

贵州文史丛刊

季刊

2020年第叁期

(总第174期)

学术委员会

主任 顾久

委员

袁行霈 乐黛云 葛兆光

钱理群 陈祖武 吴光

毛佩琦 王本朝 何宗美

陈支平 黄万机 张祥光

翁家烈 史继忠 张新民

高文强 欧阳祯人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茂爱

副主任 杨玉和 曾达

编委

林建曾 庞思纯 朱伟华

王进 张明 叶成勇

王尧礼 陈丹阳 张彪

主编 王茂爱

副主编 王尧礼

执行编辑 郎启飞 胡海琴

本期审校 张立新 桂珍明

刊名印刻 董绍伟

目 录

文史前沿

祖训：理念与实践

——以隆庆年间高拱办理贵州土司安国亨案为例……毛佩琦 (1)

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与时代学术……梁结玲 (10)

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

——兼论“甲申”政治叙事……胡丹 (17)

光绪初年丁宝楨督川与官场斗争……阳金平 (25)

一身贫骨似饥鸿

——从《离垢集》看华岳的一生……刘秀丹 (31)

四库学研究

主持人语……何宗美 (38)

《四库全书》所收宋儒考校韩集提要考辨三则……杨新勋 (39)

唐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唐宋诗文批评……蒋勇 (46)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章批评析论……姚江浩 (61)

贵州文史

心体工夫境界

——黔中王门孙应鳌知行说的三重向度……扈继增 (70)

从东京到兴义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述略

……汤涛 (79)

丁道衡民国边地考察纪行刍论……刘振宁 (87)

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利用的最佳模式选择

——以贵州、广西生态博物馆群落为主要案例……章代伦 (94)

文献整理与研究

崔述《考信录》对我国考据学的发展及影响

……王云庆 汪茜 (105)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李湛轩自叙年谱》考论……祝童 (110)

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之一）……胡海琴 整理 (115)

说图

姚大荣《西王母国故》稿本的发现……罗维江 封二/封三

GUIZHOU HISTORICAL STUDIES

No.3, 2020, Guizhou Culture and History

Main Contents

Ancestors' ncest :Ideas and Practise

——Some Examples on Gao Gong' s Dealing with the Cases of Guizhou Tushi An Guohen during the Period of Long Qin
..... Mao Peiqi

Lay Buddhist and Times Academ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njin period..... Liang Jieling

Research on the Secret Decree of Emperor Chongzhen to Bury the Remains of Wei Zhongxian—Some Narration on the
Political Story of Jia Shen Hu Dan

Ding Baozhen's Governance of Sichuan and the Official Struggle in the Early Years of Guangxu Yang Jinping

Being skinny and hungry——Hua Nie's life from "Degrees Collection" Liu Xiudan

Three Study items of the Investigative about the Works of Han Yu in Summaries of *Sikuquanshu* Yang Xinxun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Criticism of Tang and Song Poems of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n *Si Ku Quan shu* Jiang Yong

Heart-mind, Practice and Realm——Three dimensions of Sun Ying' ao's theor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 Hu Jizeng

From Tokyo to Xingyi——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Wang Boqun's Diary.....Tang Tao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ing Daoheng' s Border Inspecting Reports Liu Zhen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Cui Shu's the Book about Textual Criticism on Chinese Textual Research
..... Wang Qingyun Wang Qian

翻译 孙芳琴

祖训：理念与实践

——以隆庆年间高拱办理贵州土司安国亨案为例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洪武年间制定和实施的土司制度和政策，在历朝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和延续，保证了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隆庆年间，贵州土司安国亨因淫虐仇杀引起动乱，地方官剿抚失当，作为内阁大学士署吏部尚书的高拱及时改任巡抚，贯彻了祖训“不可因恶累善”“惠威并行”“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的原则，使事态迅速归于平静。

关键词：祖训 理念 实践 隆庆年间 高拱 贵州土司 安国亨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01-09

明朝建立以后，其统治向各边陲和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推进，而其推进的方式，不仅仅依靠武力，而是恩威并用。武力是后盾，而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则是其统治的支柱。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俗施治”，对前代的管理方式有继承也有发展。关于明朝的土司制度，前人早已多有论述。明太祖朱元璋不仅是这些制度制定实施的推动者，也是其理论的建立和阐述者。明代的土司制度及其实施，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要皆不脱离洪武时期奠定的基本框架。明代后继之君和执政官员，遵从祖训，继体守成，虽有变通而不离大法，虽有权宜而事有所宗。可以说，明代的土司制度是成功的、有效的，它维护了明朝的统一和地方的安定，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地方的发展。隆庆年间内阁首辅高拱妥善处理贵州安国亨、安智仇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充分说明了祖制的有效，也充分说明了高拱等一千人的机敏和权变。而这种恪守祖制又善于实施的做事方式，也正是明朝统治得以维持二百七十余年而大体稳定的原因。

在明朝的统治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和实施的过程中，朱元璋曾经多次阐明他的理念，提出过一系列主张，成为明朝土司政策的理论基础。比如洪武元年（1368）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自广西还朝，拜见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向他了解广西两江、黄岑二地的边务，杨璟说：“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朱元璋不以为然，他说：

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¹

又如，洪武二年（1369）七月丁未，中书省臣向朱元璋建议：“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

作者简介：毛佩琦，194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

¹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宝训·怀远人》，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97页。

边患。”太祖朱元璋说道：

溪洞僜僚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¹

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六月甲午，广西都司向朱元璋建议说：“频年僜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朱元璋说：

溪洞之民，引诱僜僚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²

朱元璋处置边境民族的原则，大体有这样几项：其一，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以不治治之；其二，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其三，安近来远，不可因恶累善；其四，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朱元璋的这些主张成为明朝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他的各项主张及做法则成为以后历代君臣必须遵从的祖训。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位，标榜一遵祖宗旧制，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得到乃父真传。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必称效法太祖朱元璋。请以云南为例。永乐元年（1403）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地官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虏其知州及民人以归。请发兵讨之。”对此，朱棣指示兵部臣，说道：

兵易动难安，一或轻举，伤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谕，未必不从，然后加兵则亦有辞。昔皇考之世，思伦发为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谕之，彼怙终不悛，乃发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赐赉诸夷，而遽继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闻车里已纳上威远印信，是悔祸之心已萌。可令云南都司移文谕之。若能格心向化，不必发兵。³

于是，九月丁酉日，又敕令沐晟说：

兵，重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云南都司移文谕之。如此格心向化，即兵可止；若谕之不悛，加兵未晚。尔其训练将士以候。⁴

再以麓川平缅宣慰司为例。永乐二年（1404）四月癸未，麓川平缅诸宣慰司并木邦、孟养二府土官俱遣人朝贡方物。平缅宣慰使司所遣使者奏：“孟养、木邦数侵其地。”于是负责管理土司的礼部官员建议：“宜以孟养、木邦贡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蛮夷知惧，不敢侵越邻境。”朱棣指示说：

蛮夷相攻夺，自昔有之。执一二罪人，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贡之使，祇沮远人向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谕之。⁵

又如永乐四年（1405），朱棣得到兵部尚书金忠等奏报，说：“湖广洪州泊里蛮夷长官司所属蛮民吴兰、吴广、吴塘华等，以妖言聚众为乱，攻劫其旁近人民。有司招谕不服，请发兵剿之。”朱棣说：“蛮夷作乱，固当诛，但兵行不免伤其良善，其令湖广三司再遣人招谕，服则宥之。”地方三司，依令而行，果然，到十月癸卯湖广都司报告说：“兰等闻命，皆已从化。”朱棣又说：

1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宝训·驭夷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95页。

2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宝训·驭夷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96页。

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太宗实录》卷二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24～425页。

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太宗实录》卷二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26页。

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太宗实录》卷三十，《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45页。

蛮夷之人以杀戮为生业，岂知有礼义？故圣人以不治之，非大逆拒命，岂可辄动官军？驭夷之道，既服，舍之可也。¹

朱棣的此类言论和处置之法，可谓与乃父朱元璋提出的原则完全一致。而后世对朱棣的指示条则，也视为必须遵从的祖制。

然而，祖训在，典章制度的规定在，并不一定能保证把地方事务处理好，贪功失误，怠惰废事，主观激乱，各种情况都常有发生，故而民族地方治理的关键在于得人。明朝民族政策和土司制度得以落实，靠的是朝廷和地方的能臣。嘉靖末、隆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首辅高拱，就是一位治世能臣。其对土司事务的处置，堪称贯彻祖制，权变运筹，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深入调查和悉心的指导，对后世是有借鉴意义的。现以其处理贵州土司安国亨、安智仇杀事件为例，透视明代民族地方治理的理念及实践情况。

一、土司安国亨、安智仇杀事件的缘起

朱元璋起兵与群雄相角逐，在打败了陈友谅之后不久，地处西南的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抚司率先归附。朱元璋令其“以故官世守之”，即仍然担任元朝所授之官职，继续掌管当地。其时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朝还没有建立。这种任用土著首领，世代相袭，不改变原有管理模式的方法，即所谓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大部分民族地区，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实行对其地的统治。

其后，永乐十一年（1413）分思南、思州为八府四州，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其下分隶七十五长官司，由中央户部管理。而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领十八卫，其下辖七个长官司，由兵部管理。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后，府并为四，州并为六，长官司或分或合，厘革不一。²

嘉靖末年，贵州水西土官安万钟应袭宣慰使职，因骄纵杀人，被左右所杀。以无子，其从弟安万镒应袭职，但却由一个庶族幼子安万钧冒充为安万钟的弟弟袭了职，这就引起了安氏土司内部的仇杀。朝廷捕杀了杀死安万钟的凶手，处罚了肇事者，而以安万镒袭职。不久，安万镒死，而其子万阿写年幼，就由平乱有功的安万铨“借袭”其职。³后来，阿写年长，改名安仁，正式袭职。不久，安仁死，安仁的儿子安国亨袭职。事情就发生在安国亨身上。史载：

子国亨袭。淫虐，乃以事杀万铨之子信。信兄智与其母别居于安顺州，闻之，因告国亨反。巡抚王诤遽请发兵诛国亨，智遂为总兵安大朝画策，且约输兵粮数万。及师至陆广河，智粮不至。诤乃令人谕国亨，而止大朝毋进。兵已渡河，为国亨所败。⁴

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⁵

时在隆庆四年二月⁶。

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太宗实录》卷六十，《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75页。

2 《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67页。

3 此据《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诸书记载略有不同，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舆地考·贵州·安贵荣始末》：“贵荣死，子万钧立，淫酗嗜杀，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候于外次，忽有贼刃万钧头去。一城哄然，督府索贼竟不得，乱五六年不定。其弟万铨廉知土目乌挂所弑也，扑杀之。诛其从者百余人，遂自立。收土嫂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万铨恣横尤甚。”参见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第六册，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7页。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四《蛮苗列传·霁安氏传》：“荣贵死，万钧立，淫酗嗜杀，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外次，忽有窃万钧头去者，索贼不可得。五六年后，其弟万铨廉知土目乌挂所弑也，扑杀之，遂自立，而妻其嫂，督府不能问。”参见查继佐：《罪惟录》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1页。

4 《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1页。

5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

6 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六十六《庚午隆庆四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26页。

按明人王圻的说法,当时贵州土司“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恣杀戮,服食僭拟,自专无上”。¹明朝对这里的管理带有羁縻性质,对他们的约束是有限的,所以在处理土司的问题上,需要格外小心谨慎,准确拿捏分寸尺度。土司首领之间以恩怨相互仇杀,本经常发生,巡抚不问根由,贸然介入,支持一方,显然已属躁进。如果官军侥幸胜利,或许可以维持短期平静。而此次官军介入惨遭失败,致使局面难以收拾。另一方面,安国亨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毕竟还要听命于朝廷,从根本上难与官府抗衡,因此心存恐惧,担心朝廷发大兵征讨,于是“遣使哀辞乞降”,而“朝廷未之许”²。安国亨无以自明,朝廷则没有台阶下,必须以征剿挽回权威和颜面。对峙之局无解,一场征战似乎不可避免。

二、明辨事件缘起,朝廷不能充当土司内斗中某派的工具

隆庆四年(1570),一度被废职的高拱被召还,再次进入内阁,并兼理吏部,旋晋少师建极殿大学士。³作为内阁辅臣,署吏部尚书,对于这场发生在遥远边陲的动乱,他说“予深念之”。他将如何处置此事?

由于攻打安国亨失败,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王诤上章自劾,王诤、安大朝皆被罢官。要处理此事,首先要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接替王诤担任巡抚。高拱选中了太仆少卿阮文中,认为他“沉毅,可以属事”,推荐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军务,被批准任命⁴。阮文中赴任之前来问计,高拱对他说:“所为用君贵州者,为处安国亨是也,君必勉之。”高拱向阮文中面授机宜,而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事件的本质,他说:

吾闻安国亨本为群奸拔置,宣淫播虐,遂仇杀安信,以至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相仇杀无已。其交恶互讐,皆仇口诬词,不足凭。乃安智不能胜国亨,抚台欲为智伸,意固善,然却为智所欺。而拥兵居省,又为智所给,而谋动干戈则多矣。国亨不服拘提,乃见抚台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⁵

高拱非常睿智地分析了事发当地的实际情况,的确要比身临其境的官员高明得多。

首先,安国亨的劣迹朝廷久已有闻,向朝廷投诉的另一方,以其对朝廷的亲近,自然更易获得同情和支持。然而,在相互仇杀中,彼此攻击之词,难免过分。这些“仇口诬词”不足凭信,只要深思一下就可以判定。其次,官府要缉拿安国亨,安国亨不出,其原因在于“疑畏”,在于他认为抚台偏袒安智。这也是容易推断得出的。这些都是高拱的过人之处。但笔者认为,高拱作为明朝的高官,必然对明朝的土司政策更加明了,理解更加深刻,也对历年处置土司事宜的得失知之更深。明太祖朱元璋早就对如何处置土司之间的争斗提出了具体政策,也留下了先例。

洪武初年,水西宣慰司的土官宣慰霭翠与宣慰宋蒙古歹一同归附。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与朝廷关系特别亲近。但是,当霭翠提出要求,要朝廷出兵为他讨伐陇居部落时,却遭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断然拒

1 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第六册,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7页。

2 《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1页。

3 高拱《边略》:“隆庆庚午,予还内阁,兼理铨务。”(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按,高拱召还在隆庆三年十二月。《国榷》卷六十六,隆庆三年十二月庚申“起高拱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署吏部事。”(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六十六《己巳隆庆三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20页)《明史·宰辅年表二》隆庆三年,拱“十二月召还,兼掌吏部事。”(《明史》卷一百十《宰辅年表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64页)

4 《国榷》卷六十六,阮文中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军务(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六十六《庚午隆庆四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32页)。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乃推为都御史巡抚贵州。”(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

5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

绝。朱元璋说：“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¹在地方部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朝廷应持公平中立的态度，不能站在哪一边，朝廷不能以武力支持任何一方。朝廷站在高处，才能驾驭双方；朝廷支持一方，必然陷入矛盾之中。显然，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高拱是清楚的。太祖朱元璋的成功管理土司事例，必然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十分清醒地说，“抚台欲为智伸”，是“为智所欺”，决不能为安智所利用。

三、罪其本罪，当无不服

明朝一些官员，常把土司的问题简单化，凡有争斗动乱都称之为反，称为叛逆；对一切所谓反叛都以武力镇压。高拱则要求仔细区分具体情况，不轻易下“反叛”的断语。他进一步对阮文中说：“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背去而为乱者也。”不能把彝族部落之间的相互征杀看成叛乱，也不能把被拘提者不束手就擒看成是抗命。如果朝廷处事不公，偏袒一方，另一方的违拗就是可以理解的，就不同于叛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而今必以叛逆论之，亦甚矣”。²

高拱一再耐心地叮嘱阮文中：

君行矣，宜廉得其实，而虚心平气处之。若果如愚所闻，则当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穷究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当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无叛逆之情自可见。于是只以其本罪罪之，当无不服。斯方为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³

然而，阮文中并不能完全按照高拱的嘱托去做。即使他经过调查，证实确如高拱所言，安国亨并非叛逆，但身处事发现场，受到习惯势力的包围，“狙于浮议”，仍无法摆脱“浮议”的牵制，因此在给高拱的报告中“不敢突变前说，语多依违”。高拱只好再次写信谆谆训示：

若民彝异类，顺逆殊途。虽有衅隙，本非叛逆之实，则人臣当自为处分，而不可过言于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当扑灭。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钉入其罪，过以言之，则将如何处也？安氏之乱，本是安国亨、安智彝族自相仇杀，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于我者，何以谓之叛逆？而前此抚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闻叛逆之说，则法所必行，岂容轻贷？而安国亨本无叛逆之实，乃祸在不测，且图苟全，地方官更不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变，乃又即以为叛逆之证，可恨也。⁴

地方官处理不当，把自己激成的事变当作叛乱，是不可原谅的。高拱既而说：“以朝廷之力，即族灭安氏何难者？顾事非其实，而徒勒兵于远，非所以驭彝狄而安中国也。”⁵“驭彝狄而安中国”，要在于罚当其罪，不能轻易用兵。

对于安国亨的“拘提不肯出”，阮文中判断为叛逆，已经是一种错误判断，而以叛乱之名上书给了皇帝，并且请求派发兵粮进行征剿，就会造成错误导向。高拱指出了这一错误的后果：如果接受阮文中的说法，把安国亨当成叛逆，朝廷就绝无宽容之理，必须要发兵征剿。既然朝廷发兵，安国亨也就别无选择只能与朝廷对抗，真的成为叛逆。如此弄假成真，双方就都没有退路了。如何才能还原事实真相，使双方回到正确的轨道，高拱在内阁急得团团转，“环床而走”，同事看他急成这样，问他为什么“环床而走”？他回答说：“思贵州本耳。”是为来自贵州的奏本而发愁。对贵州的奏本进退两难，“欲从之，则

1 《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68页。

2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页。

3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页。

4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页。

5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页。

非计；欲无从，则失威”。从之的结果是“黥兵轻杀”“于义何居”；不从的结果是“示弱损威”“其体不可”。如何解开这一局死棋？高拱想出了一个缓冲的办法，让决断推迟。他提议派一个得力的人作为“勘官”前往调查，“果无叛逆实，则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实，即发兵屠戮未晚”¹，尽管高拱已经胸有成竹，但为了说服阮文中，也避免朝廷仓促决策，必须有一个说辞，使巡抚阮文中和土司安国亨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高拱把兵部职方郎中召来，告之如此如此，由兵部提请皇帝批准，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前往贵州勘察，同时再次写信给阮文中：“愚熟观其动静，似是服罪为真，非敢负固者，顾吾所以处之何如耳。”“若以吾中国百姓之财，中国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仇杀、无敢犯我之土彝，诚不敢以为然也”²。

这是一招活棋，事情果然出现转机。

皇帝下令，特差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衔命会勘”“先声所至，逆首破胆”，朝廷将派遣特差的消息刚一传到贵州，其威力就开始发酵了，结果诸土司“畏威怀德，向化输忱，不烦兵戈自尔帖服”，争斗双方都纷纷有所表现。安国亨大为高兴，说：“吾生矣，夫吾岂叛逆者耶？然所以不出听理者，恐军门诱我出杀我也。今既有旨勘，则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吾乃可出听理，明吾非叛逆也。”³安国亨从名副叛逆的罪人，变成了等候调查处理的当事人，他有机会把事情说清楚。安国亨逢人就为自己表白一番：“吾岂叛逆者耶？”。

此前，阮文中责令安国亨：其一，献出拨置人犯；其二，照彝俗，输银赔偿安信等人命；其三，分地安插疏穷母子；其四，剥夺宣慰职衔，与男权替；其五，从重处罚，以惩其恶。

见到此令，安国亨母子仍拥兵不出，因为担心按叛逆治罪。及至朝廷派遣特差即将到达的消息传来，安国亨才俯首听命：交出人犯；赔偿各项罚银四万一千两；保证不再构兵仇杀；愿革管事，令男安民权理公务；安置疏穷、安智母子。此时，朝廷派遣的勘官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还没有到达贵州，闻知事情已经解决，就于中途被召还了⁴。明朝人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到：“隆庆间，贵州宣慰司安国亨与安智仇杀，钦差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讯勘。当其时，四川、贵州岂无抚臣？而动遣部科者，以公论出自朝廷也。”⁵派遣勘官，在当时不仅仅起到了缓冲作用，还展示了最高层关注的姿态，显示了最高的公平和权威。

阮文中将事态进程奏报朝廷：“该臣钦承明旨，参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舆论，反覆两酋颠末，事果出于有因。毒祖属诸暧昧，杀叔起于谗疑，拜将封官，既无事证可指；斩关掠地，又无行迹可稽。拒敌损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恶已献，纳银罚治，皆照彝俗价赎。而群犯就擒，继恩、国贞释自拘囚而无恙，知未怙终。安智、疏穷插之原圉而有归，可因解原忿。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宽其一死。”根据阮文中的奏报，下兵部提出最终处理意见，皇帝下旨：“安国亨凶恶干纪，本当动兵剿戮，既投见服罪，遵奉约束，并禄氏等都且饶他一死。安国亨着革了任闲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安国贞代充头目。如再违法构乱，定行剿治不饶。”⁶

阮文中大功告成。兵部叙功：“巡抚都御史阮文中开五事以责成，致二凶之耨服。多言指授虽出诸黄

1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页。

2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页。

3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页。

4 《国榷》隆庆五年三月庚寅：“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往勘贵州安国亨，以国亨与安信仇杀，阮文中请兵之。兵部议勘，三近既行，文中又言，国亨出就理，召三近还。”参见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六十七《辛未隆庆五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61页。

5 《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舆地考·贵州·安贵荣始末》，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第六册，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0页。

6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页。《明史》卷三百十六：“巡抚阮文中至，檄捕诸反者，密使语国亨，亟出诸奸徒，割地以处安智母子，还所费兵粮，朝廷当待汝以不死。于是国亨悉听命，帝果赦不诛，而命国亨子民袭。”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1页。

阁之臣，百尔经营，实竭其赤心之义，并其馀官舍人等，通宜分别赏赉。”皇帝下旨：“重赏文中，余各赏有差。”¹《国榷》隆庆五年十月辛丑记载：“贵州宣慰司土舍安国亨降。执献其党。上官其子及安智子国贞。”谈迁在评论这件事时说道：

夷俗仇杀，尺一可解。辄叛坐之，出于倖功。万一彘突，惟力之是视，黔无幸矣。新郑当事，单于解辮，土司革心。亦宁得易言制胜乎。²

因为对事实判断准确得当，使复杂的矛盾冲突凭一纸文书就得以解决了。不赖武力而使土司心悦诚服，高拱对安国亨事件的处置，实在是一件值得盛赞的事。

四、改土归流，需要条件和时机

一般认为，改土归流标志着中央政权对地方管理的加强。但如果时机不成熟，不恰当地改土归流，可能适得其反。在安国亨事件中，安智为取得朝廷支持，借重朝廷打击仇家安国亨，甚至要求将安国亨改土归流。土司本不纳入朝廷官员序列，在本地管理上高度自治，享有很多特权。改土归流，意味着土司的许多权力利益的丧失。安智是想借此剥夺安国亨的权力，以朝廷约束对方。所以，即使在安国亨已经认罪认罚之后，安智还是坚持要求杀死安国亨母子，将地方改土归流。无疑，在他们看来，朝廷是希望改土归流的，因而以此迎合当事者急功近利的心理，对朝廷施以诱惑。

显然，安智身边有高参，从中挑拨策划。这被阮文中识破，他处置了“拨置之人”，安智才表示服罪。但是，当事件过去一个多月后，又有安智和疏穷的奏疏送到京城，奏疏一方面为自己申辩，另一方面还要求改土归流。这在京城引起了议论纷纷。高拱感到此事蹊跷：贵州距京师数千里之遥，信件怎么能在一个月内得以往还？他猜测一定有安智的人暗住京师，潜为谋划。于是他下令通政司逮捕投送奏疏之人，送交法司加以审问。果然，他们供出，有两个被罢职潜逃投靠安智的人，携带重金，久住京师，为安智串通谋事。那份奏疏就是他们写的，而安智并不知道此事。这两个人被处以充军，逐出京师，议论才得以平息。

高拱身处决策地位，有长远的思考，才能不为近功小利所诱惑，也才能悉心访查，洞烛阴谋。改土归流，是民族地区管理方式的一种选择，但并不是唯一选择。在条件不成熟时因改土归流而造成的纷乱并不罕见。在一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五、德威兼用，感心摄暴

明朝在其版图之内，从来就是恩威并施的。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御史自广西还，向太祖朱元璋进献《平蛮六策》，内有“立威”一策。太祖览毕，谕之曰：

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³

在贵州地区，一直有一股“巨寇”万余人，以者念为首，“僭号称王，设官拜将，宫室服用，拟诸乘輿”。他们时时发兵到安顺一带抢掠，当地“民彝”“患苦垂三十余年”。对这一长期为患，与明朝相对立的势力，刚刚成功处理了安国亨事件的阮文中，“欲发其事，剿除之”。阮写信给内阁大学士署吏部尚

1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页。

2 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六十七《辛未隆庆五年》，中华书局1958版，第4170页。

3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宝训·怀远人》，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98页。

书高拱，商议如何办理。高拱的回答很干脆：

此贼称乱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发其事而剿除之，可谓忠矣。调度既周，方略既定，便当举事，吾其佐君成之。¹

在朝廷的支持下，阮文中发兵征剿，擒拿了寇首者念，斩之。“平其馀党，扫其巢穴，土地悉归州卫版图，深山穷谷无复逋逃渊藪”。结果，“圣武布昭，天威远震”，明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同时，这种对叛逆的坚决打击，“彝首旁观，亦皆震慑”。所谓恩威并施，武力打击可以扫除叛逆，也可以震慑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叛逆，使局势保持平静。而怀柔施惠，也是在强有力的武力为后盾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的。

在高拱的统筹和指挥下，安氏的争斗得以平息，多年的寇患也被铲除。可以说是恩威并施了。高拱说，贵州平静了，“可免百万生灵之命”“俾王化宣流万里之外”“自是境土谧宁，生民安业，兵无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劳，上下恬熙，与中华埒矣”²。

《明史》载：“国亨事起于隆庆四年，至万历五年乃已。”³《明史》又载：“国亨既革任，日遣人至京纳赂，为起复地。十三年，播州宣慰杨应龙以献大木得赐飞鱼服，国亨亦请以大木进，乞还给冠带诰封如播例。既而木竟不至，乃谗罪于木商。上怒，命夺所赉。国亨请补贡以明不欺，上仍如所请。”⁴后来，安国亨恢复了宣慰使之职，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国亨子疆臣袭职。那应当是后话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证明当年安国亨并没有叛逆。高拱等人对他的处置是正确的。

六、世事练达，机宜权变

高拱等人处理安国亨事件的经过极其精彩。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悉心领会祖训所规定的明朝对土司的基本政策，在多变的情况下头脑清醒，坚守祖训而又灵活有度。高拱邃密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领导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整个事件中，高拱不仅要维护明朝的制度，还要对付官员们的陋习。防止他们的欺蔽，防止他们隐瞒于己不利的实情，也要防止他们贪功好事，为制造业绩，惟恐天下不乱，甚至不惜扩大事态的劣性。高拱批评说：“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己之前说。”⁵他嘱咐即将承担重任的阮文中，说：“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图之矣。”⁶官僚队伍中的这种劣行，不是在处理土司事务时才发生的，但是以这种方式去处理土司事务，是绝对会坏事的。老于官场的首辅兼掌吏部的高拱，对官僚们的丑态再清楚不过了。他在长期从政中对此习闻习知，对官员们的惯常行为了如指掌。

另外，高拱对万里之外彝情的判断，对土司之间关系的分析处理，则反映出他练达世事洞悉人情的

1 高拱：《与阮文中书》，《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页。高拱：《答贵州阮巡抚书一》，《政府书答》卷之二《奢服贵番》，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7页。

2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0页。

3 《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1页。又，《国榷》万历五年十一月丙寅：“贵州土舍安国亨、安智争杀十年，至是始就勘听命。”（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七十《丁丑万历五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326页）按，《明神宗实录》卷六九，万历五年十一月丙寅：“先是，贵州土舍安国亨、安智互相仇杀，已经十年，至是奉旨行勘，二酋始听处分。抚按官何起鸣等因条上善后八事，部覆如议。得旨：‘国亨等务感恩悔祸，各保疆土，如违约启衅，剿除不赦。’”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神宗实录》卷六九，《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495～1496页。

4 《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2页。

5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页。

6 高拱：《边略》卷之三《靖彝纪事》，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页。

能力。比如，他认为土司之间的互相攻击“皆仇口诬词”，不能作为处置的凭据。比如，他断定国亨之“不服拘提”，是因为抚台偏袒一方“而疑畏不敢出”，地方官以此认定其违法抗命，是“更不复原其情”。高拱要求，凡断事须设身处地，凡度人要以理以情。最难得的是，他要求官员既要照章办事，严防欺蔽，又不能谨慎裹足，拘谨琐碎。前述，他对阮文中说，有些事“人臣当自为处分，而不可过言于君父之前”，也就是说，作为衔负钦命的抚按官，能自己处理的就自己处理了，不要什么都奏报给皇帝。当报则报，不当报则不报，也不是奏报得越细越好、越及时越好。一定要分清事理、成算在握，需要做最后决断时，才可以奏报。否则，把皇帝推到前台，迫使他过早作出决定，一旦令下就无回旋余地了。这些都反映出高拱善于统筹全局、机宜权变的能力，也说明他敢于担当的缜密和果断。高拱不愧治世能臣，岂兢兢小吏可同日而语耶。史家称“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¹，诚哉斯言。

Ancestors' ncest :Ideas and Practise

——Some Examples on Gao Gong' s Dealing with the Cases of Guizhou Tushi An Guohen during the Period of Long Qin

Mao Peiqi

Abstract: Some policies and Tushi rules during Hong Wu period, which was strongly carried out in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periods. It has an efficient insurance of Ming Dynasty' s rule towards the minority groups, which also has a safe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ciety. During Longqin period, Tushi An Guo-hen in Guizhou aroused some terrible turmoils by his cruel immodesty rules and hatred killings of the people. The local officials had a worse action in keeping down the turmoils. Gao Gong, as a prefectual scholar in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in time he appointed another governor, and also carried out the ancestor' s words, “Never let the evil person hurt the saint or the kind-hearted man.” “Let the grateful feeling and the powerful action combined together.” He used the rule “to keep the people quite, to treat them with honesty, to tell the truth and good ideas towards them .” He made the incident or turmoils quickly calming down.

Key words: the ancestor' s words; ideas; practise; Longqin period; Gaogong; Guizhou Tushi; An Guo-hen

责任编辑：王尧礼

¹ 《高拱传》，《明史》卷二百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40页。

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与时代学术

梁结玲

(闽南师范大学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佛学居士与考据学者多有交往,居士佛学受到了考据学学风的影响。考据学以经史文献为考辨对象,注重博学考证,佛学居士也深入儒释道典籍,在典籍的细读中阐发教理,有意回击考据学重考据轻义理的弊病。乾嘉考据学反对理学援佛入儒,指责佛教为异端。为回击考据学的责难,居士佛学在三教融合上走得更远,他们打通了三教的界线,认为三教其实只是一教,并无二教或三教。考据学重典籍的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居士佛学在经世、救世的实践上较前代也走得更远,这有力推动了世俗佛学的发展。

关键词:乾嘉时期 考据学 居士佛学 三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B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10-16

传统佛教在清代并无大的创新,整体趋于式微状态。清代佛学的中坚是居士佛学,上至帝王,下至遗民、普通士子,居家修佛不绝如缕。清初和清末动荡的社会促使不少士子遁入佛门,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这两个时期的居士佛学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考据学以恢复儒家原典的真义为己任,排挤杂有佛学因子的理学,佛学自然也是考据学打击的对象。居士佛学往往具有三教合一的特征,考据学对纯儒思想的探求使得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举步为艰,在与主流考据学的抗争中,这一时期的居士佛学呈现出与清初、晚清不同的风貌。任继愈认为“‘三教合一’,则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的发展过程和最终归宿”。¹如果说清初和晚清的居士佛学汲汲于国运民艰的话,那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更趋向于学理上的考辨,它主动向主流学术靠拢,染上了浓重的时代学术色彩。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的时代特征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充分的探析,这是很可惜的。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以彭绍升、汪缙、罗有高为代表,本文即以这三人为主,辨析这一时期居士佛学的时代特征。

一、居士佛学对经史文献考辨的注重

考据学在乾嘉时期是显学,梁启超说道:“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

作者简介:梁结玲,1972年生,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化与诗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与文学”(项目编号:16XZW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一期,第6页。

少。”¹仔细考察乾嘉时期信奉佛学的居士，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多数都浸染过考据学。彭绍升出自朴学大师卢文弨门下，早年以经史考证为取向，“闻将尽研诸经，首先致力于《诗》”²，卢文弨知道弟子有此志向，欣喜不已，热情地给他指引方向。罗有高与当时的考据学者交往不浅，他的好友王昶评论他：“于儒宗明道、象山，而群经主古注，小学主《说文》，皆能参稽义训，句栴而字比之，归于一是。”³罗有高的考据学小有成就，他主古注、重《说文》的治学方式与乾嘉考据学者并无二致，这应该说是时代学术使然。考据学除了需要文字、音韵、训诂等专门知识外，还需要博通经史，以达到以经证经、以史证经的效果。广博的学识是从事考据的基础，章学诚曾感慨：“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⁴这正是时代学术的表征。受到时代学术的影响，乾嘉时期的佛学居士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富于学识色彩，他们的佛理推演更多的是源于典籍特别是儒家的典籍，这与乾嘉考据学重博学的趣味取向是一致的。彭绍升曾被卢文弨寄以厚望，彭绍升学识也极渊博，他对秦汉典籍如《易》《周礼》《左氏春秋》《诗经》《礼记》《中庸》等都有仔细辨析，对程朱、陆王之学更是体悟至深。在乾嘉的博学时代，考据学者严辨儒佛，没有广博的学识就很难与主流学者对话了。在章学诚的记载里，戴震自视甚高，对普通士子多持居高临下的姿势，而戴震在读到彭绍升的《二林居制义》后，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中感慨道：“文境高绝，然在作者不以为文而已，以为道也。大畅心宗，参活程朱之说，以傅合六经、孔、孟，使闳肆无涯涘。孟子曰：‘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学尽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谓之有得；求杨、墨、老、庄、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谓之有得。”⁵戴震虽然痛批了彭绍升以佛、老释儒的做法，但他对彭绍升的学问深入经典、有自得之见的治学是认可的。彭绍升的《与戴东原书》与戴震的回信都是建立在传统典籍的运用上，这两封信在乾嘉影响至大，不管是拥护戴震的考据学派还是反对戴震的理学家都以此信为中心展开论辩。戴震的弟子洪榜认为这两封信是唐代以来学术史的一次总结，“夫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⁶。三教合一的思潮在明清进一步强化，戴震的这封信确实具有廓清学术史的意义，彭绍升借助历代典籍阐释三教同源可以说也是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两封书信都旁征博引，对儒家经典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两者的激战是学术史的必然。

乾嘉考据学重名物象数、典籍原貌的考证，不甚注重义理的发掘，学界普遍认为乾嘉学术“有考证无义理”。乾嘉考据学的价值取向与佛学相去甚远，这一时期的佛学居士也是有激于考据学的这一问题而发，考据学可以说是乾嘉居士佛学的对立参照系。彭绍升在序罗有高《尊闻居士集》时说道：“孔氏既没，学统歧，道术裂二千馀年，承学之士递相祖述，专门名家，于是有训诂之学，有辞章之学，又进之为道德仁义之学。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经之旨，以孔氏为宗，要其浅深纯驳高下之别，则断不能以颀同也。……并吾世而攻训诂辞章者往往有之，其能究极于道德仁义之归者抑鲜矣。……而或以台山之文出入乎儒释，泛滥乎庄郇，兼综乎训诂辞章，疑有累于道。夫是则台山之博也。其外心之著与乃其所以约之者，非犹夫人之所能测矣。其于博约之间，内外本末之叙，辨之者蚤矣，而又何疑焉。”⁷罗有高博通三教，由经史考据转入佛学，他对时代主流学术是深有体会的，彭绍升对考据学“学而不思”的批判其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4页。

2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四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3 罗有高：《尊闻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七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4 章学诚著，仓修良校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5 戴震：《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6 洪榜：《初堂遗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四一〇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7 彭绍升：《二林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3～424页。

实正是佛学对主流考据学的态度。正是基于探求义理的视角,佛学对考据学进行了回击,这一回击也促使了自身理论的自觉。彭绍升在《读〈礼记〉》中说道:“后之言礼者,吾悲之辨名物、稽象数、考文章以为礼,礼若是而已哉!后之言乐者,吾悲之别阴阳、分尺寸、穷损益以为乐,乐若是而已哉!若是者古人之糟魄已尔,而人道之精华不在焉。”¹中国学术素有“道问学”和“尊德性”的传统,宋明理学以“尊德性”为要旨,而考据学却秉持“道问学”的原则。面对同样的典籍,乾嘉佛学居士重在义理地发现,他们对考据学“学而不思”感到不满,彭绍升就批评他的老师卢文弨:“然读先生九原之作,其于天人相与之际,古先圣贤问学原流,似未能穷尽其意。故其言得粗而遗精,其读经诸篇考证颇详,辩论亦核,而于切问近思之旨,犹有间焉。盖古人之治经,非独以其言而已,必有不容已于性命之故,孳孳焉,内求而不释,真积力久,一旦豁然,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故发而为言,如日之丽空,如川之赴海,岂不明且信哉!先生之文既不能无歉乎此。后之編集者似不宜遽以有道加之,使先生诚诣其实与?则近世作者如汤文正、陆清献,虽不言有道,人将以有道归之,若犹未也。则恐先生不愿有是名也。”²经典的义理为精,名物象数的考证为粗,彭绍升对两才的辨析点出了考据学的缺陷。罗有高也说道:“朱子高据上达要津,而能降心敬重汉儒,《急就》《凡将》亦孜孜精校,不肯放过。所以经师人师合为一身,而非诸儒所能望也。大抵说经当知有理实、有事实。理实者千圣结顶处,事实者一切无量净土,一切刹,一切尘,一切无量差别法。”³彭绍升、罗有高等佛学居士的治学是对两者的整合,也是对乾嘉考据学的扬弃,这对矫正考据学轻视义理探究是有学术史意义的。

二、回应考据学求纯儒的价值取向,三教融合的程度更深

明朝的覆亡沉重地打击了士子阶层,不少士子将覆亡归因于陆王心学,顾炎武说道:“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⁴陆王心学具有明显的援释入儒的特征,顾炎武严辨儒佛,主张回归儒学的真义,“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乾嘉考据学继承了清初学人的治学理路,严辨儒佛,坚持纯正的儒学。戴震在与彭绍升的信中明确表示:“今赐书有引为同,有别为异;在仆乃谓尽异,无豪发之同。”⁵戴震对援佛老人儒极为痛恨,他认为自己的著述正是为“保祖”“保种”而作。钱大昕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中专门列有“攻乎异端”条,对历代援佛老人儒进行了批判,作者感慨:“而人之习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为不孝不弟之事,靡然从之,千有馀年而不悟,可不为大哀乎!”⁶辟二氏是乾嘉治学的方向,除了戴震、钱大昕,主流学者如洪亮吉、袁枚、章学诚等都对佛学有所批判。

面对主流学术的强大话语,如果还在论三教如何融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但乾嘉居士佛学在三教合一的步子上较前代更坚决了。汪缙反复强调其思想主儒家,援佛只是为了补充儒家理论的不足:

缙为学虽游乎儒释,然缙尊孔氏之心实甚于尊释迦氏。缙见释迦氏之徒,有以其道加于吾孔氏之上者,辄心恶焉。窃以吾孔氏之教行乎中国,吾孔氏之道则贯彻三界,凡有伦有物之处,一皆吾道所贯彻也。……其游乎释氏者何也?……缙促促人间世,悲人生之为浮尘所转,甚矣;悯人心之

1 彭绍升:《二林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页。

2 彭绍升:《二林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页。

3 罗有高:《尊闻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七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

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5 戴震:《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6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为爱欲污染，极矣。每读释迦氏书，见释迦氏悲轻尘，悯污染，哀号慈，摄震动一切，辄为之痛彻心腑。缙于是弹丝弦、鸣法鼓，欲为之震动一切。是又缙之心也。缙尝究释迦氏出苦之因，非徒以自私而已，实欲息三界轮回苦也。乌乎！三界轮回之苦甚矣，惟释迦氏之求出苦为入道之因，以证道出苦为果，其求出苦也，实能发大誓愿，哀三界众生轮回，苦念道成日，拯而出之。¹

儒家论现世，释迦氏论来世，一现世一来世构成了完整的个体生命意义。彭绍升对汪缙标举儒释感到不满，他认为三教其实只是一教，三教的理论是一致的。他批评汪缙：“兄之文碍于义者，在儒释之间，一彼一此，忽予忽夺，东西二教如日月相推，并行而不悖。要其归，教人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则一而已。不此之察，至主张同异，鼓弄是非，名为尊圣而圣不加尊，名欲护儒而儒不受护。何则？本之不立，只益戏论故也。又如《与韩公复书》，多为支离之说，自缠绕，此非独文字之病无，亦知有未致，理有未穷故邪。其不足于辞，则曰：‘吾之文本不求工字句也。’兄试观古圣贤人之文，一字之设，其立如山，一句之成，其安如地，亦有不工字句者邪？”²彭绍升认为儒释道只是一理，之所以产生分歧，乃是因为所得有限，如果能够从全体上进行把握，那么三教其实就是同一回事，并无见解的分歧和门派之分。

“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在人，不在教之同异也”³。三教的结穴乃在于心性，形成三教最根本的原因是“机见差别”，没有悟到三教在心性上的一致性。“道一而已。在儒为儒，在释为释，在老为老，教有三而道之本不可得而三也。学者由教而入，莫先于知本。诚知本，则左之右之无弗得也”⁴。彭绍升所谓的“本”其实是心，他通过这一“本”将三教同一化了。为了证明“儒释一理”，彭绍升积累素年，专门写了《一乘决疑论》以辟儒释异同之说，“以究竟一乘之旨”。他认为不管是儒还是释老，理只有“一乘”，并无“二乘”或“三乘”，儒佛斗争不已，乃是执一己之见而已。彭绍升分析了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辟佛的错误观点，证明儒佛之理只是一理。在文后，作者还得意地写下了自己的题后和题诗。题后再次重申了三教同源的主张：“此论作于重光赤奋若之冬，阅今十一年矣。初脱稿时，汪子大绅评为决定说，又谓不独佛氏之圆宗，亦儒门之了义，而删去戒杀生一节。及论老庄一节，其意在和同三教，不欲有所轩輊于其间。又删去末后两节。一则谓法法无根，才费分疏，已成死句；一则谓心言直故，无诸委曲，直收直放，一往快然，其言亦各有指。然戒杀一事，乃儒佛共由之路，岂得谓佛好生而儒好杀邪？诚好生，又岂得以生为仁，以杀为义？以杀为义，则义乃仁之贼矣，而岂然哉？老庄之书具在，与《圆觉》《楞严》子细较量，同异自见。实际理也，一尚不立，何有于三？然建化门头，不无差别，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分剂画然，要不碍大虚之体。最后论诸先生所证，真实不虚，并无委曲。此论不明，则诸先生亦六师三武之流耳，又何能模范人伦兴起百世哉？故仍依原本，而附著其说如此。”⁵如果说汪缙对佛教某些教律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彭绍升在打通三教时把这种顾虑都打消了，他将三教完全同化，完全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分析三教典籍时，彭绍升也很谨慎，他直接阐发义理，引用三教证明此一理相同，并无二致。在《阴鹭文集注叙》中，彭绍升论道：“稽古圣王继天出治，凡举大事决大疑必归命于帝。《书》称‘帝赉良弼’，《诗》称‘帝谓文王’。盖德合乎天者，帝实凭焉。其理自然，非意之也。道家言天上有京有阙，帝居其中，而日月星辰、五岳四渎之神皆统于帝，各以功德之大小为位次，递相联属，主察人间善恶，加赏罚焉。佛经言天与道家略等，其与《诗》《书》所陈吉凶祸福之旨，

1 汪缙：《汪子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五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92～493页。

2 彭绍升：《二林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9页。

3 彭绍升：《居士传》，《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二八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4 彭绍升：《一行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页。

5 彭绍升：《一乘决疑论》，清同治八年如皋刻经处刻本，第32～33页。

鬼神之说无弗合也。”¹通过具体的论述，彭绍升将三教同一了。

佛学教派林立，就清代而言，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等依然活跃。在考据学成为主流学术话语的条件下，佛教教派的对立其实并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与三教合一的理论构建不相吻合，在论及佛教各教派的时候，彭绍升有意整合佛教的各个门派。彭绍升主修净土宗，而对其他教派，并无排斥之意，认为佛教各派教理是一致的。彭绍升的《华严念佛三昧论》专论华严宗，当有人质疑两教难以合辙时，他说道：“子不读无量寿经乎？经中叙分，首述普贤行愿，劝进行人，三辈往生，俱云发菩提心。终之以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纵修功德，还堕胎生。然则诚欲坐宝莲华，登不退地，必也依文殊智，建普贤愿，回向往生。今此华严，正当其教，至观经上品上生者，必诵读大乘方等经典。言大乘方等，则又莫若华严最尊第一，因果无差，有何纡曲。”²彭绍升在《书知归子传后》中谈及了此著述的目的：“著《华严念佛三昧论》，以释禅净之诤。”³又说：“或参禅，或念佛，一门深入可也，两轮并进亦可也。”为了表彰历代佛学居士，彭绍升著有《居士传》，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教派的佛学居士，是清代收集佛学居士材料最完备的著作，整个著作体现出了居士佛学集大成的特点。同时代的王廷言在《居士传》的跋中说道：“儒佛之道，泥其迹若东西之相反，然循环其本，则一而已矣。知归子之学，出入儒佛间，初未尝强而同之，而卒不见其有异，所谓知本者非耶。既以自利，又欲利人，上下数千百年，凡伟人硕士有契斯道者，采其言行，比以史法，合为一书，名曰《居士传》。……予读之竟，作而叹曰：‘自为儒佛之学者，迷不知本，党同伐异，泣岐无归，知归子起而救之。是书之作，盖欲学者除去异同之见，反循其本而致力焉。至一旦豁然，还问其所为儒佛者，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复何异同之有？’予既乐玩其书，爰授之梓人，以广其传，兼志其缘起如此。”⁴王昶说罗有高：“于释也，皈心宗乘，服膺《磐山语录》，兼通天台、贤首诸家，而以净土为归宿。”⁵这与彭绍升有相似之处。

三、居士佛学的经世思想

经史考证需要丰富的学识积累，时间和精力多花费在典籍的阅读上，考据的结果也多是纸上争胜，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乾嘉考据学不求实用的印象。“他们读书虽勤且多，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淡薄了，钻进故纸堆里，从事字句的考证，对当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敢问津”⁶。随着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乾嘉考据学经世思想已为学界所承认，如果深入乾嘉考据学，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学术研究弥漫着追求经世致用的风气。乾嘉考据学是对理学的反拨，他们反对理学空谈义理，认为儒学的本义就在于经世致用，理学援佛入儒，执执于性理，已背离了儒学的原意。钱大昕说道：“《易》《书》《诗》《礼》《春秋》，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而守残专己者，辄奉一先生之言以为依归，虽心知其不然，而必强为之辞。又有甚者，吐弃一切，自夸心得，笑训诂为俗儒，诃博闻为玩物，于是有不读书而号为治经者，并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⁷乾嘉考据学试图通过恢复儒家原典的原意以求经世致用，这是考据学的内在追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开篇就说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⁸即便是比较玄虚的《易》，章学诚也认为“盖

1 彭绍升：《二林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2 彭绍升：《华严念佛三昧论》卷首，《卮言藏经》第一〇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8页。

3 彭绍升：《一行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5页。

4 彭绍升：《居士传》，《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二八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页。

5 罗有高：《尊闻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七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6 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7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

8 章学诚著，仓修良校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讖纬术数，以愚天下也”。¹崔述也认为，理学将先儒经世致用的精神丢掉了，“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于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于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于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²乾嘉考据学者讲求的经世致用是“无用之用”，其内在精神仍然是染指现实，仓修良认为“整个学术研究都应当做到经世致用，至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经世致用，要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特点随时应变，不可能千篇一律”。³这确实是很有见地。

宋明理学援佛入儒，高谈性理，这遭到了考据学者的猛烈批评，居士佛学如果仍然局限于佛理的心性、书斋，那就很难与考据学进行对话了。乾嘉时期的佛学居士对考据的内在学理大多了然于心，他们也强调外在的事功。罗有高说道：“夫文与道一而已，修之于身，措之于事业者，道也。修之于身，而次第其功候节目之详，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于事业，而条布其治迹，敷悉其德产精微涵揉之极致，彰往察来，相协伦类，出于忧患同民不得已之诚。其言奇正不同，其气之行止，节族之长短高下、抗队〔坠〕疾徐，壹顺法象之自然，而不与以私智。以其纂著陈修能之矩，昭事为之，则烜照心目，物察伦章，则文命焉，岂得歧于道而二之也。……道之胜不胜，虽有神姿，难臆断也。其获施于事者，依其事以考焉，其道可知也。其不获施于事者，不考诸其文，将暗汶而靡专。”⁴罗有高关于事功的论述显然是针对理学而发的，这与乾嘉考据学在治学精神上是一致的。汪缙在《有物录叙》里说道：“予为是录，本之乎道德，通之以经济，守之以气节，一统之于文章，命之曰《有物录》……叙所录之志，时自励焉。”⁵在道德、文章、经济上，汪缙都没有偏废，尤其是强调了经世之“经济”。同时期的刘大樾在时代学术的浸染下提出了“义理、书卷、经济”合一的观点，“经济”的提出其实正是呼应了时代学术的内在要求。汪缙认为佛教能够安顿来世，他们宣传佛学的目的就是拯救世人于三界之际，“三界轮回之苦甚矣，惟释迦氏之求出苦为入道之因，以证道出苦为果。其求出苦也，实能发誓愿，哀三界众生轮回，苦念道成，日拯而出之”。⁶彭绍升的佛学信仰更是身体力行，不仅戒杀生、禁欲、行善，而且还倡导努力念佛、大搞善场，以实际行动推动佛教的发展。他在《安居回向偈》中说道：“我弟子际清，由佛慈加被，生当五浊世，幸发正信心。悯彼世间人，长被五欲缚。轮回三恶道，辗转难出离。今对三宝前，深心发宏誓。愿尽未来际，广度生死流。冯兹回向心，归命无量寿。于安居期内，持诵如来名。一声出一佛，佛佛满虚空。日以三万声，施彼三恶道。”⁷在《受菩萨戒发愿文》更是信誓旦旦：“弟子际清，为求生净土故，敬于佛法僧前，禀受菩萨三聚净戒，愿从今日始，尽未来际，永断一切不净业，成就一切净业。誓随佛学，誓断烦恼，誓成佛道，誓度众生。若我际清既受戒已，还复破戒、增长恶法、毁坏善根，唯愿护法诸天速行诛殛，为世鉴戒。若我际清克厉身心，护持戒品，尽此形寿，必生净土。十方三宝为我证明，俾我速得念佛三昧，于命终时，远离尘垢，亲见弥陀，脱然西迈，更无遮障。见者闻者，如我发心，生极乐国，获无生忍，回入娑婆，普度有情，俱成正觉。”⁸除了超渡众生，彭绍升还根据自己见闻撰写了《良吏述》《善女人传》等

1 章学诚著，仓修良校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3 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4 罗有高：《尊闻居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七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5 汪缙：《汪子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五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0页。

6 汪缙：《汪子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五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93页。

7 彭绍升：《一行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70页。

8 彭绍升：《一行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68页。

著作，这些著作志在引导世人行善，改变世风。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经世、救世的举动有力地回击了主流考据学，也促进了佛学的世俗化发展，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Lay Buddhist and Times Academ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njin period

Liang Jieli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Qianjia, textual research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the academic. In this period, Buddhist scholars and textual research scholars had more contacts with each other, and Buddhist schola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tyle of textual research. Textual research takes the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erudite textual research, Buddhist scholars also go deep into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and ancient books, which expound the doctrines in the detailed reading of the ancient books, and deliberately counterattack the shortcomings of textual research which emphasizes textual research but ignores the doctrines. Qianjia textual research objected to Neo Confucianism, which improves Buddhism into Confucianism, accused Buddhism of heresy, and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of textual research, the Buddhist scholars went further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They opened up the boundaries of the three religions, believing that the three religions are actually one religion, and there are no two or three religions. Textual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opposes the empty talk of righteousness and principles. The practice of monastic Buddhism goes further than that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 Buddhism.

Key words: During the period of Qianjia; Textual criticism; Lay Buddhist; Integration of three religions

责任编辑：朱伟华

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

——兼论“甲申”政治叙事

胡 丹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在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年,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性谣言,“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个谣言并非是针对未来的预言,而是编造“绝无影响之事”,通过流行的新闻读本广为传播,以宣扬一种荒谬的史观,并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时人已指出,在甲申时事坊刻中,存在许多立意、刻意的作伪。“收葬魏忠贤”说与其他类似的纪事,皆贯穿着一个“文臣误国”的隐形主题,是由勋臣和宦官集团主导的政治叙事,反映了明末的政争在南明弘光朝发展的新特点。

关键词:明清易代 崇祯帝 魏忠贤 甲申之变 政治谣言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17-24

崇祯十七年(1644),干支纪年为甲申年。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明朝宗社倾覆,继之李闯王败退、清军入主北京,这一年以“甲申”进入人们的历史记忆。在明清易代的这一关键期,出现了大量的谣言。同时在鼎革的大背景下,这些谣言总体上是政治性的,以口耳相传为其传播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有关“甲申之变”的时事书写特别兴盛,尤其是在商业出版发达的江南,出现了大批快速报道时事的新闻出版物,形成了冯梦龙所说“喜事竞传”、杨士聪所称“新闻互竞”的新闻传播现象。¹国变新闻的报道者,或为“草野之臣”(布衣商民),或为中下级官绅,所记或得自耳闻,或出于目击,或杂掇他作,信息来源比较复杂;其作品又皆为亡国发愤之作,含有强烈的政治情绪。在南都激烈的党争环境下,时事书写不可避免地含有特殊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总的来说,甲申之变的报道中,夹杂着大量错讹的信息,有些是新闻传播太快造成的无意之失,有些则是出于特定的“立意”,甚至是“刻意”的编造。²

谣言,可能是预言性的,也可以是对过往之事的作伪。预言性谣言有事实的发展可供验证,而对“既然而事”所做的无中生有的撰拟,却难以察觉和辩驳。既往的谣言,是想通过对历史情节的虚拟和特定指向的叙事,为当下的现实利益服务,是政治斗争的舆论手段。³在甲申纪事的政治类谣言中,“崇祯帝密旨

作者简介:胡丹,1971年生,湖北宜昌市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史、新闻传播史。

1 分别见于冯梦龙:《绅志略·从逆诸臣》,《甲申纪事》卷二,弘光元年刻本,第22页b;释法遯:《凡论》,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2 杨士聪将所见时事坊刻之讹,划为“三变”,即由“无意”变为“立意”,再变为“刻意”。参见释法遯:《凡论》,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3 南都历史的叙事受门户和党争的影响极深,如浙东学派的黄宗羲及其弟子万斯同、好友林时对,复社钱秉铨及其好友金堡,主史笔之政,然未能允平公正,皆“不约而同”地利用“童妃案”,指弘光帝为假冒,就是一大谎言(参见顾诚:《南明史》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22页)。南都政治的叙事结构,要为“东林-复社”与“阉党”的对立,但对于由勋臣、宦官主导的叙事,尚未有论及者。

收葬魏忠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然其事实如何，至今尚未澄清。本文拟对此加以辨析，揭露其谣言的本质，分析这条谣言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在有关甲申时事的驳杂记录中，存在不少类似的“假新闻”，共同构成一个以“文臣误国”为主题的政治叙事。过去，对于南明弘光朝政治，学者多注意文臣间的门户与党争，而通过对“收葬魏忠贤”这样一些谣言的梳理，可发现以勋臣和宦官为主导、针对文臣的舆论，构成南明党争的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的侧面。

一、“密旨收葬”说的由来

在明亡之际，忽然出现了“收葬魏忠贤”说。此说最早见于无名氏所撰《燕都日记》，置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四日“起复内臣曹化淳”条下：

化淳经事故瑄魏忠贤，奏言（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骨。¹

需要指出的是，此事五天之后，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即攻入北京。

当国变的消息传来，身在南京的著名文人冯梦龙，采访陆续南逃的人士，广辑北京之变的消息，很快编成《甲申纪闻》一书。他说：

龙辑《纪闻》已毕，且付剞劂矣，复有传来《燕都日记》一册，不知出自何手，其叙事颇详，多前所未闻，且云出于目击，自三月朔迄四月十三，凡四十二日事，并刻以备史臣参酌之用。²

可知《燕都日记》的流传早于《甲申纪闻》的成书，它是江南最早的关于北京之变的新闻报道之一。次年（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冯梦龙又将其收入甲申之变的“新闻集”《甲申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纪载汇编》本，即莫厘山人增补本。³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称《燕都日记》：

是书惟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为诸稗乘所未载，颇属异闻。尝读祁门张静斋侍御（按：即张璠）请毁香山碧云寺魏忠贤墓疏，窃疑逆奄身受显戮，安得易代后尚有遗冢？及阅是书，始知庄烈帝曾有是命，殆即其党曹化淳为之营造欤？⁴

傅以礼是晚清学者，所著《华延年室题跋》考证晚明史料颇详，从其所述“是书惟密旨收葬”来看，他所见《燕都日记》为莫厘山人增补本。该书原本三月十四日仅记“起复曹化淳”一事，增补本不仅多了一条“南京孝陵夜哭”，还多出一句“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应据《明季北略》所补。⁵

傅以礼说《燕都日记》“惟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为诸稗乘所未载，颇属异闻”，未确。明末人杨士聪在对时事坊刻作“核真”工作时，亦提及此事（见下节）；在另一种流行的新闻出版物《再生纪略》里，也有简略记载，系于三月十四日“上颁罪己之诏”条下，云：

上忽传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群臣力止之。⁶

粗粗一看，似与《燕都日记》无异。可是细绎文本，两说其实很不同：其一，《日记》说“传谕”，《纪略》却说是“密旨”。其二，《日记》仅言“传谕收葬”，没有提到廷臣的反应，《纪略》说“群臣力止之”。其三，《纪略》未言旨意是对太监曹化淳奏请的反应（“忽传”之因不明），也没有“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奏言。两相校读，除了“收葬魏忠贤遗骸”这一动议外，其余均不相同。

1 无名氏：《燕都日记》，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第3页a~b。

2 冯梦龙：《燕都日记》前记，《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第1页a。

3 《纪载汇编》本书名为《燕都日记》，题作“莫厘山人增补冯梦龙原本”（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二十二册，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570页）。该书经增补后，与原本已不是一本书了。

4 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八《甲乙之际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四孝陵夜哭”条记：“召旧司礼太监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者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故旨云云。”（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8页）莫厘山人不知何许人，他的增补本里多引计六奇书。

6 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四，弘光元年刻本，第6页a。

由于《燕都日记》和《再生纪略》都是甲申之后较早刊行的国变新闻集，在当时很是流行，后来均被收入冯梦龙编辑、于弘光元年刊刻出版的《甲申纪事》中。后起的野史、杂史，即便再记此事，也很可能源自于此。然而二书对比，《再生纪略》此条，可能移录自《燕都日记》。首先，《再生纪略》是长洲人陈济生从北京逃回后完成的，底本是他在京时所写的《陷城日记》。据其自述，该日记只有“一纸”，¹但今见《甲申纪事》本，却整整占了两卷，合计一百三十三面，近二万字，这在同类型的甲申新闻书中，可称“浩繁”，这还是冯梦龙加以裁减后的篇幅。可以想见，该书借引他书者当不少，这也是当时诸报道的共同特点。其次，从内容看，《再生纪略》与《燕都日记》某些纪事相同，而不为他书所有。如在提到紫禁城时，均误作“紫金城”，又密旨收葬事，均称“魏忠贤遗骸”。故有理由怀疑，后出的《纪略》，采纳了《日记》的这条“异闻”。大概陈济生感觉新奇，加以采择，但又觉此事不大可行，亦未见到相关旨意，于是凭己意断为“密旨”，又称“群臣力止之”。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知，“崇祯帝收葬魏忠贤”说，在甲申之变后没多久就出现了，并在他书的引用中发生“变形”，即由“传谕收葬”变为“密旨收葬”。

二、“收葬魏忠贤”说不可信

由于崇祯帝下令收葬魏忠贤遗骸是一件没有旁证、也不知结果的事情，所以诸家在转述时，皆取“密旨”之说。但如果仅就两书寥寥数字细究，对于“事实”如何，却不免愈增疑惑：揣《燕都日记》所记“传谕收葬”，此事应是实行了，读者根据文本逻辑，一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傅以礼就不说“及阅是书，始知庄烈帝曾有是命”，但《再生纪略》却说“群臣力止之”，尽管他没有提到崇祯帝是否坚持己见，但读者同样会根据文本的逻辑，认为此事因群臣反对未能实行。实际上，这两条纪事都不完整，读者得出什么结论，依赖于他们的阅读经验以及对文字内在逻辑性的“感觉”，一旦深究，不免露出罅漏。这就是文字叙事的缺陷，它可能存在逻辑上的误解、理解上的偏差，还有不可控的联想等等，如果相关材料太少，仅就文字进行推论，则不免造成意见的分歧。

所幸明末材料丰富，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利用史料相互参证，不难发现，所谓“收葬魏忠贤”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假新闻”。主要有四不可信：

一不可信：该说以太监曹化淳为动议者，称曹曾“事故珰魏忠贤”，这是一误。

曹化淳是明末著名太监，出身崇祯帝潜邸（信王府），这是他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曹氏最早见于史籍，是崇祯二年（1629）三月，以皇子诞生加恩，“司礼监太监高时明、沈荫、宋普〔晋〕、王永祚、李凤翔、金忠、曹化淳各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指挥僉事。²此时曹化淳已是炙手可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而就在这次加恩的前几日，崇祯帝刚刚发布上谕，钦定以魏忠贤为首的“逆案”，一大批魏氏名下太监遭到惩处。³假如曹为魏的私人，以崇祯帝的“察察之明”，岂会重用他？

事实是，曹化淳出自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前司礼太监王安之门。史载崇祯十年秋，常熟人张汉儒讦奏钱谦益、瞿式耜，钱氏下狱几死。幸亏他曾经为故太监王安写过祠记，“司礼太监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汉儒等阴谋，立枷死”。⁴明确记载曹化淳出自王安门下。王安惨死后，魏忠贤对其名下宦官进行了迫害，把曹化淳派到“冷局”王府当差，算是一种贬逐，谁知机缘巧合，信王后来继承皇位。

曹化淳深得崇祯倚信，地位越来越高，先后总督东厂、提督京营戎政，直至升任司礼监掌印。⁵但在崇祯后期，曹化淳失宠，罢官闲住，可能因为在农民军攻来前，他奉旨捐献，比较慷慨，拿出白银数万两

¹ 陈济生：《再生纪略下》，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五，弘光元年刻本。

² 汪楫辑：《崇祯长编》卷十九，崇祯二年三月壬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第1163页。

³ 谈迁：《国榷》卷九〇，崇祯二年三月乙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74页。

⁴ 谈迁：《国榷》卷九六，崇祯十年八月癸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89页。

⁵ 曹化淳任职，参见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所附《明司礼太监、东厂太监、南京守备太监年表》。

（一说三万，一说五万），以此复得崇祯欢心，才在城破前几天，奉命戴罪守城。而所谓“密旨收葬”，就附记于此日。

这就构成了此事的第二不可信：曹化淳闲住多年，与皇帝已有情感上的疏隔，而当此亡国之际，甫一起用，竟敢大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等于彻底否定了皇帝最为得意的政绩，他敢如此置喙吗？

在时人的心目中，崇祯帝之“英断”，最初的表现就在他以十七岁的冲龄，不动声色，剪除一手遮天、党羽满朝的魏忠贤，对宦官乱政加以拨乱反正。甲申年四月，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北上勤王，所撰《出师檄》提到崇祯帝，第一句就是“践祚而首剪巨奸”¹。当时凡颂圣者，无不以此开头。崇祯帝亦以诛魏阉、定逆案自信。老于官场，且深知皇帝性格的曹化淳，必不出此危语（且此语既不见于奏章，外人何由得知）。之所以将曹化淳作为这个劝谏故事的主角，可能跟他在亡国之际被重新起用，以及他的名头大有关系。

三不可信：魏忠贤遗骸无处可收。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傅以礼关于魏忠贤坟墓的疑惑。他在读到康熙四十年御史张瑗请毁北京香山碧云寺魏忠贤墓的奏疏时，“窃疑逆奄身受显戮，安得易代后尚有遗冢”？他说，自读了《燕都日纪》，才知崇祯帝有收葬密旨，并揣测香山之墓是“其党曹化淳为之营造”。此为所见不周之误。

考香山碧云寺，创于元代，原名碧云庵。正德中太监于经改庵为寺，建生圻于寺后，故又名“于公寺”。后于经事败，寺与墓保留下来。²碧云寺本是京西名刹，并非只有一墓，按照明代宦官的习惯，关系亲密的宦官，如照管太监（又称“本官”）与其名下，身后会择葬于一地。万历二十六年（1598），魏忠贤的本官、掌东厂司礼监太监孙暹就葬在碧云寺。³天启四年（1624），发达了的魏忠贤重修碧云寺，也在寺后为自己营造生圻。墓碑题其衔，大学士叶向高撰记，礼部尚书钱象坤篆额。这就是张瑗所见之墓。此墓规模宏大，魏忠贤“身受显戮”后，自然无法享受，但墓未毁，成为一座易代而幸存的空冢。⁴

傅以礼猜测墓是曹化淳营造，甚属无谓。论者在讨论收葬魏忠贤的问题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事实：所谓“密旨”发布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当时李自成大军已打到昌平，北京戒严，奉旨以闲住起用的曹化淳，哪里有时间去为魏忠贤造墓？就是收其遗骸也不可能。考魏败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在赴凤阳戍所途中，自缢于阜城县（今属河北衡水）旅舍。次年正月，奉旨于河间府磔尸。⁵这是十七年前的事了，纵有遗骸，亦当就地草葬。且在此之前月底，京南保定、真定、河间等府，纷纷迎降，已沦为“贼区”，孰敢南去收葬？即便有收葬之旨，也只能是空旨一道，何必与香山之空穴联系起来？

四不可信：如果信从《燕都日纪》，崇祯帝“传谕”（公开的明旨）收葬，那就不是埋一具枯骨的小事，而是变相替魏忠贤平反的政治大事了。陈济生在抄录时，可能觉此事太过骇异，又未闻有明旨，于是径改“传谕”为“密旨”。然称“群臣力止之”，则又出现一个明显的漏洞：既是“密旨”，群臣何由知之？又何从“力止之”？

时任左谕德的杨士聪，南下后，从新闻读物里看到这样的记载，当即在所撰《甲申核真略》中加以驳斥，称其为“逢迎时局者”的造作：

一二逢迎时局者，乃称曹化淳面奏先帝云：魏忠贤而在，事不至此。（化淳闲住在外，未闻

1 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七《出师檄》，弘光元年刻本，第1页a。

2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八，《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7~3768页。

3 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4 顺治十一年，谈迁游碧云寺，见魏墓而“骇之”。他见该碑篆额者钱象坤之名已磨去，疑为钱在崇祯中“作相时事”（《枣林杂俎·智集》之《逸典·磨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页）。僧云此墓为入清后魏名下苏应宣所立“虚冢”，又记为名下葛九思“瘞魏氏衣冠”（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页，第251页）。可见此墓在清初时，还有魏名下宦官为其修葺。

5 分见谈迁：《国榷》卷八八，天启七年十一月庚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00页；《国榷》卷八九，崇祯元年正月丁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18页。

特召，何处面奏？——原夹注）先帝叹息，传旨收葬其骸。又称先帝召对，有荐杨维垣、霍维华等者。此皆绝无影响之事，傅会成书，公然刊布。更假岁月，必将登诸奏牍矣。¹

杨士聪作为“词臣”，经常入直，通晓政情，明习典故，兼且身处陷城之中，耳目最真。他看到的还不是“密旨”说，释法遯仅在该书“凡论”中一笔带过，大概他觉得此事太过不经。释氏反驳的理由是，“化淳闲住在外，未闻特召，何处面奏”，即曹化淳虽然蒙旨戴罪守城，但没有奉召入见面奏，帝旨何从而出？这是不熟悉朝廷制度的普通人士所无法了解的。

据以上分析，“收葬”一说，漏洞遍体，根本经不起考证，是一个明显的谎言。如果我们不将其轻轻放过，再细读甲申时事诸书，益将发现，“密旨收葬魏忠贤”只不过是甲申之际特定政治叙事的一环，与之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纪事。

三、“收葬魏忠贤”与甲申政治叙事

历史叙事，是对历史的记忆、复原与文字重建，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解释。与前代不同的是，晚明较为自由的言论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使得几与时事同步，出现了大量记载、报道时事的新闻读本，尤其是“甲乙（即甲申、乙酉两年）鼎革”之际，江南出现了大批记录、传递国变消息的抄本和坊刻（民间书坊的刻本），流行一时，满足了人们及时了解时事的信息需求。报道收葬魏忠贤之事的《燕都日记》和《再生纪略》就是这样的新闻出版物。

该书记甲申三月十四日崇祯帝传谕收葬魏忠贤，并借曹化淳之口宣称“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透露了崇祯帝对杀死魏忠贤的某种悔意（“上恻然”）。我们虽无法确知其来源（谣言往往是无法追溯的），但其政治意蕴一目了然，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面临彻底失败的崇祯帝，对其过去十七年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的正确性，已经产生动摇；“忠贤若在”，绝非一个死人的复活，而是以魏忠贤为符号的政治生态的延续。

“收葬魏忠贤”背后的政治话语，大音无声，却响若滚雷，它用荒谬的假说来解释历史，与甲申之变后南都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并非一个偶然的独立存在。事实上，在甲申的舆论场上，流传着不少与“收葬魏忠贤”潜通暗联的“纪事群”，都发生在国破之际，略举如下：

1、先帝召对，有荐召杨维垣、霍维华等者；又有称宜急召用冯铨者。冯、杨等人皆是阉党首要分子，若此等“首逆”都能公然登诸荐章，那么收葬魏阉遗骸又有何可异？《甲申纪事》本《燕都日记》在此条上，有一不知何人所书的眉批，云：“忠贤之骨尚可收，何不召用冯涿州（即冯铨）？”²正是此意——收葬死人，实为活人政治复活之先声。

2、先帝与司礼监太监王之心对哭，“御案手书十二大字，密示司礼，随即抹去”。十二大字是何字，作者没说，但该书有不知何人眉批云：“相传文武官员可杀，百姓不可杀，或此时所书也”。³

3、先帝召对，问战守策，诸臣默然，“上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⁴又或云：“闻上在宫中，每夜深独坐批览本章，既而叹曰：‘朕非亡国主，何为有亡国事！’则泪随言下，若先见然。”⁵崇祯帝屡兴“亡国”之叹，几成名言。

4、城破当日早朝，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⁶此说亦为凿空，对诸多殉难诸臣亦构成侮辱。当日凌

1 释法遯：《凡论》，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2 无名氏：《燕都日记》，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第3页b。

3 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四，弘光元年刻本，第8页a。

4 无名氏：《燕都日记》，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第3页b。

5 刘尚友：《定思小记》，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6 钱邦芑：《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三十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95页。

晨，帝已自吊煤山，并无鸣钟之事，倒是颇有官员入朝探听消息。如自缢殉国的大理寺卿凌义渠，“十九日五鼓时，公闻内传召对，亟趋长安门，阒如无人。公拱肃达曙，止见刘谕德理顺、吴侍郎履中仓惶过前，见公惊讶，随即别去”。¹召对是十八日晚间事，据赵士锦记：“先是十八晚传召对，是早，大学士丘瑜、修撰杨廷鉴、编修宋之绳，以待班入长安门，见守门者止一人，至五凤楼前，阒其无人，亟趋出。是时大寮尚开棍，坐轿传呼，庶寮亦乘骑，泄泄于道路间也。”²其实，城中人根本想不到会亡国，倒是当日晨，大批宫人从大内出奔，令人惊惧。

5、先帝自缢前留遗诏云“诸臣误朕也”“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³或记留“百姓不可戮，百官……不可留之谕”。⁴又称所留为血诏，“（帝）咬指血题襟曰：‘百姓不可杀，百官不可留’”。⁵三月二十日发现帝尸后，杨士聪听“自内出亲见”的周中官说，先帝“衣袖墨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坊刻谬撰血诏，及称‘宁裂朕尸’，皆非也”。⁶吴邦策曾亲见帝尸停于东华门外，也说“有遗诏在胸，云朕已丧失天下，不敢下见祖宗，亦不敢终于正寝”，⁷与周中官所见略同，应是。至于遗诏所谓“诸臣误朕”等等，皆为妄人附会。崇祯帝既遗令“百官俱赴东宫行在”，必寄望于百官辅佐太子，岂可云“文武皆可杀”？然而在甲申之年，崇祯帝痛恨百官，至欲借贼手尽杀之，是非常普遍的话语模式，通过先帝之口频频说出，以愚世人，尤为荒谬。

以上纪事，在甲申之际的时事书和后来的野史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若将“密旨收葬魏忠贤”说与之钩沉并置，则能发现这些谣言彼此关通，从属于一个共同的叙事主题，核心是文臣误国（虽“文武百官”常并举，然要害在文臣）。

过去论南明史者，多留意于文臣的门户之争，以及阉党和东林、复社间的党争，却对宗社南迁之际，勋臣、宦官趁机争权，并在政治上产生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使得南都政争的研究，缺失了一个面相。甲申之变，暴露了朝臣的无能与无节，“甲申新闻”的基调，便是“责”，如释法遯说：“坊刻意旨有在，专以雌黄缙绅，其国事坏乱之由，未之知也。”⁸专意“雌黄缙绅”的，并非只是杨士聪所指的宦官，而勋臣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时任锦衣卫指挥的张怡就说：“国变时，诸勋臣籍籍”，谓“归狱文臣误国”，政治声量很大。⁹

明代，勋臣在政治上是受到严格钳束的，决不许其干政。但南明建政之初，以诚意伯刘孔昭、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为代表的勋臣，亟亟于攫取入阁、预纠参等破坏祖制的权利，与试图复设东厂的宦官共为舞蹈，表现得特别活跃。¹⁰一般来说，勋臣与内臣在政治利益上关系更为紧密，他们将亡国归罪于“百官”，无疑有利于在新朝获取更大的话语权。与一些人宣扬的内臣、勋臣皆不预“定策”（即扶立福王朱由崧即位）相反，¹¹勋臣在这至关重要的决策中，有着前所未有的张扬表现，如在择定即位者时，

1 茅曦蔚：《大廷尉茗柯凌公殉节纪略》，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十三附，弘光元年刻本。

2 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8页。

3 冯梦龙：《甲申纪闻》，《甲申纪事》卷一，弘光元年刻本，第6页b至第7页a。

4 《长安道上誊出闯贼谋逆作伪罪状以醒民正讹复仇说》，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二十一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5 佚名：《燕邸实钞》，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二十一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6 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7 《西蜀拔贡日樵道人吴邦策一匡甫记》，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二十一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8 释法遯：《凡论》，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9 原题明末遗民：《謏闻续笔》卷一，《中国野史集成》第三十七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99页。

10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刘孔昭凌侮张慎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21页。

11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之《逸典·定策不预内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103页。

“勋臣有当面詈及文臣者”。¹时议论莫决，御史李沾力挺福王，“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复力持之，孔昭又面詈（兵部侍郎掌礼部事吕）大器不得出言摇惑，议遂定”。²在策立的问题上，最大的功劳，竟归于包括江淮四镇在内的勋臣，这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的命运。³面对勋臣武将的跋扈，朝臣不得不做出让步，“旧例五府不入班行”，但在会推阁臣、冢臣时，“恐文武不和，乃共商一番”。⁴勋臣竟然参与会推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甲申之变中，受祸最惨的，是明朝的勋戚（含勋臣和戚臣），这为他们谋求扩大政治利益提供了“与国共休戚”的悲壮色彩，然而勋臣在拯救国运上毫无作为，到底是底气不足。在甲申新闻里，襄城伯李国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此人本为一“大言无忌”的纨绔子弟，在城破前被委以京营重任，可是“贼”来即束手就擒，发同诸臣追银，“责贿不足，被拷折踝，自缢死”。⁵按照南都对北京朝臣苛刻的分类标准，李国祯应入“刑辱诸臣”。不料此人却在甲申之变的新闻报道中，被赋予了英雄的形象。最典型者为二事：

一是见“贼”“面反向而不跪。贼云：‘为何不跪？’襄城曰：‘我明朝大臣，无跪理。’贼云：‘不跪将凌迟汝。’襄城曰：‘任汝。’贼云：‘不跪将凌迟汝全家。’襄城曰：‘任汝。’贼又曰：‘不跪将凌迟阖城百姓。’襄城跪，仍反面曰：‘吾为阖城百姓跪，非跪汝也。’”⁶此乃近乎小说家言。

二是“苦诤三大事”，力言陵寝不可发掘、葬先帝以天子礼、太子诸王不可杀，贼尽从之。后先帝山陵毕，自缢死。⁷诸书所记诤诤事略同，大力塑造其“骂贼不屈，侃侃直言”的形象。至于其结局，至有称“大行皇帝出丧之日，止一李襄城国祯匍匐送葬。毕，自刎。真勋臣中第一人也”。⁸

尽是不值一晒的谎言。李自成进京后，重惩明朝的寄生阶层勋戚集团，并在四月十三日率军东征吴三桂前，为绝后患，将其全部屠杀，岂容一李国祯空作壮语？

这个谣言比收葬魏忠贤更普遍地出现在时事诸书中，通过肆无忌惮的夸张纪事，塑造了一个忠烈的勋臣形象，它不正是无功可表的勋臣所亟需的吗？如果甲申之变中，宦官的偶像是从帝而死的太监王承恩，那么勋臣的偶像就是襄城伯李国祯。所以，尽管李国祯死得并不光彩，却与城破时举家自杀、自焚的勋戚一样，获得祠祀、给谥、晋爵等优厚的恤典。⁹李国祯得此伪名，与新闻造假大有关系，这为我们了解时事书写及舆论如何影响南明政治提供了一个例子。

总言之，勋臣与阉宦试图扩大其在南都的政治利益，为此利用坊刻诸书，大肆渲染“臣子负恩，文武尽贪庸之辈”的话语。包括“密旨收葬魏忠贤”在内的纪事，正是在其主导下的政治叙事，而“一二逢迎时局”者，乃为之刻意造作，附会成书，公然刊布，进而引入奏牍，假之岁月，便成为不刊之史。

而吊诡的是，这些“绝无影响之事”与明朝亡国前的时事颇能印证。我们看到：当国势危急时，亲手剪除魏忠贤的崇祯帝，一再下令，命太监提督城守、宦官出镇监军、内使上城防守、整内官以备亲征，更不论最后与“一貂豎同尽”，明朝可说与宦官偕亡。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魏忠贤平反，可谓呼之欲出。收

1 《南中近报》，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二十一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2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

3 参见顾诚：《南明史》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7页。

4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诸臣升迁推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页。

5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六《李潜传附李国祯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09页。

6 杨士聪等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0页。

7 无名氏：《燕都日纪》，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

8 《闽中吴鸿磐染血书》，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二十一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按：李国祯所传伪名，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先驳之（第20页）；魏禧《新乐侯刘公、驸马都尉巩公传》亦据亲见者所述驳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46页），然皆在易代之后了。

9 甲申九月，李国祯谥“贞武”，同谥者文臣二十一人、勋臣二人、戚臣一人，除了李国祯，皆为殉节者。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北京殉难诸臣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86页。

葬之事虽假，其说却不尽谬，故在南渡之后力诋文臣的语境下，愈为流行。

贬斥文臣的叙事主题，由一些耸人听闻的异说构成，很容易在社会上流传，并为新闻报道者采用（甲申新闻的报道者，主体是底层士人，他们多不熟悉朝章典故，容易被一些夸张之辞所迷惑），进而通过大众新闻网络，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这些纪事之所以能广为流布，自然离不开普遍的大众心理基础，谣言必有与之合“调”之处。

大太监魏忠贤，在天启年间操柄数年，权倾天下。在他专权时，恰好辽东之祸稍宁，“流贼”之火未炽，与崇祯朝哀鸿遍野的亡国景象相比，简直不啻太平盛世。崇祯登极后的“首政”，就是将魏阉连同其团伙一举剪除，朝野对中兴充满期待。可是时隔不久，西北风尘骤起，东北辽祸日亟，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历十七年而社稷倾覆。由此反观，天启那几年，倒似明王朝的回光返照。这便无形中形成一种对比，并且很自然地推导出一种假设：如果魏忠贤还在，明朝之祸，必不至此。当然这是一种很浅薄的历史观，但因为它颇为契合一般民众对历史和时政的理解能力，因此也很“易售”。这也是收葬魏忠贤的谣言“可信”的根本原因。

Research on the Secret Decree of Emperor Chongzhen to Bury the Remains of Wei Zhongxian—Some Narration on the Political Story of Jia Shen

Hu Dan

Abstract: In the year of Jiashen (甲申), 1644, there were a lot of political rumors. Among them, Emperor Chongzhen's secret order to bury Wei Zhongxian was a well-known one. This rumor was not a prediction for the future, but a plot of current events that was impossible at all. It was widely spread through popular news books, so as to publicize a kind of absurd view of history and achieve realistic political purposes. At that time,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many intentional and deliberate falsifications in the inscribed copies in the year of Jiashen. The saying of "burying Wei Zhongxian" and other similar chronicles were all permeated with a hidden theme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officials are missing the country". It was a political narration dominated by the meritorious officials and eunuch groups. It reflect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ngguang (弘光) Dynasty in the South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ransition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peror Chongzhen; Wei Zhongxian; JiaShen year incident; Political rumors

责任编辑：张 翔

光绪初年丁宝桢督川与官场斗争

阳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光绪初年，丁宝桢入主四川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打击了诸多既得利益者，招致川省臬司方浚颐等部分官绅的不满。对丁宝桢不满的官绅在朝中引援，以川籍京官吴镇为代表的言官极力弹劾丁宝桢，另一方面他们交结朝中掌权的南派人物，特别是入川的钦差大臣。川省官绅和朝中川籍言官以及入川的南派钦差，三方势力屡屡为难丁宝桢，为其改革带来了较大的阻力。然而，丁宝桢不畏参劾，适时反击。在好友阎敬铭的帮助下，阻挠丁宝桢改革的重要人物大多被参纠革职，这为丁宝桢督川改革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官场环境。对这些官场斗争的考察有助于加深对丁宝桢的研究。

关键词：丁宝桢 方浚颐 钦差大臣 川省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 (2020) 03-25-30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谥文诚，晚清贵州籍封疆大吏，进士出身，军功起家，曾任山东巡抚，后任四川总督近十年。学界对晚清督抚的研究多着墨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端方和袁世凯等人，对丁宝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光绪初年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并大力改革，这一段历史是丁宝桢最后的时光，也是其一生中相当重要的时段，学界的考察却多放在改革本身，¹对丁宝桢改革时所处的官场斗争虽时有提及，但对于这一问题尚无专文探讨。²笔者欲就此问题付之专文，以期管窥光绪初年的政局以及加深对丁宝桢的研究。

一、丁宝桢的改革与川省官绅的因应

光绪二年(1876)九月，山东巡抚丁宝桢与护理四川总督兼云南巡抚文格对调，次年三月，丁宝桢正式接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刚一上任便在四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内容包括整顿吏治、清理积案、裁撤夫马局、整顿军务、革除陋规、改革盐政、创办机器局、修缮都江堰等等。³不同于前任川督吴棠因循守

作者简介：阳金平，1991年生，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

1 学界对丁宝桢的研究可参见刘晓煥：《丁宝桢研究概述》，《齐鲁文史》2000年第三期；任索：《解放思想 各抒己见 浓厚学风——“丁宝桢诞辰一百八十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综述》，《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一期；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丁宝桢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乏优秀论著，限于篇幅，笔者不一一列举。

2 鲁子健：《丁宝桢在四川的十年》，《文史杂志》2001年第二期；戴斌武：《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晚清地方督抚——丁宝桢洋务活动解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姚美玉：《丁宝桢与地方民生(1867-1886)》，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刘宝罡：《丁宝桢与晚清军事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红：《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四期；骆孝元、朱华：《从山东机器局到四川机器局：丁宝桢洋务之路》，《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五期；吴会蓉、肖静：《丁宝桢对都江堰的治理及其启示》，《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5年第一期；邢飞：《丁宝桢与四川夫马局改革》，《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九期。

3 丁宝桢在川改革情形，参见饶宗鲁：《丁宝桢在四川》，《石室学报》1943年复刊第一期，第1~11页；鲁子健：《丁宝桢在四川的十年》，《文史杂志》2001年第二期。

旧,丁宝桢主张全面改革。同时,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丁宝桢对阻碍改革者毫不手软,仅在就任川督不久的奏折中,便一次性将十五名“贪庸不职”的知州知县参奏革职。¹然而丁宝桢要面临的官场阻力并不仅在于州县官员,还有更难撼动的川省高级官员。

丁宝桢的锐意进取,打击了诸多既得利益者,也为自己招来非议。被丁宝桢请来掌尊经书院的王闳运观察到“时丁稚璜督蜀,大改盐政,官士怨谤……将军恒训觊代之,与两司程豫、方浚颐为之流言”。²丁宝桢在给长子丁体常的信中有言:“川省官场,近日稍好。惟贪奸之徒,以不获利仍不死心,屡有条奏参劾,均仰蒙圣明洞鉴。来信内所言成都将军参奏之事,亦是无所得利,故为此倾陷。”³可见,成都将军恒训、藩司程豫、臬司方浚颐三位川省高级官员皆对丁宝桢不满。

丁宝桢在蜀的改革受到非议最多的是都江堰水利和盐务,而这两方面恒训皆有参与。⁴陋规在川省已成为官场积习,刑狱极多且经费紧缺的川省臬司常将其作为办公费用。丁宝桢裁撤陋规时,将臬司的陋规一并裁撤。⁵这直接开罪了臬司方浚颐,引起方的不满。方浚颐对丁宝桢的改革很不以为然,王闳运初到四川时,方便找到王闳运,指出丁宝桢所办理的裁撤夫马费、官营盐务等“皆新不如旧”。⁶程豫与丁宝桢的矛盾虽不如方浚颐严重,但程在四川机器局一事上与丁宝桢作对,“机器局在省城三杀方,故不利于长官,丁被劾,程再有阴讼”。⁷另外,程豫在尊经书院多次为难丁宝桢非常器重的王闳运,甚至让王产生了“唯辞去可以断之也”的想法,丁宝桢不得不当面向王闳运道歉。⁸

为了打击丁宝桢,川省官绅还联合了川籍京官。丁宝桢在川改盐法,裁夫马局,利国便民,“所不便者,官、绅、商之中饱及游客、京员之渔猎其中者耳”。⁹曾任丁宝桢幕府的陈夔龙指出丁“督蜀时奏改盐法,剔除中饱,百余万悉数归公。虽奸商勾结言官,腾章奏劾,谣诼繁兴……”¹⁰此处京中言官主要是指川籍京官吴镇。吴镇,四川达县人,号少岷,庚申科进士。¹¹作为一名在京官员,吴镇十分关注家乡。同治九年(1870),刚由翰林院补授御史吴镇便奏称川省节年被扰,民力维艰,指出该省“有私派流差夫马、缉捕经费、委员薪水、及弥补历年欠项前任亏空等名目”。朝廷谕令时任川督的吴棠“认真访察,将一切私派名目概行革除,其被災较重地方无力津贴者,即酌量先行裁减。如查有官绅侵蚀欺蒙等弊,即著据实严参,毋得稍有回护”。¹²

丁宝桢就任川督后锐意改革,不仅引起了川省官绅的不满,还遭到了吴镇的数次参劾。¹³光绪四年(1878)九月十七日,吴镇受皇上召见,就丁宝桢“诸事纷更”当面向皇上奏述,后觉得自己当时未能详

1 《清德宗实录》卷五三,光绪三年七月甲寅。

2 王闳运撰,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39页。

3 丁宝桢著,(丁)泽霖释,(丁)垂健注:《丁文诚公家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68~69页。

4 《成都将军恒训奏为遵查川省官运困商病民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6457—006,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成都将军恒训奏为查明灌县等地实在情节并署督丁宝桢等奏报不实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片,档号:03—9589—090,光绪六年。恒训对丁宝桢大改旧章非常不满,还曾秘密参劾丁氏,参见《成都将军恒训奏为密陈丁宝桢擅改成章并宜宾等地匪患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片,档号:03—5155—041,光绪六年。

5 《津贴臬司两首县公费片》(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559页。

6 王闳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26页。

7 王闳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33页。

8 王闳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74~775页。

9 《答张振轩中丞书》,黄彭年著,黄益整理:《陶楼诗文集辑校》,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74页。

10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页。

11 苏树蕃编:《清朝御史题名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04页。

12 《清穆宗实录》卷二九二,同治九年十月丙申,《清实录》第五十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8页。

13 《刑科给事中吴镇奏为特参四川总督丁宝桢任用非人纷更贻患请密查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5131—056,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巡视西城掌工科给事中吴镇奏为特参署四川总督丁宝桢讳灾不报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9313—009,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言，便就此事专门上一折极力参奏丁宝桢，重点强调丁误听道员丁世彬之言就都江堰水利任意变更成法。¹吴镇为何会弹劾丁宝桢？恐怕不仅是因为吴为四川籍京官，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其现实利益。张之洞曾言“盖蜀中京官之语，即蜀中盐商之语也”。²张曾在光绪初年任川省学政，对四川官场较为熟悉，其所言不差，串通京官吴镇的候补道员王余照正是蜀中富顺县大盐商。³丁宝桢推行的蜀盐官运政策严重侵犯了王余照的既得利益。王极力阻挠盐政改革，也成为了丁宝桢重点打击对象。丁上奏弹劾王余照，谓其“倚恃富豪，欺压乡里……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强买已字民女为妾……恃势横行，目无法纪”。⁴朝廷下旨对王余照“亟应从严惩办，著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惩戒”。⁵

二、川省官员联合入川钦差意图使丁宝桢去位

丁宝桢面临的考验不仅来自于改革上的阻力，还在于一些案件的审理上。光绪初年，东乡县以袁廷蛟为首的粮民围城抗粮，县令孙定扬在局绅的鼓动下，以匪徒叛乱为词请兵。提督李有恒随即率四千多官军开赴东乡。兵民交战使东乡当地人付出了惨重伤亡，为民呼冤的声音随即而来。此即东乡抗粮案。⁶这是丁宝桢入川后审理的第一件大案。

东乡战事结束后，吴镇是第一个对东乡一案提出不同意见的人，⁷在东乡一案被定为冤案的过程中，吴发挥了重要作用。专载此案的《袁案纪略》评价道：“非御史吴镇公之奏，廷蛟匹夫何能达圣鉴而伸冤狱哉。有恒之兵自以搜索扰乱致怨于吴，天使之也。”⁸继吴镇之后，川省在京官员和士人共四十七人闻风联合为被杀的乡民喊冤。⁹朝廷派川籍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入东乡县专查此案，李宗羲也为民呼冤。¹⁰但是，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就东乡一案两次上奏，皆否认此案为冤案。¹¹由于双方各执一词，案件迟迟无法定讞，朝廷遂派钦差大臣赴川。

光绪初年，清廷存在南北党争，南派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军机大臣李鸿藻则领衔北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¹²此次朝廷所派钦差大臣为礼部尚书恩承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满人恩承与南派官员王文韶、翁同龢等关系较好，童华则是南派重臣。¹³光绪五年（1879）二月，张佩纶在打击南派重臣贺寿慈时指出“商人李鍾铭……工部尚书贺寿慈妻以义女与之姻缘……科道率引李为援，干求差使，杨玉科、方濬颐等贿通权要，李实主之，声势赫甚，余因附片请旨驱逐”。¹⁴可见，与丁宝桢矛盾极深的川省臬司方浚颐，彼时主动交结朝中南派势力，背后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1 《刑科给事中吴镇奏为特参四川总督丁宝桢任用非人纷更贻患请密查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5131—056，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2 《致潘伯寅》（光绪五年），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6页。

3 《清德宗实录》卷九八，光绪五年七月庚子；《清德宗实录》卷一〇八，光绪六年正月己丑，《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0、587页。

4 《四川总督丁宝桢奏为候选道员王余照恃势横行请旨革职审办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片，档号：03—7408—016，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二日。

5 《清德宗实录》卷九一，光绪五年闰三月乙酉，《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2页。

6 王澈：《光绪初年四川东乡抗粮案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三期。

7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吴镇为确查东乡袁廷蛟起事缘由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第二期。

8 汪承烈修，庞麟炳纂：民国《宣汉县志》卷十《武备志》第十下《袁案纪略》，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第1页。民国成立后，将四川东乡县改为宣汉县。

9 《内阁中书萧宗瑀等为李有恒纵兵杀戮无辜事呈文》，《历史档案》1994年第三期。

10 《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为遵旨查明东乡算粮缘由及李有恒纵勇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第四期。

11 《四川总督丁宝桢为查办袁廷蛟抗粮及李有恒等有无纵勇妄杀并处置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第三期；《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遵旨复核东乡一事办理并无轻纵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第四期。

12 林文仁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其时，南派势力强大，朝中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尽为南派。详参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12页。

14 张佩纶：《涧于日记（一）》，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45～46页。

另外,丁宝桢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中得罪了朝中南派势力。¹钦差的到来,令与丁宝桢有矛盾的川省官绅欢欣鼓舞:“迨钦使抵成都,司道相要,誓必排去公,日奔走钦使所媒孽画策,再三劾奏。”²王闿运注意到“二使星已前至蜀,不独按问东乡,至乃注意丁公,牵连仆妾。道员中丁、劳、唐,州县中田、李,并登白简,加以丑词,语甚含沙,情同舞剑。盖由自恃廉俭,少所匡绳,致此纷纭,足以沮挠”。³川省官绅意图让丁宝桢去位,二使亦然,审理东乡案时还不忘向朝廷密陈:“若该督臣丁宝桢久居其地,恐非所宜……伏乞圣明垂照,密考其行,详查其政或量移他处,另简谨慎廉明之吏,仰承德化。”⁴

时值吴镇参劾丁宝桢督办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失当,朝廷让钦差查验后上奏。恩、童二人的上奏再次不利于丁宝桢,二使指出“旧用竹笼作堤,此次全行揭去,改用石工并加宽厚,致河身逼窄,水势激冲,将新堤一百三十丈冲刷过半,与丁宝桢所奏仅冲刷金刚墙三丈馀情形迥不相符”。朝廷对丁宝桢大失所望:“丁宝桢办理堤工要务,又值经费支绌之时,宜如何尽心区画,慎重兴办。乃仅凭丁士彬之言,并不详细考察,率更成法,发帑兴工,以致被水冲刷。又不据实奏陈,迨经降旨询问,仍以人字堤毫无损折等辞,粉饰覆奏,实属办事乖方,丁宝桢著交部议处。”⁵吴镇还参“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钦差复核后再另指出“机器局费用较鉅,制造未能精良”。朝廷不得不“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⁶最后朝廷令“丁宝桢应得降三级调用即行革任处分。加恩著降为三品顶戴,仍留四川总督之任”。⁷盐务是丁宝桢整顿的重点。⁸丁改川盐为官运商销,认为其“有利无弊”,钦差却认为川盐改归官运开销靡费,故奏称“利少弊多”。⁹经户部核查后,丁的盐运改革刚有成效,不便更改,但朝廷告诫“将来征收渐绌,不便民用等情,则咎有攸归,必惟该督是问”。¹⁰

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曾因奏请开复已革候补道员李耀南时,未将其从前参革缘由声叙而被朝廷处罚,“吏部奏丁宝桢请照不应重私罪律降三级调用,得旨加恩改为革职留任”。¹¹此时又经吴镇和钦差连续打击,诸如丁士彬等丁宝桢重用之人纷纷被弹劾革职,王闿运感慨道:“释公羽翼尽剪,又不得罢,殊难施展也。”¹²然而,丁宝桢并未就此屈服。

三、丁宝桢的反击

曾诛杀慈禧太后身边大太监安德海的丁宝桢性格刚毅,不惧官场压力,曾对心腹唐炯言:“我作事,枢府不能挠。”¹³对于阻挠丁宝桢改革的川省官绅,特别是串通朝中南派势力的臬司方浚颐等人,丁宝桢

1 阳金平:《光绪初年“东乡案”审理中的南北党争与地方督抚》,《史学月刊》2019年第五期,第48~55页。

2 唐炯撰:《丁文诚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一六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要”通“邀”。

3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24~725页。“道员中丁、劳、唐,州县中田、李”分别指:丁士彬、劳文翻、唐炯、田秀栗,“李”疑为李传骏,皆是丁宝桢改革时重用之人,大多被钦差弹劾革职。

4 《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御史童华奏为奉旨查办川督丁宝桢刚愎怙非敛怨具实密陈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5137—072,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5 《清德宗实录》卷八七,光绪五年二月丙戌,《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4页。钦差所奏详参:《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奏为遵旨查办四川总督丁宝桢被参各款复奏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408—010,光绪五年二月十三日。

6 《清德宗实录》卷八八,光绪五年二月壬寅,《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4页。

7 《清德宗实录》卷八八,光绪五年二月癸巳,《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0页。

8 傅德元:《丁宝桢与四川盐政改革》,《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六期。

9 钦差所奏详参:《礼部尚书恩承奏为四川省设立官运局耗财敛怨请旨改为仍由官运或官督商销等情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408—011,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10 《清德宗实录》卷九三,光绪五年四月壬申,《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9页。

11 《清德宗实录》卷六六,光绪四年正月庚午,《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页。

12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61页。丁宝桢字稚璜,“穉”通“稚”,简体为“稚”,王闿运将丁宝桢称为“穉公”。

13 唐炯:《成山老人自订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64页。

给予了反击。光绪五年（1879）二月，丁宝桢上奏称川省臬司不能胜任其职，朝廷令丁悉心察看，据实参奏。¹次月丁宝桢再次参劾方浚颐，态度坚决，称臬司“方浚颐性近优柔，习尚瞻徇，其于发审各案情事稍涉繁难者，辄日久延搁，不能督率研讯，平情执法，迅为办理，及面加催促，犹多濡滞不决，而于官吏复多宽纵”。丁还参劾方浚颐“于支领公费外，仍复照前收受陋规”。²朝廷最终同意照丁宝桢所请，将方浚颐“即行革职”。³接着，丁宝桢将参劾目标放在了阻碍盐政改革并和钦差沆瀣一气的盐茶道蔡逢年身上。五月，丁上奏历数蔡逢年数罪：其一，“收受局员规礼，并于规礼外，每令人函致局员，为其亲故勒索帮费，自数十两至一二百两不等”；其二，办理贡缎时大费周折并趁机贪私；其三，有人向丁呈控蔡逢年，蔡却不顾体制两次赴总督府索回呈控之人；其四，违章妄改盐引并屡教不改，丁宝桢奏请将“盐茶道蔡逢年即行革职以儆贪墨”。⁴不久，朝廷下旨：“蔡逢年著即革职。”⁵

对丁宝桢有知遇之恩的阎敬铭也适时出手。正在山西办理“丁戊奇荒”赈务的阎敬铭于光绪五年（1879）五月突然参劾恩承、童华二人“行至晋境，每迎常带轿者杂费折钱百数十千，门包零费银百数十两，酒席折价外又用燕菜、烧烤及海菜多棹，大车轿车四十余辆，驿马民马六十余匹。合计一日支宿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此非常扰害行赈事”。⁶除了在山西，二使路过陕西也是支用浩繁。⁷恩承、童华离川时，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二使出境，往贡院看之，装驮累累，有四百驮，一百余扛，云其来百人，其去千人，可讶也。”⁸如此兴师动众的离川，亦可见钦差对民间的扰累。朝廷后来将两位钦差“革职留任”。⁹

在丁宝桢和阎敬铭的参劾下，阻挠改革的两位钦差大臣、川省臬司方浚颐、盐茶道蔡逢年等人纷纷被查办。这一举扭转了丁宝桢在官场的被动局势，为改革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光绪五年（1879）六月，经过数年审理，东乡一案以冤案定讞，丁宝桢被部议革职，但朝廷下旨认为“丁宝桢平日勇于任事，操守尚好……四川吏治废弛，风气浮靡。该督到任后竭力整饬，不避怨嫌，且于盐务力排众议，变通办理，规复滇黔引地，即为复还淮岸之计，自应责成一手经理，以观后效。丁宝桢著加恩赏给四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该署督当仰体朝廷弃瑕录用之意，于力求整顿之中”。¹⁰丁宝桢虽被处分，而朝廷鉴于其督川的改革而网开一面，使得丁仍居川督之位。光绪三年（1877）五月，丁宝桢着手办理四川机器局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遭到了钦差和吴镇等人的弹劾，机器局被停办。¹¹到了光绪五年（1879）十月，朝廷下旨：“四川机器局经恩承、童华奏请停办，谕飭酌度办理。现经裁撤，应否缓办，得旨。著仍设法兴办，毋使废坠。”¹²停办两年多的四川机器局得以恢复。丁宝桢倾力最多的盐政改革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四川盐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盐税成倍增长。¹³丁宝桢在四川的改革获得了较高成就，“蜀中犹有天日，

1 《清德宗实录》卷八八，光绪五年二月庚子，《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4页。

2 《遵旨覆陈方浚颐不能胜任折》（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899～1900页。

3 《清德宗实录》卷九二，光绪五年闰三月乙未，《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9页。

4 《参办蔡逢年折》（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937～1942页。

5 《清德宗实录》卷九六，光绪五年六月丁巳，《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0页。

6 《稽查山西赈务阎敬铭奏为奉使大臣恩承、童华过境扰累殊甚据实直陈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5587—074，光绪五年五月十七日。“棹”，通“桌”。

7 《稽查山西赈务阎敬铭呈光绪四年十一月恩承童华经过陕西华州宿站支应各项照录原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5587—076，光绪五年五月十七日。

8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76～777页。

9 《清德宗实录》卷九六，光绪五年六月壬子，《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1页。

10 《清德宗实录》卷九七，光绪五年六月乙未，《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7页。

11 戴斌武：《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晚清地方督抚——丁宝桢洋务活动解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第163页。

12 《清德宗实录》卷一〇二，光绪五年十月癸亥，《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3页。

13 王红：《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四期，第43页。

盖十年来丁公倡导之功不可没也”。¹也有人将丁宝桢称为“四川数十百年第一好总督”。²

四、结语

张荫桓曾在日记中写道：“丁文诚公督蜀十年，勋业炳著，履任之始，裁夫马局，改离堆水道，办官运盐，锐意兴革，怨毒之声腾于京外，言者交弹，使星勘治，而松柏之姿经冬弥茂，名实相副。”³张荫桓恐多为丁宝桢美言，因丁在山东时对张有提拔之恩，不过日记所记丁宝桢在川督任上遭遇非难却是事实。丁宝桢在川大刀阔斧的改革，招来了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击。据传，有对丁宝桢不满之人在总督衙门大书：“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⁴李鸿章对丁宝桢的遭遇感慨道：“惟念公自莅蜀后，兴利剔弊，摧陷廓清，百废具举，无非为国为民之忠诚，乃官绅不知感服，横生怨谤，又值朝廷广开言路，使若辈得以逞其私，天下任事者能无寒心耶。”⁵在川省官绅和川籍京官以及钦差大臣的一再打击下，丁宝桢多次遭受处分，但始终巍然不倒。丁宝桢勇于任事的性情源自于为国为民之心，面对官场斗争，丁告知长子丁体常：“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宁可被参而罢黜，断不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貽羞后世也。”⁶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对丁宝桢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的探讨。⁷光绪初年丁宝桢督川时的官场斗争这一个案，既向我们展示了“同光中兴”时期地方督抚的锐意进取，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地方大吏在改革时弊中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丁主川后开展的一系列举措，本为利国利民之举，却不断遭到来自朝廷和地方的非议，这一面相学界虽有注意，但对官场斗争这一背景尚未展开探讨。笔者认为，要推进丁宝桢研究，就必须把握住丁宝桢言行背后诸如官场纠葛等相关背景，才能更加丰富地展现丁宝桢的人物形象以及加深对丁所处时代的认识。

Ding Baozhen's Governance of Sichuan and the Official Struggle in the Early Years of Guangxu

Yang Jinpi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Guangxu, Ding Baozhen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reform after governing and inspecting Sichuan, which hit many people with vested interests, and caused dissatisfaction of some officials and gentry, such as Fang Junyi, the Sichuan inspector general. On the one hand, they sought support in the imperial court. For example, the imperial censors represented by Wuzhen, the capital official of Sichuan, tried to impeach Ding Baoz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awn on the powerful Southern faction figures in the court, especially the imperial envoy who entered Sichuan. These three forces often puzzled Ding Baozhen and brought great resistance and hindrances to his reform. However, Ding Baozhen was not afraid of impeachment and fought back in time. With the help of his good friend Yan Jingming, most of the important people who obstructed Ding Baozhen's reform were dismissed or punished, which created a better officialdom environment for Ding Baozhen to supervise Sichuan's refor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se official struggles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study of Ding Baozhen.

Key words: Ding Baozhen; Fang Junyi; Imperial envoy; Reform in Sichuan

责任编辑：庞思纯

1 《致游署督》，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4页。

2 《光绪庚辰致黎简堂廉使书》，刘愚：《醒予山房文存》；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版，第549页。

3 张荫桓著，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4 金梁辑：《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5 李鸿章：《复丁稚帅》，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

6 丁宝桢著，（丁）泽霖释，（丁）垂健注：《丁文诚公家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7 刘晓焕：《丁宝桢研究概述》，《齐鲁文史》2000年第三期。

一身贫骨似饥鸿

——从《离垢集》看华岳的一生

刘秀丹

(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 贵阳 550023)

摘要: 华岳是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谓为三绝。《离垢集》五卷,由华岳在世时亲自缮写并传诸后世。本文以《离垢集》为线索,考察画家贫困交加的人生际遇和人生转折的重要时间节点,以厘清学术界关于华岳研究的几个时间争议。

关键词: 华岳 《离垢集》 人生 售画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20) 03-31-37

华岳(1682—1756)¹字德嵩,后改字秋岳,福建上杭县白沙里华家亭人,上杭古属新罗,故自号新罗山人,以示不忘桑梓之意。别号布衣生、东园生、白沙道人、新华山人、离垢居士等。华岳是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谓为三绝。《离垢集》是华岳的诗文总集,“五卷,山人手自缮写”²。道光丁亥年(1827),其曾孙世琮、世璟游仙源,以华岳手录《离垢集》全稿出示华榕轩,榕轩大爱,“因命儿曹缮抄,以质大雅,……爰于簿书之暇亲加校阅,以授梓人。嘱其曾孙世琮、世璟考辨鲁鱼,越三月书始成”³。顾师竹也以为“山人曾孙铁舫序荣持至仙源幕府,始得榕轩表扬之”⁴。本文拟根据《离垢集》,就华岳生平作简单介绍,并就其一生中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初客杭州(1682—1703)

1682年,华岳出生于福建上杭县白沙里华家亭的一个布衣家庭。白沙村是上杭土法造纸的起源地,华岳的父亲华常五是一名造纸工人,四十多岁因病离世。华岳幼时,曾入蒙馆就读,后来可能因家贫失学,在造纸坊当学徒。少年时代的苦难经历,并未改变华岳勤奋好学的性格和高洁的人生志趣。“少年好骑射,意气自飞扬”⁵,多年后,华岳在一首《画马》的题诗中这样描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除读书学剑外,华岳常游荡在故乡的山水之间,上杭的山水陶冶了他的心灵,锻炼了他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华岳可能还

作者简介:刘秀丹,贵州省毕节市人,贵州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展览策划和文物研究。

1 关于华岳的生卒,目前学术界认识并不统一。其生年有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两说;卒年也有1756年和1761至1763年两说。温肇桐先生《华岳》对此已有论述(温肇桐著:《华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在《华岳生平补订》(徐邦达著:《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2页)中,徐邦达先生考证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本文从此说。《离垢集》卷五《辛未,余年七十,仍客广陵员氏之渊雅堂,艾林以芹酒为寿,因赋是诗》(华岳:《新罗山人离垢集》,道光乙未年本,第8页b),故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比较确定的。

2 顾师竹:《新罗山人离垢集序》,华岳撰:《新罗山人离垢集》,道光乙未年慎馀堂本。

3 华时中:《新罗山人离垢集卷后记》,华岳撰:《新罗山人离垢集》,道光乙未年慎馀堂本。

4 顾师竹:《新罗山人离垢集序》,华岳撰:《新罗山人离垢集》,道光乙未年慎馀堂本。

5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58页。

从民间画师学习过绘画，并展示出自己过人的绘画天赋。康熙四十二年（1703），家族重修华氏宗祠，华岳一挥而就，完成了宗祠正厅的四幅壁画：《高山云鹤》《水国浮牛》《青松悬崖》《倚马题诗》。画完后，因遭族中权贵反对，华岳愤而出走，从此客居异乡¹。

1703年，华岳来到了杭州，依靠卖画谋生。但现实给了初到异乡的王岳重重一击，“踟蹰于田，安得缗钱”²，赖以谋生的砚田，并没有给华岳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仍旧过着动荡而清寒的生活，依然是“一身贫骨似饥鸿，短褐萧萧冰雪中”³。

科举登仕已不可能，华岳必须另谋他途。因此在卖画之余，华岳益发勤奋苦读。徐逢吉曾说华岳“壮年苦读书，句多奇拔，近益好学，长歌短吟，无不入妙”⁴。但是对于未来，华岳有些彷徨无助。“踟蹰于田，安得缗钱？知我者为我以长叹，不知我者吾独往而谁攀。吁嗟乎，击筑长歌，时当奈何？”⁵困苦的生活，让华岳顿觉前途茫然，悲愤自己怀才不遇。另一方面，困顿的生活并没有对华岳想有所为的志气造成打击，“咄咄髯生冰上来，破靴踏冻脚皮裂”⁶，借钟馗破靴踏雪而来的形象，华岳展示了自己不屈于困境的意志。积极入世的同时，出世的思想也在萌芽。“人生不得意，安肯濯沧浪。何日与子游，携手三石梁”⁷，体现了华岳人生不得意，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甘愿与二三同好寄情山水的人生态度。或如徐紫山“鸡犬寒梅外，琴书深竹间”⁸，不慕荣华，寄身田园。

大约在1705年，华岳与蒋妍结婚。关于华岳与蒋妍结婚的时间，周坤先生的《华岳年谱》作1707年⁹，其他各家均作这一时间。据华岳《离垢集》卷一《癸巳十一月八日，为亡妇追写小景，因制长歌言怀》¹⁰，可知蒋妍病逝于雍正癸巳年（1713）或更前。又据《追忆蒋妍内子作诗当哭》，有“八年荆布俭，一病玉颜摧”¹¹句，知蒋妍病逝于婚后八年，则华岳与蒋妍结婚当是1703至1705年间。

蒋妍的病逝，给清贫困苦的王岳重重一击，使他又回到了初到杭州时孤苦的生活状态。“试将红粉调清露，恍是当年见新妇”¹²，“肯将遗枕为卿梦，肯将残鸭为卿熏。天长地久情还在，不许鸳鸯有断群”¹³。这种孤苦无依的生活状态，并未持续多久。1717年，华岳北游京都。

1703至1717年寓居杭州期间，华岳结识了徐逢吉（字紫山）、蒋静山（字雪樵）、吴允嘉（字石仓）、厉鹗（字太鸿）。其中徐、蒋、吾三人为安贫乐道、潜心著述的下层知识分子，三人均较华岳年长。厉鹗才华横溢，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举，后屡试不第，是浙西词派的中坚人物。五人之间经常诗文唱和、参禅论道。与诸人交游，对华岳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诸友人的感染下，华岳发愤读书。

“昔当壮岁血性豪，学书学剑云可恃”¹⁴，学书学剑，是华岳为实现其建功立业的理想而作的准备。

1 据《华岳青少年时期的传说》载，时间是康熙四十年（1701），地点在文昌阁。而据《离垢集》徐逢吉题记，“忆壬午、癸未间，华君由闽来浙”，康熙壬午、癸未分别为1702、1703年，徐逢吉回忆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年，因其所忆为壬午、癸未间，所以华岳离开家乡，当是1703年之事。又据光绪十五年（1889）罗嘉杰刊印《离垢集》序言：“上杭华氏祠堂壁塑，至今墨迹犹存，盖山人所作也。”说明华岳所作四幅壁画，一直保持至光绪年间，地点正是华氏宗祠。

2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1页。

4 徐逢吉：《题辞》，华岳撰：《新罗山人离垢集》，道光乙未年慎馀堂本，第1页a。

5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6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18页。

7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7页。

8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9 周坤：《华岳年谱》，卢辅圣主编：《朵云》（第五十七集）“华岳研究”专集，上海书画出版2003年版，第261页。

10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4页。

1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4页。

12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4页。

1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5页。

14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

在学书学剑之外，华岳也寄情山水，遍观名家书画，画艺大进。蒋妍病逝前，华岳曾有江西之行¹，于郎中丞幕府得观倪云林、王叔明合写古树竹石一帧，游庐山，有《拟庐山一角》。郎中丞，即江西巡抚郎廷极，1705至1712年间任江西巡抚。据《离垢集》卷一《写古树竹石》，有“倪王合作一帧，昔在郎中丞幕府得观，其云石苍润，竹树秀野，精妙入微，由来二十年不能去怀”²之语。《离垢集》按照时间编排而成，《写古树竹石》前有画黄竹岭的来由：“雍正七年三月三日，仆自鄞江复来钱塘，道经黄竹岭。……入秋后，始得闭户闲居，偶忆春游佳遇，追写成图，补题小诗用遮素壁。”³可知画黄竹岭是在雍正七年（1729）秋天。《写古树竹石》后有《养身一首》，题记为“己酉冬十月望前一日作”⁴，雍正己酉年也是1729年，可知《写古树竹石》作于1729年秋冬之际，华岳的江西之行，则大约在1709年了。

据《离垢集》载，1713至1717年间，华岳曾游于龚翔麟之门，有《画苍苔古树赠玉玲珑阁主人》，可见他与龚翔麟关系并不一般。龚翔麟（1658—1733），字天石，号蘅圃，又号稼村，晚号田居，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康熙二十年（1681）中顺天乡试乙榜。翔麟以副贡生授兵部主事，出榷广东关税，康熙三十三年（1694）考选陕西道御史，寻命巡视西城。官御史十年，乞归故里。龚翔麟是清代有名藏书家，藏书甲于浙右，有藏书楼“玉玲珑阁”。据厉鹗《东城杂记》：“玉玲珑，宋宣和花纲石也，上有字纪岁月，苍润嵌空，叩之声如杂珮，本包涵所灵隐山庄旧物。沈氏用百夫牵挽之力，致之庾园，后归龚侍御翔麟，因以名其阁焉。”⁵晚年，龚翔麟“移家白洋池畔，自号田居，旧宅已易主”⁶。华岳与龚翔麟交游，当在其移家之前，得以遍观其藏书，识见大长。

二、北游京师

据《丁酉九月客都门思亲兼怀昆弟作》一诗，康熙丁酉年（1717）九月，华岳已经到达北京。香港王南屏先生收藏有华岳行楷书一册，其中有自书诗《武林之下留别诸友》，据薛永年先生《华岳通论》所录，有“感此明月光，梨花满园白。华月淡春空，春生柳岸风。蒲塘三月水，莎草绿茸茸”⁷之语，说明该诗可能作于春三月。如果该诗是华岳离别诸友北上京都时之作，那可能华岳离开杭州北上的时间是康熙丁酉年（1717）春。

据王靖宪先生研究，促使华岳北游，并“联轳北上”的友人，很可能是金志章。金志章，初名士奇，字绘甫，别号江声，钱塘人，雍正癸卯（1723）恩科举人，由内阁中书迁侍读，出为口北道，莅四载，廉而慈，民称金佛。《尊闻录》有云：“金君江声高才博雅，以诗、古文名家。乡前辈龚蘅圃先生特重之，延课其子。龚故多藏书，江声能尽读之，与先生讨论不辍，唱酬为乐。又从先生游粤西北，……”⁸大约在康熙乙未年（1715）冬，龚蘅圃携金志章游粤西北归，厉鹗作《金绘甫自湖南游桂林归赋赠》记其事，“郡有颜公称二始，溪经元子署三吾”⁹。“二始”指晋始平太守阮咸与南朝宋始安太守颜延之，厉鹗以其誉龚蘅圃、金志章二人，金志章亦有《楚粤游归樊榭有诗见问聊叙景物大略赋以答之》一诗。据《江声草堂诗集》之《与倪穉畴话别时穉畴之严陵余将北上》一诗，说明金志章回杭后，就有北游的计划。而据《北沟河吊二忠祠遗址》“庚子春，北游过北沟河”¹⁰，金志章直到康熙庚子年（1720）才北上北京，其

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2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6～47页。

4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

5 厉鹗：《东城杂记》卷下《玉玲珑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第三一七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8页。

6 厉鹗：《东城杂记》卷下《玉玲珑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第三一七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8页。

7 据薛永年《华岳通论》抄录，卢辅圣主编：《朵云》（第五十七集）“华岳研究”专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8 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十七《金志章》，清嘉庆仁和朱氏碧溪草堂钱塘陈氏种榆仙馆刻本。

9 厉鹗：《樊榭山房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二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10 金志章：《江声草堂诗集》卷四，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时华岳已自北京返回杭州了。王靖宪先生认为华岳北上,可能与金志章调任口北道有关,而金志章出为口北道,已是乾隆己未年(1739)的事了。

不过,在1715至1720年间,华岳、金志章二人的人生是有过交集的。金绘贞有《月夜同重阊秋岳登虎丘》¹二首,正是庚子年(1720)春金志章由杭州途经苏州、丹阳、镇江北渡长江前,在苏州登虎丘所作。当时同登虎丘的,除华秋岳外,尚有汪德容²。而《随园诗话》之《月夜同重阊秋岳登虎丘》作于雍正壬子年(1732),不知所本为何,谬也。华岳也有《六宜楼听雨同金江声作》一首,创作时间大概也在1720年前后。金志章途中尚有《白沙江上晚泊即景寄华秋岳》,说明华岳并未与之同行。

1717年,华岳到达北京。华岳在北京的经历不甚清楚,但对北上京师怀有抱负的华岳而言,现实又给了他沉重地一击。背井离乡,思亲、思乡总是萦绕在华岳的心头。“何处抛愁好,穿庭复绕廊。东西经夜月,南北梦高堂。有眼含清泪,无山望故乡。纷纷头上雁,联络自成行”。³但京师的孤苦生活并未持续太久,据薛永年先生摘录《华岳与闽汀华氏族谱》,“(岳)壮岁游京师,得交当路巨公,名闻于上。召试,列为优等,受县丞职以归,卜居杭州”⁴。但对怀抱远大志向的华岳,八品的县丞恐非其所愿。而其时的北京画坛,奉四王为正统,华岳早年从民间画师习画,寓居杭州后师法陈洪绶、恽寿平,尚未形成自己个人的艺术特色,很难得到北京画坛的赏识,使华岳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⁵之感。戴熙亦载:“华秋岳自奇其画,游京师无问者。一日有售贗画者来,其裹纸华笔也,华见而太息出都。”⁶如果戴熙所载此事确实,那对自视甚高的华岳而言,颇受打击。

“游罢诸名山,归舟载风雨”⁷,南归途中,华岳便道游历了五岳名山,至迟在康熙己亥年(1719)秋,华岳已经回到了杭州。“己亥秋,纳言陈六观先生招游园亭,陪诸君子渡江造胜,饱饫林峦,复探禹陵、南镇、兰亭、曹山诸奇,爰归,梦想弗置,得五言诗数首,以识平生游览之盛”⁸。此次陈六观所邀各位,可能也有金江声,在《江声草堂诗集》中,也有《禹陵》《兰亭》二首,创作时间也大致在1719年前后。很可能,这次的游园活动,促成了华岳与金江声的友谊。越明年,金江声北游京师,华岳为其送行,同登虎丘,金江声作《月夜同重阊秋岳登虎丘》记其事。

三、鬻画维扬

华岳自京师回杭州后,寄情山水之间,却无法排解孤寂苦闷的心情。“焦桐鼓罢想离鸾,四壁灯青韵未干。莫使孤弦长寂寞,满帘湘水压栏干”⁹。焦桐,即焦尾琴,典出《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下》,诗词家多以焦桐述寂寞、离情等。华岳也如是,他不仅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孤独,也望徐紫山“莫使孤弦长寂寞,满帘湘水压栏干”。不管徐紫山是否为其牵线搭桥,华岳还是成功续娶蒋妍的妹妹蒋媛为妻。

与蒋媛结婚后不久,华岳有了自己的小家,“白云岭上伐松杉,架起三间傍石崖”¹⁰。在自己的小家里,“自有小天容我乐,且携杯酒对花衔”¹¹。但随着两个儿子的降生,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贫遣客情

1 金志章:《江声草堂诗集》卷四,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2 汪德容,字重阊,号蔚亭,亦字云尺,浙江钱塘人。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一甲三名进士。著有《重阊斋集》。

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5页。

4 薛永年:《华岳与闽汀华氏族谱》,卢辅圣主编:《朵云》(第五十七集)“华岳研究”专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5 周颐:《离垢集补钞序》,华岳撰:《离垢集补钞》,民国六年铅印本。

6 戴熙:《习苦斋画絮》卷三,清光绪十九年(1893)景文斋刻本,第19页。

7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0页。

8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1页。

9 香港王南屏藏《华岳行楷书册》,转引自薛永年:《华岳通论》,卢辅圣主编:《朵云》(第五十七集)“华岳研究”专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0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9页。

1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9页。

随野鹤，怕论家事避山妻”¹，“常共妻孥饮粥糜，登盘瓜豉茹芹葵”²。虽以“贫家自有真风味，富贵之人那得知”³自嘲，但窘迫的物质生活，迫使华岳不得不鬻画扬州。

其时的扬州得地利之便，晋、陕、徽、浙等地方商帮汇聚扬州，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盐商巨贾通过盐业获取暴利的同时，追逐声色之娱，大兴养士之风。各地文人名士纷纷游食扬州，出入盐商巨贾之门，使扬州成为江南一文化中心。各地画家为谋求衣食，或提高画艺，或广交朋友，纷纷流寓扬州，形成了以八怪为代表的画派群体。

据上海博物馆藏《栖云竹阁图》自题，华岳“甲辰岁（1724）客游维扬”，是为目前所见华岳到扬州的最早时间记载。据《离垢集》，华岳客游扬州有如下数次：

1. 雍正庚戌年（1730）。据《离垢集》卷一，华岳作《题员双屋红板词后》《裳亭纳姬戏为艳体一律奉赠》。

2. 雍正壬子年（1732）。自邗沟返钱塘，道过扬子。

3. 具体时间不详，大致在1732至1738年间。为员周南作画。

4. 乾隆戊午年（1738）。据《离垢集》卷二，有《题员果堂摹帖图》《和一轩子言心》《员青衢移归老屋作诗赠之》《题果堂读书图》《员裳亭珠英阁落成招集雅酌分赋得禅字》《高犀堂五十诗以赠之》《员十二以岁朝图索题漫为长句》《同员九果堂游山作》《过双屋口赠》等诗，皆是与员氏族人的应酬之作。

5. 乾隆庚申（1740）春至乾隆辛酉（1741）秋。据《离垢集》卷二《客春小饮有感》“老矣扬州路，春归客未还”⁵句知华岳在扬州已有时日。据辛酉年《和汪食牛清明日扫墓之作》“余客江北积岁，不获一归省先人坟墓，深有惭于汪生也，慨之哉”⁶之语，结合《客春小饮有感》内容，可知《客春小饮有感》作于乾隆庚申（1740）春。据《离垢集》卷二云：“时辛酉秋，……果堂偶出前书批阅相玩”⁷，则乾隆辛酉秋，华岳尚客居扬州。乾隆庚申（1740）春至乾隆辛酉（1741）秋，华岳客居扬州，《庚申岁客维扬果堂家除夕漫成五言二律》中有“十年交有道，此夕感分金”之语，并注“果堂以青铜三百文惠余压岁”⁸。《挽徐紫山》有“庚申岁，仆客邗江”⁹。乾隆辛酉（1741），《离垢集》卷二《辛酉仲春，……乃为一诗，以志斯事》¹⁰《员双屋见过雅谈赋此以赠》《余客居杨之东里，……》等诗作¹¹。另《辛酉自维扬归武林舟次作诗寄员九果堂》云“重云贯征雁，霜气带寒陂。敝芦依短楫，幽鷁泛文漪”¹²，则华岳此次自扬州归武林大致在1741年秋了。

6. 乾隆壬戌年（1742）。据《离垢集》卷三有《壬戌夏，员双屋携囊渡江，饱观杭之西湖，兼访陋室，晤拙子，留诗而去。余时亦客维杨，扣双屋，则主人已在六桥烟柳间矣。越月归，录前赠相视，拟此答焉》¹³，另有《果堂东游海滨见寄慰感而答诗》《挽广陵光禄汪上章》《松竹画眉题赠员果堂》等

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0页。

2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2页。

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2页。

4 扬，《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作“杨”，误。道光乙未年慎馀堂本作“扬”，据改。

5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3页。

6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2页。

7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4页。

8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6页。

9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

10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8页。

1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12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06页。

1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24页。

诗,也作于这一时期。《赠金寿门时客广陵将归故里》则作于即将离开时。然而不知是归家后又回扬州,还是根本就没有回杭州,华岳于果堂处作《壬戌岁客果堂除夕同员巽之作时抚厘兆互为吟赠》,并记“岁暮之日,风雪凄然,群为尘务所牵,唯余与果堂独以寒襟相对。噫,静躁不同,岂止悬阻千里也哉”¹,则壬戌岁除夕华岳客居果堂家,未在杭州陪家人过除夕。

7. 乾隆癸亥年(1743),员周南母吴夫人寿,华岳作《题松竹为员周南母吴夫人寿》。重阳,作《题闵耐愚闲居爱重九小照》。十月七日,作《癸亥十月七日过故友员九果堂墓,感生平交,悲以成诗》²。除夕前一日,有《癸亥除夕前一日崇兰书屋作》。除夕,作《重过渊雅堂除夕有感题赠员氏姊弟》,有“一过吟堂一惨神,烟花雨树色非真。去年此夕篝灯事,人鬼难言隔世春”³句。华岳此次扬州卖画,一直持续到乾隆甲子年(1744),《和员裳亭立春日宴集原韵》就作于1744年立春日。为马日璐五十岁生日作《马半查五十初度拟其逸致优容写之扇头并制诗为祝》。另有《题员周南静镜山房图》也作于此年。

8. 乾隆乙丑年(1745)。据《离垢集》卷三《乙丑秋客维扬,薛漠塘殿山两昆季见过,并赠以诗,即用来韵和答》⁴,可知华岳1745年秋曾贩画扬州,但离开的时间不详。

9. 乾隆庚午年(1750)。华岳作《庚午七月渡扬子江口拈一首》,有“江声万里至,书卷一担归”⁵句。

10. 乾隆辛未年(1751)夏至乾隆壬申年(1752)二月。华岳作《辛未夏夜渡扬子作》。是年,华岳七十岁,有《辛未余年七十,仍客广陵员氏之渊雅堂,艾林以芹酒为寿,因赋是诗》⁶记其事。辛未冬,客邸大病月余。壬申二月,归舟渡扬子江。

1724至1752年,华岳扬州卖画的时间长达二十八年。对于卖画养家的华岳,这段人生充满了悲苦。1732年,华岳自邗沟返钱塘,“遂冒寒得疾,抵家一卧三越月,求治弗瘳。自度必无生理,伏枕作书遗员子果堂,以妻孥相托”⁷。托付朋友,安排身后事。书的内容不得而知,华岳自认为“词意悲恻,惨不成文”⁸。病愈后,“既能饮糜粥,理琴书,守家园,甘葵藿以终馀生愿也”⁹,油然而生归隐林泉之念,“奈何饥寒驱人,未克养拙,复出谋衣食”¹⁰。

孤独和疾病,时时窥视着客游者。辛未(1751)冬,客邸大病月余,身边无一亲人照料,只能靠“默祷佛王”,才“渐得小瘳”,由此生出“我命轻如叶,飘飘浪里浮”的无力感。病中,对家人的思念时时折磨着华岳,“望楼思二子,泪下不能收”¹¹。

华岳售画扬州期间,交谊最深、最知己的朋友,当属员果堂。员果堂,生年无考,卒于乾隆癸亥年(1743)八月底九月初。据《离垢集》可知,华岳与扬州员氏往来者,有员果堂、员双屋、员裳亭、员十二(名字不详)、员青衢、员周南、员道颐等。其中员果堂排行第九,其人“别拓清怀,含贞宝朴”,“藜藿实所甘,丝篇日积理”,性格“恬处幽素,守默养和,不为世喧所扰其衷,而以山水云鸟自娱”。

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37页。

2 《癸亥十月七日过故友员九果堂墓,感生平交,悲以成诗》有注“果堂葬于九月七日”,则果堂去世当在九月七日前。周坤先生《华岳年谱》以员果堂于乾隆壬戌年(1742)十月七日去世,谬矣。据《壬戌岁客果堂除夕同员巽之作时抚厘兆互为吟赠》,则壬戌年(1742)除夕员果堂尚在世。

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53页。

4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64页。

5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29页。

6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39页。

7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3页。

8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3页。

9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3页。

10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3页。

11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42页。

华岳每次渡扬子江于扬州售画，寄迹员果堂家，多得果堂一家关照。庚申岁（1740）除夕，华岳客维扬果堂家，愁旅思乡，为解华岳思乡之愁，果堂陪华岳把酒漫话，并“以青铜三百文惠余压岁”。壬子年（1732）病中，“自度必无生理，伏枕作书遗员子果堂，以妻孥相托”，可见二人相交至深。

另外，华岳还结识“扬州二马”。“二马”为扬州有名盐商巨贾，兄曰马日琯，字秋玉，号嶰谷，“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¹。弟曰马日璐，字佩兮，号半查，工诗，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二马”为扬州有名藏书家，“乾隆三十八年奉旨采访遗书，经盐政李质颖谕借，其时主政已故，子振伯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²。华岳得与“二马”交游，得以结识游食扬州的各地画家，识见大增。

四、小结

乾隆丁卯年（1747），继室蒋媛病故。次年周忌，华岳作《戊辰三月二十一日亡荆蒋媛周忌作诗二首》³，“自伤衰朽骨，谁复劝支持”，想起斯人，“斟尽杯中酒，音容何处追”，自己只能“痛抛余日泪，宁复整孤弦”。1752年，华岳最后一次从扬州回杭州，“不甚酬应，惟以举子业课后昆”⁴。1756年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华岳的一生，起自底层，依着自己的奋斗，一步步成长为“诗书画”三绝的知名画家。当时的扬州，小写意花鸟画大行其道，华岳并不因谋衣食而舍弃山水画的创作。怀抱“笔尖刷却世间尘，能使江山面目新”⁵的华岳，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山水画，其数量差不多占华岳传世作品的一半，这在扬州画派其他画家中是不多见的。华岳去世后，《离垢集》经其再侄孙华时中整理刊刻，流传至今。

Being skinny and hungry

——Hua Nie's life from "Degrees Collection"

Liu Xiudan

Abstract: Hua Nie is one of 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whose writing poems, calligraphy, painting are well known as three unique. Set off Scale (Ligouji) (five volumes) was written out by Huayan and was passed on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Depending on reading Set off Scale, one can inspect the life point of the case of hunger and poverty of those painters and make the controversy left in academic on Huayan's life in different periods clearly.

Key words: Hua Yan; Set off Scale (Ligouji); life; Selling paintings

责任编辑：王尧礼

1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七三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页。

2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七三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页。

3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00页。

4 华时中：《新罗山人离垢集卷后记》，华岳撰：《新罗山人离垢集》，道光乙未年慎馥堂本。

5 华岳：《离垢集》，《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第六十六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1页。

“四库学研究” 栏目 主持人语

何宗美

本期所刊三篇论文，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新勋教授的《〈四库全书〉所收宋儒考校韩集提要考辨三则》、西南大学文学院蒋勇博士的《唐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唐宋诗文批评》、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姚江浩硕士的《〈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章批评析论》。

杨文是考辨之作。《四库全书》所收宋人撰编韩愈文集三种，即方崧卿撰《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朱熹撰《原本韩集考异》十卷，王伯大编《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其提要“在书名、卷数、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实、差异之处”，杨新勋教授借助广泛的文献视野，包括亲自经眼的一些相关版本，对问题进行了仔细深入的考证和落实。以《韩集举正》提要为例，一些疑问四库馆臣曾悬而未解，如：“十卷之末，又有《外集举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陈氏亦不及，核其原刻，不标卷第，殆即附之十卷中欤？”又如：“今考《外集举正》所列，自《海水诗》至《明水赋》，二十五篇之数俱全，无所谓《大颠三书》者，亦无所谓石刻联句、诗文之遗于他集者，不知《考异》所据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阙所不知可矣。”¹这些问题被明确提出来，只是在当时文献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馆臣难以强作确论，说明本身有很大的难度。而杨文用扎实的考证功夫，尽量给出了切实可信的回答，所谓“千古之大疑”也就水落石出。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张佳《四库总目唐集提要会证平议》等，对《韩集举正》等几则提要虽然也有所涉及，但皆非专考，较为全面、深入的考辨迄今为止则属杨文。

四库馆臣曾谓“盖著述之中，考证为难”²，《四库全书总目》堪称考证之学的集大成者，而考证《总目》更是谈何容易。当下这方面的论著或论文日益多见，但不尽人意者时亦有之，问题在于往往有考之名而无考之实，究其因主要是功力不足，甚至根本不愿下功夫。《总目》的考证，今后还需进一步推进。

蒋勇、姚江浩之文同为《总目》文学批评的论作，不同者在于针对的分别是唐宋诗文和明代文章。蒋文从清代文学的唐宋之争与《总目》生成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考察了作为清代官方文学批评产物的《总目》对于唐宋之争这一公案的官学立场，并揭析《总目》无论是唐宋诗还是唐宋文其批评的宗唐语境，进而归结到“以唐律宋”的批评倾向。论文的价值，既在于回答代表清代官学思想的《总目》是如何介入唐宋之争并表现为怎样的态度，同时又深入了解在唐宋之争官学介入的背景下，《总目》是如何进行唐宋文学批评的，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都不乏较重要的意义。姚文侧重讨论了《总目》“明集”文章批评的几个要点，包括“重道德人品的批评观”“学术与明集文章”“尊儒与明集文章”“复古而不泥古的文学观”，虽然论文所涉范围较为宏大，但大体把握了问题的要领，况且“《总目》明代文章批评”话题的提出，本身亦较有价值，期待作者继续探讨并取得新的创获。

本栏目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担任组稿人。

主持人简介：何宗美，1963年生，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四库学。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05～2006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钦定西清古鉴》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29页。

《四库全书》所收宋儒考校韩集提要考辨三则

杨新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韩愈著作在宋代非常流行,宋儒方崧卿《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朱熹《原本韩集考异》十卷和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是宋儒考校韩集的重要代表。三者均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为三者先后撰写了多种库本提要 and 总目提要。这些四库提要在三者书名、卷数、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均有不实之处。通过全面搜集资料,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可以考证三书各本面貌,梳理四库提要源流,并对提要评论加以澄清,订正各提要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韩集举正》《韩集考异》《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20) 02-39-45

韩愈的学术和文学在北宋受到了朝廷上下的肯定和推崇,其本人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配祀孔庙¹,其著作也在受到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的推崇后广泛流行。宋人搜集、整理、编选、刻印韩愈著作较多,各种集本、选本层出不穷²,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集考异》和王伯大《韩文考异》是宋儒考校韩集的重要代表。

这三种宋儒考校韩集在清代乾隆年间均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为这三种著作先后撰写了多种库本提要及总目提要,非常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四库馆臣视野下的宋代韩集的认识;但毋庸讳言,这些四库提要在书名、作者、版本及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多方搜索资料,对提要进行了梳理,撰成考辨三则,企方家垂教。

一、宋方崧卿撰《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

方崧卿(1135—1194)是南宋的校勘学家,尤以校勘韩愈诗文著称,《韩集举正》和《外集举正》是其长期校勘韩愈诗文成果的结晶,也是他校勘学的代表作。今天,人们对方氏生平、校勘成就及《韩集举正》的版本和价值已多有研究³,但对《韩集举正》和《外集举正》四库提要中的问题却鲜有涉及。

作者简介:杨新勋,1971年生,山东省惠民县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和四库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项目编号:15ZDB075)阶段性成果。

1 脱脱等撰:《宋史》卷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2页。

2 具体参看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金华凌:《论宋人韩文善本观的演进及其古籍版本学意义》,《云梦学刊》2009年第六期;金华凌:《论宋人选编韩文学术标准的嬗变》,《求索》2011年第十二期等。

3 具体参看史历:《〈韩集举正〉校勘符号简论》,《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二期;史历:《〈韩集举正〉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2002年第三期;史明文:《方崧卿的校勘学思想》,《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五期;刘真伦:《方崧卿韩集校理本考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五期;史明文:《〈韩集举正〉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四川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二期;刘真伦:《宋淳熙南安军原刻〈韩集举正〉考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六期;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真伦:《韩集举正汇校》,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等论著。

此书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前提要（以下简称“《文渊阁提要》”）¹、文溯阁《四库全书》本书前提要（以下简称“《文溯阁提要》”）²、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书前提要（以下简称“《文津阁提要》”）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言方崧卿《自跋》“称‘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增考年谱》一卷，复次其异同，为《举正》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同，而多《外钞》八卷”⁴。今按：文渊阁库本书末无《自跋》，文津阁库本书末有《自跋》，又铁琴铜剑楼原藏影宋钞本《韩集举正》书末有《自跋》。核方崧卿《自跋》中“《外集》一卷”后有“《目录》一卷”，诸提要皆脱。诸提要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多《外钞》八卷”，核《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著录为“《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举正》十卷、《外钞》八卷”⁵，《增考年谱》作《年谱》，陈氏《直斋书录解题》云“《年谱》，洪兴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名略不同。⁶

又，诸提要皆引《直斋书录解题》言“《外集》但据嘉祐刘煜所录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联句、诗文之遗见于他集者”，所引即出于《直斋书录解题》“《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举正》十卷、《外钞》八卷”条。然陈氏计篇有误，今核《外集举正》实二十六篇，是陈氏误数⁷，馆臣又沿袭陈氏之误。

又，诸提要言“十卷之末，又有《外集举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陈氏亦不及。核其原刻，不标卷第，殆即附之十卷中欤”，所言非是。今按：韩愈集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四十卷，宋人辑佚补缀成《外集》。方崧卿《韩集举正》十卷针对的是其所刊《韩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所以《韩集举正》每一卷内又列有原《韩昌黎先生集》的卷数，这与《外集举正》不分卷体例完全不同，《外集举正》是无法附入《韩集举正》十卷之中的。方氏《外集举正》针对的应是韩愈《外集》，这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方氏有“《外集》一卷”能看到这一消息。而《外集举正》所列篇目见于朱熹《韩集考异》卷九《外集》、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更能证明这一点。自朱熹校语可知（详下文），方氏刊刻之《外集》当来自嘉祐蜀本刘煜所录之二十六篇。虽然方氏刊刻的《昌黎先生集》及《外集》亡佚了，今无从得见，但却可从朱熹在方氏书基础上校定的《昌黎先生文集》及《外集》来做一些推论。朱熹校定的《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之后为《外集》十卷，据朱熹按语可知，其《外集》前五卷内容同方氏《外集》，只是增加了《与大颠师书》，后五卷为《顺宗实录》。方氏《外集举正》所列篇目和内容，正与朱熹所定韩愈著作《外集》前五卷内容基本相同，则方氏《外集》应是附《文集》而行，方氏撰《外集举正》即针对其《外集》而作，当附《韩集举正》之后，而不会“附之十卷中”，是馆臣臆测致误。

又，诸提要皆引《直斋书录解题》“《校定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条“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语，《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总目》言“今考《外集举正》所列，自《海水诗》至《明水赋》二十五篇之数俱全，无所谓‘大颠三书’者，亦无所谓‘石刻、联句、诗文之遗于他集’者，不知《考异》所据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阙所不知可矣”⁸。今按：自元代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之《外集》十卷来看，朱熹编定的《外集》确自《海水诗》至《明水赋》共二十六篇，与方崧卿《外集举正》篇目相同，只是卷二之末多了《与大颠师书》三通。则《与大颠师书》并非来

1 方崧卿：《韩集举正》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七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页。

2 金毓黻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71页。

3 《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卢仁龙辑：《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页。

4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7页。

5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75页。

6 刘真伦在《韩集举正汇校·前言》中说道：“根据现存《增考》遗文，方氏的增考为辨正吕、程、洪三谱之疏失而作，并非单单针对洪《谱》。”参见刘真伦：《前言》，方崧卿原著，刘真伦汇校：《韩集举正汇校》，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7 按：张诒自绍定二年刊朱熹《韩集考异》卷九《外篇》题下有注“方氏只据蜀本定录二十五篇”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言“二十五篇”似有所承。

8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679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页；《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8页。

自方崧卿所刊《昌黎先生集》之《外集》。今核此日新书堂刻本《外集》之《与大颠师书》题目下有语“此书诸本皆无，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此为朱熹注语，则朱熹定本之“大颠三书”来自嘉祐小杭本，并次序亦袭之，是方氏《外集》确无《与大颠师书》，朱熹《韩集考异》据嘉祐小杭本而言也。

又，《直斋书录解题》言方崧卿本《外集》后附以“石刻、联句、诗文之遗于他集者”，诸提要言《外集举正》“亦无所谓‘石刻、联句、诗文之遗于他集’者，不知《考异》所据何本”。馆臣据方崧卿《外集举正》无石刻、联句、遗诗文而怀疑朱熹《韩集考异》这些内容的来源，并认为方崧卿所刊《昌黎先生集》原无石刻、联句、遗诗文，不认可《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今按：《直斋书录解题》所言，可据张洽绍定二年所刊朱熹《韩集考异》及宋咸淳年间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略作考证。朱熹据方崧卿刊本校定《昌黎先生集》并撰《韩集考异》是学界共识。张洽本朱熹《韩集考异》卷九《外集》篇题下注云：“方氏只据蜀本定录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与诸本不同……其石刻、联句、遗诗文等则从方本录之，以补《外集》之阙。又诸本有《遗文》一卷，方本亦多不录，今亦存之以附于后。”¹朱熹所言“方本”即方崧卿所刊《韩昌黎先生集》，可见石刻、联句、遗诗文原附刊于方本《外集》之后，陈振孙所言是事实，方本并非“无所谓‘石刻、联句、诗文之遗于他集者’”。张洽本朱熹《韩集考异》卷九《外集》之后为《遗文》，《遗文》首篇《有所思联句》题目下有注“此下三联句，方云‘见《孟东野集》’”²，《寻刘尊师不遇》《春雪》等题目下亦有“方云”或“方本”之注；又廖莹中所刊朱熹校定《昌黎先生集》最后为《遗文》，当即朱熹所言之“《遗文》一卷”，其中文体按类排列，依次为联句、遗诗、墓志、启、状、疏、题名，遗诗类第二篇《春雪》题目下注“已上并方本所载，诸本所无者，今悉存之”³，题名类首篇《长安慈恩塔题名》题目下有注“以下并方本所载”，则朱熹校定后《遗文》一卷实已合诸本《遗文》与方本所附石刻、联句、遗诗文与一，其石刻、联句、遗诗文之文字当据方本录，据他本校勘，而分类和编次则作了调整。今天正可由此反推方氏刊本《昌黎先生集》后确附有石刻、联句、遗诗文，亦可据朱熹《考异》和其校定《昌黎先生集》复原方本所附石刻、联句、遗诗文⁴。此石刻、联句、遗诗文确为方氏所辑，与诸本《遗文》互有出入；只是由于方氏过于信据秘阁本，未见诸本《遗文》，无从考订，故石刻、联句、遗诗文的内容不载于《外集举正》，从而与朱熹《考异》并录之大相径庭。可见，方氏所辑石刻、联句、遗诗文与其《外集举正》无关。馆臣将方氏所刻《外集》与其所撰《外集举正》弄混，未免臆测有误。

对于此书版本，《总目》书名下注“编修朱筠家藏本”，所注与《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各省进呈书目》《四库采进书目》之《编修朱交出书目》著录合（言“十本”）⁵，库本抄成后曾发还朱家。又《文渊阁提要》《总目》皆云“此本纸墨精好，内‘桓’字缺笔，避钦宗讳，‘敦’字全书，不避光宗讳，盖即淳熙旧刻，越五百载而幸存者”，言其为宋淳熙刻本。今编纂《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使用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影宋钞本《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⁶。日本“大仓集古馆”藏有宋本《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韩集举正叙录一卷》，已影印入《四库全书底本丛书》⁷。此本书衣铃“乾隆三十八年□月，翰林院编修朱筠交出家藏《韩集举正》壹部，计书十本”，正文首叶铃满汉文“翰林院印”朱文大方印，当即发还之朱筠进呈本，确为四库底本。书中讳“桓”字，亦兼讳“敦”字，馆臣言不讳“敦”

1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九，李光地刻本，第10页a~b。

2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九，李光地刻本，第24页a。

3 韩愈：《昌黎先生集》第三十二册《遗文》，廖莹中世彩堂刻本，第2页b。

4 刘真伦认为，方氏外集不分卷，诗文作品二十六首，《明水赋》采自杭本，二十五篇采自蜀本，下接以《与大颠师书》为首的石刻若干篇，下接联句三篇、遗诗五篇及题名七篇（刘真伦：《前言》，方崧卿原著、刘真伦汇校：《韩集举正汇校》，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5 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第二册《编修朱交出书目》，《各省进呈书目》之《编修朱交出书目》，吴尉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4页。

6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二册，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7 罗琳主编：《四库全书底本丛书》第五十一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字非是，则此宋本刊刻或刷印已至光宗绍熙年间¹。又《文渊阁提要》《总目》言原书“其于改正之字用朱书”，《总目》下有双行小注云“刻本实作阴文。盖古无套板之法，不能作二色也。观政和《本草》称‘神农本经用朱书’，而皆作阴文，是其明证。谨附识于此”，今核原宋本实作阴文，是《文渊阁提要》径言“朱文”而略不近实，《总目》加注文甚是。

二、朱熹《原本韩集考异》十卷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学者，其于庆元三年（1197）完成的《韩集考异》，有针对方崧卿所刊韩集及其《韩集举正》错漏之处加以纠正的意味，成就超过了《韩集举正》。朱熹此书后被王伯大、廖莹中逐条采摘，散入韩集，影响深远。对于《韩集考异》，钱穆《朱子新学案》、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等均曾专章讨论，此外也时有学人撰写研究文章²，但对此书四库提要的不足却谈论不多。

对于本书书名，《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皆言“原本韩集考异”³，而《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目》”）作“原本韩文考异”⁴。《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各省进呈书目》和《四库采进书目》之《江苏省第一次书目》均著录《韩集考异》二本⁵，吴慰祖注：“十卷，宋朱熹著。案四库上冠‘原本’二字，以别于王伯大之本。提要云‘此出李光地家，乃从朱子门人张洽所校旧本翻雕，最为精善’。今考此书宋刻，丁氏八千卷楼旧藏者，今存南京图书馆，实题‘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云。”⁶今按：吴氏所说非是。对于江苏进呈之《韩集考异》，《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亦有著录，云：“按此集唐张元德定，国朝李光地校，共十卷。”⁷是江苏进呈本为李光地校刻之《韩集考异》，与诸提要所言“此本出自李光地家”相合，是《总目》书名下标注“江苏巡抚采进本”不为无据。虽然今南京图书馆确藏有宋刻《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但此宋刻本与李光地刻本并没有直接的版本承递关系。今核南图藏宋刻本八册，半叶九行，行大字十七字，小字十九字，第一册为卷一卷二，为补抄，钤“惠栋之印”，自卷三起后各卷首钤“澹生堂经籍记”“山阴祁氏藏书之章”“子孙共珍”“旷翁之识”“朱彝尊印”“竹垞”“惠栋之印”“定宇”等印，知其曾经祁承燾、朱彝尊、惠栋递藏。但此本除补抄之卷一后附《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诗》考异同于诸提要所言外，作为原刻本之卷四后并无诸提要所言之《原性》考异，卷七后亦无《曹成王碑》考异，又此本《汪季路书》及朱熹语置于卷十后，也与文渊阁库本附于卷六后不同。国图藏有李光地校刻本，可据以考证。国图李光地校刻本书名作“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两册，半叶十行，行大字、小字均二十字，版心刻“韩集考异卷×”，其内容全同诸提要所言，也与文渊阁本相同，只是书末所附赵德《文录序》、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题名略异，盖馆臣据例改动，三文南图宋刻本并无），可证文渊阁库本确据李光地校刻本誉录，但李光地刻本并不出于今藏于南图的宋刻《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李刻本末有李氏题识，云：“《韩文考异》近年无原本，皆散入篇句中者……吕晚村家藏宋刻，遭兵火，逸其文，幸所存者则《考异》也。其嗣君无党及后，与予言及，因属以家书邮致，为之付梓京师，无党仍监其役。惜乎未观厥成而下世

1 按：佐藤保此书影印本前《解題》推断刊刻于绍熙末年。刘真伦《韩集举正汇校·前言》认为此书为淳熙己酉西安军原刻本，时已讳敦字，盖书刊刻后挖改，亦有挖改未尽者。

2 如曾抗《〈昌黎先生集考异〉版本考略》，《古籍整理》1999年第一期；陆德海：《〈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研究》，《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二期；王东峰：《〈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与〈韩集举正〉〈韩文考异〉的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三期等。

3 《原本韩集考异》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七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8页；金毓黻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73~2674页；《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卢仁龙辑：《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页。

4 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8页；永瑤、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0页。

5 《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第四册为《江苏省第一次书目》和《江苏省第二次书目》，次序已紊。

6 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页。

7 黄烈编：《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页。

矣。徐友坛长遂任校讎之勤，字画简讹，虽已登版，必剜剔补备，务合于正，以视旧本之体完善为多……康熙戊子闰三月望日李光地识。”¹知李氏刻本刊于康熙四十七年，原出吕留良所藏宋本，经吕葆中之手获识，并在吕葆中、徐用锡帮助下得以翻雕，其传承与南图宋刻本明显不同。吕氏所藏原书后世无载，盖已不传；然山西省祁县图书馆有一宋刻本，应与吕氏藏本同版。祁县图书馆藏本名“昌黎先生集考异”，版心题“韩集考异”，六册，书末有张洽题识，署“绍定己丑十有一月辛卯日南至门人清江张洽谨识”，知是书为绍定二年刻本。此本行款、版式、内容全同李光地刻本，即使其中的多处黑底阴文也与李刻本相同，只是李刻本略去张洽《题识》，而更以李氏《题识》，知李本所据底本确为宋绍定二年张洽刻本。张洽刻本、李光地翻刻本书名均作“昌黎先生集考异”，版心同题“韩集考异”，文渊阁本及《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题名“原本韩集考异”，与底本接近，《总目》《简目》更名“原本韩文考异”，有悖版本原则。当然，吴慰祖指认李氏刻本底本为南图所藏宋刻本是错误的。

盖确如吴慰祖所言，馆臣为别于王伯大之本，冠此书“原本”二字；然馆臣此举不但无谓，且有悖版本原则。因为此本自张洽至李光地均名“昌黎先生集考异”，版心作“韩集考异”，馆臣并未获张洽之前的本子，更未获朱熹初稿，自然无所谓“原本”，加以“原本”之名徒增纷扰。至于王伯大本更非什么“别本韩文考异”，王伯大本与此本《韩集考异》并不相对，二者不只是版本不同，馆臣指认有误，详下文《别本韩文考异》提要考论。

这里还要说说绍定二年刻本与南图宋刻本的关系。张洽《题识》云：“方氏书刊刻已广，独此书先生末年所著，未有善本。洽通守池阳，初欲刻之泮宫，已而不果……庾使赵侯范继其费，益以属邑学帑之助，并刊《考异》于后。《汪季路书》初存于末，今移附本卷之后，间有愚见一二，亦各系卷末，以俟观者采择焉云。”朱熹《韩集考异》原自单行，《直斋书录解題》仅著录朱熹《校定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未载《韩集考异》正可佐证。又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之《凡例》后按语云“朱文公校《昌黎集》，又著《考异》十卷，在《正集》之外，自为一书”，亦说明了这一点。自张洽《题识》可见，是张洽将《韩集考异》附在朱熹校定《昌黎先生集》后合刊而行，两者合刊系张洽所为。只可惜张洽原刊《昌黎先生集》已难觅，今仅见此本《韩集考异》。又据张洽《题识》可知，诸提要所言此本卷一、四、七之末所附三处考异亦为张洽所增，其卷六末附《汪季路书》也是张洽自书末改移。今核，张洽刻本《韩集考异》卷十收有《新唐书》本传（题名“新书本传”）和赵德《文录序》、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而南图宋刻本卷十为《唐书本传》和《汪季路书》及考异，而无三文。朱熹于《新书本传》题目下注：“今以李翱所撰《行状》，皇甫湜所撰《墓志》、《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所撰《年谱》，程俱所撰《历官记》，方崧卿《增考年谱》考其同异详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见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见于《集》者不复载云。”²可见此《新书本传》为朱熹注。《汪季路书》为汪逵记其据所见诸本韩集校以石本、方本《韩集》之所得，朱熹以之作为《考异》附录；则此南图宋刻本似存朱熹《考异》原貌，应该刊刻较早。据张洽《题识》“《汪季路书》初存于末，今移附本卷之后，间有愚见一二，亦各系卷末”语不难看出，张洽刻本正是以此南图宋刻本《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的本子为底本，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增补、校勘并重新刊刻的。张洽除卷一、四、七之末附增三处考异外，又在将书末《汪季路书》并考异移附卷六末时，在《新书本传》后附文三篇。

王伯大重编之《别本韩文考异》最后为《附录》一卷，内容同张洽刻本《韩集考异》之卷十，又廖莹中世彩堂咸淳刻本朱熹校定《昌黎先生集》最后为《昌黎先生集传》，内容亦同张洽刻本《韩集考异》之卷十，只是张洽本作黑底阴文，而世彩堂本改为了加圈文字。今按：盖由于张洽将《韩集考异》附刻于朱熹定本韩集之后，王伯大重编时，遂将《韩集考异》散附韩集各文之下，仅余《韩集考异》卷十无所附缀，遂移录张洽本《韩集考异》卷十为《附录》一卷，附于其《别本韩文考异》之末，廖莹中刊《昌黎先生集》亦移张洽本《韩集考异》卷十为《昌黎先生集》最后之《昌黎先生集传》。

1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李光地刻本，第1页a~b。

2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十，李光地刻本，第1页a。

三、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王伯大(?—1253)字幼学,号留耕,嘉定七年(1214)进士,为政宽仁,官至参知政事。宝庆三年(1227),时任南剑州通判的王伯大首次将朱熹《韩集考异》逐条散入韩集,加以刊印,是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后世亦称“韩文考异”。有关此书,历来研究不多¹,对其四库提要中的问题更无人揭橥。

对于本书书名,诸提要皆作“别本韩文考异”,文渊阁、文津阁本同。《总目》书名下标注“两江总督采进本”²。《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各省进呈书目》和《四库采进书目》之《两江第一次书目》著录“《韩文考异》。唐韩愈著。十二本”³。则“别本”二字为馆臣所加,以与李光地刻本之“原本韩集考异”书名区别。然本书实内容丰富,主体为韩愈集正文,之下附有朱熹《韩集考异》和王伯大《音释》,故有五十一卷之巨,并非类似只收朱熹《韩集考异》而不收全文的李光地刻本之《韩集考异》,此书与《韩集考异》绝非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今按:此本原为王伯大南剑州宋刻本,原刻无存,今存最早为元代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半叶十三行,行大字二十三字,小字同,签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首列《晦庵先生朱文公韩文考异序》,次为王伯大《序》,再次为《昌黎先生集诸家姓氏》,后为李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和汪逵《汪季路书》,再后是《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则(馆臣考此《凡例》非朱子《凡例》,乃王伯大重编之《凡例》,甚是),卷一首行作“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一”,次行署“晦庵朱先生考异 留耕王先生音释”;之后每卷首行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x”,下注“考异、音释附”,共《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后自此本出者有明洪武年间勤德堂刻本、正统年间王宗玉刻本、弘治年间善敬书堂刻本等,内容基本相同。后万历三十三年又出现朱吾弼重编、朱崇沐订校之天德堂刻本,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卷首之序改题“韩文考异序”,《昌黎先生集诸家姓氏》后增《重侵韩文考异阅订姓氏》,卷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一”之后署重编、校、阅、订梓诸人,更远离了王本原貌。可见,此书实际上原是王伯大校刊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及《外集》,不过是王伯大缀入了朱熹的《韩集考异》和自己的《音释》,所以他增加了十二条《凡例》,至日新书堂刻本时再补入《凡例》后语。然而,万历天德堂刻本之版心上方皆题“韩文考异”,且此万历本之国图藏本偶见册首有“韩文考异”之签题,遂致后人以此书为《韩文考异》。疑江苏巡抚所上者为万历本或出自万历本者,如文渊阁本《凡例》后语之“校”字同万历本,而元刻本、勤德堂刻本、王宗玉刻本、敬善书堂刻本均作“较”;又文渊阁本卷一首叶“赋”前亦同万历本,且同元刻本、勤德堂刻本、王宗玉刻本、敬善书堂刻本自“宋菖公云”至“正与冯合”之六十五字。都说明文渊阁本以万历本为底本。馆臣据万历本之名,又考虑到与李光地刻本区别,遂定名为“别本韩文考异”。然馆臣此举实际上并不正确,此书实为王伯大校刻之附有《考异》和《音释》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不能改称“别本韩文考异”的,馆臣之改造成了名实不副。尤其是《四库全书》所收此本正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收有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御题诗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相同⁴,这样的改名就更不合适了。

对于本书内容,《文渊阁提要》言“《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附录》一卷”,《文渊阁提要》《文津阁提要》《总目》言“《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简目》言“《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补遗》一卷”,并不一致。今核文渊阁、文津阁库书依次为《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补遗》一卷、《外集》十卷、《附

1 杨国安:《韩愈集注本概述》,《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五期。此文曾略加介绍。

2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8页。

3 《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第八册《两江第一次书目》,《各省进呈书目》之《两江第一次书目》,吴蔚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5页。

4 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一“宋版首部”有《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函三十二册,书前有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仲春题诗,提要云:“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后附《遗文》,又附录《新书》本传、赵德文录序、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前有《考异序》、伯大序、《诸家姓氏》、李汉序、汪季路书、《凡例》并刊书家识。”又言其为宋麻沙本。此书今散藏海内公私藏家。刘蔷考订其实为元代刻本(《纪念韩愈治潮一千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四十周年年会主题报告论文》,韩山师范学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2019年11月22日至25日)。

录》一卷，则诸提要所言类别、次序皆有问题。万历本类目依次为《朱文公先生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文》一卷，其《集传》同库本之《附录》，其《遗文》同库本之《补遗》。盖库本作序调整，又变动了类目名称。自《文渊阁提要》《文津阁提要》《总目》所题书名来看，似可见底本类目及次序，然不符合文渊阁、文津阁文本实情。《简目》题名中《遗文》《补遗》并见，最为无据。

又《文渊阁提要》言“韩淳《解》”，《文溯阁提要》《总目》之“韩淳”作“韩醇”，《文津阁提要》作“韩淳”，亦不一致。今按：韩氏《宋史》不载。元刻本、勤德堂刻本、王宗玉刻本、敬善书堂刻本、万历本卷首之《昌黎先生集诸家姓氏》，皆有“临邛韩氏”，并注“淳，《全解》”，这是《文渊阁提要》“韩淳”之来源，《文津阁提要》“韩淳”当“韩淳”之误。宋庆元六年魏仲举家塾刻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首《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亦载“临邛韩氏”，注“名醇，字仲韶，有《全解》”，又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之《重校昌黎集凡例》有“韩醇”，并注有“《全解》”。《四库全书》收有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书末有其淳熙四年题记；又《天禄琳琅书目》之“宋版集部”收其《新刊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言卷一下标“临邛韩醇”，且言“宋刊《五百家诂训昌黎文集》列诸儒名氏，载醇，字仲韶”，韶乐尽美，恰与醇通，则当作“韩醇”。“韩淳”“韩淳”并皆“韩醇”之误。

四、结语

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集考异》和王伯大刊印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是密切相关的三部著作，也是宋儒整理韩集的重要代表。以上三书连同宋魏仲举所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均被收入《四库全书》，表现出了清代官方对宋儒整理韩集成绩的肯定。这些书的四库提要也竭力考索诸书的资料来源、版本性质和校勘得失，大多从正面对其成绩作了评价。遗憾的是，四库馆臣在对方书、朱书和王书所撰提要中均有些瑕疵，本文于此期有补焉。

Three Study items of the Investigative about the Works of Han Yu in Summaries of *Sikuquanshu*

Yang Xinxun

Abstract: Hanyu's works were famous in So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investigative works about Han Yu's works in *Sikuquanshu*. There are some matters in the summaries of Fang Songqing's *Hanji Juzheng*, Zhu Xi's *Yuanben Hanji Kaoyi*, and Wang Boda's *Bieben Hanwen Kaoyi*, which include the names, volumes, editions, and contents, etc. I try to get at the facts in these cases, testing to clarify the source and course of the summaries, and revealing the truths of these records by means of checking summaries, books in *Sikuquanshu*, and other reference materials.

Key words: *Hanji Juzheng*; *Yuanben Hanji Kaoyi*; *Bieben Hanwenkaoyi*

责任编辑：胡海琴

唐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唐宋诗文批评

蒋 勇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去清人宗唐祧宋论争最激烈的时代不远，且处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全面总结阶段，它对唐宋诗文的评价与判断颇具意义。《总目》与清代帝王和官方宗唐的立场大致相同，《总目》宗唐立场对唐宋诗文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以唐律宋”倾向，这一倾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唐遗风”，二是“学唐而不得”，三是“晚唐丘壑”。

关键词：唐宋之争 《四库全书总目》 唐宋诗文批评 宗唐 以唐律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 (2020) 02-46-60

诗学上的唐宋之争于南宋初现端倪¹，后经元、明以至清代，唐宋之争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公案之一。学界不乏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虽以“清代文学批评史”为名，但基本是以清代“唐宋诗之争”为线索而展开的²；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以时代为序，较早梳理了南宋以至清代唐宋诗论争的诗学发展脉络，并对代表人物作了重点考察³；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从“研究基础”“历史概述”和“唐宋诗之争的检讨”三方面对唐宋诗之争的学术基础、历史历程和理论反思进行系统研究；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分“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时期”三编，将清代各个时期宗唐法宋风气之流转、宗尚群体以及诗学的论争和理论主张进行全方位的介绍⁴。除上述对唐宋诗之争作全景式的、流变发展史的梳理以外，也有以唐宋诗之争为背景，进行微观的、个体性的探讨，如潘务正《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从清初诗坛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的论争这一受人关注的事件入手，分析了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矛盾与差异的原因，认为“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⁵。代亮《邓汉仪与清初唐宋诗之争的走向》一文以邓汉仪的个案研究，展示了“清初宗唐诗学突破自我、创新范式的重要表征，也折射出清初唐宋诗之争的复杂面向与态势”⁶。

作者简介：蒋勇，1986年生，山东曲阜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1 按，“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见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页。南宋初张戒《岁寒堂诗话》首倡扬唐抑宋之论，称“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见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5页），学界多以此为滥觞（见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页；另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479页）。

2 按，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第一章“清初的反拟古运动”、第二章“清初尊唐派诗说”、第三章“神韵说的提倡与宋元诗的流行”、第四章“清初唐宋八家文的流行”，青木正儿对于清初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基本是以唐宋诗之争的背景进行论述。详见〔日〕青木正儿著，杨铁婴译：《清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

4 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潘务正：《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二期，第49页。

6 代亮：《邓汉仪与清初唐宋诗之争的走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六期，第51、57页。

然而,梳理学术史可以发现,无论是通代、断代唐宋诗之争史的研究,还是专注于微观、个案的考察,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所涉及到的唐宋诗之争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总目》编纂去清人宗唐祧宋论争最激烈的时代不远,且处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全面总结阶段,它对唐宋诗文的评价与判断颇具意义。笔者梳理的关于唐宋诗之争的研究成果中,仅有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一书偶有提及,称“《提要》诸文于‘唐诗’‘宋诗’不惟兼有肯定,对历来之争辩,亦多所调和、折中与批判,所言至今仍有发人深省者,不必以其书编纂之动机而废其言”¹,然限于篇幅,戴著并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总目》对唐宋文学的品评包含了诗文评价、审美批评、流派演变、文学思想等多要素的对比与评价,集中于诗文别集提要的批评之中。研究《总目》唐宋诗文之论,既有助于弥补唐宋诗之争研究上的不足,也是理解《总目》文学批评的背景与前提。本文拟从唐宋诗之争背景下馆臣的宗唐立场,结合《总目》对唐宋诗文的评价,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宗唐:清代唐宋之争官方立场的选择

清诗流变一直暗含着“宗唐”“法宋”两大阵营的力量角逐,但总体上《总目》与馆臣的立场是宗唐的。《总目》宗唐的立场与清代帝王和官方的立场大致相同,宗唐立场使得《总目》在唐宋对比中主张宋是以唐为本。

首先,唐诗在清代唐宋诗之争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虽然清初的钱谦益开启了宗宋之风²,后又有叶燮《原诗》对唐宋诗之争进行了理论指导³,但至乾、嘉之际,唐宋诗之争由宗唐、法宋的对垒,到宗唐、法宋、唐宋调和的三足鼎立,呈现了“唐宋兼师派”与“宗宋派之南北对峙”的流变过程⁴。表面看来宗宋之风渐起⁵,但实际上唐诗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宗唐之风从未减弱。即便是康熙中叶出现大量宋诗选本、宋诗风广泛传播等热潮⁶,这股风潮也仅是相对于元、明时期宋诗所受到的冷遇而言,如果就诗歌选本的数量、诗歌的影响力而言,宋诗还不能与唐诗比肩。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统计,清代唐诗选本有近四百种,古代选唐诗的四次高潮就有两次发生在清代(第三次高潮是在康熙年间,第四次高潮是在乾隆年间)⁷;比较而言,清代宋诗选本则不超百种⁸,其中乾、嘉以前宋诗选本的数量仅为清代宋诗选本的一半,唐诗选本则已经历了雍、乾两次高峰。所以,《总目》编纂之时,唐诗的影响力就诗歌选本数量而言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

其次,宗唐祧宋虽派别各异,但官方立场总体是以宗唐为主的。唐诗选本的增加有赖于官方的宗唐立场,清代大量唐诗选本的背后是“御选”唐诗的影响力。《总目》著录的康、乾时期官方编定、冠以“御选”的唐诗选本就有三部:其一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御定全唐诗》,其二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御选唐诗》三十二卷,其三是乾隆十五年(1750)的《御选唐宋诗醇》。康熙皇帝尤为推崇唐诗,他在《御制全唐诗序》中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⁹乾隆时所编《御选唐宋诗醇》虽唐宋并举,然实际上还是有所偏袒,诗选唐人四家、宋人二家,《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显然遵循了乾隆帝的诗学倾向:“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

1 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2 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9页。

3 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4 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5 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6 按,康雍年间的宋诗选本“包括《宋诗钞》在内共有十三种”,就数量而言,较之唐诗选本并不算多。见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7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8 按,谢海林在申屠青松《清人编宋诗选本经眼录》《清人编宋诗选本待访录》和高磊《清代知见宋诗选本叙录》基础上,广为搜佚,叙录清人选宋诗八十五种,其中“顺康雍朝宋诗选本”二十三种、“乾嘉道朝宋诗选本”十四种、“咸同光宣朝宋诗选本”十四种、“年代未详的宋诗选本”二十七种(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高磊《清代宋诗选本研究》后附《清代宋诗选本叙录》,“经眼”者四十二种,“待访”者二十八种,计七十种(高磊:《清代宋诗选本研究》,苏州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9 康熙:《御制全唐诗序》,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补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一；杜甫源出于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¹孙琴安认为“清代的唐诗选本虽也有出于诗坛争论的，但更主要的还是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²；贺严在论唐诗选本与清代社会时认为“御选”已经成为“清代文治的重要措施之一”³；另有学者注意到帝王尚好对馆阁文人的巨大影响，康熙帝效法明太祖朱元璋复归唐制，诗法注重唐代，而馆阁文人亦鼓吹“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的唐诗，号召翰林官声讨宋诗，以至于终康熙之朝出现了“宋元诗格家喻户晓”，然“馆阁诸公尚仍唐制”的诗坛现象⁴。而与此同时，清代还出现了大量为应试学子服务的唐诗试帖诗选本。有人统计，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科举考试加试五言排律之后的二三十年间，编选的唐人试帖诗就有三十多种，其中总裁官纪昀所编《唐人试律说》可称集大成者⁵。显然，清代官方对唐诗的推崇，结合馆阁文人的宗法尚好，加之科举应试的制度保障，客观上为唐诗盛行提供了政治环境。受御定、御选、试帖等唐宋取法倾向的影响，清代官方文学对唐诗的推崇已经形成了从上而下的“声音”，正所谓“射之穀率”“治器之规矩”⁶，诗坛风云虽此起彼伏，然宗唐倾向在官方文人与举子群体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具有官方身份的《总目》取法倾向必将受帝王尚好的影响，此前已多有学者指出《总目》唐宋之争的诗学倾向。韩胜认为《总目》“虽成于众人之手，但论诗以清高宗诗学思想为主导是不争之实”⁷，而“扬唐抑宋”就是清高宗所主张的诗学观念；刘敏敏通过对《总目》清初别集提要梳理后，发现馆臣实际上“站在宗唐的官方立场”⁸；王美伟梳理“《总目》视角下的清初唐宋之争”，认为馆臣有明显的“尊唐贬宋”倾向，其原因主要是受“清初帝王的好尚”之影响⁹。《总目》是在清高宗授意之下编纂而成，那么其诗学倾向必然与清高宗的诗学立场相统一。不仅如此，《总目》还是一部群体编纂的著作，相较于清代帝王的个人影响力，具有官方身份并由群体编纂的这部《总目》，则构成了清代唐宋诗之争最具话语权的表达。从《总目》反映的诗学立场而言，就是宗唐。

宗唐立场在《总目》文学批评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馆臣认为唐宋之间，无论是文人的师法对象，还是流派传承依据，宋皆以唐为本。

其一，馆臣多论宋人宗慕唐人。《总目》所录两宋别集提要有大量宋人师法、追慕唐人的情况。诸如力变唐末五代衰飒之气，开宋初骈体文章之变的杨亿“大致宗法李商隐”¹⁰；开宋初文坛复古之先的柳开“少慕韩愈、柳宗元为文”¹¹；又如王令“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¹²等等。馆臣注意到，宋人慕唐是骨子里的崇拜，如柳开改名“肩愈”、改字“绍先”是因宗慕韩愈，“又改名改字，自以为能开圣道之途也”¹³；虞俦“慕白居易之为人，以‘尊白’名堂，并以名集”¹⁴。馆臣还关注到宋附会唐人的情形，并借以说明唐对宋的持久影响。郭祥正“其诗好用仙佛语，或偶伤拉杂，而才气纵横，吐言天拔”¹⁵，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9页。

2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3 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4 潘方正：《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二期，第50页。

5 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6 康熙：《御制全唐诗序》，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补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7 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8 刘敏敏：《〈总目〉清初宗宋诗风批评研究》，西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9 王美伟：《〈四库全书总目〉清人别集提要研究》，西南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151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武夷新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6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河东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3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广陵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63页。

1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河东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3页。

1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尊白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33页。

1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青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3页。

其诗文有飘逸之气，正因如此，梅尧臣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¹《宋史》亦载“母梦李白而生”²，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居然为《总目》所引，提要结合郭祥正的诗作风格分析道，“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为太白后身，又称青山太白祠以祥正侑食，盖因其诗格相近，从而附会。然亦足见其文章惊迈，时似青莲，故当时有此品目也”³，唐人对宋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宗慕唐人促使宋人文学风格、体例乃至诗学理论全方位继承模仿唐代，《总目》宋代别集批评中亦述宋对唐诸多方面的模仿。风格、体例上如赵师秀“其诗亦学晚唐。然大抵多得于武功一派，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⁴；张耒“晚岁诗务平淡效白居易，乐府效张籍”⁵；陈造集中有《罪言》一篇，乃“仿杜牧而作”⁶；汪晫《康范实录》“仿李翱文集所作《皇考实录》之例”⁷，是具体到文章篇目、体例的模仿。不唯如此，对后世影响颇深的严羽诗论，馆臣亦持源自唐人之论，例如严羽与司空图诗论的渊源⁸，《沧浪集》提要云“羽之持论又源于图，特图列二十四品，不名一格。羽则专主于妙远，故其所自为诗，独任性灵，扫除美刺，清音独远，切响遂稀”⁹。

其二，《总目》梳理了宋代文学流派的唐代渊源。宋初诗人多学唐人，文章亦沿袭晚唐五代文风，诗文流派皆与唐人有着深厚的渊源，唐代文学既是宋代诸派产生发展之根源，又是宋代文学除弊矫正、推波助澜的动力。薛嵎《云泉诗》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叶适以乡曲之故，初力推之，久而亦觉其偏，始稍异论。吴子良《林下偶谈》述之颇悉。嵎之所作，皆出入‘四灵’之间，不免局于门户，然尚永嘉之初派，非永嘉之末派。”¹⁰《总目》梳理了宋代诗坛流变过程：北宋诗坛凡变有三，初宋之西昆，盛宋之元祐，以至后来对南宋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西诗派；南渡以后，江西诗派“久而弊生”，故以晚唐体矫之，随之又产生了“四灵”“江湖”之宋诗末流¹¹。《总目》将宋初诗坛对唐人的沿袭与模仿、南渡以后晚唐体对江西诗派的矫正，统一于宋诗的流程过程中，不仅如此，还提及大量宋代文学流派的唐代渊源案例。

北宋初期诗坛三体皆源出唐人。今所谓“宋初三体”常指白体、西昆体、晚唐体¹²，“晚唐体”在宋代

1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23页。

2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23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青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3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清苑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56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宛邱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69～2070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江湖长翁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9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康范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61页。

8 按，关于馆臣提到的司空图诗学著作《诗品》，此著真伪与作者归属问题，学界多有争论。陈尚君、汪涌豪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提出《二十四诗品》作者是明代怀悦，而不是晚唐司空图。这一见解自1994年第七届唐代文学年会提出以后，在学界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提出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一文，同意陈尚君、汪涌豪所提出的《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及《二十四诗品》出自《诗家一指》的观点，但认为《诗品》的作者为元代的虞集。张柏青曾先后发表《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两篇内容大体相同的论文，从用韵证明《诗品》非司空图莫属。《文学遗产》2011年第五期发表了已故哈佛学者方志彤作、闫月珍翻译的《〈诗品〉作者考》一文，此文对《诗品》进行形式和韵律的探讨，而结论恰与张柏青两篇文章相反，对此陈尚君在《方志彤〈〈诗品〉作者考〉阅后的一些感受》一文作了回应。详见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1994年版，第589～596页；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五期；张柏青：《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四期；张柏青：《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文学遗产》2001年第一期；方志彤作，闫月珍译，刘宁校：《〈诗品〉作者考》，《文学遗产》2011年第五期。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70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5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5页。

12 傅明善：《宋代唐诗学》，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主要是对四灵诗派风格的指称,《直斋书录解題》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¹,《沧浪诗话·诗体》有“晚唐体”²,亦指“赵紫芝,翁灵舒辈”³。宋末元初的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⁴馆臣在提要中采纳方回的看法⁵,对宋初诗坛也是持白体、昆体、晚唐体的观点,从而在唐宋诗学传承的阐述中进一步强化了唐诗对宋初诗坛的影响。白体诗代表有王禹偁,《小畜集》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俚,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⁶所谓“古雅简淡”,实承白居易。《击壤集》提要在评邵子诗歌渊源时,曾一并讨论了“平实坦易”诗风之渊源:“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偁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⁷可知二人诗歌风格,皆源出白氏。所谓“昆体”,西昆体是也。《总目》在《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讨论了李商隐西昆体诗学源头的问题,“自宋杨亿、刘子仪等沿其流波,作《西昆酬唱集》,诗家遂有西昆体”⁸。北宋西昆体由杨亿开创,刘筠、钱惟演等人“从而教之”⁹,《武夷新集》提要又重申了杨亿“大致宗法李商隐”¹⁰的诗学渊源。晚唐体诗人有赵湘、九僧等人,其中赵湘“源出姚合”¹¹,而“晚唐一体,九僧最逼真”¹²。

《总目》所列诗学唐人并对宋代诗坛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之名首见于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入选二十六人,对于江西诗派的范围界定历来多有争议,莫砺锋先生将创作受到黄、陈影响的宋人新增补于江西诗派,有释惠洪、吴则礼、刘跂、江瑞友四人¹³。《总目》对江西诗派诗人有较多关注,从入选别集情况来看,吴亚娜根据吕本中所列江西诗派诗人,梳理了《总目》宋代别集,“通过家学渊源、诗学传统以及诗学风格而明确将之归为江西诗派者还有”二十三家¹⁴,其中著录有十一家。江西诗派影响深远,其渊源却是唐人,江西诗派的形成则是在师法唐人的基础上动态发展的结果。有学者研究,汴京、黄州、江左三大诗人群体为江西诗派形成的“历史前孕”阶段¹⁵,而具体到江西诗派的传承、壮大,《总目》也有一条线索。笔者根据宋代涉及江西诗派诗人间的传承关系,大致梳理了江西诗派传承的脉络,据《总目》中直接指出具有渊源传承关系的江西一脉诗人,大致有这样三条线索:一条为黄庶——黄庭坚——吕本中——林之奇——吕祖谦;一条为黄庭坚——曾几——陆游;另有一条为黄庭坚——陈师道——周孚。以江西诗派而论,这三条诗脉皆以黄庭坚为初祖,后来者皆受黄庭坚的诗学影响。黄庭坚的诗学又源自唐人,《总目》黄庶《伐檀集》提要中追溯黄庭坚的家学渊源:“黄庭坚之父也。江西诗派奉庭坚为初祖,而庭坚之学韩愈,实自庶倡之。”¹⁶黄庶宗尚韩愈,直接影响了其子黄庭坚,馆臣认为,黄庶的家学渊源促成了黄庭坚乃至江西一脉的形成,所谓“先河后海,其渊源要有自也”¹⁷。黄庶规摹唐人,也正是自黄庶起,对唐人的师法影响了江西一脉。例如,山谷以后,吕本中“诗法出于黄庭坚”,作《江西宗派

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09页。

2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页。

3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4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2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南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7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1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武夷新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6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6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南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南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13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21~128页。

14 吴亚娜:《〈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研究——以宋人别集与词集提要为中心》,西南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117页。

15 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5页。

1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伐檀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5页。

图》，“列陈师道以下二十五人，而以己殿其末”¹。此后，林之奇“之学得于吕本中”²，“吕祖谦又受学于之奇”³。馆臣评周孚“延风雅一脉”，为诗“初学陈师道，进而学黄庭坚，俱能得其遗矩”⁴，也是渊源有自。不仅如此，南渡以后为一大宗的陆游诗学，亦承江西而上溯唐人。《剑南诗稿》提要称：“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⁵至于曾几，陆游曾作墓志铭云：“公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⁶《总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杜甫、黄庭坚、曾几、陆游之间的诗学传承进行了勾契，见《茶山集》提要：“后几之学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大宗。”⁷《总目》对江西诗派形成与发展的梳理，表达了浓厚的诗学传承意识，而江西诗派的根本则是唐，馆臣的宗唐立场就在对唐宋师法的传承阐述中逐渐体现。不仅如此，南渡以后，因江西诗派的影响力，陆游诗法传承也有了唐代文学的基因，成为南宋诗坛之“遗矩”。

宋末诗坛，四灵与江湖两大诗派与晚唐诗人也有重要的关联。“‘四灵’一派，摭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气”⁸，馆臣亦溯此两派与晚唐诗人之间的关联。《姚少监诗集》提要云“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而“武功体”便是“四灵”源头之一，姚合“其集在北宋不甚显。至南宋‘永嘉四灵’始奉以为宗。其末流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遂为论者所排”⁹。四灵诗人赵师秀，《清苑斋集》提要云“其诗亦学晚唐，然大抵多得于武功一派”¹⁰。至于江湖诗派，亦与晚唐等人颇有关联，“姚合以下，至于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灵’，刻意苦吟，不过求工于五字。盖江湖一派，门径如斯”¹¹。

综上，《总目》在唐宋诗之争立场选择上与清代官方相一致，是典型的宗唐立场。在唐宋文学的态度上，馆臣是将唐代作为宋代诸文学流派形成与发展的根据，对宋人宗慕唐人的现象也颇多关注。从这个角度而言，论宋离不开溯唐，唐代是宋代文人师法的依据，宋代也即唐代文学的传承与流变。

二、《总目》宗唐立场下的唐宋诗文批评

以诗来论，《总目》将唐诗置于不可超越的地位，认为唐诗众体皆备且颇具风人之旨，宋较之唐则格意不高、境界促狭；以文来论，则强调唐文批评中的“词”与“质”，关注宋对唐的沿袭。《总目》虽称宋难望唐人之项背，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又承认唐宋诗文之差异性，并无明显的扬唐抑宋立场。细究《总目》唐宋诗文批评，一方面《总目》评宋人诗文创作师法唐人却又难继唐风，另一方面对唐宋之别又有着客观的认识，馆臣承认二者不同。

（一）《总目》唐宋诗之批评

《总目》强调唐代是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峰，所谓“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¹²，唐诗蕴含了诗体多元、气格壮大的昂扬气象。《总目》还动态勾勒了一条具有诗史脉络的唐风变化史，从初唐一改齐梁遗风，到开元、天宝年间诗格大变，唐诗遂盛，大历以后“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¹³，气格雄健的唐诗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东莱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13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拙斋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1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拙斋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2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蠹斋铅刀编》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35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剑南诗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3页。

6 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12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航漫游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4~2185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姚少监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0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56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野谷诗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60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御选唐诗》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8页。

1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钱仲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04页。

风貌逐渐消退,进而进入中晚唐格,唐诗各个时期均有不同风格。多元与变化之中,《总目》唐诗之论集中于“风人之旨”的讨论。

《文心雕龙·明诗》有云:“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¹风人之旨源自王者以诗观风俗、知得失的诗教实践,体现为性忠纯厚、有为而为、感时忧国,同时又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蕴藉含蓄、一唱三叹的诗歌风貌,是诗三百以及盛唐诗言近旨远的传统。《杜诗臈》提要云:“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²杜甫在提要中被赋予了至性忠厚、感时忧国、继承风人精神的楷模意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称杜甫为“唐人第一”³,《御选唐宋诗醇》各家小序中,乾隆亲自执笔,称“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⁴,由此可见杜甫“风人之旨”的正宗地位。风人之旨反映为诗歌中的“风人精神”,也关乎诗歌风格之雅正、蕴藉与平和。馆臣兼顾体格雅正和风人精神的平衡,如评价以钱起为代表的大历诗人“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⁵;晚唐局于风气而格力不高,但《总目》评价晚唐诗歌亦找寻诗风中醇正风雅的诗歌基因,评韩偓“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废,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⁶又如胡曾,格调虽卑,但贵在“不悖于风人”⁷。晚唐大家李商隐词虽缛丽,但其诗歌本质的不同就在于风人精神的传承,对比温李之异同,《总目》评李商隐“寄托深微,多寓忠愤,不同于温庭筠、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则所见特深”⁸,寄托深微、多寓忠愤的诗意追求,也令李商隐成为晚唐得老杜之精髓者⁹。

“风人之旨”又表现为诗歌体式中的气骨与寄托。盛唐诗歌以其昂扬磅礴之气而独立于唐代诗坛,随着盛唐时代品格的消融褪去,唐诗之气的延续与展现,则是风人精神注入唐诗的骨气。《总目》对比唐人诗歌常以“骨气”论高低,如论张籍“骨体实出王建上”¹⁰,论刘禹锡“气骨亦在元、白上”¹¹,又杜牧“诗治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¹²。元、白一派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白居易诗亦源出杜甫,乾隆帝称“其源亦出于杜甫”¹³,然而元、白诗歌中的骨气与风人精神,直接体现为诗歌之“讽”。元、白诗派最大的特点是直白、真实,不追求含蓄之美,从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元氏长庆集》提要引元稹《与白居易书》,专论诗中之“讽”:“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五七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¹⁴由此可见,元白诗作,意在于“讽”,所谓“古讽”“乐讽”“律讽”云云,仅是诗体区别,而这却导致了元白诗作因追求讽刺效果而近乎功利,兴寄不存而限制了“风人之旨”的本质作用,风已不在,骨将焉存?这也是《总目》以杜牧、刘禹锡风骨、气骨高于元白的真正原因。

对于宋诗,《总目》则关注到格意与境界的促狭与单调。诗歌之“格”指诗歌的法度与规则¹⁵,罗根泽

1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7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9页。

4 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各家小序·陇西李白》,引自马清福主编:《唐宋诗醇》卷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上册第3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钱仲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04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韩内翰别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8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咏史诗》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6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李义山诗注》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1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李义山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1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张司业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0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刘宾客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0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0页。

13 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各家小序·太原白居易》,引自马清福主编:《唐宋诗醇》卷一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册第3页。

1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8页。

15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指出“诗格有两个盛兴的时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¹。唐代“诗格”，偶尔及于“赋”，很少及于“文”，宋代“诗格”也涉及“赋格”“文格”²。张伯伟指出，“诗格”在唐宋时期主要包括声韵、病犯、对偶及体势，是诗歌初学阶段的“技”层面的规定性内容³，明代以后，诗格在诗学中“所占的比重却微乎其微了”⁴，《总目》中所指的“格”主要是从诗歌的思想与艺术品格而论。以“格”来论，唐诗气格雄伟壮阔，对比之下，则宋诗格意不高、境界狭窄。风会际运，唐代气格终因时代的变化难在宋诗中延续，宋人摹唐而不得唐，缺少的正是唐诗的昂扬精神与壮大气格，宋诗也由唐诗饱含时代之气的风格转而形成促狭、平实乃至卑弱的写作风格。《总目》所提到的宋诗风格可概括为两大特征：

其一，风格自然、平实坦易。相较于唐，宋诗风格总体不够多元，《总目》对宋诗的描述仅有清新、自然、古雅、高秀之别。清新、自然，是宋初诗人在力矫晚唐五代雕琢习气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风格。如赵湘“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⁵，张咏“发于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⁶，又如韦骧“颇有自然之趣”⁷，文彦博“风格秀逸，情文相生”⁸。宋人“风格”已无唐人之盛气，取而代之的是流露于外的自然之趣。宋诗于南渡以后，虽有江湖、四灵等人规摹晚唐，流于寒酸纤琐、词病质俚之弊，但自然诗风亦得以延续。其中代表如姜特立“意境特为超旷，往往自然流露，不事雕琢”⁹。

宋儒论理诗是平实坦易诗风的典型，《总目》关注并追溯论理诗之发端为北宋邵雍。韩愈“以文为诗”的诗学主张启发了宋人，如欧阳修、苏轼等人淡化文学色彩、专注叙论“事”与“理”的散文化诗歌创作，而诸如苏舜卿、梅尧臣、王令、黄庭坚诗文兼善，也或多或少受到“以文为诗”的影响¹⁰。宋代论理诗就是“以文为诗”诗学实践的具体呈现，黄庭坚“诗常常表现出诗人对‘理’的一种沉潜把玩的趣味”¹¹，常被后人视为宋代论理诗的代表，而《总目》则将这一类型的诗歌追溯到北宋邵雍。《击壤集》提要云：“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¹²论理诗关注于宋儒的“道”与“理”，忽视诗歌的文学色彩，诗歌风格则平实坦易。《总目》认为，宋儒论理诗歌是宋初以清新自然反对唐末五代秣丽文风的延续，亦为白居易直抒胸臆、不名一格的余风，“北宋自嘉祐以前，厌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朴还淳”，“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¹³。

其二，境界促狭、诗体卑弱。《农田余话》有云“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¹⁴，《总目》赞同这一观点¹⁵，并称南宋为“诗教极弊之时”¹⁶。在具体的诗歌批评中，馆臣极言南宋诸家境界促狭和风格粗犷，如评李流谦“诗文边幅稍狭，间伤浅俚”¹⁷，晁公溯“体格稍卑，无复前人笔力”¹⁸，林季仲“边幅稍

1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4页。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4页。

3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南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乖崖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4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钱塘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2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潞公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7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梅山续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53页。

10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6页。

11 郭鹏著：《诗心与文道——北宋诗学的以文为诗问题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7页。

1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击壤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7页。

14 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二三九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15页。

1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文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0页。

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梅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78页。

1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澹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04页。

1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嵩山居士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18页。

狭,已近江湖一派”¹。南渡诗坛以江西末流、四灵与江湖诗派为代表,“有佳句而乏高韵”²,此三派代表了宋诗末流,《总目》多有“弊”“病”之评,如称“豫章生硬之弊”“江湖末派酸馅之习”³;称江西诗派“有颓唐粗俚之处”⁴,四灵一派“虽镂心鉢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⁵;评江湖诗派“多五季衰飒之气”及“山林枯槁之调”⁶,“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琐细,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⁷。由此可见,《总目》论宋诗,既有宋诗不同于唐诗的风格自然、平实坦易之处,也言宋诗不如唐诗之处,而所谓宋诗之弊,基本是就南渡以后“体格稍卑”“颓唐粗俚”“边幅稍狭”“破碎尖酸”“刻意雕琢”等风格特征而论。

正变之论是清代诗学论争的一个关键⁸,也可以辅助理解唐宋之间的差异。清人正变之论,或有强调时代与诗歌流变之关系者,如汪琬“观乎诗之正变,而其时之废兴、治乱、污隆、得丧之数,可得而鉴也”⁹;或从诗歌自身的演变而论,如叶燮所谓“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¹⁰。《总目》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概括:“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¹¹所谓极盛与极变,极盛与极其衰,指的就是唐宋诗歌体格、声调等变化。《总目》论唐诗为诗学正体,并称颂唐代为诗歌盛世,论宋诗较之唐是“失其正”或“伏其衰”。虽然《总目》唐宋诗对比有所谓正变,甚至《总目》还批评了宋末诗坛境界不高、粗鄙习气,然而综观《总目》论唐与宋,更是一种差异性的比较。《总目》唐宋对比主要还是从风格与境界的不同而论,所谓唐诗“极盛”是云众体皆备、风格多元,而宋诗“极变”则是基于唐诗正体上的风格不同。所以,《总目》对唐宋诗的对比,并不能算是诗学论争,亦较少涉及唐宋诗之优劣。

(二)《总目》唐宋文之批评

《总目》唐代别集以“文集”为名者十三种¹²,除此以外的大多数别集兼收诗文,并且文占据了别集大部分卷次¹³,所以唐代文学虽以诗著,但《总目》别集提要对文章的批评实际也占了相当大比重。《总目》唐宋文的对比兼顾骈文、散体,批评之中又注重文章内容所蕴含的“风骨”之质,在“词”与“质”的对比中推崇雅而有本的有道之文,由此梳理了一条由唐而宋的古文发展脉络。

首先,《总目》唐别集提要对文章的批评尤重“质”。由初唐文章“丽而有本”到盛唐之“宏博典实”,进而至中唐韩柳古文大盛,《总目》论述了唐文由骈而散的发展过程,但史脉叙述对“质”的重视并未发生改变。陆希声为李观文集作序,提出了“文以理为本,而词质在所尚”¹⁴的主张,馆臣论文亦看重文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竹轩杂著》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1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月洞吟》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95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太仓稊米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2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诚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2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芳兰轩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55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航漫游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4~2185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5页。

8 按,陈子龙、施闰章、陈维崧、王士禛、汪琬、叶燮、沈德潜等人,可以参见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相关内容。

9 汪琬:《唐诗正序》,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页。

10 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御选唐宋诗醇》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9页。

12 按,《总目》著录唐别集以“文集”计十三种:《萧茂挺文集》《李遐叔文集》《原本韩文考异》《别本韩文考异》《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诂训柳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刘宾客文集》《李元宾文编》《樊川文集》《李义山文集笺注》《皮子文藪》《司空表圣文集》。

13 按,别集收录文章卷次较多者《王子安集》十六卷,录诗赋仅三卷,其余十三卷均为文;《盈川集》十卷中七卷为文;《陈拾遗集》十卷,仅录诗赋二卷,其余八卷皆为文;《张燕公集》二十五卷,有十五卷为文;另如《李北海集》六卷、《次山集》十二卷、《颜鲁公集》十五卷,诗歌都仅录一卷,其余卷次皆为文章。

14 李观:《李元宾文编》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七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7页。

章之本,平衡文章的“词”与“质”,尤为推崇典丽宏赡、有本有末、恣肆博辨之文。例如《总目》评价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与六朝骈文本质的不同,称赞他们在文章创作中注重文章根本,从而形成了颇有风骨的初唐文风。从文体角度而言,唐初文章尚沿六朝浮艳之体,“不脱陈、隋旧习”¹,但是《总目》在“儒者颇病浮艳”的文坛旧习之中,选取四杰、陈子昂的文章进行评论,恰是看到他们文章创作中“质”的不同。四杰等人在骈体的运用上扩大了题材范围,体格虽沿袭旧制,但其思想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王子安集》提要反复提到的王勃《滕王阁序》,就是重在抒发情感,摆脱了六朝骈文徒具外表、堆砌辞藻的浮艳习气之代表:“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²王勃以骈体进行创作,但却意在抒发个人抱负和怀才不遇之感,文中充盈着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内容已与六朝文体有着“质”的不同。故而馆臣评价王勃之文“精切有本原”,其“本”在于情。馆臣并进一步驳斥了那些轻诋四杰文章者,“枵腹白战之徒,掇拾语录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动其喙,殆所谓蚍蜉撼树者欤”³。

其次,提要论文章之本,还关注文章的经世与典博。“词”“质”之辨,兼顾文章的审美与功用,馆臣推崇言之有物且典丽高雅的文章。所谓“朝廷大述”“王言之体”,是以张说、张九龄、陆贽等人为代表的公牍文写作。公牍文主要使用浅近的文言文写作,文风以明白畅晓为宜,但骈体公文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中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⁴。有学者曾以陆贽为代表的骈体公牍文写作为例,倡明骈文在公牍文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古代著名之政论家陆宣公,其文章固全用俚体,然则骈文似又不可遽废”⁵。与六朝骈文局于格律辞藻、丧失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功能所不同的是,唐代公牍骈体在张九龄、陆贽这里有了新的气象。一方面文风舂容典雅,在审美上更符合官方的“和声鸣盛”要求。《总目》评价张说“文章典丽宏赡”⁶,张九龄“文章高雅”⁷,他们的文章恰好满足了清人对于“泚泚乎盛世之音”⁸的盛世想象。另一方面,这类文章非止步于雕章绘句之语,更是看重宏博典实、学有根据的有本之文。燕、许以前的六朝骈体,常常浮靡无根、流于形式上的整饬,而张说、张九龄、陆贽在行文中更注重文风自然、气势恢宏以及儒家经世观念的融入。提要称其“学究精义,文参微旨”“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虽为骈体以“富艳求之”,但内容“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⁹。张九龄诗文理论和创作承继陈子昂,他赞同其“兴寄”与“风骨”之说,提出“修辞以达其道,则质文相半”的主张¹⁰。至于陆贽,他在唐代公牍文体与文风嬗变中所起的作用,更是得到了历朝历代文人的认可与推崇。陆贽在文章内容上强调儒家经世致用观念,论事析理善于治繁总要、切中要害,其观点常是开门见山,议论精当透辟,苏轼曾称赞其文“论深切于事情”¹¹。《总目》评价其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青”,对其文章的重要价值,则云“经世有用之言,悉具是书。其所以为贽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绘句之末矣”¹²。

《总目》论宋文强调宋对唐之沿袭。宋承五代余弊,《文恭集》提要称“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¹³,宋初文章实际是在骈体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骈文在宋又称“四六”,如陈师道所云“国初士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陈拾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2页。

2 王勃:《王子安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六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5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王子安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1页。

4 宁薇:《唐代骈体公牍文论稿:以陆贽为中心》,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页。

5 刘宣阁:《公牍文研究》,世界书店1946年版,第43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张燕公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3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曲江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4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张文贞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8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曲江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4页。

10 张九龄著,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11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2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翰苑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05页。

1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0页。

大夫例能四六”¹，骈体是宋初文人入仕的必备技能，故而处在五代文坛荒原之上，最先为文坛带来希望的就是四六骈文。

宋初骈文既不同于六朝浮靡之作，亦少五代衰飒之气，而是严守唐人矩矱而进行的创作。《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²李调元《赋话》卷五亦称“按唐人篇幅谨严，字有定限。宋初作者，步武前贤，犹不敢失尺寸。”³孙梅《四六丛话》称“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⁴正是在对唐人的借鉴与模仿中，宋初骈文延续了唐文之“质”，去纤而就古，从而在古文未兴之时承担起了宋文振兴的作用。如《小畜集》提要评：“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俚，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其奏疏尤极剴切。”⁵骈文多用作王言之体、代言之文，例如胡宿所作多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⁶，故而馆臣多以唐之燕许、陆贽作比，称徐铉“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⁷。又如称夏竦“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⁸。

在骈散的态度上，馆臣并未落入宋元以后重散轻骈的窠臼，而是客观对待骈体对唐文的沿袭，充分肯定了骈文对宋初文风复兴的文章发展史意义。对待骈文创作上，馆臣以“质”来论，如汪藻所作虽“以俚语为最工”，但其代言之文“皆明白洞达，曲当情事。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以比陆贽。说者谓其著作得体，足以感动人心，实为词令之极则。其他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⁹。所以，典重赡丽、风骨高秀的骈文创作既是宋初文章复兴的先锋，也成为《总目》宋文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散体古文是《总目》宋文批评的重点，也更为集中和全面地反映了唐宋文之关联。《总目》宋代古文批评，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唐代古文的关联性评价，无论是宋初古文由弊而兴过程中的“沿洄韩柳”，还是宋代古文创作中的唐人遗风，皆反映了馆臣于唐宋文批评的文脉观念。馆臣将宋初古文运动的兴起，追溯到了唐代韩柳的渊源。《宋元宪集》提要云：“文章至五季而极弊。北宋诸家，各奋起振作，以追复唐贤之旧。穆修、柳开以至尹洙、欧阳修，则沿洄韩、柳之波。庠兄弟则方驾燕、许之轨。譬诸贾、董、枚、马，体制各殊，而同为汉京之极盛。”¹⁰又如穆修古文承唐开宋，亦是师法韩柳之则，馆臣称其“天资高迈，沿溯于韩、柳而自得之”¹¹。馆臣关注到宋代古文与唐人渊源，特别是对韩柳的师法传承。如赵湘“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¹²；陈襄“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¹³；又如郑獬“文章豪伟峭整，议论剴切，精练民事”¹⁴，溯其文章宗旨渊源则“实源出韩门”¹⁵。宋代古文作者多有师法唐人之举。

至于宋文新的特点，《总目》主要关注到学者之文与儒者之文的古文批评。学者之文，特点为博学多识、立言有本。如苏颂“其学本博洽，故发之于文，亦多清丽雄赡，卓然可为典则”¹⁶。经史学家刘敞淹通

1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0页。

2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97页。

3 李调元：《赋话》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页。

4 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三，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五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5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0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骑省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2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庄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7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浮溪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94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9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穆参军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6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南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5页。

1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古灵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6~2047页。

1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郾溪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2页。

1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郾溪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2页。

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苏魏公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5页。

典籍而颇有心得,“非南宋诸家游谈无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经术,具有本原”¹。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的沈括“所作《笔谈》,于天文、算数、音律、医卜之术,皆能发明考证,洞悉源流”,《总目》对沈括的评价,勾连了人与文的关系,人“学有根柢”,则“所作亦宏赡淹雅,具有典则”²。儒者之文多以经世、体用来论。北宋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倡经世致用、明达体用之学,与此同时,宋儒文学创作中的儒者之气就成为了宋代古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文正集》提要评价范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其文章则“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³。提要以儒学体用之论评价曰:“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⁴《传家集》提要评司马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⁵。《总目》评价宋代儒者之文的范畴不只政坛名臣,是包括一切有裨世用、经济之言“端人正士”之文,如金君卿,《金氏文集》提要称:“君卿所与游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诗文皆清醇雅飭,犹有古风。陈灾事、贡举诸疏,剴切详明,尤为有裨世用。”⁶《潞公集》提要评文彦博“文章不事雕饰,而议论通达,卓然经济之言。奏札下多注年月,亦可与正史相参考”⁷。

《总目》唐宋文批评是基于唐宋文各自特点,在代际文学间寻求的平衡与周全。《总目》唐宋文批评非纯文学立场,故而对唐宋文的价值判断也非纯文学角度。何宗美先生曾以欧阳修为例,揭示《总目》对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儒者之文态度的不同。以《孙明复小集》提要所云“复之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又别为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执也”⁸为例,何宗美先生认为:“此以孙复之文为儒者之文,‘欧、苏、曾、王’之文为文人之文,前者‘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后者‘务极文章之能事’,对比起来,前者更加受到四库馆臣的推重,后者相比而言则稍有区别。这里其实隐含着《四库全书》体系中文化批评的一种惯用策略,可以称之为‘持衡’(卷首二《进表》,第13页)批评或中庸批评。这种批评通常以压高抬低、抑此扬彼来达到某种文化平衡效果,并体现官学批评的圆融和周全。”⁹儒者之文更多受到了馆臣的青睐,根源于“根柢经术,谨严峭洁”的创作主体,主体不同则文章的思想、本质有不同。馆臣推崇何种文章,就是在引导何种思想,何宗美先生所谓“官学批评的圆融和周全”也是就官方对于思想的选择和文化的平衡而论。从这个意义而言,唐宋文体虽有骈散之别,但《总目》并不关注于文学层面的文体批评,更注重文章的功能性与思想性。所以,《总目》在唐宋文批评中呈现出来的多是对唐宋文内在思想性“质”的把握,以及对文章功用性的阐释。

三、“以唐律宋”:《总目》唐宋诗文的批评倾向

在唐宋文学沿袭、创新以及整体风格的对比中,《总目》诗文批评有着明显“以唐律宋”的倾向。这一倾向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有唐遗风”,二是“学唐而不得”,三是“晚唐丘壑”。

其一,《总目》唐宋诗文对比呈现一种“有唐遗风”的评价方式。宋别集提要中出现了大量以宋比唐、追寻唐人遗风的评价内容。馆臣论宋诗之格韵,或寻盛唐之波澜壮阔、典雅高秀之余韵,或以晚唐凄婉孤峭、含思绰约之致进行对比。如称胡宿“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訇,亦可仿佛盛唐遗响”¹⁰,潘阆“风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¹¹,寇准“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¹²,刘安上“格意在中晚唐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公是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9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长兴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4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1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1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7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8~2049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57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2页。

9 何宗美:《〈四库全书〉体系中欧阳修“褒贬”问题揭析》,《文学遗产》2019年第一期,第69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0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道遥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3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寇忠愍公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4页。

间, 颇见风致”¹, 又如王铨“诗格近温、李”², 郑侠“古诗在白居易、孟郊之间”³。论诗情抒写与阐发的方式, 亦对照唐人, 述其唐人渊源。如郑清之“大都直抒性情, 于白居易为近”⁴, 高斯得“悯时忧国之念, 一概托之于诗。虽其抒写胸臆, 间伤率易, 押韵亦时有出入, 而感怀书事, 要自有白氏《讽谕》之遗”⁵。论宋文, 则溯古文韩、柳之渊源, 骈文燕、许之轨范。宋初古文如穆修“沿溯于韩、柳而自得之”⁶, 骈文如宋庠“方驾燕、许之轨”⁷, 另如郑樵“其文滉漾恣肆, 多类唐李观、孙樵、刘蛻”⁸, 员兴宗“其文力追韩、柳, 不无锤炼过甚之弊”⁹等等, 馆臣在宋代文学的评价中多可寻到唐人之遗。

其二, 唐人遗风多源自宋人对唐人的师法规摹, 但学唐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总目》还提到了大量“学唐而不得”的情况。受限于风会、才力, 宋人并不能尽可学得唐人, 《紫岩诗选》评于石“《邻叟言》《母子别》《路傍女》诸篇, 欲摹少陵, 而不免入于元、白。《山中晚步》诸篇, 欲拟襄阳而不免入于钱、郎。皆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¹⁰。学唐者又或仅得其表, 唐代文学之风神则不可模拟, 如江湖诗人赵汝鐸以晚唐为尚, 《野谷诗稿》提要评其“一花一石, 时饶佳致”¹¹, 然较之唐人则缺乏了内在的气质与精神, 馆臣尤为赞同王士禛的评价, 所谓“多佳句而无远神”¹²。以“专主于妙远”的严羽论诗推崇汉魏、盛唐, 其诗则因才力所限, 《沧浪集》提要称其“止能摹王、孟之余响, 不能追李、杜之巨观”¹³, 李东阳《麓堂诗话》分析了其中缘由: “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 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 未尝有失。顾其所自为作, 徒得唐人体面, 而亦少超拔警策之处。予尝谓识得十分, 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 其沧浪之谓乎?”¹⁴《总目》进一步分析“徒知其病, 未中其所以病”¹⁵, 至于“所以病”的原因, 细究馆臣之意, 应该还是根源于唐宋时代发生了改变, 所谓师法与传承, 仅能独具外表, 而唐诗之风神是模仿不来的。

馆臣强调宋代诗文对唐人遗风的承继, 但同时又捍卫唐代诗文的重要地位。例如江湖派诗人周文璞, 其纤巧自然的诗歌风格为张端义所称道, 《贵耳集》卷上评周文璞“《灌口二郎歌》《听欧阳琴行》《金涂塔歌》, 不减贺、白”¹⁶, 《方泉集》提要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文璞古体长篇, 微病颓唐, 不出当时门径, 较诸东坡、山谷, 已相去不知几许。端义拟以青莲、长吉, 未免不伦。”¹⁷又如源出白居易的刘学箕, 《方是闲居士小稿》称“其诗虽大体出白居易, 而气味颇薄。歌行则往往放笔纵横, 时露奇崛。或伤于稍快稍粗, 与居易又别一格。淮以为抗衡居易, 则似尚未能矣”¹⁸。

其三, 《总目》唐宋对比亦关注到唐代文学自身的优劣性问题, 宋对唐的沿袭亦有优劣之别。《总目》并非一味推崇唐代文学, 在晚唐诗文的认识上, 认为亦有优劣之分。晚唐诗文常以含思凄婉、风格绰约之致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五《刘给事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085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雪溪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12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西塘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075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安晚堂诗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64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耻堂存稿》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76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穆参军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036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宋元宪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039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夹漈遗稿》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23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九华集》提要,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40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96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60页。

12 王士禛:《居易录》卷二,《王士禛全集》(五), 齐鲁书社2007年版, 第3704页;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60页。

1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70页。

14 李东阳:《麓堂诗话》,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 中华书局2006年版, 第1371页。

1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70页。

16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五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第426页。

1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59页。

1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 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2162页。

著称,但亦有“雕琢细碎”“刻画纤巧”¹“纤靡俚俗”²之习。《总目》评价宋人,既关注宋对唐优点之继承,如真山民“诗格出于晚唐,长短皆复相似”,其诗“颇得晚唐佳处矣。一丘一壑,足资延赏,要亦宋末之翘楚也”³,但也关注到宋人有学唐因偏执一端而致误入歧途的情况。四灵诗人同样以晚唐为宗尚,然在对晚唐的模拟中失之太狭,又主于炼字,以至全无晚唐风致,发展了晚唐清瘦一脉。《芳兰轩集》提要评徐照:“四灵之诗,虽镂心鉢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照在诸家中尤为清瘦。”⁴《清苑斋集》提要评赵师秀:“其诗亦学晚唐,然大抵多得于武功一派,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其诗主于野逸清瘦,以矫江西之失,而开宝遗风则不复沿溯也。”⁵学晚唐不同于晚唐,炼句炼字,这是馆臣所批评的,诗法不当导致了四灵的境界促狭。

“以唐律宋”反映了馆臣潜意识中以唐为正的批评倾向。以诗为例,《总目》论唐宋诗文的差别,基本可以归纳出唐宋诗风格上的差别,诸如唐诗盛、宋诗弱,唐诗灵、宋诗拙,唐诗雅、宋诗俗。自宋迄清,多有诗家持唐诗正体之论,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称:“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⁶严羽梳理了有宋诗之唐代渊源,称盛唐诸公为“大乘正法眼者”,感慨宋代“正法眼之无传”;清人宋荦《漫堂说诗》展示出宋代诗学流变的动因大多受到唐人的影响:“唐以后诗派,历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数:宋初晏殊、钱惟演、杨亿号‘西昆体’。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王安石稍后亦学杜韩。神宗时苏轼、黄庭坚谓之苏黄。又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称苏门六君子。庭坚别开‘江西诗派’,为江西初祖。南渡后,陆游学杜苏,号为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分派别也。其后有江湖四灵、徐照、翁卷等,专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⁷由此可见唐诗对宋诗的深远影响。《总目》对宋诗多有“变体”评价,见以下所论:

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仿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载生于诗道弊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风规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遗音。⁸

唐诗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学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杨意等倡西昆体,流布一时。欧阳修、梅尧臣始变旧格,苏轼、黄庭坚益出新意,宋诗于时为极盛。南渡以后,《击壤集》一派参错并行,迁流至于四灵、江湖二派,遂弊极而不复焉。金人奄有中原,故诗格多沿元祐,迨其末造,国运与宋同衰,诗道乃较宋为独盛。⁹

由唐而宋,《总目》认为诗学发展的趋势是盛而转衰、正而成变。唐宋对比中,《总目》显然基于宗唐的立场,以至唐代文学成为宋代文学的批评基点与标准,宋代诗文批评则被笼罩在与唐人的对照、溯源、优劣的评判中。《总目》唐宋诗文批评采取了一种贯通式的综合论述,唐宋别集提要的书写也是采取了一种前后对比、互文的写作方式,既看重唐代文学对宋代的启发,又在宋代的批评中追溯唐代文学之渊源。这种对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追昔游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7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玄英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9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真山民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94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55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56页。

6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27页。

7 宋荦:《漫堂说诗》,《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1~432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杨仲弘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28页。

9 《御选四朝诗》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三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引文中“杨意”当作“杨亿”,盖四库馆臣笔误。

比式评价也由来已久,符合文学批评史之惯例。需要注意的是,《总目》抬升唐代、以唐为本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唐宋诗之争、唐宋优劣评判中宋代诗文绝无可取。这是因为,《总目》唐宋对比中不全是文学层面的优劣对比,四库馆臣在唐宋诗文的对照中更在意唐宋诸家文学创作中承载的思想性。所以,《总目》承认唐代文学不可匹敌的文学地位,但同时看到了宋代文学发展中新凸显出来的儒者气象、学者风范。从这个意义而言,《总目》的唐宋之论与诗学流派上的唐宋诗争也并不相同。四库馆臣在唐宋文学的对比评价中,更着力于彰显唐宋之别并取法唐宋所长,构建《总目》的文学批评世界。

四、余论

文学层面的唐宋之论,《总目》以“唐”为正,或是以“唐”律“宋”,唐较之宋受到馆臣更多的关注。然而若将《总目》放到清代诗学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则可以获得更丰富的认知。唐宋诗之争是诗坛数百年来重要争辩,但处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易代文人,除文学风尚与诗学论争之外,“宗唐”“祖宋”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历史与群体心态内涵。清代宗唐法宋的群体构成有不同的、复杂的思想性因素和心理动因,馆臣对于唐宋文学批评的问题,也必将针对这一思想性因素进行疏导,所以宗唐法宋的背后,以及《总目》唐宋诗文批评背后,不惟文学风格异同与优劣之论,还有着复杂的文化政治背景。就《总目》唐宋诗文批评而言,馆臣虽持有以唐律宋的态度,但实际上还是有意于调和唐宋,二者兼取之,但馆臣兼取唐宋不仅仅是纯文学角度上的沟通唐宋,还倾向于一种文学与思想性的构建。取宗唐者的“盛世”心态,消解宗宋者的“野逸”情怀,反之取法宋代诗文之儒者精神。可以说,唐诗所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特性,表现出昂扬有为的精神,它注重的是外向的、宏大的表达,唐诗与清代的盛世心态有着天然统一。宋诗则重在诗人的个性表达,是内敛、深刻的气质与精神,而向内的精神既有儒者之胸襟,也有清人遗民的谨慎、自省乃至隔代之思。《总目》在唐宋诗批评中,就是要将唐诗风貌引向壮大与昂扬,而将宋诗风貌引向儒者胸怀与内敛精神。因之,唐宋之争在清代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下,绝非纯粹文学争论,而是关乎文人心态与政治意图的思想性引导。《总目》唐宋诗文的评价融入了大量的政治意识,馆臣在唐宋之论中,并非着力于优劣之论,而是将唐宋之别诉诸引导与建构之中,兼取唐代盛世之音与宋代的思想性因素,将二者共同运用于其政治诗学的构建。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Criticism of Tang and Song Poems of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n *Si Ku Quan shu*

Jiang Yong

Abstract: It is not long ago that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had the most intense controversy involv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it was in the stage of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It had a lot of significance in the evalua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poems and writing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osition of the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fficial emperors of the Tang Dynasty is rough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position of the emper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riticism of 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is an obvious tendency to “follow the law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re is a legacy of the Tang Dynasty”; Seco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learn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ird, “the gull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y;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ang and Song poetry criticism; Advocate the ta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restrained the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章批评析论

姚江浩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重庆 400031)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虽是一部目录学著作,但实则以提要形式阐发馆臣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其中,对明人文章的批评又自有特殊之处。明朝作为清之前朝,明人文章乃前朝思想之遗存。馆臣对明人文章进行审视评价,既有学术考量,也存在政治用意。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文章批评话语的研究,揭示其批评理论体系的架构和意义。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明人别集 文章批评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2-61-69

定本《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中有明人别集提要二百三十八篇,存目提要八百五十四篇。在千余篇明人别集提要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进行了“特色”批评,形成了《总目》明代文学批评史。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明代诗、文批评系双线并进,在诸多提要之中,以“文章”二字进行学术批评之语达百余次。由此,《总目》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明代文章学批评理念。那么,四库馆臣是如何建构明代文章学批评体系的?这在《总目》批评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尚需解决。具体来说,本文论述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总目》明代文章批评的学理范畴;《总目》对明代文章批评理论的建构;《总目》之明代文章批评对文学史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对《总目》明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有学者关注。如1990年,邵毅平发表了《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明文风观》,对《总目》明代文风分期,晚明文风特点,产生之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述¹。2005年,郑明璋发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明代文学时,指出四库馆臣将文品同人品进行密切联系,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但并未针对明代文章立论。2010年,何宗美、刘敬发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一文,主要对《总目》中关于明代七子派文学和复古问题的评价特点进行了论析²。2012年,刘冰欣发表《〈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批评探析》,从人品学术、因袭创新两方面,讨论《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³。同年,史小军、潘林发表《〈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多方面论述了馆臣对台阁体文学批评的特殊之处⁴。2013年,璩龙林、谢谦发表《〈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晚明小品文》,分析馆臣对晚明小品文的批评立场,认为其对晚明小品的批评虽然激烈但不失中肯⁵。2014年,刘敬发表《〈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

作者简介:姚江浩,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四库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四库全书》研究学史”(项目编号:19GZGX23)的阶段成果。

1 邵毅平:《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明文风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三期,第52~57页。

2 何宗美、刘敬:《〈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九期,第102~111页。

3 刘冰欣:《〈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批评探析》,《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二期,第70~72页。

4 史小军、潘林:《〈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四期,第143~148页。

5 璩龙林、谢谦:《〈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晚明小品文》,《东南学术》2013年第一期,第203~208页。

提要为例》，主要针对《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所存在的文献错误、对原文献断章取义、议论缺少实据、原文献误读等问题进行分析¹。2015年，张庆民发表《〈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文批评问题》，提出《总目》明文批评与明朝国运紧密结合，总结出《总目》明文批评的独特话语，将《总目》明文批评分期作了梳理，认为《总目》明文批评是一种社会性批评²。2016年，张晓芝发表《〈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析论》，文章以《总目》稿本系统为着眼点，分析了从稿本系统到最终定本《总目》、清代官方思想对明代文学观的动态建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思想变化³。2017年，何宗美发表《〈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主要解决《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和架构问题、《总目》明代文学批评如何定性的问题，总结性地提出了《总目》明代文学观是“演退”的文学⁴。这一论断对《总目》明代学术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2018年，刘敬发表《解读与反思：〈四库全书总目〉的明代文学批评——以复古派作家的别集提要为例》，以明代复古派文学为中心，分析《总目》明代文学批评中文献失误背后的批评意图、理论意图，对《总目》明代文学批评进行了有价值的学术反思⁵。同年，梁园媛发表《论晚明文学评价的失实与偏差——以〈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总结《总目》对晚明文学流派的评价、《总目》的局限性以及对文学史的影响⁶。兹略举大端如上，本文不揣简陋，以《总目》中的“明代文章”为中心，分析《总目》的“文章学”理论及其学术思想。

一、《总目》明集“文章学”释义

何为“文章学”？吴承学先生说“中国文章学固然涉及文道、文体、文气、文术、文评等诸多问题，是关于文章问题的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与认识，但是其对象与重心应该是关于文章之写作与批评，或者说中国文章学就是以文章之写作、批评为核心并包含相关问题的系统理论”⁷。祝尚书先生认为“它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与人们所熟悉的诗学、词学性质相似”⁸。结合两位学者的论述可知，“文章学”的核心内涵是与文章有关的学术批评，“文章学”可以说是一门系统研究文章的学问。故《总目》明集“文章学”，实际上指的是四库馆臣研究明人文章的路径、方法、学术批评与学术判断的学问。那么，《总目》明集“文章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翻阅《总目》明人别集提要，有一百零九篇提要中提及“文章”二字。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百零九篇提要，全面探究《总目》明集“文章学”概念之内涵和外延。

文章学的核心内容是有关文章的写作与批评。馆臣对明人文章的审视，主要是以文章批评的形式，表现其独特看法，从而形成了《总目》明集“文章学”。考察《总目》明集“文章学”的内涵，需要探讨馆臣对明人文章的认识，其评判明人文章的态度立场，以及馆臣对明人文章的批评标准和内容。对明集文章的整体认识，馆臣在《总目》别集叙言中有所提及，“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⁹。馆臣认为明代文章数量繁多，筛选应当更加严格，这是馆臣对明代文章的整体性认知。对于为何要对明人文章进行严格选择，馆臣解释道“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¹⁰。按馆臣

1 刘敬：《〈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提要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二期，第147~150页。

2 张庆民：《〈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文批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五期，第91~99页。

3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析论》，《北方论丛》2016年第三期，第25~30页。

4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三期，第1~9页。

5 刘敬：《解读与反思：〈四库全书总目〉的明代文学批评——以复古派作家的别集提要为例》，《中国四库学》2018年第一期，第340~349页。

6 梁园媛：《论晚明文学评价的失实与偏差——以〈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8年第十二期，第133~136页。

7 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十二期，第140页。

8 祝尚书：《关于文章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一期，第182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1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1页。

的说法,之所以要对明代文章严加删薙,并非是因为贵远贱近的惯常思维,有意抬高前代文章,贬低明代文章,而是因为明代文章同先秦、两汉及唐宋文章相比,其历时未久,优劣并存,未成定论,需要慎重对待。尽管馆臣给出的解释看似合情合理,但如果联系到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所颁谕旨及四库馆臣在《总目》集部总叙中的话语,不难发现馆臣所谓的“公允”其实是戴了有色眼镜的,对明代文章另眼相看实际上存在着政治意图。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初六日的谕旨中,乾隆说“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¹。作为最高统治者,乾隆修书有自己的政治用意,明确表示四库所辑之书须关乎“世道人心”,即要有利于人伦教化,希望引导社会民心,达到稳固统治的政治目的。在《总目》集部总叙的最后,馆臣也说“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²。馆臣特意指出,对明代以后各个流派,不掩其长处,更不回护其缺点。而一准至公的最大目的,并不只是从文章批评上考量,关键着眼点是在“世道之防”,可见其选择标准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利于清王朝的统治教化。再联系馆臣在《总目》别集类序言中所说,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总目》别集类序言或是集部总叙中,明代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明代作为清之前朝,明代文章属于前朝文人思想之遗存,其特殊性与敏感程度不言自明。故在强调“有关世道人心”的政治背景下,明代文章被清朝官方重点关注自是不可避免。馆臣反复地强调明代文章筛选标准,主张“世道之防”,可见其立场与最高统治者是一致的。对明代文章的认知与严格筛选,都是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的政治需要。这样看来,馆臣所说的因明代文章历时未久,优劣杂存,故“去取之间,不敢不慎”,实际上只是托辞,欲盖弥彰而已。馆臣对明代文章高度重视,认为明代文章尤其需要严格筛选这一根本认知,都是从“讲求世道之防”“有关世道人心”的政治立场出发,自然会对馆臣批评明代文章的标准和内容产生影响。

二、《总目》“明集”文章批评浅析

(一) 重道德人品之批评观

馆臣对明人文章的评价,尤为重视从道德人品方面对明人文章进行价值判断。馆臣的道德标准无法逾越所处时代及其官方身份之限定,这也从根本上定性,馆臣的道德是臣下对帝王尽忠的封建道德。这种道德意识,在《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顾允成《小辨斋偶存》提要,馆臣评说“允成文皆论诗讲学之语,书简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饰。诗为《击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节凛然,其对策奏疏,皆真气流溢,发于忠爱之诚,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³。评顾允成文章,馆臣只简单一句“直抒胸臆,不事修饰”,评价不高。而其对策奏疏,则赞扬“大节凛然”“真气流溢”,有“忠爱之诚”。论断顾允成足以流传千古的文字,指的是对策奏疏这类有关国事时政之文。对策奏疏之文事关朝政,其所论所议关乎忠君爱主这一君臣关系的伦理准则,所以馆臣并非赞赏其文章,而是褒扬其道德人品。《杨忠介集》提要中评杨爵“世宗时斋醮方兴,士大夫率以青词取媚,而爵独据理直谏,如所陈时雪之不可以为符瑞,左道之不可以惑众,词极剴切。下狱以后,犹疏谏以冀一悟。其忠爱悱惻,至今如见”⁴,馆臣对杨爵直言进谏,并因此受牢狱之灾但仍不后悔的做法十分称赏,赞扬他对君主“忠爱悱惻”。论其诗文,曰“大抵直抒胸臆,虽似伤平易,然有本之言,不由雕绘。其可传者,正不在区区词采间矣”⁵。在道德价值判断下,文章平易并非作者识见浅显,倒是直抒胸臆,文章传世并不在其词采雕绘。《仰节堂集》提要,评曹于汴称“盖平生制行高洁,立朝风节,凛然震耀一世,远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笔札见长。《从吾序》所谓‘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者’,为得其实。观是集者,谓之文以人重可矣”⁶。馆臣所谓“远者大者”,专指其行为之高洁,这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71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小辨斋偶存》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2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杨忠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1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杨忠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1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仰节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3页。

显然是就道德立论的。馆臣针对官员政治品格的评价,最终目的亦是求为官有方,经世致用。“风节”若大有可观,那么其笔札文字则并不重要,也就是“文以人重”。但在《总目》之中,真正被重视的并非人这一“单纯”的个体,而是个体之外合乎封建王朝规范的道德与政治品质。

乾隆明示四库采辑书籍要“关世道人心”,馆臣也提出要“讲求世道之防”,都是希望文章对民众、世风起到教化和引导作用。而能够对民众和世风起到正向引导作用的,自然是道德品质高尚,值得效仿的典型人物。对这类德行出众的明人,馆臣在提要中就其人品与文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如《刘清惠集》提要,馆臣称“至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得其实矣。是亦文章关乎人品之验也”¹。“文章关乎人品”,这是馆臣提出的“文章学”理论性主张之一。至于关系到底如何,馆臣并未全面解答,而是着力关注“人品”这一范畴较“虚”的指标。在《未轩文集》提要中,馆臣有进一步的论断,“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颇颇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²,馆臣认为黄仲昭的文章,虽沿袭当时平实的文章写作风气,但因人品高洁,行文无粗鄙之语。即使同专门作者相较,也不会因平实坦易而受人指摘。馆臣认为人品与文章语言雅俗存在因果逻辑,人品决定文章语言高下。《东园文集》提要,馆臣又评“(郑纪)诸体文亦多属有关世教之言。《续编》内有‘归田咨目’十条,皆兢兢以礼法自持。盖其人品端谨,亦有足重者焉”³。馆臣首先特意指出郑纪诸体文章大多是有关世风教化的言论,然后又说其《归田咨目》中所作,也皆是坚守礼法,既然坚守礼法,自然“有关世道人心”,最后认定其人品之端正,文章自应受到重视。由郑纪文章多有关世教之言,且坚守礼法,再到人品端谨,不难发现,按馆臣之逻辑,其文章多关乎世教礼法,才有了人品端谨的论定,依然是“文章关乎人品之验”。在《灋溪草堂稿》提要中,馆臣如此说道,“(孙承恩)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纯正恬雅”⁴,将孙承恩与严嵩此类佞臣对比,突出其人品卓然,继而点出其文章之纯正恬雅。馆臣进行顺向推导,人品好,文章亦佳,人品与文章依旧是正向因果关系。

单看上述提要中馆臣之论,人品与文章优劣之关系是纯粹的因果关系,人品之优劣决定文章之好坏。然张宇初《峴泉集》提要,馆臣称“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⁵。张宇初人品非纯良,文章却斐然可观。黄淮《省愆集》提要,馆臣称其“人品亦不甚醇”,但“其文章春容安雅”⁶。与之前“文章关乎人品”“人品既高,自无鄙语”的说法,并不一致。馆臣看待人品与文章之关系,态度上的前后不一,凸显了馆臣对“文章关乎人品”这一批评标准的矛盾性。而矛盾的根源,是馆臣遵循统治者的政治意图,“从批评立场来说,它是官学批评,即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学批评,是非纯文学批评的批评”⁷。是“世道之防”这一政治需要下,批评标准之功利性与文章批评自身的客观性产生了冲突。面对这一冲突,馆臣并未进行有效调和。这也说明,馆臣抛出“文章关乎人品”这一观点,并不是真的为了讨论文章与人品之间的实质关系。人品之于文章,只是馆臣为了拔高道德人品之影响,为其狭隘性“文章学”思想进行立论,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而已。

(二)“学术”与明集文章

馆臣作为品评《总目》明集文章的主体,他们自身的一些内在特质也会影响其评判标准。四库馆臣如戴震、邵晋涵、任大椿等均为朴学大师,精通经史之学,学术修养深厚。在这种学术背景影响下,馆臣对《总目》明人文章的品评,重视作者学术功底这一特点十分突出,“学术”一词多次出现。如《陶学士集》提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刘清惠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1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未轩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2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东园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9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灋溪草堂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6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峴泉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87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省愆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1页。

7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一期,第4页。

要，馆臣称“（陶安）学术深醇，其词皆平正典实”¹。陶氏学术深厚醇正，故发为文章，语词多平正有故实。魏校《庄渠遗书》提要，馆臣则说“然校见闻较博，学术亦醇。故是集文律谨严，不失雅正。考据亦具有根柢”²。这里，馆臣分了三点评说。一是魏校之学术，馆臣一字括之，曰“醇”。二是因“学术”之醇，魏校文章律度的谨严和雅正兼备，馆臣对此极为欣赏。三是魏校文章中有考据，这是馆臣十分看重的根柢之学。馆臣对陶安文章的评价，从其学术着眼，论及学术对文章语言的外在作用影响。在对魏校文章的评说中，论述更加深化，学术深醇形成魏校文章内在法度之谨严以及内容之雅正，且考据功力作为学术水平的一种反映，自然被深受乾嘉汉学影响的馆臣推崇备至。

通过陶安与魏校，馆臣认为“学术”的醇正，能够使文章外在之语词与内在之内容法度获得提升。在李时勉《古廉集》提要中，馆臣认为李时勉“学术刚正”，“至其为文则平易通达，不露圭角”³。肯定了李时勉学术之“正”，虽然馆臣语气间并没有将学术刚正同平易通达、不显棱角的文章风格联系起来。

但在《逊志斋集》提要中，馆臣态度出现变化，说“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⁴。依馆臣之见，方孝孺学术是醇正的，论及文章，却话锋一转，认为他的文章风格介乎苏轼与陈亮之间，纵横豪放的气势，更像是纵横家。徐有贞《武功集》提要，馆臣论道“集中如《文武论》《制纵论》及《题武侯像》《出师表》诸篇，多杂纵横之说。学术之不醇，于是可见；才气之不可及，亦于是可见”⁵。馆臣认为徐有贞文章杂有纵横家习气，由此判定其学术不醇，这也可以解释馆臣为何对方孝孺学术醇正，而文风纵横有些许诧异和不满。但馆臣对徐有贞并没有持批判否定态度，反而作了折中，认为正因如此，也体现出徐有贞文章的才气。陈献章《白沙集》提要，馆臣直接说道“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⁶。陈献章的学问学术在馆臣看来并非正宗，其文章亦如同学问。但是，馆臣并不否认其为能有所树立的豪杰之士。无论是《武功集》提要还是《白沙集》提要，馆臣力图调和“学术不醇”与文章之间的关系。馆臣意识到了文章创作与“学术”之间的关联，更意识到了不能单纯以“学术”为尺度来衡量文章创作。因此在《宋景濂未刻集》提要中，馆臣特别指出，“盖文章一道，随事立言，与训诂经义，排纂语录，其例殊”⁷。这表明，馆臣也认识到，文章写作有其自身内在特性，并不能将之与训诂、语录等学术著作混为一谈。

（三）“尊儒”与明集文章

通过前两部分分析可知，馆臣对《总目》明集文章的品评重点有二：一为“人品”，一为“学术”。不管是“人品卓然”“人品端谨”，或是“学术深醇”“学术醇正”，都包含着馆臣的一种价值判断，即对儒家伦理道德与儒家学说的尊崇。如殷奎《强斋集》提要中，馆臣说道“如奎等者，在当时不以词翰名，而行矩言规，学有根柢，要不失为儒者之言”⁸。殷奎等人在当时并不以文章名于世，但其行为举止合乎儒家传统，学问根底深厚，故其文章可称为“儒者之言”。所谓“儒者之言”，盖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言论。在馆臣眼中，殷奎文章写得虽然不出色，但其言行遵守儒家规范，其文章也被馆臣大为称赞。张宇初《岷泉集》提要中，馆臣说“其中若《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辨》《荀子辨》《阴符经》诸篇，皆有合于儒者之言。《问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尝以云师风伯荒怪之说张大其教。以视诵周孔之书，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实转为胜之”⁹。此处，馆臣特意指出张宇初之《太极释》《先天图论》等篇什“皆有合于儒者之言”，且《问神》一篇没有怪诞言说，比起那些号称习读周公、孔子之书，实则混淆儒、墨两家之界限者，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陶学士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4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庄渠遗书》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3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古廉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2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逊志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85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武功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5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白沙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5～2296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宋景濂未刻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3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强斋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79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岷泉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87页。

着实胜过许多。馆臣在这里提出“儒、墨之界”这个论点，并非要论证儒、墨之分别，实则是强调“儒者之言”“周、孔之书”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必须要坚守。其他如在胡居仁《胡文敬公集》提要¹、魏校《庄渠遗书》提要²、杨爵《杨忠介集》提要³中，都反复提到“儒者之言”，可见馆臣对儒家学说有着笃定的信念。如果说“儒者之言”是馆臣对儒家学说的整体界定，那么“经术”可以说是儒家学说中馆臣最为关注的核心。《胡仲子集》提要，馆臣评胡翰道“《牺尊辨》《宗法论》诸篇，亦湛深经术，则又未尝不精究儒理也”⁴，透过胡翰的《牺尊辨》《宗法论》等篇章，馆臣论定他对儒学理论有着精深研究。何以见得？正因胡翰“湛深经术”。龚敦《鹅湖集》提要，馆臣评价其文章说，“文则原本经术，结构谨严，实能不愧于作者”⁵。龚敦的文章结体严谨，与古之作者相比也不逊色，正是因为其文章写作“原本经术”，是根柢于经术得来。《容春堂集》提要，馆臣引用《明史·儒林传》说道“‘其文典重和雅，以李东阳为宗。而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殆非虚美”⁶。查《明史·儒林传》邵宝传记原文，称其“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⁷。虽然并非出自馆臣之口，但馆臣对此亦极为赞同，认为“殆非虚美”。文章原本“经术”，便可结构谨严，粹然纯正，无愧于古作者，馆臣眼中“经术”的核心作用，不言而喻。在张岳《小山类稿》提要中，馆臣态度更加鲜明。“又史称岳博览工文章，经术湛深，不喜王守仁学。今观集中《草堂学则》及诸书牋内辨学之语，大都推阐切至，归于笃实近里”⁸，张岳经术功底深厚，并且厌恶王阳明之学说，馆臣由此观其文章，说大抵都推详阐释得切实至当，笃实有理。“经术湛深”，当然是对儒家学说极为推崇认同，故“不喜王守仁学”。馆臣在此对张岳文章语含夸赞，实际上是认同张岳对儒家学说、思想的恪守。综上所述，无论是“儒者之言”或是“经术湛深”，馆臣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儒家学说、儒家思想的推重与信仰。

（四）复古而不泥古的文学观

“相对于前人的学术批评，《总目》所做的不再是枝枝叶叶的工作，而是全方位的学术总结和点评”⁹。而这种全面的学术视野和思考，反映在《总目》明集文章学的批评中，突出表现在文学创作观念上，即十分重视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继承化用，又不主张拘泥前人之成法。如朱右《白云稿》提要中，馆臣议论道“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实权輿于此。其格律渊源悉出于此。故所作类多修洁自好，不为支蔓之词，亦不为艰深之语。虽谨守规程，罕能变化，未免意言并尽。而较诸野调芜词、驰骋自喜、终不知先民矩矱为何物者，有上下床之别矣”¹⁰。此处，馆臣所论有三点：一为朱右作文宗旨，不高言秦汉文章故为高论，奉唐宋文章为正宗；二为朱右文章之格律源自韩、柳、欧阳诸人，馆臣评其所作文章大抵高洁，无冗词杂句，也不故作艰涩深奥。可知馆臣反感刻意摹秦仿汉，粉饰字句的做法；三为朱右文章尽管遵循唐宋文章之规范章法，其弊在于少变化，有言尽意尽的遗憾，缺乏言外深意。

尽管朱右文章在馆臣眼中并非理想之作，但对其能够谨遵前人创作经验的做法极为认可。对于蔑视前人创作经验，自以为是的文章作者，馆臣斥其为“野调芜词”，斥责他们“驰骋自喜”“不知先民矩矱为何物”，与朱右等学习前人创作经验的作者相比，有“上下床之别”，批评态度极为严厉。“先民矩矱”可以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7～2308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3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1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胡仲子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9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鹅湖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83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容春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6页。

7 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卷二八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45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小山类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8页。

9 叶文青：《〈四库全书总目〉与学术批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二期，第40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白云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7页。

解释为前人文章创作的各种规程,即前人文章创作的宝贵经验。对于能继承“先民矩矱”的作者,馆臣都给予称赞。如张吉《古城集》提要中,馆臣说道“吉当其时,犹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则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梦阳、何景明,而平正通达则胜之”¹。张吉虽然文章高明不敌王阳明,才学雄富又比不上李梦阳、何景明。但能谨守“先民矩矱”,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故文章笃实胜于王,平正通达又胜过李、何。顾清《东江家藏集》提要,馆臣又说道“当时何、李崛起,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倣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²。李梦阳、何景明引领的文章风气,在馆臣看来是“变体”,而顾清坚守“先民矩矱”,虽在当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却是真正的文章“正声”。黄淳耀《陶庵全集》提要中,馆臣评道“文章和平温厚,矩矱先民”³。黄淳耀的文章风格和平温厚,亦是因其“矩矱先民”,其文章风格意蕴有古作者之遗风。

馆臣对于学习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作者都持认可态度,而对刻意摹拟前人创作定式的做法,则大加批判。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称“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⁴,馆臣批评李梦阳的文章是故作艰深晦涩,以此遮盖其文章内容的浅显。何景明《大复集》提要中又说道“平心而论,摹拟蹊径,二人之所短略同”⁵,馆臣认为李、何二人文章短处,根本来说都是病在摹拟秦汉。在其他明人别集提要中,馆臣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如李舜臣《愚谷集》提要,馆臣说“然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⁶,康海《对山集》提要中说“然其逸气往来,翛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也”⁷。《荆川集》提要中,馆臣更是直接说道“故于秦汉之文,不似李梦阳之割剥字句,描摹面貌”⁸。“钩棘涂饰”“割剥秦汉”“割剥字句”“描摹面貌”,指向的都是一个弊病,即单纯从文章面貌上摹拟,而抛弃文章应有的精神内核。

对李梦阳等学习秦汉文章,只求摹拟文章外表,在涂饰字句上下功夫的做法,馆臣尤为不满。王慎中《遵岩集》提要,馆臣发议论道,“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⁹。馆臣并不否定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诗歌造诣,认为可自成一派。但文章则十分浅陋,一味地去摹拟秦汉文章的字句,只是抄袭到秦汉文章的外貌,却没有真正学到内在精华,最后只能是成为“伪体”。《具茨集》提要中,馆臣借王立道《论文书》说“‘兵无常形,以正胜者什九。文无常体,以奇善者什一。《盘》《诰》之文,则六经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犹未可为常,而况其万不类也哉。’其言深中当时北地诸人摹仿周、秦之弊”¹⁰。馆臣认为李梦阳诸人文章一味摹仿周秦,弊病即王立道所说“文无常体”“效而似者犹未可为常”。文章并非只有一种常法,文章摹拟到面貌相似更是不足为训。卢柟《螭螭集》提要中,馆臣特意点出其文章“绝不染钩棘涂饰之习”¹¹,方良永《方简肃文集》提要称“其文信笔挥洒,虽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钩棘,视后来摹拟涂饰之习,转为本色”¹²。也可知馆臣对钩棘章句、涂饰字词这种文章创作中的摹拟僵化习气深恶痛绝。

三、《总目》明集文章批评对文学史的意义

《总目》的明集文章批评,在“官学意识”影响下,将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判定为逐步衰退,何宗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古城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5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东江家藏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9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陶庵全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8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9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大复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3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愚谷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0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对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2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荆川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1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遵岩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0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具茨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3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螭螭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0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方简肃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8页。

美先生称之为“‘演退’的文学”¹。概而言之，馆臣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明季。明人文章创作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对明初文章整体风貌的定性，馆臣总结为“考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²，又说“一代开国之初应运而生者，其气象固终不侔也”³，《夏忠靖集》提要中更是称扬“洪永之际，作者如林”⁴。可见，馆臣对于明初文章及其创作群体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具体评价明初作家文章时，也多褒扬之词，如评宋濂“濂文雍容浑穆”“自中节度”⁵，刘基“其文阔深肃括”⁶，汪广洋“清刚典重”⁷，宋讷“文章亦浑厚醇雅”⁸，王祯“其文醇朴宏肆”⁹。“浑穆”“典重”“浑厚”“醇雅”等，皆将明初文章树为典型标榜。

至于明中期文章，馆臣则说“明自正统以后，正德以前，金华、青田流风渐远，而茶陵、震泽犹未奋兴。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¹⁰。馆臣于此划出一个时间界限，即明正统至正德，指出此期距明初已有一定距离，宋濂、刘基等人文章创作风格所具有的影响也渐渐消失。几十年间，文章沿袭台阁体，创作日渐僵化。馆臣在《怀麓堂集》提要中又说“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於庸肤”¹¹，《类博稿》提要说“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啾缓之音”¹²。“啾缓”在明朝纯为贬义，清承明代用之¹³。“庸肤”即庸俗常见，落入俗套，亦是针对台阁体之僵化泛滥而言。至于造成这种文章习气的原因，馆臣解释为“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啾缓冗沓，千篇一律”¹⁴，“然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¹⁵。一方面是对台阁体的不断摹拟沿袭，致使文章创作毫无新意生机，流于庸俗。另一方面，当时士大夫崇尚“心学”，学风空疏不实，文章亦然。在对此时期明人文章的评论中，依然不乏对明初的追思。如评李贤“然其时去明初未远，流风余韵尚有典型”¹⁶，柯潜“犹不失明初先正之风焉”¹⁷。对于文章的评价趋向明显转变，不像明初的大肆赞美，显得十分平常。如评岳正“其文章亦天真烂漫，落落自将”¹⁸，郑文康“文章亦不屑以修词为工，而质朴之中自中绳墨”¹⁹，柯潜“文亦峻整有法度”²⁰，黄仲昭“尚沿当日平实之格”²¹，谢迁“而所作诗文，大抵词旨和平”²²。“法度”“平实”“和平”等评语，与馆臣评明初文章之措辞，高下立判。

对于明季文章，馆臣评价最低。称“盖明之末造，太仓、历下馀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

1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三期，第8~9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9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陶学士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4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夏忠靖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1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2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诚意伯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3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凤池吟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3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西隐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4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王忠文公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4页。

1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襄毅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5页。

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怀麓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9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类博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6页。

13 何宗美：《台阁体审美范畴释论：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一期，第105页。

1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9页。

1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篁墩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2页。

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古穰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4页。

1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竹岩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6页。

1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类博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6页。

1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平桥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7页。

2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竹岩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6页。

2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未轩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3页。

2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归田稿》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4页。

敝，莫甚斯时”¹，公安、竟陵被馆臣视作明季文章衰退的代表。评公安派“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²。在馆臣看来，公安派的文章创作是自恃聪明，缺乏学问根柢。摹仿其文风者，更是卖弄小智慧，破坏文章法度，更为低下。对于竟陵派，馆臣则称“竟陵钟惺、谭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³。公安、竟陵在文章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被馆臣贬斥为尖新幽冷。由此，整个明末文章创作都被馆臣否定，一概被认定是“明末纤诡之习”⁴。在馆臣十分笼统的三段论下，明人文章创作只有明初可圈可点，之后便后继无人，终至明末衰落到了极点。但馆臣对明人文章的评价并非出于纯粹的文学审视，更大程度上是要符合其政治立场。对明末公安、竟陵派的评价，完全忽视他们的文学创新追求和创作价值，一味贬斥，有失公允。使得今人提起明末文章，提起竟陵派，最先想到的是“尖新”“纤诡”，形成了刻板印象。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价竟陵派说“他们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加明显”⁵。袁行霈主编的文学史，也称竟陵派将文学创作“引上了奇僻险怪，孤幽冷峭之路”⁶。随着今人对竟陵派文学进一步地研究，其并非如《总目》所谓不值一提。其中亦有“经世志意”，具有“实事”“理义”“深情”“识见”⁷，且“竟陵派诸子以高度的文学责任感与非凡的勇气，欲用自己的文学观与诗美理想去廓清晚明文坛的不正之风，不论其效果如何，都值得肯定与赞扬”⁸。

虽然馆臣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对明人文章的认知存在偏差，对后世文学史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不能因此全面否定《总目》明代文章批评的学术价值。《总目》重视道德人品的批评观念，以学术根柢及儒家学说评价明人文章的批评方式，提倡借鉴古人又不拘泥成规的创作观念，为我们理解清初对明代文学的接受与批驳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A Brief Criticism of the Ming Dynasty articles in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Yao Jianghao

Abstract: Although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is a bibliographic work, it actually elucidates the academic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the library officials in the form of synopsis.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 criticism of the references. As Ming Dynasty is a former dynasty, Ming articles are the remnants of the thought of the former dynasty. There are both acade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o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Ming Dynasty articles. Through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f the Ming dynasty articles in The General Catalog of the Four Librarie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critical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Si Ku Quan Shu Zong Mu*; Collection of Ming People; The article criticized; The academic thoughts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 栏目组稿：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学古绪言》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4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袁中郎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93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〇《妙远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00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高子遗书》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2页。

5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4页。

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7 师雅惠：《乱世文人的持守与展望：竟陵派的文章理论与创作》，《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二期，第145～152页。

8 杨森旺：《势有穷而必变——竟陵派对晚明文学的反思与重构》，《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三期，第26页。

心体 工夫 境界

——黔中王门孙应鳌知行说的三重向度

扈继增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知是良知本体，行是良知之用。在心体纯然的状态下，心与物接，良知自然发用为行，知与行本然合一。常人因气拘物蔽，其良知心体无法完全呈现，从而导致了知与行的分离。孙应鳌认为个体通过慎独、诚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归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实现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进而达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贯境界。孙应鳌对“知行并进”与“知行合一”作了区分。“知行并进”是在见闻之知向良知的转化过程上立说，“知行合一”则是在良知之体用上立说。“知行并进”中虽有良知之用，但中间夹杂“有我之私”，知与行仍分为二，二者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则是个体在克除私意后，实现的良知之体与良知之用的统一，是体与用的关系，其知行说的实质是体用论。

关键词：孙应鳌 知行合一 良知 体用 黔中王门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 (2020) 03-70-78

孙应鳌是黔中王门的主要代表之一。近年来，学者关于他的研究成果颇多，¹但对其知行说这一重要论题却鲜有专文讨论。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传统问题，从先秦至近代，相关探讨从未间断。孙应鳌继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作了进一步发展。本文从心体、工夫、境界三个向度对孙应鳌知行说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以孙应鳌为代表的黔中王门的研究，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一、心体：知行合一之必然

孙应鳌继承了王阳明以心为体、心外无理的基本观点，进而建立了具有黔中王门特色的心学思想体系。²概言之，孙应鳌认为天地万物之理与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为人心所本有，而心就是个体感通天地，与万物为一体的基础与枢纽。个体之所以能做到知行合一，正因为人心是包具万物、涵括众理，又能感通万有的关键。孙应鳌指出，人心之体就是良知，而良知无间古今，是人类共有共通的价值本体，是道德理性的源泉。他说：“盖此知，即我之心体，无间于古今，必好古敏求，则在古人的，就是在我的；知道是在

作者简介：扈继增，1982年生，山东沂水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黔中王门孙应鳌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5JD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张明、关春红：《黔中王门弟子孙应鳌研究综述》，《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五期。

2 参见扈继增：《工夫与境界——孙应鳌的心学之路》，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关春红：《本体与功夫——黔中王门孙应鳌心学思想研究》，贵州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明：《黔中王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探析——以〈四书近语〉为中心的研究》，《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五期。

我的，则好者好在我耳，求者求在我耳。”¹在孙应鳌看来，良知心体具有三个特性：第一、“心体正而已矣。心体之正，既不可堕于无，又不可滞于有。”²第二、“寂感人心也，……虽寂，而天下之故未尝不感；虽感，而本然之真未尝不寂……吾心之妙，万物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耳。”³第三、“知与不知，此心何等明白，是谓‘良知’。”⁴

除此之外，孙应鳌还进一步认为，心体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心体不滞有无，不偏动静，至中至正，虚灵不昧，具有自然感应万物、因物而显的能力。它能“‘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万物’‘知命’‘知昼夜’，……此知放而弥六合，卷而藏于密。”⁵另一方面，心体又拥有是非判断的能力。当心与物接，良知心体根据具体情境，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从而生发出仁、义、礼、智、敬、爱等具体的道德行为。孙应鳌正是以良知为知，以其感通万物时，所产生的结果为行，从良知之体与用的角度来说明知行合一的问题。

良知心体的应感能力是知行合一的前提，而其是非判断能力则是知行合于价值理性的基础。那么，要得出知行合一的结论，必然需要论证良知心体何以能感通天地万物。这就涉及到心物关系的问题。

孙应鳌说：“物之所在，就是知之所在；知之所在，就是意之所在；意之所在，就是心之所在。”“物者，知之统会也。”⁶物是心、意、知三者的“统会”。统会即三者共同的落实之处。一方面，心、意、知三者必然通过物得以体现，否则心、意、知便成为悬空虚寂的东西；另一方面，物也因走入心、意、知的世界，而彰显其意义。由此，心、意、知、物四者打成一片，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具体落实到“物”的问题上，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客观实在之物；二是物即事。以下展开论述：

首先，客观实在之物。从客观实在物的角度来看，当客观实在物在进入人的视野后，它便与心体发生感应，成为观察者的心内之物及其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之前客观实在物的称谓，物成为了与人的意义世界产生关系的“人一物”之“事”。另一方面，人的价值与意义总是彰显于与物沟通的事件中。就这一角度而言，人的存在本身便是“物”（或“事”）的存在。⁷如阳明之“南镇看花”便是一例。此点可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说明。海德格尔说：“只有当此在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理解在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性存在，才有存在。”“这个存在者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你未看此花时”，南镇之花只是“事实性”的在者，并未从隐蔽状态进入光明状态，其自身未显示出来。而此在的敞开亦须面向存在，所以“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会同归于寂”，作为在者的花与作为此在的人相对于彼此都处于隐蔽中。“你来看此花时”，“花”成为“上手之物”，是“实际性”的在者，在与此在交往之中，它将自己带入光明之处，显示出自身。此在与“花”由此构成了“因缘关系”的整体，所以“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其次，物即事。在中国哲学中，“物”可训为“事”。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格，至也。物，犹事也。”⁸《传习录》记徐爱与阳明问答，亦解“物”为“事”：“‘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

1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2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3 孙应鳌：《淮海易谈》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4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三，《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5 孙应鳌：《淮海易谈》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4页。

6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7 正如杨国荣先生在《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所说：“‘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参见杨国荣：《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哲学研究》2018年第五期，第47页。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¹ 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亦有“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之说。《传习录》又记：“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² 由此可见，在格物的语境中，训“物”为“事”是宋明理学的普遍共识。由阳明答徐爱之问，亦可见“物”乃是个体之意所到之处。

进而言之，每个个体的世界均以其意所及之处为全部内容。个体之意及意之所及的客观实在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事”之世界。天地万物，古往今来，凡是进入个体视域中的事件及客观实在物，无不包含于这一整体世界之中。孙应鳌又说：“意者，心之发动也……知者，意之明觉也。”³ “知，即吾心之良知。”⁴ 意为心之所发，良知为其“明觉”；而个体世界又建立于意的基础上。作为意之“明觉”的良知，拥有感通古今天地万物的能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此强调一下，孙应鳌认为良知心体有三个特性：一、至中至正，不堕有无；二、至虚至灵，随感而应；三、知与不知，何等明白。因良知至中至正，不滞有无，又虚灵不昧，一旦心中出现一事，必然会得良知的回应。又因良知至善至美，包仁含义，其自身既是德性的源泉，又是德性的发用者，故其每一种回应，都合乎道德原则。良知是体是知，其对物回应是用是行。因此，知与行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良知主导的个体之“事”世界中，知行合一，是必然的合一、本然的合一。

二、工夫：知行合一的隔绝与回归

（一）知行合一的隔绝

对常人而言，以良知为主导的“事”世界并非现成。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常常处于知行两离的状态。在孙应鳌看来，知行分离源于人的“血气之私”。“血气”是“人之所以同于禽兽”的原因，它是个体欲望的来源，这就造成了知行合一的隔绝。

与宋明理学的主要观点一致，孙应鳌认为气有正气与血气之分。孔子等圣人是“正气用事，无一毫血气”；常人之好色、好斗、好得，“皆出于血气之私”⁵。个体的本然状态应与天理相应，但血气使人的存在常以自我为中心，致使人欲日彰，天理日黯：“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为心者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浑是一团天理，便浑然与物同体，有何私欲？但人为气拘物蔽，不见与物同体之本，然只从自家躯壳起念，然后有私欲。有了一分人欲，便没了一分天理；去得一分人欲，便全得一分天理。私欲者，我也。有我之私，即己也。”⁶

血气与物欲之蔽，使常人的“事”世界总是伴随着“有我之私”，无法表现为以良知主宰的知行合一的世界。“没了一分天理”，良知对个体之“事”世界的主导能力便减了一分。由于在心所发的意中，夹杂着良知与“有我之私”，当一件事（或“物”）中“有我之私”遮蔽良知时，知行必然是分离的。

孙应鳌又说：“凡人不能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只因失此真知。”⁷ “盖人之妄有所作者，以其无真知也。知行一理，惟有真知，而后可作；苟不知而作，是外知以为行。”⁸ “一者，吾心之天则也。……此天则，在视为明，在听为聪，在貌色为温恭，在言行为忠敬，惟失此天则而不能思，视听便不聪明，貌色便不温恭，言行便不忠敬。”⁹ “失此真知”是说良知被遮蔽的状态，并非说良知消亡。个体的种种现

1 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2 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3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

4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5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6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7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8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9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实之行根据具体的情境作出合乎德性的反应，是其应然的状态。视听聪明、貌色温恭、言行忠敬是知行合一本来的样子。但是因为“真知”（即良知）的隐退，导致了“妄有所作”“不能思”“不聪明”“不温恭”“不忠敬”等种种行为，知与行的分离由此产生。

（二）诚意慎独工夫

既然从本然来看，人人都是知行合一的，而现实世界中知行又常分离，那么，个体应如何回归到知行合一的世界中呢？在个体之“意”所主宰的“事”世界中，“意”的主人是“有我之私”还是良知，是知行能否合一的关键。因此，要回到知行合一的本原状态，必然要在“意”上下工夫。于是，孙应鳌提出慎独、诚意的解决方案：“‘知行合一’便是‘慎独’，‘慎独’便是‘知行合一’”¹；“自欺、自谦，只在自己意上用功。曰‘独’者，示人下手用功处也。盖意者，心之所发，正是独知之地，所谓几也”²；“故知行合一，而慎独之功尽，便无时无处不与此道合一”³。“意”是慎独、诚意工夫的实落手处，是回归知行合一的关键。

那么“意”的层次和构成是如何的呢？孙应鳌说：“然修身必先正心；心者，身之主宰也。正心必先诚意；意者，心之发动也。诚意必先致知；知者，意之明觉也。致知必先格物；物者，知之统会也。……意者，好恶而已。心之忿懣、恐惧、好乐、忧患，身之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惰，家之仁让、贪戾而行于国，国之好善、恶恶而达于天下，皆不外好恶而已。好恶之心之发而为意也。”⁴这表明“意”有三个层次：

第一，“意者，心之发动也”。由于心体有应感的功能，当心与物接时，便产生“意”。物既可指现实中的实在之事或物，也可指人思维意识中的想象之事或物。第二，“知者，意之明觉也”。此处之知指显发为拥有道德理性的良知。第三，“意者，好恶而已”。意包含有好恶之情。这种好恶之情可善可恶，是良知与私欲在个体情态上的表现。当良知呈现时，表现为“仁让”等正向的情感，此时好恶之情得其正。当私欲遮蔽良知时，则表现为“贪戾”等负面的情感，好恶之情不得其正。

由此可见，孙应鳌所说之“意”在三个层次之外还拥有四层结构：第一层为认知意识。它是当事或物进入人的视域时，心自然产生的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个体内心的投影，无是无非。第二层为情感意识，表现为好恶之情。好恶之情正与不正，由良知是否呈显并起支配作用而定。第三层为个体成见，或说有我之私。成见是个体长久以来形成的惯常思维，包含孔子所绝之“意”“必”“固”“我”⁵等，可统称为私欲。⁶私欲处于即静即动的状态，一涉及物便发动为好恶之情。第四层为良知。与私欲相似，良知亦有即静即动两种相状，在涉及物时亦可发动为好恶之情。孙应鳌说：“知者，意之明觉也。”此句可解为良知是明觉的意或是意的明觉之处。处于发用状态的良知都包含于意的范畴之中。在这四层结构中，第三、四层的私欲与良知均通过第二层的情感意识得以显发。细以绎之，情感意识常常分作两层。一层由私欲支配，一层由良知支配。私欲作主时，表现为不正的情感。此刻良知虽隐而不彰，但仍潜藏着对不正之情的照察和排拒。此时之情感意识应作两层看。只有当私欲克尽，情感完全由良知支配时，才成为一层纯粹的至善之情。由此，第二层的情感意识是第一、三、四层意识的枢纽。一种认知意识产生后，自然伴随有相应的情态表现。情态表现正之与否，则由第三、四层的私欲与良知决定。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良知与私欲都处于即静即动，随物而显的状态，但是相对于私欲，良知更具有终极性。它同时具备照察、判断、肯定与纠正四种能力。这四种能力的针对对象包含了意之结构的前三个层面。就良知自证自明的特征而言，这四种能力甚至可针对意的所有方面。孙应鳌曰：“虑，即此知之照

1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2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3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4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

5 《论语·子罕第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6 《孙应鳌文集·四书近语》：“而我无所与，便是心得其正；一涉有所，则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心，非天理之本然矣。”

察”¹。“照察”是对认知意识与情感意识的观察。从这一功能来说，如果将整个“意”世界比喻为一座房子，那么良知就是四面墙上的镜子。房子中物品或显或失，无不一一显示于镜子之中。“意”世界的每一个念头出现、消失及其相状，良知无不知道。孙应鳌亦曾以“明镜蓄照”比喻良知之动静。其次，良知具有知是知非的判断能力。孙应鳌说道：“是非，是人心本然之公。”²“大人无所不知，只是不失了当初赤子一点不虑而知之良知。”³知是知非是工夫论的前提。是非不明，则无所谓好善恶恶。再次，基于知是知非的判断能力，良知对情感意识拥有或肯定或纠正的能力。李景林师在《论人性本善及其自我捍卫机制》中，将孟子“羞恶之心”之“恶”解为所羞之对象（读为è）。文中说道：“此‘羞恶之心’对于引导反思本心、捍卫人心之善性、践行道德以达德性之实现，具有重要的工夫论意义。如果说‘四端’之‘不忍恻隐之心’表现了人心对善的肯定性一面，那么‘羞恶之心’或羞耻心则表现了人心对非性之恶的排拒与否定性一面。”⁴“不忍恻隐”是为良知所显发的情感意识，良知对其自然是肯定的。“羞恶之心”所羞所恶之对象，是私欲的呈现，良知对其存在天然的拒斥与否定。良知之照察、判断、肯定与纠正四种能力在发用时，一齐俱发，并无先后之分。照察与判断是知，肯定与纠正则是行。如“知好色恶臭”是照察与判断，“好好色”与“恶恶臭”则是肯定与纠正。就此而言，良知自身之知、行本来也是合一的。它们只是良知发用时的不同侧面而已。

在“意”的四层结构中，认知意识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私欲作为支配层，只有通过情感意识才显露出来。那么，要进行慎独、诚意的工夫，其下手处便在情感意识。良知之照察、判断、肯定与纠正的四种能力，又为慎独、诚意工夫提供了可能性。可见，慎独、诚意是以情感意识为对象，以良知发用为手段的工夫系统。那么，慎独、诚意工夫又是如何在情感意识层展开的呢？

孙应鳌说：“所谓中也，此吾心之真机也。吾心之真机，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君子戒慎恐惧，非有加于此真几（据原书点校者考证应为“机”字），只是顺此真机，直养无害，使独知之地，惺惺不昧。”⁵又说：

其机则在审理欲之几而慎独，使此心主一于理而无他适耳。此心不主一于理而人欲得以干之，则视、听时，仁就违于视、听；言、动时，仁就违于言、动。己何由克、礼何由复？此心能主一理而欲不得以干之，则未尝不视、听而视、听皆理，未尝不言、动而言、动皆理，己就此克，礼就此复。要紧工夫全在一“勿”字上。勿者，审理欲之几而时时慎独，使心主一于理，而无他适也，故“勿”之，即克之也。……“勿”之，即克之。可见“克”与“复”非二事。“克己”，即所以“复礼”也。“勿”之，只是审理欲之几而时时慎独，使此心主一于理而无他适。可见礼与仁非二道，复礼即为仁也。⁶

区别于朱熹，在慎独的问题上，孙应鳌继承了阳明视“独知之地”为良知的看法。上文中“所谓中也，此吾心之真机”即是不堕动静有无的心体，即良知。通过上述两段文字，孙应鳌对于慎独工夫作了具体说明：一、“顺此真机，直养无害，使独知之地，惺惺不昧”，即使良知始终处于清醒灵明的状态，物来顺应，随机而发。二、“审理欲之几而慎独”，说明慎独的时机，在意识将萌未萌的隐微之时。三、“使此心主一于理而无他适耳”，即使良知作为“意”之主宰，不给私欲乘虚而入的机会。四、“‘勿’之，即克之。可见‘克’与‘复’非二事。”克治工夫与致良知其实是一件事。在慎独问题上，孙应鳌更为强调良知主宰，由内向外的修养方式。当良知作为情感意识的主宰时，必然会排拒、克治由私欲支配的

1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2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3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六，《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4 李景林、马晓慧：《论人性本善及其自我捍卫机制》，《哲学动态》2018年第一期，第43页。

5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6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情感意识。另一方面，随着克治工夫的进行，良知会得到进一步长养，即“去得一分人欲，便全得一分天理”。省察克治就是存养之功，存养必然意味着省察克治的工夫。因此，孙应鳌说：“慎独，则存养省察，一时并妙，非先省察而后存养也。”

（三）知行合一的回归

孙应鳌由内向外的工夫论特点，决定了良知在工夫修养中的首要地位。无论是“顺吾心之真机”还是“此心主于一理”，都是以良知为基础。没有良知，慎独、诚意工夫便成为没有支柱与落脚点的空中楼阁，缺乏了实施的依据。于是，孙应鳌提出了由“闻见之知”向“德性之真知”转化的解决方案以扩充良知。他说：“然知有二：有德性之至，不由闻见而有，而闻见莫非德性之用，生知者也，上也；有学问之知，由多闻多见以求知，而闻见所会理明心，得德性之真知，因以不昧，学知之者，次也。”¹生而知之者是圣人，姑不在讨论之列。常人则须通过多闻多见的过程中，体会思索以明白道理。这个道理只是个闻见之知。只有当“所会理明心，得德性之真知”，才能实现由见闻之知向良知的转化。

那么，如何获得见闻之知，又如何使见闻之知所会之理明心呢？孙应鳌说道：“‘知之’‘好之’‘乐之’，要看得‘知’字重。程子曰：‘学必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明诸心。知所往，知也；力行，好也；求至而至之不去，乐也。盖圣学，惟在于致知。好，则知之切实，而他道不惑；乐，则知之浑融，而与道为一。能好，则其知也，不涉于拟议；能乐，则其知也，不滞于形迹，皆非有外于此心之真知也。了得此，知圣学无有余蕴。”²为便于分析这段材料，可将其主要内容列于下表：

知所往	知也		拟议之知
力行	好也	知之切实，他道不惑； 其知不涉于拟议。	见闻之知
求至而至之不去	乐也	知之浑融，与道为一； 其知不滞于形迹，非有外于此心之真知。	良知

孙应鳌将“知”分为拟议之知、见闻之知与良知，三者是递进转化的关系。拟议之知是事先的思考，虽然对行动具有指导意义，但并未验之于实践，尚停留于理论阶段。通过力行，拟议之知转化为切实的见闻之知。见闻之知是在实践中体会到的直接经验，其中融入了个体真切的情感体验，触碰到个体的内心世界，拥有了转化为良知的可能性。但是见闻之知有可能退转，它只有再经过“求至而至之不去”的固执工夫，才能完成向良知的转化，成为个体德性之心的一部分。在转化过程中，一方面，知先行后，“然其实落用功，必是未行之先，而忠信笃敬之实理念念念不忘”³；另一方面，知与行又相互为用、相互促进：“学问、思辨此行，不害其为先；笃行此学问、思辨，不害其为后。是知、行虽若有二功，而实无二理。学问、思辨既真，则笃行并切；笃行既至，则学问、思辨益至。是知、行虽若为二事，而实无二功。”⁴力行在学问思辨（知）中愈加笃切，学问思辨（知）在力行中愈加明白。在知与行互动的过程中，拟议之知转化为见闻之知，再一进而为良知，最终实现了知与行的合一，即孙应鳌所谓：“知者，知此耳；仁者，行此耳；勇者，强此耳。知、强，此仁耳，一也。知、仁、勇，同功并进，便是知行合一。”⁵

孙应鳌又说：“由择善固执之学，以造于明善、诚身之地，是由知行之并进，以造于知行之合一。可以见慎独之全功矣。”⁶不难看出，“知行并进”是在由见闻之知向良知转变的过程上来立说，“知行合

1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2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四，《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3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4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0页。

5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6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一”则是在良知发用上说。在前者，知行中虽有良知之用，但其中仍混有“有我之私”，尚有“意、必、固、我”的成见，因此，知与行还分作两个。在后者，知与行纯粹为良知之体与用，二者合而为一。历来关于知行问题的探讨，纷扰不清，歧见层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将转化过程中的“知行并进”与良知之体用的“知行合一”混淆所致。

综上所述，第一、知行合一是良知呈现后的必然结果，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第二、通过慎独的工夫可实现良知呈现，慎独工夫的实下手处在情感意识将萌未萌之时；第三、慎独工夫须主于良知，这又需在知行并进中扩充良知，为慎独工夫提供基础。这里有三点需要申明：一是良知扩充只是良知呈现的条件。因此，才有由知行并进到良知扩充到慎独，再到良知呈现的逻辑。二是知行并进与慎独非先后关系，在知与行中自有慎独在。三是一念诚明时，良知当下呈现，即刻就实现了知行合一。念念诚明时，良知永恒呈现，方可实现恒久的知行合一，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之境。

三、境界：知行合一与一贯之境

在孙应鳌看来，经过慎独、诚意的工夫历程，有我之私被一扫而光，意、必、固、我等对自我主体性的执着被一一打破，个体之心处于绝对的虚灵之状。这正是庄子所说的“撝宁”之境。庄子说：“撝宁也者，撝而后成者也。”¹在此种境界中，个体虽然处于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中，但其心体始终处于自作主宰的虚静之状，它完全从有我之私的物役困境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其本然之状，达到了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一致，放失的本心再一次被寻回。²

正因为本心是虚静的，不为人欲所扰，良知方得以处于完全的澄明之境，才能随感而应，随物流行。当个体与外物交感时，良知之体自然地发用，呈现为行。此时之知与行无非是良知的一体两面。就其体而言是知，就其用而言是行，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合一关系。知行合一不仅体现为某种行为样式，同时也体现着一种极高的心灵境界。

在知行合一的状态中，无论是意识层面之“动行”动机（motives）³，或是行为层面之实践，无不与良知相应，知与行是绝对的统一。⁴此时，个体之是非情感、所作所为“发而中节”，“当仁而仁，当知而知，当信直而信直，当勇刚而勇刚，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皆中和礼乐之美矣”⁵。“曾子‘三省’，看‘省’字何等用功！密切吾人心体，在处人则为忠，在处友则为信，在事师则为习”⁶。仁、知、忠、习、信直、勇刚及中和礼乐之美，是良知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是知行合一在当下情境中的表

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7页。

2 《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3 刘悦笛先生在《从“一念发动处”解王阳明“知行合一”——兼论“意动”与“动行”的道德动机分殊》一文中根据耶西·普林茨（J.Prinz）对情感“知觉理论”的研究，将“动机”分为“意动”动机（motivations）与“动行”动机（motives），前者为“驱使行为的意向”，后者为“驱动行为的意图”。“意动”动机是倾向感性的，“使人们做出行动的意向或性情”；“动行”动机则是“更理性化地给予我们行为的理由（reason）”。刘先生认为：“王阳明驱动‘知行合一’的‘一念之动’，其实就是‘动行’的动机，而非‘意动’的动机，因为这种本土化的道德动机本身就是诉诸于‘行’了。”（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十一期，第46页）孙应鳌在探讨“知行合一”问题时，亦经常引阳明“好好色”“恶恶臭”之例。讨论孙应鳌的知行观，无法脱离对“行”的范畴界定。刘文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很有启发。

4 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阴阳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Yin and Yang—A contemporary Apprach）一书中，将阴引申为“接受性”，将阳引申为“决断性”，并以此来解释道德、行动及心智哲学。他认为：“一个人在认知上是理性的，一个人是基于伦理上的理由而行动的，一个人的心智是真正在发挥功能的——的场合，就必定存在阴与阳。”（〔美〕迈克尔·斯洛特著，汪江伟、牛纪凤译：《阴阳的哲学——一种当代的路径》，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63、465页）“伦理学、认识论和心智哲学都体现出同样一种套装式的、两级的阴/阳结构。”（〔美〕迈克尔·斯洛特著，汪江伟、牛纪凤译：《阴阳的哲学——一种当代的路径》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15页）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可将知行合一作“两级”的分析：在意识层面的“知好色恶臭”是对周围情境“接受性”的阴，“好好色恶臭”则是“决断性”的阳。而意识层面的良知之知与现实层面的行为之行，又构成了一级阴/阳结构。另外，斯洛特认为阴/阳所描述的是两个“彼此不可分割的部分”。用“不可分割”来描述知行的“合一”是十分准确的。

5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6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三，《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现。曾子之“三省”功夫，便是慎独诚意之功。通过这样不间断的功夫历程，个体才能在千变万化的事实情境中，自然地将价值与行为统一起来，实现时时刻刻的知行合一。因此，孙应鳌说：“心学工夫全在致知。心之本体，知而已矣。定，即此知之专一；静，即此知之凝聚；安，即此知之顺适；虑，即此知之照察；得，则人已、内外、本末、始终一以贯之，相因之功，一齐俱妙，无等级也。”¹

另一方面，知行合一的原则不仅表现于个人事务的处理中，同时也可以推扩至公共事务的解决中。孙应鳌说道：“大舜知矣，好问好察，惟在其用中于民。可见知者，知其所行耳。行之真切处，便是知也。……知之笃实处，便是行也，一也，知行合一之理。”²《论语·尧曰》中记道：“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³朱熹释“中”为：“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中”是自然而然的处事原则。当心完全不受制于私欲的情况下，个体之行为必然能无过无不及，始终合于中道。舜之所以能成功地处理国家事务，是由于他能够始终将体现着知行合一价值原则的中道用之于民。

可见，通过慎独诚意工夫，心体回转至虚灵之境，良知可自然发用于个体所面临的种种情境。它既可发用于个人事务的处理中，也可作用于公共事务的应对中，在个体所经历的“事”世界中，无不透显着知行合一的价值原则与境界。孔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对以知行合一的原则来构建个体“事”世界的极好表达。《中庸》说道：“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朱熹释此句作：“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⁴“时措之宜”是中庸之道的极致，其前提在于“诚”的功夫。“诚所以成己”，即通过“诚”的功夫发明自己的本心，重新回到自作主宰的本然样态。如此，在与外物的交通过程中，“道亦行于彼矣”。朱熹在此处所说的“存”“发”“皆吾性之固有”，恰恰证明了前文关于知行是良知一体两面的判断。在“合外内之道”的境界中，君子“时中”的中庸之道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显发，知行合一的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个体面对的不仅是人文世界，还包含虫鱼鸟兽、山河大地的自然宇宙。在良知澄明、心体虚静的境界中，个体不再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个体对天地宇宙的固有成见被彻底廓清，天地万物以其自然本有的相状呈现于“我”的世界中。在这里，个体与他者的隔阂被一齐堪破，无物无我，天地万物一齐贯穿，万物之性自由显发，无处不焕发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勃勃生机。在物各付物、各是其是的美好与和谐中，人我、物我实现了完满的统一。知行成为个体与天地万物贯通为一的纽带。当与物接时，心体只是一个“顺应之常”，良知所发之行，流被于物，“为而不滞，应而不差”⁵。在知与行的合一中，个体与天地万物互通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如孙应鳌所说：“若圣人之时中，则不滞于物，不私于己，明体达用，各当其可，然后为一以贯万而能合道也。”⁶这便是孙应鳌所称述的天人合一的“一贯”之境。

四、结语

孙应鳌的知行说与心物观、工夫论是一个统一整体。首先，心物的统一性是知行合一的基础。无论是客观实在物，还是“事”之“物”，都因人（此在）的参与而敞开其自身。物必然是人心之物。这就使得作为心体的良知具有了感应、主导并作用于万物的可能性。良知又具有中正不偏的特点和是非判断的能力，这为个体之行合于道德理性之知，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其次，孙应鳌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由于血

1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一，《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2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二，《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页。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页。

5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6 孙应鳌：《四书近语》卷六，《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气、物欲对良知的遮蔽，导致了知与行的分离。只有通过慎独诚意工夫，人才能回转到知行合一的本然之状。由于个体世界是一个由其意所主导的“事”世界，所以慎独诚意工夫须在意上下工夫。“意”具有认知意识、情感意识、有我之私（私意）及良知四层结构。认知意识无所谓善恶，情感意识是良知或私意的表现。良知或私意对情感意识具有支配作用。“意”的主人是良知还是私意，决定了其表现出来的情感意识与行为的正与不正。当良知为主时，情感意识与行为各得其正，呈现出知行合一的状态，否则便知行分离。相对于私意，良知更具有终极性，它具有察照、判断、肯定与纠正的能力。它是慎独与诚意工夫的依据。而在慎独诚意工夫中又伴随着良知的长养。因为良知的存在，慎独诚意才具备了克除私意的可能性；慎独诚意对私意的克除，反过来又促进了良知的葆任。此外，孙应鳌还提出通过拟议之知向见闻之知，见闻之知向良知转化以扩充良知的方案。在这两级转化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知行的互动。知行在并进的互动过程中最终实现了合一。知行并进是在见闻之知向良知转化的过程上立说，知行合一则是在良知发用上讲。值得指出的是，知行并进之所以会发生，恰由于良知的作用。所以知行并进的过程，本身也是良知发用的过程。就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可将知行并进看作行，良知看作知，这两者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结构。通过不断的慎独诚意工夫，“有我之私”被一扫而光，人回转到他本来的样子，良知不再被遮蔽，个体之视、听、言、动无不是良知的发用呈显，知行达到了完满的合一。人心所涵遍的宇宙因之与个体形成了无隔阂、无偏矫的一体之境。通过知行合一，个体最终实现了物我的合一、天人的合一。

Heart-mind, Practice and Realm

—Three dimensions of Sun Ying' ao's theor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Hu Jizeng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Sun Ying' ao's theory of innate-heart knowledge and action is the theory of Ti (conceptual body) and Yong (conceptual function). The innate knowledge is the conscience, and the action is the function of conscience. In the pure state of heart-mind, when the heart-mind is on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onscience manifests as its action. Meanwhile, the action is consistent with innate knowledge, as ordinary men are restricted by Qi and desires, their conscience cannot be presented on some occasion, which consequentially leads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 innate knowledge and their actions. Sun Ying' ao believes that if one constantly reflects on his inner heart and behaviors, he would return to the natural state of unit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realizing the unity of natural state and actual state, then human being can become one with the whole world. Furthermore, Sun Ying' ao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nit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the situation that innate knowledge advances along with action. The statement of the situation that innate knowledge advances along with action, which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knowledge to conscience, whil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refers to conscience' s Ti (conceptual body) and Yong (conceptual function). Although there i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cience at the situation that innate knowledge advances along with action, but there are human desires at the same time. Inner knowledge is to action while moral principle is to moral practice, which are two independent domains. Relatively, the unit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refers to the consistent unity of conscience' s Ti(conceptual body) and its Yong(conceptual function) without personal desires, which is what Ti(conceptual body) is to Yong(conceptual function).

Key words: Sun Ying' ao; the unit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innate knowledge; Ti-Yong; Wang Yangming' s school in Guizhou

责任编辑：张 明

从东京到兴义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述略

汤 涛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 要：王伯群是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著名教育家。他的日记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地理和生活等史料价值。本文以王伯群撰《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稿本中关于二十世纪初的中日交通工具、货币支付、地理风物和沿途社情等记述为考察对象，力图描摹他不畏路途艰险、寻求真理、热爱桑梓、怀抱读书强国的坚韧信念和高蹈梦想。这段独特的回国返乡经历，为王伯群日后以强盛中国交通和教育为志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非常值得史家的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王伯群日记 返国省亲 日本留学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79-86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原名王文选，小名震章，自号云崇山人等。曾组织参与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府委员（常务），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交通大学校长，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并担任董事长兼校长。他毕生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交通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

二十世纪之初，王伯群痛感国势日益衰弱，受维新思潮影响，萌发实业救国的愿望。1905年他以贵州惟一习经济学科的官费生¹，浮槎东渡，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留学期间，王伯群曾于1908年7月告假回国探亲，这段经历在其撰《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以下简称《自记》）稿本中有记载。《自记》为王伯群1908年1月1日至9月25日之日记，计八十页，主要记述他在日本留学及告假归国探亲的经历。《自记》采用西历记时，同时标明中历，如“正月初一，即中历冬月廿八日也”。由于年代久远及白棉纸薄劣，日记有些字迹漫漶不清。日本东京距贵州兴义数千公里，在清朝末年，回到复岭四塞、关山迢递的家乡，王伯群是如何漂洋过海，走进重峦叠嶂的“天末”边邑？他主要乘坐哪些交通工具，用什么货币支付差旅费？路途经过哪些城市和乡镇，见到哪些风物人情？遭逢哪些艰难险阻？本文以王伯群所撰《自记》稿本为中心进行梳理，参酌其他史料文献，力图描摹和重现他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境下，从日本东京转乘各种交通工具，历经六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回兴义省亲，从而再现一位好学的西南山区青年勿忘初心、寻求真理、热爱桑梓、怀抱读书强国的坚韧信念和高蹈梦想。

作者简介：汤涛，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人物与思想、大学史等。

1 1905年，贵州共选送一百五十一人去日本留学。其中上半年，习专门学科者：监生周步英、李桢、王文选……等共二十二名。参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

一、日本东京至湖南常德

1908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中央大学留学的王伯群做了个怪梦。梦中他收到胞弟王文华¹来函,谓母亲去世。事亲尤孝的王伯群“读后甚悲切,不禁直痛而醒”。他反思曰:“母体素弱,余不得亲侍膝下,反教母以两重之累,是不能安。”²于是,他致函贵州兴义团营管带的大舅刘显世,禀告“今年夏秋间拟归省一次”³。接此消息,大舅马上代母亲转寄“百馀金作归国川资”⁴。

1908年上学期一结束,王伯群就跟中国驻日使馆告假。根据母亲叮嘱,此次回国是要完成婚姻大事,故他以“母病”为藉由,以便延长假期⁵。7月24日,王伯群与黔籍同学符经甫、赵显彬、蹇先渠、胡麟生、刘治民、朱学曾等行告别礼后,由东京启程,经神户赴长崎。东京与长崎两地相距一千三百余公里,王伯群前后花费四天。是日晨,王伯群由东京赵方首途到新桥车站,登二等火车(最急者)夜抵神户,住一天一元(含食宿)的同和客栈,请店方代购从神户开往上海的船票,“去金十二元”。神户是中国留学生离船换乘的中转站,“清国留学生”从1902年的二百几十名到1905年的一万人左右⁶,无数留学生海上劳顿之后,自此登陆,乘上直达横滨或东京的火车。第二天上午九时,客轮从神户码头开行。七月的濑户内海,风平浪静,但由于坐的是三等舱,人多物杂,空气比较污浊,食物令人难于下咽。他记述道:

惟乘三等人之多,臭鼻之气不可言状。饮食亦恶劣,不可进。然每餐加五十钱,则特别买得洋食。⁷

7月27日上午八时,王伯群顺利到达长崎。在午餐时,他见中国居留民之浪费腐败现象,心里大为不快。“见中国居留民腐败,不禁为之痛,危恐惊祸之不遇,而彼等仍泰然自得,其可悯也。”⁸下午四时,王伯群乘坐的轮船驶离长崎,劈风斩浪驶往上海。

长崎至上海,有八百多公里海路。王伯群从小生活在山区,三年前首次东渡日本,确实让他体会到晕船的痛苦。虽然有多次长途航海的经验,但此时的王伯群还是感觉终日为船所困,“头昏眼花,终至呕吐,精神大困”。经过两天的海上起伏颠簸,7月29日上午,轮船安抵上海吴淞口岸。下船时,他发现检验检疫的都为西人,而非中国人。

这是王伯群第二次路过上海。第一次是三年前的秋天,他从吴淞码头转船去日本。上海作为长江运输大动脉上的重要节点,成为近代日本留学生运动最大的集散地,对于从内地出来的乡镇秀才们来说,上海完美地映现了外面的世界。有留学生描述所见所感:“上海洋场十里,崇楼杰阁,排云而立。自来火光彻霄汉,几疑不在人间。”⁹

王伯群刚在客栈安顿下来,在中国公学就读的吴维初、蒋芷泽两位同乡就前来探访。好友相见,不禁“感喜交作,以至涕泪”。留日三年,别离少年同学,今日他乡相见,不禁感慨万千。“是夜,天气固热极,然亦因所感,而至于夜不成寐也”¹⁰,他们互谈近状,述游史,并及东京留学同乡之概况。沪上的繁

1 王文华(1888—1921),字电轮,号果严,贵州兴义人。1911年任兴义高等小学堂堂长。1915年任黔军总司令,发起护国运动。1920年任孙中山广州政府军委常委。1921年在上海遭暗杀。1930年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2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2月2日。

3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2月3日。

4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4月24日。

5 根据《游学生请假规则》,请假分两种:一是通常请假,即于学堂暑假期内而请假回国者;二是特别请假,即遇有父母死亡或病重时而请假回国者。后一种可延长假期。参见梁中美:《晚清民国时期贵州留日学生与贵州近代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6 严安生著,陈言译:《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8页。

7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7月25日。

8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7月27日。

9 李劫人:《暴风雨前》,载《李劫人选集》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10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7月29日。

荣与繁华给王伯群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此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伯群从日本归国，首选之地就是上海，投奔在章太炎创办的《大共和日报》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致力于民主共和的鼓与呼。1919年他代表孙中山南方政府参与南北和议¹，也是在上海。后来，王伯群把整个家族从贵州迁居到上海，1921年妹夫何应钦在昆明遭遇刺杀后，东潜到王伯群的上海家中继续养伤赋闲。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著名的大夏大学。

候船期间，王伯群多次赴上海豫园观览和购物。8月2日凌晨一时，他登上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大通丸”轮船，溯长江西上，朝汉口进发。在这一千二百公里的水路上，先后经过江阴、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穴、黄州，于五天之后的8月5日下午抵达汉口。王伯群沿途记下他的所见所闻，譬如船过南京，寥寥几笔，描写南京的荒凉景象：

晨一时起，三时抵南京，五时尚停于此地。京城之旷而荒，大有零落景况，宜乎洪杨之不见也。²

可能是攻读经济学的原因，王伯群对财务和数字甚是敏感。他记叙由上海至汉口被英商轮船公司欺蒙之经历：

此次由上海至汉搭房仓，每人去轮费二元五角。长江三公司轮船习惯不良，长悬作欺广告，如房仓通常二元左右及可搭，而船上所标广告则系六元。若稍为外行或稍不留意则受亏方大。此次因先宿泰安栈后，写船事亦托之，仍去二元五角，难免不吃亏。³

王伯群抵达汉口后，前后逗留了五天，主要是代购、游览和等船。归国前，王伯群曾接大舅刘显世函，“言小舅父之病情，托买海狗肾”和“托买绒线寿屏”⁴。两样东西在上海购买不得，故在汉口下船后，他即赴商场“问许多药店，访海狗肾皆不获”。长旅途行虽然辛劳，但可饱览山川美景，领略异地风土人情，增知长识。故每到一处，只要时间允许，王伯群都会选择当地著名景点观光，譬如8月7日下午，游武昌黄鹤楼。购买从武汉到常德或长沙船票，王伯群跑了好几个窗口，终于买到开往长沙轮船，花费“五元八角”。临走前，王伯群与亲戚贵慕翁结算余账，他敏感地记下了当时各地银元汇兑情况：

湖北估宝每百金换得银元一百四十一元六角，故为余汇五十元，交东京恒德，去汇水五角，合计为五十元五角；又面交余九十一元二角，合恒德数及汇水共为一百四十一元七角，应作估宝银一百金。⁵

汉口经长沙到常德，水路合六百多公里。王伯群前后跋涉了四天。8月10日下午由汉口登船，同行的吴维初前来送行，然后由汉口写房仓返沪，“去款一元七角”。朋友离开，上船独坐，王伯群颇感苦闷。是夜风清月朗，又值秋祭之期，他顿生怀乡思亲之情，“为人子者，生不能孝，死不能祭而藏之海涯，故不凄凉也”⁶。在溯长江的航船上，王伯群特别书写稟母亲书，言此次为自己完娶，请诸事从简，一则可省劳心神，再则可为自己惜福。他解释说：“何以言此，盖装饰各物，不过为个人之娱乐而设，果须因此而劳老人心神，是余等之罪也。”且举曾国藩嫁女以言之。8月12日早晨，王伯群走出舱外，见满江清秋，天水一色，“极目楚天舒”。他叩问船夫何至？答曰“洞庭湖”。下午二时，船抵长沙。偶遇高陞栈服务员来船相迎，即命代购去常德的船票，“去金二元七钱”。8月14日下午，王伯群抵达常德。

二、由常德溯沅江至贵州铜仁

从常德回贵州的路途，开始显得比之前的东海、长江等水路更艰难得多。因为常德到贵州，没有公共

1 汤涛：《王伯群在1919年》，《文史天地》2019年第六期，第20～22页。

2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3日。

3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5日。

4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4月24日。

5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8日。

6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10日。

车船可以乘载。沿途要靠搭乘过路的私人货船，溯沅江而上才能到达铜仁或镇远。沅江流经黔湘，为洞庭湖支流，湘省第二大河流。所以，一到常德，王伯群首先着急的是找船。8月15日上午，王伯群去码头看船，见有一小船，告知十二天可抵达铜仁，要二十千文，他嫌其价高。晚上终见有价格更低的，“此船主姓张，其船已载货千斤，搭乙舱，十四日抵铜仁，价十二千文，神福水脚等一并在内，遂确定”¹。

常德到铜仁水路近四百公里。王伯群8月16日出发，整整坐了半个月的货船才登陆上岸。在这漫长的航程中，王伯群并没有闲坐，而是趁着船行不忘读书做笔记。

其一，观赏两岸风物，记录沿途遭逢。王伯群上船前，换兑了票银及铜元，以备路上使用。船老大按计划暴风雨中开船，夜宿桃源洞。他记述道：

晨子刻开行，舟子四人、船掌一人同行。……暴风雨点至，舟子主恐慌无计，而风更甚，水势大汹不可挡。将入船行，同伴王翁大谈舟子之不心细。余悯其愚，舟子亦无德可设也。……不久行抵桃源，舟人买物，王翁合余亦征办食物也。办毕开舟，又行开徐里至桃源洞前停舟。闻是日行了百二十里。²

8月19日，船主“行三十里到清浪滩”，前方遇雨，船主不敢行动，即停舟于此。清浪滩是沅江数百险滩中最长最险恶的一段滩流，有“船过清浪滩，闯出鬼门关”之谓。该滩暗礁密布，浅窄浪急，上下数千年里吞噬了无数生灵。当年东汉名将马援，率西征大军伐蛮，逆沅江至清浪滩，强渡不能，最终与数百部众困死滩边壶头山，在当地留下“走遍天下路，难过沅江渡”之悲叹。8月20日晨五时船主即开行，王伯群“起褥视之，大雨如林，而伊等仍未稍息，致吾心不禁戚戚也”。险过清浪滩后，晚宿于白衣浦。船主有布数匹欲逃关税，王伯群“以为关税亦非清白人，乃与其使伊等得利，不如使舟子得利也”³，乃允为船主隐税。

8月21日一早，船主便开行，王伯群叩其何至？答曰：“已抵九矶滩。”九矶滩是沅江中游的第二个险滩，其“滩头有潭，九道石矶突入潭中”“洪水时多旋涡”⁴。此滩长十余里，水势之激，不亚清浪。王伯群这才真正感到危险，乃命船主雇船夫一名加之，才涉险过滩。下午，船过第三大险滩——横流滩，该滩与九矶滩相似，但因“近日因水势大涨”，故过时亦不十分困难。傍晚船抵辰州府，“闻今日共行八十里左右”。过了三个险滩，后面几天的水势相对平缓。8月24日，晚宿辰溪县城。日记云：

辰溪县在辰河上水之左岸，山明水秀，风景绝佳，游者常于岩上古寺题句，其古寺即远仰，有“寰海镜浪”四字者是也。辰河水源在此分为大小二支，由左流来者大，舟人谓向此而上及即抵镇远，故名之曰镇远河。由右流来者小，向此而上可抵铜仁，故名之曰铜仁河。今过道铜仁，故溯小河由右而上也。⁵

本日为王伯群二十三岁初度。他反思道：“不能在家博老人之欢心，而反恼恼于风尘之中，入慄慄危惧局，贻老人以莫释之忧，不孝之罪，百身莫赎矣。”8月26日夜，船停辰水江口，见船正遇打头风，船主不堪其苦。此时，王伯群联想到在日本见到的巍峨而先进的船舰，叹息道：“见而悯之，亦只有太息，吾国实业之无进步已耳。”⁶货船自沅江干流进入辰水支流，或为坐船日久，思虑过度，王伯群觉精神不振，行五十余里，夜宿麻阳县。8月29日，路见此地风物，很像老家兴义景家屯，便引发了他的极大兴趣，疲劳一扫而光。是夜，宿铜仁东关益友客栈。此地黔之者地，入口总税在此地稽查。他日记述道：

1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15日。

2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17日。

3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19日。

4 马本立主编：《湘西文化大辞典》，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页。

5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24日。

6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26日。

本日共行四十五里，至铜仁府城外三四里之地，名东关。盖此地水势崎曲，山岳秀耸，尤可观者，是镇水口之山恰似狮象，与家乡住宅前之水口狮象山无异，而此地水大又曲沉于象山下，恨未得登高一览。就此地来脉由何者，此种奇观系为何处而设者，将来有机会特来一览耳。¹

其二，预复习功课，阅读古籍，临摹书法。王伯群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其夫人保志宁在《王伯群生平》回忆他“平生勤读，中日文皆有根底”²。少年时在兴义曾跟随被誉为“京华一代通人”的姚华专习《小学》《孟子》《左传》和数理学。留学期间，他一心向学，埋首功课，还利用寒暑假自费上正则英语补习班；他省吃俭用，加入东亚同文会，订阅《支那经济调查》《支那经济学报告书》等刊物，了解中日经济发展情况。《资治通鉴》《史记》等经典书籍伴随着他的一生。在悠长而寂寞的旅途中，王伯群仍然不忘读书，复习课程，预习新课，阅读古典，研习书法。他自我督促，拟定假期读书计划。

八月十八日³，晨起五时半，看《物权法》二页。午后，又看《物权（法）》；自五时起，看《货币论》六页，冷水浴。

八月十九日，本日看《货币论》十余枚⁴。

八月二十日，本日因天气不良，腹时微痛，看《货币论》无绪，看小说亦然，乃置之。

八月二十一日，看《货币论》卅枚，有奇却少心得。

八月二十二日，看《货币论》第六、七章，又看《商法总论》数枚。

八月二十三日，本日看书无趣味，因思家思东（京）两不能矣。

八月二十八日，夜看《货币论》十页，《农业政策学》十页，《商法及物权》均须明日补看也。

八月二十九日，在日之课如《商法及物权》第二部均未补习，明日又要上岸，只好待后日以后长途去补足矣。

王伯群从小酷爱书法，后来以擅篆隶书体而闻名于国民政府高层和文化教育界。他尤为推崇黔籍大家莫友芝、郑珍，皖籍邓石如等。遍购《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大孟鼎铭文》《散氏盘》《虢季子白盘铭文》《毛公鼎铭文》《秦石鼓文》《汉袁安袁敞碑》《宋拓天发神讖碑》等名贴。1930年代初，他曾花五千元巨资购买孤本《夏承碑》，用以收藏和临摹。⁵从他沿途所记，窥见一斑：

八月二十四日，看曾文正家书二十余页，欲取伊处文正兄弟之道而法则之。

八月二十五日，看文正家书数枚。

八月二十六日，今日写曾父家书第六卷毕，取得家训看之，录其谈写字之法，拟依其法当使自今日始，尚待抵家后，觅好帖也。

八月二十七日，读写字之法，殊有趣。

八月二十八日，又录曾文正书法七则，行书也。

在航行中的一个早晨，王伯群觉精神疲乏，影响读书进度。他当即拟定一个计划，并提醒自己要严格执行之：

（一）自此加意调养，抵陆后，每日以二时步行，以补运动之不足，想仍可复元也。

（二）使每日有恒业，则思欲自然寡少。近因无恒业，即作字写字看书均觉在有意无意间，故思欲勃勃而生。

（三）此后宜每日看《货币论》十页、《农业政策学》五枚、《商法总论》五枚、《物权法》

1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29日。

2 保志宁：《王伯群生平》，《文史天地》1996年第二期，第12页。

3 公元日期，下同。

4 “枚”为日文，即为中文“页”的意思。为尊重原文，仍写着“枚”。下同。

5 汤涛：《人生事，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第二部五枚。分午前午后，午前不能竟事者，午后补之；午后不能竟事者，灯下补之；今日不能竟事者，明竟之从。以自今日始，八月十五止，《货币论》看百五十页，《农业政策》一百页，《商业总论》至第三章末，《物权法》看毕，至要至要。¹

三、自铜仁经贵阳抵兴义

到达铜仁以后，王伯群回家的前途与水路绝然不同，走的都是陆路驿道。所谓驿道，多为崎岖小道，山高路险、不通车辆的山地陆路。自铜仁，过镇远、贵阳、安顺，到达兴义，全程有六百多公里。此段路程，王伯群计划分两个进程：第一进程是自铜仁到贵阳，在贵阳拜亲访友，休整数日；第二进程是从贵阳至兴义。两进程各约三百公里。

贵州地处内陆边陲，其近代化交通的兴办，比京畿、中原和东部沿海地区为晚。长途旅行，只能是徒步、骑马或坐轿。1842年，贵州创设“麻乡约信轿行”²，利用驿道，经营客运、货运、递信和汇兑等业务，往来于川黔滇三省。其中与旅人直接相关的客运，有“长路轿子”和“过街轿子”两类。前者为长途，后者为短途，主要使用官轿、小轿和滑竿运送。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贵阳和1903年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进入贵州，都曾雇佣“麻乡约信轿行”的轿子。

1908年的王伯群，选择坐滑杆这个人力交通工具踏上归程。出发前一天晚上，他花“铜元六百五十文”“请木匠来打箱子脚及夹板书箱等物”。然后，与轿行的小头目杨久显商谈到贵阳的费用，最后决定请三人，并花一千二百文自购滑杆。王伯群9月1日出发，9月14日抵达贵阳，前后约半个月。这段旅程，王伯群沿途所记，乃民情风物、餐饮住宿，以及与轿夫的纠葛为多。由于驿站之间途中少有人家，食宿完全寄托于驿站，故王伯群多昼行夜歇。梳理王伯群沿途所见所记，乃黔地绝色美景与地瘠民贫奇迹般地相处。

9月1日，秋阳杲杲，王伯群坐上滑杆，心情愉悦地上路。9月3日，过玉屏县，一路见“玉屏山清水浅，四周云峰尤秀”。出铜仁，明显感受到不同的民风民气，“观其民风尚有进取之气。铜仁以上，无有之局”³。9月5日，行走在黔东南山间驿道，他大概感受到宋代李觏“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苍茫心境，又有“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之迷恨心情，加上读书计划泡汤了，一路颇有不满之感。他写道：“原以为在途中或可略看讲义。……或留意行李且不能看一书，心中忧之，想到家后更不能看读写作。”⁴

9月8日，沿路秀美风景令王伯群目不暇接。亦让他回忆起三年前赴日本留学，曾顺路观览此地风景区。记载云：

由濠桥出来十里之地，山谷秀丽，飞瀑高流。进视之，始知即飞云峰也。其半山之上有神祠，祠傍谷口风景异常，游此无不停车，余乙巳出黔时，偕同人曾游之。其洞修理有未毕处，用以为歉，此隔三载矣。而略补之完善则迥异前日，且题门额曰“黔南第一洞”，天不我诬也。⁵

沿途的住店条件，也令留洋归来的王伯群深感不适。9月9日，鄙陋污下的旅店令他苦不堪言：“昨夜臭虫过多，周夜未得眠。晨一二时即起收拾行李，五时由重安江出行，走二十七里抵大风洞。由大风洞行四十馀里，夜宿腊梅塘县。沿途栈房均鄙陋污下，苦不堪言，故常终夜不得眠，但当日于轿上少酣已耳。”⁶9月12日，因轿夫杨久显不能抬，王伯群“自行十八里，尽走坡坎”，感到疲劳至极。次日，因

1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27日。

2 何光渝、何昕著：《贵州社会六百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页。

3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9月3日。

4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8月27日。

5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9月8日。

6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9月9日。

“杨久显力弱，至九时抵龙里城，遂在龙里喊加班二名”。此段行程，山路弯弯，王伯群坐了四天的滑杆，且请的轿夫多四川籍，路上摩擦不断。他后来对川人狡猾和狡黠之判断，大概源自对轿夫的印象。旅途记叙，颇多异趣。

九月二日，轿夫休则休，轿夫行则行。且因伊等懒惰之状，而抱不快之象。

九月三日，余终日闷坐，颇觉不乐。五时，对轿夫生气，明知不值而又不能自己，真不可如何。

九月五日，因只有三十里即可抵镇远，而轿夫等多晚起。下午一时，抵镇远，宿联一古栈。

九月六日，命杨久显等轿夫收拾行装就途，未至五里，轿夫及搬夫均谓行李过重，不能速行，乃辞去即时。又遇有轿夫挑夫等在途中寻事，乃放之耽搁过久，故本日始行四十三里至七里冲。

九月七日，原以为在途中或可略看讲义，殊不知终日与轿夫生气。

王伯群与轿夫挑夫的矛盾，在9月11日达到高潮。在黄司，他与轿夫打了一架。此次互殴，二十三岁的王伯群暗暗发誓要习武抗暴，强身健体。他详叙打架经过：

晨起略晏，而夫脚等公因以不起，遂至六时顷始出发，八时半至黄司。朝食后，轿夫陈兴发（四川人）、徐洪顺二人因雨欲打坐，然是时又无雨，二人特借故不行。

余婉言说之再四，又命杨久显说之，便行至贵定不过五十二里，伊等公不至受苦，而二人坚持不允，彼时又不能别故加班。余以不能听伊等欲行则行，欲止则止，致误我事言之。二人怨声言曰：“非打我等几棍不行也。”且作调戏之态。延到午后一时，余见天色渐晚，若今夜不能宿贵定，明日必不能宿龙里，如是十八日万不能抵省矣。即迫之使行，二人仍坚执前言，致余四年未轻动打人手，今日加之伊等矣。而陈夫先打，徐即来援。徐夺我木棍，余顺手即得陈鼻梁打着，鼻血流染东海。陈蛮力朝余来，余脚滑□者持于地，乃自堕地。徐举所坐之板凳作欲打余之势，为他人阻之。当时余立起复还击去，伊等已转他人之后，恶其等敢与余相伍，乃寻黄司团首将二人交伊责法，另找人送余到贵定。

观今日之事，自愧未习柔术，几避此等下等人狙击。今年九月起，必请教师专心讲习数月，以为卫身之具乃可以言出门也。思及此子苦可谓先鉴者矣，宜效之切至耳。¹

9月14日中午，王伯群抵达省城贵阳。在贵阳四天，主要是访亲会友。其一，他最想见到弟弟王文华。王伯群父亲五年前因病亡故，那年王伯群十八岁，王文华十五岁。长兄如父，王伯群自然承担培养弟弟的义务和责任。1906年王文华与魏正楷、窦简之等十三个兴义学子赴贵阳参加贵州全省公立中学通考，全部被录取，一时轰动全省。后转入优级师范选科，精研史地。在日期间，兄弟之间经常信函往来，谈读书、谈理想，谈家国大事。由于事先通报，一到客栈，王文华就兴冲冲跑来。王伯群见弟弟比自己高二寸许，但“体气则比尤弱”，表示“直殊可虑”。连续几天，兄弟之间彻夜畅谈。其二，走访在贵阳的同乡戚友。王伯群至农林学堂，访表弟孙勤典。少时，同乡周尉文及友人黄干夫、陈哲生、王仲肃、朱友奎、窦简之、魏树生等人来访，相互“谈及张彭年昔年诸君”，然后往复仁阁摄影留念。

在贵阳休整几天后，王伯群重新踏上回乡的最后一程之旅。从贵阳到兴义，全程三百余公里。自9月18日启程，到9月26日到达兴义景家屯。这段路王伯群之前往来比较多，路况比较熟悉，故他没有近乡情怯之顾虑，对周围的景观和风土人情记录也明显简略。在轿夫和挑夫的配合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前后只花了九天时间，比相同旅程的铜仁到贵阳整整省了六天。

也许由于旅途疲倦，王伯群“沿途似病非病之状，大感不快”。9月19日，由清镇抵达安平县（今平坝县）。9月20日到达安顺府城。9月21日“行六十馀里”，本日除行路而外，他无所视。晚宿镇宁县城，写信致王文华，列为戊申书第一号追录。9月22日夜宿关岭县。9月23日夜宿慕役司。9月24日行

¹ 王伯群：《云崇山人自记——震章戊申年小史》，1908年9月11日。

“七十八九里”，晨起遇雨，午间过花江正苦，“步行二十里”，疲困不堪，宿贞丰县平街。9月25日“行八十馀里”，夜宿兴仁县巴林（今巴铃镇）。经过六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王伯群终于于9月26日抵达阔别三年的兴义老家。

王伯群此次返国省亲，让他终身难忘的是完成了人生的婚姻大事——与兴义周绍虞先生之次女周光帼完婚。周大他两岁，他们夫妇投身革命，患难与共，琴瑟鹒鹒二十年。令人唏嘘的是1928年妻子在上海不幸离世，¹让彼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王伯群悲伤既久。王伯群前后在老家度假约四个月，直到1909年1月30日，他才依依不舍，告别新婚妻子，告别母亲、外公和舅舅们，从兴义出发，再次踏上东瀛求学的路途，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From Tokyo to Xingyi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Wang Boqun's Diary

Tang Tao

Abstract: Wang Boqun is a pioneer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ian and a famous educator, so his diary has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ic and life values.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describe him without fear of hardships, seeking true learning, loving his hometown, holding the tenacious beliefs and dreams of a strong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Sino-Japanese transportation, currency payment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description of social conditions along the w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which were described in his diary manuscript written by Wang Boqun in 1908. T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home to China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Wang Boqun's future career in prospering China's transportation and Chinese education, and is worthy of th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f some historians.

Key words: Wang Boqun' s Diary; Returning Home to Visit Relatives; Studying in Japan

责任编辑：庞思纯

¹ Edward D. Wang: Patriots and Warlords: Brothers' Journey Towards Republican China, Qilin Publishing Evanston, 2014, P.209.

丁道衡民国边地考察纪行刍论

刘振宁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丁道衡边地纪行的文章共六篇,全部写于民国时期,涉及蒙新、绥远、西康三地。尽管六篇行纪都是科学考查中形成的文化“副产品”,但是囊括的自然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不仅展示了作者亲历目击的自然风貌、物产气候、人文地理、边民生计、民族习性、宗教生活景象,而且饱含着作者“爱国若命”的赤子情怀,彰显着叙说者“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深陷外侵内扰时国人如何共克时艰以及边地何能长治久安等问题的思考和展望。

关键词: 丁道衡 民国时期 边地民族风情 赤子情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20) 03-87-93

丁道衡(1899—1955)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贵州九三学社建设和发展史上的“第一人”,也一度担任过贵州大学的掌门人,堪称一代“科学大师、民主先贤、学术精英、业界楷模”。¹

丁道衡出生于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的一户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十七岁入贵阳模范中学(今贵阳一中)读书,二十六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因品学兼优而留校任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远赴德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丁道衡自小受到家族先辈尤其是叔祖父丁宝桢和祖父丁梅村的影响,幼年时期多次随在外省为官的长辈远游,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了风情各异的民族文化,从而萌发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在从事矿产资源调查和地质研究的岁月里,丁道衡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或扎根于荒无人烟的西北大漠,或跋涉于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为世人留下了为数较多的记录不同自然风貌、不同民族习俗、不同区域物象的考察纪行日志。既然“游记可以很好地揭示其撰写者的精神和心理架构”²,那么,透过这些笔力遒劲又充盈着人间烟火味的考察纪行,既可以洞见作者当年跋山涉水的艰辛,也可感触边地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还可以窥见作者夹杂着个人感情的文化见解。这些源于人文体验与心灵感知的珍贵文献,对于掌握多彩的民族风情,获取地方性知识,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丁道衡把实地考察视为科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认为那是获得第一手材料和科学实据的必经之途。早在1925年4月,时为北京大学大三本科生的他,就获得了由李四光教授亲自带队指导的“地质旅行”

作者简介:刘振宁,1964年生,四川蓬安人,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南近现代人物与思想、西方近代中国西南形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英语文献为中心的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7BWW027)研究成果,2015年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英语文献中的贵州形象研究(1860-1949)”(项目编号:GDZT201506)研究成果。

1 陈履安:《科学大师 民主先贤——纪念九三学社先贤丁道衡先生》,《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二期,第62页。

2 〔法〕伊夫·谢弗勒(Yves Chevrel)著,王炳东译:《比较文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页。

机会,赴山西太原等四地进行为期两周的实地考察。丁道衡为此撰写了《地质系三年级山西旅行报告》一文,刊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作者在文中结合自身所读地质专业,着力强调了不盲从教条、唯崇信真理的重要性。“地质之学,注重实地调查,平日所习,不过书中知识,于地形(tectonic)、地史(stratigraphy)之情形,仅见诸成著,不知身历目睹之亲切受益”¹。无疑,如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知求是态度,体现了南宋诗人陆游所倡导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精神,这种把书本知识与田野体验自觉融会的意识,将“形上”和“形下”有机统一的态度,至今昭示着后世,启迪着当下。

在出国深造前,已留北大担任助教的他,又受邀参加了1927年5月至1930年8月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次历时三载的科考,行程数万里,跨越了从内蒙古到新疆北部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丁道衡所著的《蒙新探险的生涯》一文,以一个内地汉人的审视角度,将西陲边地的物象风貌和民族风韵,用奇幻的文字和雄健有力的笔调进行了书写表达。“在考察途中,他们顶风沙雨雪、冒严寒酷暑,涉大漠、爬高山,风餐露宿,历时三年,出色完成了西北科学考察的任务”²。学成归国后,他又于1939年9月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不畏川康地区山高严寒、空气稀薄的恶劣环境,深入海拔超过四千米的理化县(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率先研究了西南地区铝土矿,其间还历经了被土匪洗劫一空和同行被打等事。³

通过两次时间较长、空间跨度大的考察,丁道衡不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科研数据,而且闲暇之余,他还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温情而理性的笔触,描摹了边地的民生、民情和民俗,其文字中饱含着原始而雄浑的生命力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检索《全国报刊索引》发现,丁道衡有关边地考察纪行文章共六篇。刊发时间和所载刊物先后为:(1)《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四期,第1~5页);(2)《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1~10页);(3)《蒙新探险生涯(丁道衡在女师院讲演)》(《时报》1930年10月8日第三版);(4)《蒙新人民生活之状况:丁道衡先生讲演》(《文治中学半月刊》1931年六月,第55~62页);(5)《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09~116页);(6)《佛教在西康》(《新评论》1941年第三卷第五至六期,第14~17页)。上述六篇边地考察纪行,都是作者科学考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副产品”,是作者现场观察、生命体验和搜奇探险后的见闻心影集成。就内容与特征言,前四篇文稿讲述的是同一主题,都源于1927年至1930年参与的那次历时三年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因此具有明显的同质化特征,尤其是第一篇和第四篇、第二篇和第三篇基本观点大致相似,不同处主要表现在后篇往往是前篇的拓展版或升华版,逻辑结构更为明晰,叙事风格更为清新,所述内容更为充实,主观印象和回忆感想色彩更为浓郁。

《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一文,是丁道衡根据在文治中学演讲的内容提炼而成。是关于蒙古、新疆人民生活境况全方位考察的报告,涉及气候地貌、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女性境况、食物结构、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信息量极大,文笔优美流畅,思路清晰。文章开篇便渐次深入地阐明了蒙古独特的气候地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以及该生计模式下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等情况:蒙古地方,天气寒冷,戈壁沙漠居多,不宜耕种,但是水草很是丰富,适于游牧,所以他们都是以游牧为生活

1 丁道衡:《地质系三年级山西旅行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第一七三二期,第3页。

2 陈履安:《科学大师 民主先贤——纪念九三学社先贤丁道衡先生》,《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二期,第62页。

3 姜刚杰于2011年根据《丁道衡自传》整理并刊发纪念文章《贵州第一位九三学社社员丁道衡》,参见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员会网站, <http://www.gz93.gov.cn/Html/sshp/150536868.html>, 2009年1月31日。

的，他们男女老幼，都是很勤苦的工作，吃闲饭的很少，尤其以女子工作的时间最多。那边的女子，没有像我们内地的小姐太太式的，都是以主妇兼做家庭间一切琐碎的事情，他们的食料，以乳为重要食品，辅以米面等类。¹由于乳制品乃游牧民族食物的主要来源，牧民往往“以母羊、母牛、母马为食料仓府”，挤奶庖食等家务劳动完全是女性的责任，男子则专管牧畜及对外一切事务。因此，在作者看来，这样的生计模式不仅形成了“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内部分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助推了某些富裕大家庭中“一夫多妻”婚姻制的产生，因为如此可使更多勤劳妇女进入家庭，以分担繁重家务。

在论析了家庭结构后，作者进而就蒙古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生活进行了探释，指出蒙古部落不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而是以苏木（庙宇）为单位的。换言之，“说有多少苏木，就是说有多少部落了”。就治理体系言，喇嘛既控制和管理着苏木，也统治着部落的所有人和一切事，因此，“蒙古人对于喇嘛非常信仰，一家里如果有两个儿子，定把聪明的一个施给庙里去当喇嘛，喇嘛终日诵经，鸣钟，击鼓的大做法事，他们的衣食住等等，均由人民供给，但不能娶妻生子。”²一旦成为喇嘛，将终身信守不娶，人们为何还对该阶层趋之若鹜呢？丁道衡认为，由于喇嘛位尊权高，还充当着医者的重要身份，因此备受推崇。

“蒙古没有医生，有病的时候，只有去求喇嘛治病”。文中记述蒙古人的葬俗有别于内地：“不是土葬，也不是火葬，他们是腹葬，就是葬在豺狼的腹里，当他们家长或其他人死后，就把尸首放在狼群出入的地方摆着，过后几天去瞧，被狼吃了没有，如果吃了，那末就以为死者升到天国去了，如果没有被吃，就以为他罪恶太大，狼都不肯吃了”。³据此，丁道衡认为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同其栖居的自然环境相互制约。

随后，丁道衡讲述了与蒙古牧民经济运作相关的物资生产、使用、处理、分配模式，以及产品购售买卖行为。据他观察，蒙古人常同毗邻的汉人交易商品，“大多数是以货换牲畜皮毛，现钱交易的少，而且赊期居多，譬如说春冬季将货物放给蒙古人，到夏秋的时候去收去〔取〕换得的牲畜”。作者继而就蒙古人“为何从不赖债”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大胆猜测，认为“（蒙古人）譬如说你给他们赊款同他们谈交情，在交换上便可得到很大的便宜，他们虽然实质上吃亏，心里上却高兴，若果你马上要兑现交易，他便觉得你瞧不起他，不放心他，以后的买卖就不好做了”。⁴显然，如此地评断观点有着一定的先入之见，存在着把少数民族同胞率直的民族性格误读为“虚荣心很大”的不实之处。

接着，文章转入对新疆地区相关情况的论述。对于广袤区域内的民族复杂性，丁道衡以“新疆的人种是复杂的”一言以蔽之。随后，在就各主要民族的族名及分布地域稍加介绍后，着力对聚居于天山山脉内的旧吐尔扈特蒙古族支系的演变历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读：“他们的种族，有汉人的血统在内，他们的祖先，是汉人的公主下嫁给蒙古的单于所生的这位太子长成后，他想谋篡他蒙古哥哥的王位，不幸被发觉了，就遭到俄罗斯一个蒙古部落去避难，护从他的有四个汉人，同若干蒙古人，到了那里，俄国的蒙古王子，就把他招了驸马，这样的繁殖起来，一直到了清朝，他们才受封，迁到新疆来。”⁵不难看出，作者有关天山山脉蒙古人演化史的历史记忆叙述，采用了传说加转述的形式，体现出了一种文学故事的叙事特征，真实与否则不得而知。

在综述了迪化（乌鲁木齐旧称）、古城子（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及伊犁三地的基本状况

1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1页。

2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1页。

3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2页。

4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2页。

5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3~4页。

后，作者就新疆人民当时的经济物质生活情状做了如是总结：“新疆牲畜的事业，自以蒙古、哈萨为其干部，因为他们都是山居，精于牧畜，大山里面又有极大的草厂，所以牲畜甚是繁殖，除供本省食用之外，大多数销于俄国，小部分销于印度、阿富汗等处，他们都很富足，生活都很容易。”¹进而，作者对新疆和蒙古两地人民的文明程度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总体上高于后者，原因大概在于前者接近俄国，容易开化。另一方面，又择取蒙新两地的哈萨克和蒙古两族，就彼此间的文化风俗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哈萨的风俗，同蒙古大不相同，蒙古是喇嘛教佛教，哈萨是回回教，回教人不吃他教人宰杀的东西，所以回回在山里面，在哈萨地方，可以过门大嚼，一到蒙古地方，便观望不前了”²。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演讲结束前，还就如何进一步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质量，增进他们的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新疆人种虽很复杂，若果在上者能够改良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输入中国的文化，必不难将他们团结起来，执干戈以卫国家”。³

《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一文，也载于1930年同期的《女师大学术季刊》上，作者在文中对考察的具体细节和经过信息进行了全面补充说明，因此篇幅上较前一篇增加了一倍。文章开篇便就“蒙新探险生涯”为何不同于一般的探险加以说明。本次探险表现出的“异”，既在于它的性质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探险”，“探险二字用在我国的蒙古、新疆等处，似乎不很合宜，因为这些地方，既没有两极那样的冰天雪地，又没有非洲澳洲那样的毒蛇猛兽，说不上什么险”，又在于考察队所选择的方法同常人的方式背道而驰，“我们因为要作一种科学考查的旅行，所取的方法，与一班〔般〕的旅行不同，不同之点，可分为三项，（一）昼行，（二）不走大路，（三）不怕损失”。⁴

遍览全文，作者在记述遭遇劫匪、蒙古人民宗教禁忌及新疆民风异俗方面，花了不少心力，也投入了大量笔墨。“蒙古人民的宗教观念甚深，迷信尤其利害，而且这么大的科学团，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蒙古走，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举动，都持一种怀疑态度”。⁵作者通过蒙古人如何担心外人触动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老包”或拿走“镇山之宝”，来证明蒙古人如何迷信。当讲述到新疆境内的科考过程时，作者着重就“入乡问俗”获得的若干地方民俗进行了描述，“我们在路上便知道关于新疆的若干事，什么抓饭，哈密瓜，吐鲁番葡萄，猎鹰抓兔，缠头佯郎，种种好听的名词，所以一到哈密，便先吃了哈密瓜，其次就去观猎，一到吐鲁番，就去叫人佯郎。佯郎即是缠头的一种跳舞，有四五个人奏着他的乐器，两个人对跳起来”。⁶如此惟妙惟肖的叙事情节，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甚至民俗研究意义，即便今日对民俗或民族研究界的学者言，依然颇具参考价值。

至于同年载于《时报》上的《蒙新探险生涯》一文，则是丁道衡受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所邀，再次就“西北科学考察”历程发表演讲的内容节录。但就文体风格言，《时报》所刊内容，全文按照事件发生先后的时序进行叙述，将考察故事分为六个章节进行讲述，即“此行旨趣”、“旅行方法”（昼行，行大道，不怕牺牲）、“土匪覬觎”（组织卫队、轮流警备）、“蒙人迷信”（怕人触动‘老包’、拿走‘镇山之宝’）、“蒙人美德”（避债不赖债、父死子孙偿）、“行戈壁中”（额清纳河到哈密、戈壁中挣扎、粮尽食骆驼）六个板块，彼此连贯，一气呵成。较之于前篇《蒙新探险的生涯》，尽管篇幅上有所缩

1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4页。

2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4页。

3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5页。

4 丁道衡：《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1页。

5 丁道衡：《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3页。

6 丁道衡：《蒙新探险的生涯（在北平女师院演讲）》，《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6页。

减,但是讲述者经过对情节的进一步提炼优化,从而使情节更加紧凑,表述更加精炼,层次更加分明,尤其是对蒙古人的迷信加以适度的艺术性、想象性修饰和对蒙古人的美德进行具象式渲染后,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也由此大增。

1932年3月,因工作需要,丁道衡展开了一次往返北平、绥远间的短暂旅行,写成了《最近游绥的见闻》,并发表在了《西北研究(北平)》上。这篇长达八页的见闻录,信息量极其宏富,知识面颇为广阔,塞北气息、经贸形势、建筑风格、民族特性、生活起居、市井风貌、宗教习俗、乡村治理、内外蒙古关系等相关知识充盈其间。文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绥远商人的生存境况:“在贝勒庙的东边,约一里,有三四十家做买卖的,鸡鸣犬吠之声相闻,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据说从前蒙古人不在其地建筑房屋,几年努力的结果,已得到允许,不过每年须向王爷缴纳地租,及营业税若干,大约买卖大的,每年须纳二三百两银子,小的几两至几十两不等。”¹

随后,作者对暂居绥远的商人群像进行了刻画,讲述了他们生活的诸多不易和艰辛。入微的观察,细腻的描述,精彩的文字,读罢令人不得不为作者的非凡笔力所折服。

他们与蒙古人的交易,大半是赊期,三四月间出去放账,六七月间便去收取兑换得来的牲畜皮毛了。凡是在蒙古做买卖的,都要在王爷府领票,且只能在其旗内通行,一过了界,又得领取他旗的票了。……他们除了纳税之外,还得分担差事,譬如遇有公事,要草料马匹骆驼的时候,就按户分派,有马骆驼的出马骆驼,有草料的出草料,一个养马的商人告诉我说:派马还不要紧,最苦的是马匹到别处去了,不论三天五天的路程,还得自己去牵了回来,蒙古人是只管取不管还的。这样一来,谁敢养马骆驼呢!所以在那里的商人,都是养牛,因为牛走得慢,拉车还用得着,别的差事就轮不到,而且奶是最好的饮料,粪是最好的燃料,尤其是住户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的手艺人也不少,如鞋匠铜铁匠裁缝等类,不过手艺既劣价钱又贵罢了。在那里居住的商人,还得遵守一条禁令,就是不得随带家眷及容留女人,违者重罚不贷。这条禁令不知是因为附近庙宇的关系,恐亵犯了神灵呢?还是免去商人就地繁殖起来?尚待详细的研究了。²

尤其是论及到该地的庙宇与喇嘛盛景时,作者展开了更为详尽地描述:“那里的庙宇,在一土坡上水抱山环,倒也形胜,而且建筑极是辉煌,大的小的,不下二三百所,喇嘛也有好几百人,香烟袅绕佛号喧扬,红僧白马,出入其间,另有一番气象。离庙十几里地,方有人家,唯穷人居多,半是依庙宇为生活的。”³全文既荡漾着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更饱含着真挚而浓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在论及日侵俄扰边患不断的时局,面对“列强”威慑和侵袭,作者提出了国人理应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探寻中华振兴良策的主张,甚至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国艰,何得缄默”⁴的呼号。在文末,作者再次指出,“这次游绥,由各方面看来,绥远在军事上边防上商务上农业上地位都是重要的,我希望绥远当局本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努力做去,并且祝他们最后的成功”⁵。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佛教在西康》乃是丁道衡边地游记的压轴之作,彼此交叉互渗了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却饱含人文气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就结构言,全文由“引言”“西康天然环境与人民的生活”“佛教传入西康的简略经过”“佛教在西

1 丁道衡:《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10页。

2 丁道衡:《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10~111页。

3 丁道衡:《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11页。

4 丁道衡:《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14页。

5 丁道衡:《最近游绥的见闻》,《西北研究(北平)》1932年第六期,第116页。

康的现状”“佛教对西康现时的影响”及“最后的几句话”六部分组成，既检视了西康佛教传播的“前世今生”，又探析了佛教兴盛背后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成因，立意深远，论证透彻。

文章首先指出了佛教于西康的至关重要性，“佛教在西康影响的大是无可否认的。有人竟以为在西康除了宗教无文化，除了宗教无政治；要治理西康只有假之宗教一途，至少要提倡宗教，皈依喇嘛，方能够抚绥康民安定边疆”¹。在挖掘和剖析佛教在康区如此兴盛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当地苦寒恶劣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限制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佛教隆盛的结果。“人民既受这种环境的限制，又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除少数特殊阶级的人外，一般都甚寒苦。大半以牧畜为生活，牛羊为食料，羊皮为袄，牛毛为篷，过他们游牧生涯。又以文化落后，医药不良，故身体虽然强壮，而疾病的流传甚广，平均寿数只在四十左右；抢劫与仇杀的风气盛行，故家家有朝不保夕的恐慌。在这种种压迫下面，人们自然要求一种安慰，尤其是精神的安慰。我以为佛教能在西康或其他地方流行，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由”²。如此论断，无疑具有宗教社会学的立场和理趣。

在余下的篇幅里，作者进一步论析了康地佛教的流布现状和现时影响。以“佛教对西康现时的影响”为例，作者认为康地佛教的当下发展，正处于一种日渐式微的状态。“就整个看来，似乎是日在没落中”。“它衰弱的征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戒律的废弛（喇嘛人数虽多，但除少数外，终日晒嘻无所事事）；二是教化不够，不能依法力行（大多数僧众对于佛经要义不甚了解，也无法了解，依法力行成了无本之木的空头口号）。

在文章末尾“最后的几句话”里，作者继而申论道：“佛教在现时西康，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惟它本身发生了若干流弊，急待改革；而且以时轮的流转，环境的变迁，对于人们精神上的指导，似已失去从前的尊严。它的地位虽因他种条件，仍居重要，但它的影响，好坏的分量，须详加估计，这对于治边不可不注意。”³全文所透露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情怀，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鞭策和教益作用。当然，如此的品性人格和宏远志向，同丁道衡终生秉持的思想信念完全一致。正如他勉励学生勤学所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真理，谋求福利，以尽个人应尽的责任。”⁴

综上所述，丁道衡关于边地纪行的六篇文章，时间全都集中于民国时期，空间分别指向了蒙古新疆（西北边陲）、绥远（塞外）、西康（西南内地）三地。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诸如外来者的猎奇视角、非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跨专业的知识素养、走马观花式的观察经验、非原型在场的叙事手法等，从而使这些科考“副产品”或浓或淡地显现出了观感者自己的文化心理与价值秩序，尤其在对比称“缠民”的维吾尔族的族性和文化描述和论断中，存在着明显的主观认识，认为“缠民”“惰性甚深”⁵“进取心很薄弱”“缠民妇女的虚荣心及挥霍性，据我看来，比何处都大”⁶，等等。如此的先入之见，往往是文化外来者无法以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审视和体认“族内人”文化的通病。换句话说，“旅行家往往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视野去‘发现’世界的，‘眼后’的既定观念决定了‘眼前’所看到的東西”⁷。

1 丁道衡：《佛教在西康》，《新评论半月刊》1941年第三卷第廿一期，第15页。

2 丁道衡：《佛教在西康》，《新评论半月刊》1941年第三卷第廿一期，第16页。

3 丁道衡：《佛教在西康》，《新评论半月刊》1941年第三卷第廿一期，第18页。

4 姜刚杰于2011年根据《丁道衡自传》整理并刊发纪念文章《贵州第一位九三学社社员丁道衡》，参见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员会网站，<http://www.gz93.gov.cn/Html/sshp/150536868.html>，2009年1月31日。

5 丁道衡：《蒙古新疆人民生活状况》，《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4页。

6 丁道衡讲演，吴炎、郭汉超笔记：《蒙新人民生活之状况：丁道衡先生讲演》，《文治中学半月刊》1931年六月，第57页。

7 王寅生著：《西方的中国形象（上）》，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

然而，瑕不掩瑜。六篇文章其囊括的自然文化信息十分宏富，既展示了他所处时代和特定空间下的自然风貌、物产气候、人文地理、边民生计、民族习性、宗教生活景象，更于字里行间承载着丁道衡“爱国若命”的赤子情怀，彰显着叙说者“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深陷外侵内扰之时，国人如何共克时艰以及边地何能长治久安等救国图强良策的思考和展望，是当时边地考察的学术佳作。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ing Daoheng' s Border Inspecting Reports

Liu Zhenni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Ming Guo of China, Ding Daoheng made several scientific inspections related to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Province, Suiyuan Special Zone,Xikang Special Zone and then he wrote six inspecting reports which were published on different newspapers.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ose reports are nothing but spin-offs or by-products of the culture, they are a worthy encyclopedia on geography, economy,society, customs, religions,ethical and regional cultures of that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Moreover, they are full of the writer' s patriotic feelings that every man alive has a duty to his country.

Key words: Ding Daoheng;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ethical and regional culture; patriotic feelings

责任编辑：黄万机

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利用的最佳模式选择

——以贵州、广西生态博物馆群落为主要案例

覃代伦

（中国民族博物馆 北京 100080）

摘 要：贵州生态博物馆“4+2”模式和广西生态博物馆“1+12”模式，是全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经典案例。以点带面，从“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出发，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出发，探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对象与范畴、理论与实践、前世与今生；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切入，探讨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和利用的政策与法理、责任担当与工匠精神、世界意义与国家价值。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 民族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26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94-104

民族文化遗产，是指具有民族特色并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有形或无形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特定生活区域里的有机总和。关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模式选择，一千个传承人或NGO或政府组织就有一千种选择，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莱特一样。笔者从事民族文博研究近十年，纵观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历史逻辑，横观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理想与现实，窃以为，生态博物馆，见物，见人，见生活，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最佳模式选择。

一、对象与范畴：从世界和国家层面探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前世今生

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一民族地域内的有机总和，具体到民族文化事项，那就是：（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建筑、设施以及融为一体的自然地理环境；（二）民族的传统服饰、生产生活工具；（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场地、器具和道具；（四）碑碣、古墓或城郭遗址；（五）民族民间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六）民族传统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七）民族传统风俗、礼仪、祭祀、节庆、文化体育活动等；（八）民族经卷、典籍、文献、谱牒、楹联等等。上述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之丰厚、之广博、之久远、之深刻，在世界文化遗产范围之内，都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异彩缤纷。中国从1985年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在联合国二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组

作者简介：覃代伦，1963年生，土家族，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人。现为中国民族博物馆非遗部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美术。

织之中，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总数已达五十五处，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其中，汉族有四十三项，占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六；少数民族有十二项，占百分之二十点三四。列表如下：

表一：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中国少数民族部分）简表

名 称	类 别	民族聚居区	时间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世界自然遗产	土家、白、苗等	1992
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	世界文化遗产	藏、蒙古等	1994
三江并流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	藏、纳西、傈僳、蒙古等十六个民族	2003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世界文化遗产	朝鲜、满、蒙古、回等	2004
元上都遗址	世界文化遗产	蒙古、满、回、藏等	2012
丝绸之路——新疆天山廊道（中、哈、吉）	世界自然遗产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	2013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世界文化遗产	哈尼、彝等	2013
土司遗址（湖南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贵州海龙屯）	世界文化遗产	土家、苗、仡佬等	2015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世界文化遗产	壮等	2016
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	藏、土、回等	2017
贵州梵净山	世界自然遗产	土家、苗、侗、瑶等	2018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三十九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其中二十五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主体民族汉族主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一；其中十四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少数民族主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九。列表如下：

表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少数民族部分）简表

名称	类别	民族聚居区	时间
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维吾尔	2005
蒙古族长调民歌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蒙古	2005
侗族大歌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侗	2009
格萨（斯）尔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藏、蒙古、土	2009
热贡艺术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藏	2009
藏 戏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藏	2009
玛纳斯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柯尔克孜	2009
花 儿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回、撒拉、东乡	2009
中国朝鲜族农乐舞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朝鲜	2009
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蒙古	2009
羌 年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羌	2009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黎	2009
麦西热甫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维吾尔	2010
赫哲族伊玛堪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赫哲	2011

在国家层面，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郑孝燮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研究馆员三位宿儒提议，国务院从1982年启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认定、保护和规划计划，共分三批认定了一百三十五座国家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汉族一百二十一座，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六三，另有十四座民族聚居区的“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占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三七。列表如下：

表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部分）简表

城（区、县）名称	类别	民族聚居区	时间
遵 义	历史文化名城	汉、布依、仡佬等	1982
大 理	历史文化名城	白、回等	1982
拉 萨	历史文化名城	藏等	1982
丽 江	历史文化名城	纳西、傈僳、普米等	1986
日喀则	历史文化名城	藏等	1986
银 川	历史文化名城	回等	1986
喀 什	历史文化名城	维吾尔等	1986
呼和浩特	历史文化名城	蒙古等	1986
江 孜	历史文化名城	藏等	1994
同 仁	历史文化名城	藏、撒拉等	1994
凤 凰	历史文化名城	苗、土家等	2001
吐鲁番	历史文化名城	维吾尔、哈萨克等	2007
库 车	历史文化名城	维吾尔等	2012
伊 宁	历史文化名城	哈萨克等	2012

在国家层面，国务院从2006年启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定工作，分四批评定了一千三百七十二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九百一十七项，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四；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四百五十五项，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六。另有一千九百八十六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八名省级非遗传承人。列表如下：

表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表（少数民族部分）

批次	总数量（项）	民族非遗数量（项）	所占百分比（%）	年代
第一批	518	162	31.27	2006
第二批	510	186	36.47	2008
第三批	191	60	31.41	2011
第四批	153	47	30.72	2014
总批次	1372	455	33.16	

在全国民族工作主管部门层面，国家民委2013年9月23日首批命名了三百四十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7年3月3日，第二批又命名了七百一十七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0年1月14日，第三批又命名了五百九十五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涉及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同样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列表如下：

表五：国家民委命名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简表

地域（省、市、区）	第一批（个）	第二批（个）	第三批（个）	总数（个）	百分比（%）
北京	4	7	2	13	0.79
天津	1	1	1	3	0.19
河北	9	24	20	53	3.20
山西			1	1	
内蒙古自治区	3	40	45	88	5.32

地域（省、市、区）	第一批（个）	第二批（个）	第三批（个）	总数（个）	百分比（%）
辽宁	4	31	7	42	2.54
吉林	9	11	19	39	2.36
黑龙江	4	17	8	29	1.76
江苏	1	3	4	8	
浙江	6	15	19	40	2.42
安徽	2	10	1	13	
福建	10	32	26	68	4.12
江西	3	9	3	15	
山东	0	0	7	7	
河南	5	1	2	8	
湖北	21	28	15	64	3.87
湖南	27	31	29	87	5.27
广东	7	10	2	19	1.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59	38	40	137	8.29
海南	3	11	9	23	1.39
重庆	5	17	4	26	1.57
四川	5	50	69	124	7.50
贵州	62	151	99	312	18.89
云南	41	113	93	247	14.95
西藏	10	8	11	29	1.76
陕西	5	6		11	0.67
甘肃	5	12	10	27	1.63
青海	9	11	22	42	2.54
宁夏回族自治区	12	8		20	1.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14	25	47	2.8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8	2	10	0.61
总计	340	717	595	1652	

从上表统计数据看，贵州省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第一的省份，以三百一十二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居全国首位，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八点八九；云南省二百四十七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居全国第二，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四点九五；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百三十七个，居全国第三，占全国的百分之八点二九；内蒙古自治区八十八个，居全国第四，占全国的百分之五点三二；湖南省八十七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居全国第五，占全国的百分之五点二七；福建省六十八个，居全国第六，占全国的百分之四点一二。此表全面、准确地统计了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国家制订有关保护政策提供了目标与依据。

从上述五个图表，我们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民族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哪些项目？从国家的角度，民族文化遗产又需要保护哪些项目？这些数据虽然是抽象的，也是冷冰冰的，但是，每个数据所对应的民族文化遗产，却是温暖的、久远的、人文的、鲜活的。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才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二、理论与实践：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多地的成功建构与创新性发展

我们已经从世界与国家两个层面探讨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对象与范畴，现在，我们重点讨论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中的定位与作用。

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届代表大会（ICOM）在法国召开，大会主席乔治·亨利·里维克第一次

提出了“生态博物馆”这个国际文博新概念：“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会发展的博物馆化的机构，它融合了对该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生态博物馆”这个新概念传入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中国国家博物馆苏东海研究馆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黄春雨教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史吉祥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潘守永教授在生态博物馆、在学科建设方面，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在传统的相对保守的文博界，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风”。

中国第一个实体生态博物馆建设，毫无争议，是中（国）挪（威）两国元首——江泽民和哈拉尔五世共同签署的文化项目——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1998年10月31日正式开馆。它不仅是贵州省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贵州六枝特区以北四十二公里的梭嘎乡内，平均海拔二千米，在邻近十二个村寨中，居住着一支古老而又神秘的苗族支系“箐苗”支系，也称作“长角苗”支系。他们居土墙茅屋，纺纱画蜡，民风古朴，堪称人类工业化前生活的活化石！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开馆，开中国生态博物馆群落建设风气之先河。

中国民族博物馆也是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力量。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是苗族文化的富集地，1992年就成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技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照国际博物馆协会有关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与行动指南，中国民族博物馆与雷山县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历时三年，“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分馆”挂牌，这标志着贵州省又一家生态博物馆的诞生。

贵州从江县小黄村是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侗族大歌”之乡，早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广千年发展目标计划时，中国民族博物馆就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代表卡贝丝女士联系，并派出专家调研考察，与从江县政府一起历时四年，建成了贵州从江小黄村侗族生态博物馆，为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贡献了一份光和热。

2005年6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和挪威驻华大使馆联合在贵州召开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国际学术论坛”，时任贵州省长石秀诗、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加拉、挪威驻华大使郝图安等领导出席了论坛会议，来自中国、挪威、法国、意大利、美国、韩国、日本近百位生态博物馆专家参与了开放式的学术讨论。这个高峰论坛表明，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落“4+2”模式开启了。

“4+2”模式中，“4”就是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和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就是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导援建的“西江千户苗寨生态博物馆+从江小黄村侗族生态博物馆”。可以说，贵州生态博物馆群落建设从理论与实践，都走在了中国前列，并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广西民族博物馆是广西生态博物馆群落建设的重要力量。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1+10”民族生态博物馆工程。所谓“1”，即总投资二点五亿的“广西民族博物馆”新馆，是广西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核心工程。所谓“10”，就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围屋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高道古村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那坡达文黑衣壮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11年，这个“1+10”生态博物馆群落全部建成开馆，标志着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成为了全国的领军旗帜，其标杆效应十分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为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和内蒙古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落“1+12+26”模式（1个中心馆+12个生态馆+26个村落展室），从2008年10月立项成功，2009年5月开建，将畚民文化、茶文化、扇文化、竹文化、孝文化、蚕文化和书画艺术比较完整地打包建设，2012年建成开馆后，成为完美展示安吉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窗口和平台。

在国家层面，2011年，国家文物局首批力推五个生态博物馆示范点，即浙江省安吉生态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福建省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广西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这五大生态博物馆示范点（贵州和广西各占其一）的隆重推出，对促进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调动全社会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共享、共荣的精神家园，延续中华民族文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原真活态，互动体验：生态博物馆实操的关键词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先生认为：“它（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为不少人接受缘于其‘以社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整体遗产概念的意识 and 认知，对社区公共记忆的动态维护，对原地原貌文化的信息链接以及世俗化方法论下的民主参与机制等非传统博物馆要素的引入”¹，与有围墙的传统博物馆比较，我们可以提炼出如下关键词：

（一）原地原貌的本真保护

传统博物馆对可移动文物或收藏品的保护，大多是异地库房保护。出土的可移动文物或藏家的收藏品经历过层层审批与鉴定的征集环节，入藏库房时会编目、拍照、信息录入，在库房保管时，对温度、湿度和光照度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而生态博物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原地原址原貌的本真保护。以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导建立的贵州从江小黄村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小黄村有七百四十二户，三千三百三十九人，有歌堂五十六个，歌师七十八名，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是生态博物馆保护的核心要素。而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鼓楼、风雨桥，还有小黄村的溪流与山川，作为产生侗族大歌的人文自然环境，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只对道路、灯光做了些技术调整，基本上完整实现了原地原址原貌的本真保护。

（二）以社区为中心的动态保护

传统博物馆以流动的变化的观众群体为目标展览文物或藏品，这些观众群体大多是临时的、变化的、流动的，不可能构成长久的、稳定的社区居民。传统博物馆职工群体相对稳定、相对长久，但职工群体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而不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与对象。而在没有围墙的生态博物馆里，创造民族文化遗产的活态的人，他们本身就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与对象。笔者还以中国民族博物馆曾经主导建设的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有一千二百八十五户，五千零二十人，正是这五千零二十个活态的个人，他们传承了苗族非遗文化中的苗年节、吃新节和十三年一次的牯藏节。他们戴着银光闪闪的银饰，唱着古老的苗族古歌，跳着优美且气势恢宏的高排芦笙舞，而这些，正是西江千户苗寨以社区为中心保护传承下来的苗族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苗民本身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中流动的观众群体，他们本身就是活态的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西江千户苗寨生态博物馆展览的对象与目标。而这些活态的展览对象所居住的平地吊脚楼与斜坡吊脚楼，以及平寨风雨桥和南寿风雨桥，特别是美轮美奂的千户灯光夜景，给西江千户苗寨这座巨大的生态博物馆凭添了可视可感的气质与风度，他们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生态博物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标群体。西江千户苗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美结合，构成了西江千户苗寨生态博物馆以社区为中心的动态保护。

（三）高度参与式的非遗保护

传统博物馆因为场地空间的限制，因为安防技术的要求，其所进行的社会教育活动是有限的、局部

¹ 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问题》，《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四期，第15页。

的,参与程度也是比较低的,那是在围墙之内、庙堂之上进行的阳春白雪式的社会教育活动。而生态博物馆进行的社会教育活动,则是点多多发的、观众参与度高的接地气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进行的社会教育活动。还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在进寨门之前,盛妆的苗族姑娘们列队在寨门前,为每一个贵宾进献“拦门酒”,唱敬酒歌,这可以概括为“暖场”的社教活动。在寨中开放式的舞台,寨中歌手唱苗族古歌,邀请游客或观众跳高排芦笙舞,这可以概括为是苗族民俗文化的互动式体验,是与时俱进的活态传承。西江千户苗寨的长桌宴也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硬菜“牯藏肉”附有赞辞:“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肉就要吃砣砣肉,喝酒就要喝一碗碗。”硬菜“苗王酸汤鱼”,酸爽滑嫩,展示了过去时代苗王的饮食文明;红、黄、蓝、橙植物染料染出的花米饭和象征鸿运当头的红鸡蛋,更是象征当代苗家人五彩斑斓的新生活。印象最深的还是西江千户苗寨特有的酒文化——高山流水,美丽的苗族姑娘唱着酒歌,香甜的米酒从高处酒壶里缓缓流下,流进最低处贵宾的酒碗里,这样厉害的叭当酒让许多酒量惊人的游客也不醉不归。苗族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就在这样有趣的互动式体验中得以保存,得以蓬勃发展,这也是生态博物馆得到社会大众广泛认同的标志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标志,保护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好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2005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了。侗族民谚说:“侗寨有三宝,鼓楼、大歌、风雨桥。”在堂安侗寨里,不可移动文物鼓楼不仅仅是村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侗族人喜爱的集会与议事场所,有了鼓楼才有侗寨,有了侗寨才有鼓楼下“摆古”的老人,才有流传千百年的侗族传说,可以说鼓楼是侗族人浓缩了的精神家园。堂安侗寨里的风雨桥,也是受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在月白风清的夜晚,侗族小伙子弹着心爱的琵琶或牛腿琴,与姑娘们一起“行歌坐月”,风雨桥可以说是侗寨里的“爱情桥”。戏台是堂安侗寨娱乐的所在,戏台上轮流上演的侗戏,是侗族人口耳相传数百年的民间戏曲。堂安侗寨里瓢井、谷仓、水碾、石碓、榨油坊、鱼塘、井亭、梯田和层层叠叠的吊脚楼,都是散发着温度与灵性的不可移动文物,正是它们,组成了堂安侗族博物馆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推介的生态博物馆示范点。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先生在总结推广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落时说:“从传统博物馆的‘馆舍天地’走向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面对多样化的文化资源,进入无限的发展空间。这种将自然生态资源与历史人文资源融为一体,将馆内宝贵的藏品与馆外原真、活态的陈列品紧密相连,突破了传统博物馆与环境之间、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之间、信息与实物之间的障碍,让全县人民成为博物馆管理的主人,是博物馆建设模式的重大创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¹单霁翔先生推广的是安吉生态博物馆的经验模式,其实,用在贵州“4+2”生态博物馆群落、广西“1+10”生态博物馆群落上面,也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操作空间。

四、政策与法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世界意义与国家价值

如果说,没有围墙的生态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利用的民族文化遗产是点对点的村寨保护(社区保护),具有分散性、随意性和共时性,如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落的“4+2”模式,广西生态博物馆群落的“1+10”模式,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落的“1+12+26”模式。那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传承、研究、利用,就是面对面、块对块、区对区的行政区域保护,具有集中性、规划性和历时性特点,如“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简表”(中国少数民族部分)中的十二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又如“人类

¹ 陈毛应、陆健、潘剑凯:《安吉建成世界最大生态博物馆群》,《光明日报》2012年10月30日,第05版“文化新闻”。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简表（中国少数民族部分）”中的十四项中国少数民族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简表（少数民族部分）”中的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后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表（少数民族部分）”中的四百五十五项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一部分，我将从现有政策和法理的视角切入，探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条件要件、规划要件和措施要件，从而明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利用的世界意义和国家价值。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自1975年公约正式生效后，在全球范围内，迄今共有一百八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在1985年也加入该公约。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要件是第一条：“（一）古迹：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成份或构造物、铭文、窟洞以及景观的联合体；（二）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三）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的联合工程以及包括有考古地址的区域。”¹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元上都遗址、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土司遗址和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等在其保护范畴之内。有关“自然遗产”的条件要件是第二条：“（一）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景观；（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地文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到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三）从科学、保存或自然美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²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保护区、新疆天山廊道、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贵州梵净山等，均在其保护范畴之内。

有关保护、保存和展出本国领土内“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一）通过一项旨在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全面规范纲要的总政策；（二）如本国内尚未建立负责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保存和展出的机构，则建立一个或几个此类机构，配备适当的工作人员和为其履行其职能所需的手段；（三）发展科学和技术研究，并制订出能够抵抗威胁本国或自然遗产的危险的实际方法；（四）采取为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这类遗产所需的适当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五）促进建立或发展有关保护、保存和展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国家或地区培训中心，并鼓励这方面的科学研究。”³显然，前文所列的中国少数民族十二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适用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措施要求与法理规定，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更是世界文明互鉴交流的载体与平台。

从国际视野回到国内视角，2008年7月1日，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准入条件要素，该条例第七条列举了如下四条：“（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三）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四）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⁴显然，在国务院分三批公布的一百三十五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十四座在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因为集中

1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720.htm。

2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720.htm。

3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720.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家文物局编：《文物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汇编》，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34～35页。

反映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完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四大入围条件要素,从而进入国家政策保护和财政支持的盘子之内。这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入围,就必须按照国家的要求做好保护规划。该条例第十四条列举了如下五条:“(一)保护原则、保护内容和保护范围; (二)保护措施、开发强度和建设控制要求; (三)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护要求; (四)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五)保护规划分期实施方案。”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还刚性要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¹这个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加强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有利于确立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价值评估体系,有利于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延续性与完整性。

这个条例认定的一百三十五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中,在民族聚居区的有十四座,占百分之十点三七,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宏观的、高大尚的保护名录。比较而言,民族地区名村入围较少。从国家民委部门工作来看,分三批认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二个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村寨范围广、品类多、地理空间大、民族族别齐全,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必要补充与丰富。特别是贵州省,国家民委认定了三百一十二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八点八九,在全国居首位。这三百一十二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涵盖汉族、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满、蒙古、佤、羌等十八个世居民族,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三个自治州、十一个自治县和二百五十三个自治乡。可以说,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从数量到质量再到美誉度,都是全国第一。贵州省生态博物馆“4+2”建设模式以及承办“首届国际生态博物馆学术论坛”,从数量到质量再到国际影响力,也是全国第一。

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工匠精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和利用的有效载体与责任担当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视角看,上文所述民族聚居区的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大都涉及的是遗址,是古建,是不可移动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对它们的保护有其特殊的政策要求和规划措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视角看,中国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三十九项中,其中有十四项是少数民族族群主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九,在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这十四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不仅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治理政策水平,更体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多民族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而且还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2011年11月,应美国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基金会主席贝蒂·麦肯金斯女士邀请,国家民委主办、中国民族博物馆承办的“多彩中华——中国民族服饰展演团”访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与该校艺术团进行了互动交流。来自贵州从江县小黄村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侗族大歌”技惊全场,美国大学生们对侗族大歌里的“蝉鸣音”赞不绝口,惊为天籁。“多彩中华”是国家民委旗下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创办二十余年来,出访过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观众超过百万人次,笔者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为“民族文化走出去”也尽了绵薄之力。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法理基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主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所谓“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

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家文物局编:《文物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汇编》,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特定区域。《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2019年3月1日实施。目前，国家共设立二十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其中民族地区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十个，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二，列表如下：

表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少数民族部分）

名 称	民族地区	时 间	主管单位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	2008年8月	文化和旅游部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	2008年11月	文化和旅游部
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实验区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等	2010年5月	文化和旅游部
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	2010年11月	文化和旅游部
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2011年1月	文化和旅游部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2012年12月	文化和旅游部
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2014年8月	文化和旅游部
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五峰县、长阳县	2014年8月	文化和旅游部
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重庆市黔江区、石柱县、彭水县、秀山县、酉阳县、武隆县	2014年8月	文化和旅游部
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2017年2月	文化和旅游部

在这十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黔东南州辖一市十五县，以苗、侗族文化为主体，兼具水、布依、土家、畲、仡佬、壮、瑶等民族组成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保护区内，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十三项七十二处，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二十六人；有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九十二项二百四十一处，贵州省级非遗传承人一百零四人。可以说，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矿地带，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不仅摸清了黔东南州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同时，也使得黔东南州对自身遗产的保护从“物质”层面上升到“非物质层面”，从“静态保护”层面上升到“活态保护”层面，从“器物保护”层面上升到对器物制作者即“人的保护”（工匠）层面，从而彰显了大国的工匠精神，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代际传承，是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民族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按照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经典解释，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其中第二条主要包括六大类：“（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与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¹毋庸置疑，在国务院公布的四批一千三百七十二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民族地区非遗代表作达到四百五十五项，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六，是中国非遗宝库中异彩纷呈的、奇香扑鼻的文化奇葩。如何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这么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制定了“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

1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1-05/10/content_1664868.htm。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其中第四条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¹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²

综上所述，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与参与者。³生态博物馆，从现实与理想的链接来看，从世界视角与国内语境的比较来看，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多民族文明的互鉴来看，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活态性来看，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来看，都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和利用的最佳模式选择。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好我们民族的根与魂，就是守护好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Eco-museum: An Optimized Choice of Models for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Studies and Uti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Based on case studies of Eco-museum clusters in Guizhou and Guangxi

Qin Dailun

Abstract: The "4 plus 2" Model of eco-museum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1 plus 12" Model of eco-museum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re representative cases in China on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studies and uti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Seeing a wider horizon rising from these spots, this essay is based on researches of the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in China, entries i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national-level, which is intangible with cultural heritages, and the villages with ethnic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was approved by National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It thus aims to explore the involved objects, scopes of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s, and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t also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peoples to explore the legal principles with drafting policies on studies and uti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s, as well as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be taken, craftsmanship in need of, and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being reflected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Eco-museum;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责任编辑：郎启飞

1 胡锦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1-05/10/content_1664851.htm。

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9月28日，第02版“要闻”。

3 习近平：《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贺信》，《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1日，第01版“要闻”。

崔述《考信录》对我国考据学的发展及影响

王云庆 汪 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考据、辨伪学者。其一生著作良多,代表作《考信录》一书被视为我国古代考据辨伪史上的里程碑。《考信录》内容丰富,远至上古。又作有《考信录提要》,详尽地对古代历史中存疑之处进行考证,辨明是非。同时将义理结合,科学地介绍了辨伪的具体原则与方法。不仅对我国的考据学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而且其辨伪思想在现今文献鉴定乃至编纂领域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基于《考信录》的研究,从文献辨伪角度概括崔述有关古代文献领域思想之精华,并加评述,以达继往开今之意。

关键词: 崔述 《考信录》 文献辨伪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20) 03-105-109

一、崔述及其《考信录》的修撰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府魏县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其父元森“自理学及经世致用书靡不究览”¹,毕生致力于经世之学,然而却始终不得其志。因而崔述自幼时起,便秉承父志,受到严格的教育,“每受若干,必限令读百遍,以百钱置书而递传至右。无论若干遍能成诵,非足百遍不得止也”²。在刻苦的学习之下,崔述很快便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诗词章赋,见者皆称奇才。十五岁时赴大名府应童子试,列名第一,受朱熹知遇之恩,得以在家境落破之时继续致力于经史。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却落败于会试。而后刻苦钻研古史,潜心著述。直到五十七岁,吏部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员,崔述才有机会就任福建上杭、罗源知县等职。崔述本想一展胸中抱负,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他在与朱松田的书信中写道:“兼以权不自由,动多掣肘。无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惩,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顿,固已尸位素餐矣。”³可见其无奈。尽管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崔述仍旧清廉为官,卯起亥眠,事事亲督,为当地人建架桥梁,修缮庙宇。嘉庆七年(1802),终于得以归之山野,日子虽然清苦,但他仍笔耕不辍,坚持完成《考信录》等著作。

《考信录》卷帙浩繁,分《前录》《正录》《后录》三部,全书总目三十四种、八十八卷。书中详

作者简介:王云庆,1964年生,山东菏泽市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档案学、文化遗产学。

汪 茜,1996年生,女,山东威海市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档案学。

1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16页。

2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69页。

3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4页。

尽地对上古历史、孔孟之学等进行考证,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考史辨伪体系。《考信录》的诞生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乾嘉时期正是考证学鼎盛时期,考证可以说是时代精神”¹。再者,我们在书中也可窥见其著书的原因,《考信录提要》中记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²众所周知,古代史料多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杂糅,因而需要去伪存真、明辨虚实。基于作者数十年遍览经典、刻苦研究,《考信录》之成书,也不负他平生之所学。然而此书虽经出版,却未在当时引起反响。他的学说,不仅在当时不被人知,而且在他卒后长达百年的时间也消沉无闻,直到二十世纪在解放思想潮流中,才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二十世纪初,崔述的疑古思想传入日本,日本人将《考信录》加以标点排印出来,对日本汉学和东洋史学影响重大。如今,站在新世纪的前端,回顾经典,重新审视两百年前的这本史学巨著,发掘书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文献辨伪思想,不仅仅是对崔述毕生心血的尊重,更是将它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用于指导后世的学术活动,借古以开新境。

二、《考信录》之考据思想管窥

(一) 维真求实, 无征不信

说到“真”一字,上溯秦汉,下至当时的乾嘉学派,维真求实一直是古代文史学家坚守的根本信念,崔述也不例外。在崔述明道经世之学的数十年之中,“求真”一词贯穿始末,从他的书中便不难发现。例如,在阐述汉人解诂之误传时,分别以陶渊明与乌孙公主为例,讲求有证可依。陶渊明作《桃花源记》之后,有韩愈、刘禹锡之人复作桃源之说,然其内容涉及仙道也为一时之误,直至宋洪兴祖,据原文以正韩、刘之说,才使真相得以大白。杜甫关于昭君嫁时琵琶作乐的误传也是有证可备查考的,据石崇之词可证是乌孙公主嫁时之所为。在感叹诸儒之所传不可尽信的同时,崔述也表明了自己求真的决心:“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謫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³再例如,介绍记忆失真篇章中,指出了经多人记载或传播造成失真的情况,因此他总结道:“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⁴此外,《考信录》中每一条辩驳之说均基于一定的史料和实事的记载而展开。如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以《易大传》为据;在辩孟母三迁时,以孟子之说为据,加之逻辑分析,得出三迁之说无非是想表明孟母善教的结论。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崔述著述必先考证,探知虚实。另一方面,大胆疑古也是他求真求实的一种体现。崔述称《考信录》有推广《史通》之意,然而较刘知几而言,崔述的疑古,更为直接地怀疑史料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在疑古的彻底性上比前人更进一步。梁启超先生更是对此赞为“勇气真可佩服”。

崔述的维真求真精神与疑古态度,在今天也仍然是文献考证与鉴定领域的重要理论思想。例如在文献汇编的过程中,面临材料杂糅、虚实不一的情况,自然不能不加考证与筛选而“兼收并蓄”,因而需要对文献材料本身进行鉴定。在具体工作中,大胆对文献资料的来源与可靠性提出质疑,经考证后剔除其中伪误的部分,尊重与保护其真实性。此外,在学术研究领域,“无征不信”的理念更是严谨治学的基本要求,著书立说的每一条论断都需要“无一字无来处”。对于普遍认定的说法也应该秉持存疑的态度,寻求

1 赵光贤:《崔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五期,第56页。

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可信的证据加以考证,而不是全盘接受或是妄加臆测。

(二) 考信辨伪, 方式多样

上文提到崔述著书讲求的是无征不信,对于存疑的文献,有证可考是再好不过的。然而我国历史从上古以迄今日,历数千年,大量的史料文献已经失去了有力的佐证作用,崔述针对这样的史料,提出了一系列的鉴定原则与方法。首先,崔述概括了导致伪书形成的主观因素,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二是‘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三是‘旁采他人,以入古人之书者’。这已经触及历史知识论的问题,应该说是传统辨伪学的一个新发展。”¹其次,又由此衍生出多种文献辨伪的方法。一是从文体文风上来判断,《考信录提要》中记载:“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之有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是知伪托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²简而言之,即根据不同时代文献的体例、文风用法的不同来区分和鉴别。因为凡是伪托原始史料的文献一定会有与相关时代背景相异的蛛丝马迹,所以需要留心观察。与之相似的还有依据著述源流、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鉴别。再者,崔述沿袭了“考信于六艺”的原则,用六经来考证存疑的史料和文献。他在《补上古考信录》中讲道:“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³在《考信录提要》中又言:“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⁴以上足见其以经证史的理念。虽然这种观点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仍具有合理性。因为经书是后世所见,距离上古三代最早的记载,较少甚至没有经过后人附会,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此外,崔述将经与传相区别,提出“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主张。站在文献辨伪的立场上,崔述的考据学思想为具体的辨伪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例如以可信度高、相对权威的文献为基础鉴别;根据时代特点、文体文风、文献来源鉴别等,为后来科学的考证与鉴定程序提供了思想源头与依据。

(三) 传注分类, 便于取信

崔述在撰写《考信录》过程中,“以经中史实为骨干构筑而成。但《经》记事毕竟简略,遇有那些《经》虽言及,然语焉未详之处,则采摭传注中有关史料加以补充,书写格式均低经文一格,以示区别”⁵。简而言之,崔氏在编纂史料中,将早期经书看作是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的材料,而后参考传注进行补充。不仅如此,崔述还对传注进行分类采集,共有补、备览、存疑、附录、附论、备考、存参七种。在《考信录提要》卷下的《后论》中有着详细的记载。(1)关于“补”:“降而书者,不敢以齐于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于经而今旁见于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2)关于“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于‘备览’。”(3)关于“存疑”:“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于‘存疑’。”(4)关于“附录”与“附论”:“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5)关于“备考”与“存参”:“事虽后日之事而有关于当时之得失,言或后

1 邵东方:《崔述学术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3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序》,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5 魏文:《〈考信录〉的编纂体例、刊刻及版本》,《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五期,第58页。

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¹崔述将文献分门别类，依据其可靠性进行分等、筛选后汇编成书。这种做法能够使后来读书之人在充分掌握主体内容，了解是非真伪之余还能参照传注，丰富和加深对相关史实的理解。例如在《洙泗考信录》中关于孔子事迹的考证，就常以《论语》为附录，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崔述将不同种类的传注与正文论述分开，而不是武断地将史料杂糅的做法，一方面为后来人进行文献辨伪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考据之书大多晦涩繁杂，而《考信录》在论述前后善用各类传注，将与正文相关的内容呈列出来，并补充存疑之处，使读书之人条理清晰，逐类取信。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文献的可靠性进行分类，对文献鉴定以及编纂取材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崔述考据思想之局限

对于崔述之学，后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适曾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同时，顾颉刚也认为：“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²由此可见，崔述的考据学思想有相当的部分值得借鉴，对于今日文献的考证和鉴定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崔述的思想仍有不可突破的桎梏。

一方面，崔述考证史料的主要原则是“考信于六艺”，然而在很多时候，由于对六经的过分推崇，导致崔述不易对经书的内容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在《夏考信录》里，他错误地认定《尚书》中的《尧典》《禹贡》两篇是夏代的原始文献，而不加分析地使用”³。顾颉刚先生也对此批评说：“只有司马迁和崔述，他们考信于六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确是一个简便的对付方法。但六艺以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既经有了这些东西，难道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闭了眼睛不看吗？况且就是六艺里的材料也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密的标准呢？”⁴因而，我们可以得知崔述的疑古是建立在尊经的基础之上，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儒家圣道的信仰。对六经的信赖与推崇使得崔述的疑古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圣人的成见，虽然这是封建社会普遍具有的时代局限性，但这也是崔述考据思想的根本弊病。于是，顾颉刚先生在编订《崔东壁遗书》序时便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总之，他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⁵

另一方面，崔述的考证重点放在文献的“真伪”上，认为其非真即伪。这种观点过于机械了。因为同样是从前人留传下来的文献，其中虽然有伪书的存在，但伪书自身也具有一定承载历史的价值。就是说，如果一份文献是伪造失实的，那么它仍然有作为伪造的这一事实的证明和记录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伪误”也是一种“真实”，对此需要的是透析作伪书之人的意图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不仅仅局限于判断是非对错之中。因而只仅仅用真伪两性来辨别史料文献，相对简单了些。此外，造成崔述考据思想局限性的原因，有时代的禁锢，也有自身的原因。崔述的考据思想在当时汉学统一全国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独学无友一方面能够成就他特立独行的思想流派；然而另一方面，其“负性兢兢，不与人妄通一刺”⁶

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2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3 邵东方：《崔述学术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4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5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6 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页。

也使得他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呈现狭隘、主观的色彩。缺席了与当时学者大家的交流网络,也是《考信录》沉寂了百年不为人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侧面警示后人,做学问切忌闭门造车,否则只能出门而不合辙。

四、结语

崔述先生将毕生心血投身于考证经籍的研究之中,不求名利与传世,只将著述看作为“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崔述去世之后,其著作由其门人陈履和整理出版,却少有人闻。从陈履和撰《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对先生著述的热切希望:“老未登第,官又不达,且其持论实不利于场屋科举,以故人鲜信之;甚有摘其考证最确,辩论最明之事,而反用为诋诃者。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真知,天亦必默相此书,传之无穷,履和唯有慎守遗编以待其人而已!”¹笔者每每读此,备感辛酸。胡适先生也认为如此德才兼备的学者及著述却被时代埋没了百年之久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因此,本文在介绍崔述文献考据思想的同时,也是出于对崔述先生的敬佩而欲宣扬之。

总而言之,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尊重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关键,还是要将之转化为今日之实践。以崔述先生为例,后人需要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充分应用于日后的工作与学习的实践中,化经验为动力。当然,对于其思想中的局限,应该以此为戒,注意反思,从而为发展的前路扫除障碍。借古以开新境,重新发掘沉寂于历史中的古老智慧,让后来者在漫漫前路上与先人同行。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Cui Shu's the Book about Textual Criticism on Chinese Textual Research

Wang Qingyun Wang Qian

Abstract: Cui Shu was a famous historian of the Qian-Jia period in Qing dynasty. He wrote lots of books. His masterpiece is the book about textual criticism and it i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forgeries in ancient China. The rich content recorded as far as antiquity. He also wrote the abstract of the reference books. These books had some researches on the doubtful points in ancient history in detail and clarified right and wro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He combined the argument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detection of forgeries.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his ideas also make sense in today's document identification and literature compilation. This exam were based on the book about textual criticism. From the view of the document identification, we will briefly tell about the essence of thoughts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Finally, we should review it in order to use ancient wisdom and open a new border, which is a meaningful thing.

Key words: Cui shu; the book about textual criticism; document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黄万机

¹ 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44~945页。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李湛轩自叙年谱》考论

祝 童

(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李忠鉴自撰《李湛轩自叙年谱》稿本,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是谱一方面勾稽其族李朝仪、李端棻二人行迹甚夥, 尤其记载了李端棻编修翰林、提督云南、恩赦回籍等重大史实, 可补史之阙; 另一方面还述记谱主体恤民苦、劝学课士、平乱靖边等政绩, 为学界考其生平事功提供了直接佐证。要之, 是稿虽为简谱, 然家事、宦事皆能窥其大略, 诚为研究李忠鉴生平和黔中李氏一族之第一手文献, 具有重要之史料价值。

关键词: 《李湛轩自叙年谱》 李忠鉴 李朝仪 李端棻

中图分类号: K8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20) 03-110-114

《李湛轩自叙年谱》不分卷, 李忠鉴撰, 稿本, 贵阳舒氏五之堂旧藏, 今入藏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册页装, 一册, 三十三页。页宽十五点八厘米, 广二十五厘米。无界栏, 每页九行, 行三十余字, 全谱近万字。从笔迹、内容来看, 初稿作于宣统元年(1909)谱主六十岁时, 二年(1910)、三年(1911)各增补该年之行迹。各叶版心略残数字。行书, 有黄山谷、赵松雪意, 格当逸品。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失收。2019年6月据稿本收入《贵州文库》,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李忠鉴(1849—1914), 字镜心, 号湛轩, 贵州贵阳人, 附生。先, 入云贵总督岑毓英幕, 随其叔父李端棻督学云南, 保荐县丞。光绪元年(1875)指分云南候补, 旋升同知。后历任永昌府龙陵同知, 署文山、蒙自知县, 元江知州, 有政声。二十三年(1897)改省四川, 署叙永知县、泸州知州, 政声益闻。二十八年(1902)补授成都府水利同知, 以病开缺回籍。三十年(1904), 创办贵州商务总会, 三十三年(1907)任总理。卒于贵阳。

《李湛轩自叙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谱主李忠鉴生平行迹, 虽为简谱, 然家事、宦事皆能勾稽大略, 为研究李忠鉴生平和黔中李氏一族之第一手资料。

一方面, 《年谱》所涉家事多可补史阙。李氏为黔中名门, 祖籍湖南衡州府清泉县(今湖南衡阳), 曾祖因“家事中落”(据《年谱》)来黔(一说受朝廷征调入黔), 分朝桢、朝杰、朝英、朝显、朝仪五房。自叔祖李朝仪而下, 父辈端棻、端棻、端渠先后博得功名, 为著名之“一门四进士”, 此中尤以功勋卓著之李朝仪、衰世请折之李端棻二人名重士林, 而《年谱》所载二人行迹甚夥。

李朝仪(?—1881), 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 以知县分发直隶, 先后任平谷、三河、大兴知县。咸丰三年(1853)署南路厅同知, 次年任东路厅同知。五年(1855)灭蝗救灾, 随僧格林沁在

宁河、营城、北塘、大沽等处修筑炮台。九年（1859）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进攻大沽，协助僧王击退大沽口英法联军舰船。十年（1860）分办直隶团练。十一年（1861）后任顺德知府、广平知府、大名知府。同治八年（1869）因曾国藩保荐授永定河道，治河有功，成绩卓著。光绪五年（1879）升山东盐运使，署山东按察使，改任顺天府尹。从《年谱》来看，同治六年（1867）腊月，李忠鉴因堂兄忠赞之约，“赴直隶励学，俟服阙纳监北闱”，寄居“藻舟五叔祖署”。在署前后两年有余，李朝仪任职广平、大名二府，继又升任永定河道，正是其宦途彰化之际。两年当中，李朝仪命忠鉴同端树、端槩两子先后师从廖晋轩、魏云帆、董辅卿、□鸿卿四先生就学，既得切磋之便，又转益多师，学业大进。《年谱》载：

廖师势利横中，故抑寒贱以扬贵胄。赞兄既破盘缠，复闻讥评，大有悔意，时露怨词。所弃之旧衣滥帽，藉资蔽体。形状尴尬，气阻神丧，惘惘若患神经，骤起傻子之谤。作文不检，廖师以为有意侮犯，辄怒辞馆。五叔祖训责慰留，卒改师魏云帆先生。（己巳1869）

计从叔等讲学两年，除本已带往各读本外，未能添置一卷。间尝窃读九叔架上各书，须深夜人静，携入卧处，次晨仍归置原架。（庚午1870）

事实上，李忠鉴十七岁时丧父，经济骤断，拮据无地，全凭堂兄李忠赞一力扶持。所赖寄居朝仪署，得五祖父祖母多方照顾，既“耗五祖之学金”，时给盘费，又蒙五祖母“惠给汗褂小衣各一件，袜子一双，年以为例”。但毕竟寄人篱下，“万里依人，老少难堪”，只能“时时窃读九叔书籍”，加上本身衣食无源，处处显得蹇蹇寒酸，因此心情“抑郁不舒，神思瞀乱，局促堪嗤”。最终还是在顺天府乡试时“无力纳监”而返回黔中。与李朝仪此别之后，忠鉴仅在三十一岁时赴京面晤一过。虽是，李朝仪对其影响自不言而喻，在忠鉴五十五岁退居黔中之后，尚“倡捐五百六十金，为藻舟五祖建立专祠”，可见祖孙情谊之一斑。

李端棻是家族中对李忠鉴影响最大之人。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幼年弃养，与母相依为命，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咸丰二年（1852），补博士弟子员。同治元年（1862），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擢内阁学士。同、光两朝颇受知遇，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迁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请推广学校折》。二十四年（1898）擢任礼部尚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流放新疆，滞留甘州。二十七年（1901），赦回贵阳，致力于教育直至去世。从《年谱》来看，在忠鉴九岁时，端棻“诣直隶”，投奔李朝仪。十四岁时端棻“联捷成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年谱》载：

是年，棻叔成翰林。先府君训鉴弟兄曰：“吾有惠于棻叔，异日尔辈当获庇荫，惜吾年老，已咸托之矣。”（癸亥1863）

李端棻幼年丧父，各叔伯兄长对其多有恩惠。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入翰林即可谓飞黄腾达之始，从忠鉴父之重托便可窥一隅。而“异日尔辈当获庇荫”，亦确有其实。同治年间李忠鉴在五叔祖李朝仪署中求学时，便常受李端棻襄助（自京都返黔时“棻叔给京大钱五十千”）。《清实录》载，（壬申1872）五月丙午，“命云南学政汪叙畴来京，以翰林院编修李端棻提督云南学政”。¹（丙子1876）六月癸丑，“云南学政李端棻丁忧，命翰林院编修李岷琛提督云南学政”。²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四年，而忠鉴于同治十一年（1872）便赴滇投李端棻幕中，随侍前后，实为其人生之重要经历。《年谱》载：

措貲赴滇，投棻叔督学幕中，襄办书启，并分校试卷。蒙五祖惠赠娶妇银三十金，由棻叔拨

1 沈桂芬等纂：《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页。

2 沈桂芬等纂：《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给。(癸酉1873)

随菜叔考试迤东四棚澄江、临安、广西、曲靖,回省试首府。秋后考试迤西四棚楚雄、大理、永昌、景东。试毕旋省。值岑襄勤汇奏克复大理、蒙化等处奖案,波及各署幕友,蒙菜叔荐保,以花翎县丞归部选用。(甲戌1874)

随菜叔将东四棚科试考毕,请假回黔应恩科乡试。蒙菜叔算给年修一百金,合随棚所得幕修,共三百餘金。付往来盘费外,约餘二百之数……婚后,计菜叔学任将满,托友人贷款将所保县丞指分云南,随即起程,腊初缴咨禀到。(乙亥1875)

春间,随菜叔出试西路四棚。(丙子1876)

其时云南“动乱”甫戢,民生凋瘵,文教颓然。李端菜任一方学政,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文教发展。《清史稿》载:“(云南)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菜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¹此间忠鉴得以随侍,“襄办书启”“分校试卷”,四方奔走,为官、为学、为人等诸方面当获益不少。不仅如此,李端菜还趁巡抚岑毓英(谥“襄勤”)戡定滇乱上陈奖案之机,荐保忠鉴以花翎县丞归部选用,对其提携尤重;而忠鉴在滇数年,情形俱熟,故在端菜即将任满之际,还“托友人贷款,将所保县丞指分云南”,以求相宜之便。在此之后,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菜奉旨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时忠鉴“奉委广东提运军火”“从广南一路诣广东”,正“值菜叔主试广省,初撤闱,为校勘闱墨,及进呈各卷”,借机在端菜幕下游走。²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朝廷却迟迟没有处置李端菜,端菜心感彷徨,于八月十九日上《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折》以求朝廷降罪,被即行革职,发往新疆。在端菜落魄之际,忠鉴亦多方筹措经费,足见叔侄二人堪为相得。《年谱》载:

菜叔因保举人才,发谴新疆,函由墨卿弟送程仪银二百两。(戊戌1898)

菜叔由戍所释回,路经叙永,留住十日,筹夫马费送黔约用银六百餘两。(壬寅1902)

端菜滞留西北三年,二十七年(1901)受“恩赦回籍”,次年途经四川叙永,往还皆受到忠鉴接济。端菜回黔后,曾作诗《买屋甚惬意不果得》:“觅得城隅屋数椽,全招远岫到窗边。楼环嘉树常生静,园有寒蔬可摘鲜。无奈探囊太羞涩,遂教酬绢费周旋。长安第宅知多少,瞬息沧桑一慨然。”³尽管前得张之洞、李忠鉴等亲友照料,但毕竟年迈体衰,知交零落,入不敷出,自无力购置居所,只能抱膝高吟而已。据《年谱》明确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遇有闲暇,忠鉴便“侍菜叔杖履作乐”。事实上,在各自经历宦海浮沉同寓贵阳之后,其时之叔侄二人,非但有血缘连脉之份,更兼有诗友唱和之情。

另一方面,《年谱》为忠鉴生平事功提供了直接佐证。忠鉴宦途虽未臻显达,然其自幼受五叔祖李朝仪、叔父李端菜之影响,凡所治之处,详察社情,与民同苦,致力兴教,平靖动乱,多有实绩。《年谱》载:

正月,奉调办镇雄厘金。鄂宪抵滇,念恤民艰,示令“肩挑背负等□概免征厘”,解数大减。

迨鄂宪因案获咎到京,继其任者严行征取,豁免易规复难。张弛之际,大费劝导,年满告交。(癸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39页。

2 《清实录》载(己丑1889)五月丁巳,“以内阁学士李端菜为广东乡试官,翰林院编修王仁堪为副考官。”(《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8页)又,《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载:“光绪己丑,以内阁学士典广东试。”(梁启超著,林志均编:《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四上,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第2页)确知李端菜主试广东,在光绪十五年(1889)。《李湛轩自叙年谱》行文有回忆成分,把为端菜“校勘闱墨”“进呈各卷”事系于光绪十四年(1888),当误。

3 李端菜:《苾园诗存》,许先德、龙尚学编:《贵阳五家诗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未1883)

七月,委署元江直隶州。旧例州牧住兴隆厂避瘴,州吏目驻城经理监狱、仓廩。鉴思一邑之事,贵在州牧,已住乐土,而听吏目住瘴乡,公理、人情两有未愜。竟奉母携眷前诣州署,除棘斩荆,亲历城阙,招募书役,清厘街保,民皆乐附。(甲午1894)

李忠鉴在镇雄襄办税务时,“念恤民艰”,反对严行征取;在任蒙自知县(癸巳1893)时,勒令天主教退出“串买”的民宅,“微服独往”勘悉审讯霸占他人田土之豪绅;在任元江知州时,一反知州离开州城避瘴的惯例,“除棘斩荆”“招募书役”,携全家住城中州署。其体恤民苦,实为廉吏。不仅如此,举凡任职各地,忠鉴皆大力兴办教育:

在文山署任,劝学课士,捐廉作奖,士风丕变。(壬辰1892)

创立月课,俾四乡之好学能文者月课一次,共与讲论,士颇来归。(甲午1894)

蒙化士秀民驯,土田腴美,讼简务闲,日与士子讲习考究,比他邑劳逸远判。筹修街房数十间,为书院添贻膏火。(丙申1896)

奉飭改良学校,当为地方筹款,就书院广修学堂,派丁赴上海购买新旧两学应用书籍,供学堂讲习研究。(壬寅1902)

筹将行台改修中学堂,并于城乡创立小学堂十数处,均为之各筹经费,以期久远。(癸卯1903)

李忠鉴在文山、元江、蒙化等地任职时,皆“劝学课士”,兴建书院,尤其是在元江时,不仅不避瘴气携全家住在城中,而且还“创立月课”,同“四乡之好学能文者”“共与讲论”;受叔父端棻影响,任泸州知州时,还积极改良学校,筹集经费,兴建新式中小学堂,购买新学书籍,为各地教育皆作出了贡献。此外,李忠鉴还颇富谋略,有多次平乱靖边之功:

三月,委署开化府文山县。府尊石晋卿太守,广西人。时当游匪扰边,民居不靖,到任后,力办乡团,整饬保甲,强者惩之,弱者扶之,虎而冠者抑之。初腾毁谤,久知鉴无私心,相服相安,边境赖以宁谧,上峰檄留一年。(辛卯1891)

在文山知县任上,面对“游匪”,其制定惩强扶弱之政策,尽管一开始遭到毁谤,但因全心为民,故终能和太守“相服相安”,边境亦得安定,忠鉴也因功檄留。在军功方面,最值得称道的要数其署理叙永厅时襄定“平成之乱”一事:

二月,成都府刘幼丹太守以叙永党匪滋患,力言于大府,委鉴前往署任。履境时,平、成两会党众械斗抢劫,民不聊生。参府翁文卿率兵弹压,恃众怙抗,两城惊扰,夜寐不宁。查知平会为江湖亡命,成会为团绅保正,始而以成制平,继而蔓延势重,两相持拒。民则平至顺平,成至顺成,杂糅裹混,官权失驭。又武营弁兵半平党,文署书役半成党,地方官一举一动,境以内无不知者,偶一偏视,立见戎机。鉴从容抚治,喜怒不形,一律以良民待之,若不知其有会党者。一面示令各安生业,从前械斗恶习,概不追究,后此则重办不宥。众心稳靖,择办首恶数人,余多敛遁,地方初平。(己亥1899)

川南一带,清季以来匪患猖獗,光绪朝尤烈。“平成之乱”,关捩在官匪勾结,社情复杂:会党中既有“江湖亡命”之徒,又有“团绅保正”,且弁兵相半其间,而普通民众则只能望风依附,“杂糅裹混”。忠鉴走马上任,勘察情势,洞察人心,“喜怒不形”“从容抚治”,任职前后两年,相继擒办“首恶数人”,驱散会众,最终抵于安靖(庚子1900)。壬寅(1902)调署泸州直隶州知州。在知州任上,逢护理四川巡抚的布政使陈鹿笙做寿,省上友人代送寿礼“粗疏菲薄”,陈“含怒于心”,旋令撤任回省。

未久，总督锡清弼以忠鉴“在泸别无劣迹”，檄还泸州任。回泸州不久，属县合江被匪劫场，署理合江知县的赵某捏报军情，忠鉴受到总督申斥，并命亲赴该县查办。查办结果上报，总督又认为“讳重就轻”，在成都的候补官员们又从中煽惑，忠鉴遂被撤职。等待交接期间，他又赴合江，督促缉拿劫匪，前后缉获十二名，会审政法。交接后，钱粮清楚无亏，赴省城面见总督，总督面有惭色，命他仍回合江协助州县缉捕劫匪。经此两事，他深感“近时仕宦，是非不计，专以喜怒为取舍”（癸卯1903），如继续周旋其中，又需“颠倒迎合，是非罔辨”，遂决意辞官。到合江，借口“过黔查办”“实则挂冠归里”。时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十五岁。

要之，《李湛轩自叙年谱》，因其为自撰，故具有可靠之史料价值。从中不仅可以详细了解李忠鉴宦途生涯，对清朝重臣李朝仪、李端棻生平事迹之观照亦大有裨益。事实上，黔中李氏一族，虽仕途显达，但因多乏于著述，故相关史料颇鲜获见而多赖旁证。今《李湛轩自叙年谱》之发见、出版，庶几拨云见日，可补文献之阙。

Research and Reviews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Collection “The Auto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Li Zhanxuan”

Zhu Tong

Abstract: Li Zhongjian wrote the manuscript The Auto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Li Zhanxuan, which is in the library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On the one hand, it records the traces of the two people, Li Chaoyi and Li Duanfen, and especially records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 of Li Duanfen such as the revision of Hanlin, being an official in Yunnan, and his return to Guizhou, thanks to the Emperor's pardon,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record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of Li Zhongjian, such as compassion for the people, teaching students, and safeguarding the border, which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academics to research on his life and contributions. The main point is that although the manuscript is a brief chronology, family affairs and official deeds can be outlined. It is the first-hand literature to study Li Zhongjian's life and the Li family in Guizhou, and it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The Auto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Li Zhanxuan; Li Zhongjian; Li Chaoyi; Li Duanfen

责任编辑：王尧礼

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之一）

胡海琴 整理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 要：贵州省博物馆藏《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清稿本一册，为清代贵州省石阡县乡绅成其济自撰，分年叙述其所经历的生平事迹和家族事变，又颇多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战乱的记录，为研究石阡成氏家族和贵州省近代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关键词：成其济 自撰年谱 咸同起义

中图分类号：K8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115-130

《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清稿本一册，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几年前随王尧礼、陈昌繁诸先生前往省博物馆寻访，得为一观。《年谱》颇多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战乱的记录，为研究贵州省近代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因整理点校，并略作介绍，供相关研究者参阅。

《年谱》为清代贵州省石阡县乡绅成其济自撰并楷书誊清，封面楷书题“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其后是成其济后世孙成启宇所书介绍文字。观其文字，封面亦为成启宇所题。原本年久破损，已经收藏方裱褙一新。但可惜《年谱》中七岁前之内容，仅存残页，已无法辨识。据成启宇“简介”所言，《年谱》是成氏后人于1955年与李文田书赠作者的对联一并捐赠省博物馆。“简介”作于1979年3月22日，所用纸张与修复纸同，可知修复时间当不早于此。“简介”未言捐赠者为谁，推测当是成启宇，省博物馆修复后，请捐赠者题签并作简介，自是理所当然的事。成启宇先生是石阡成氏后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933年毕业于北师大。早年献身教育，在广西、北京、四川、贵州等地中学任教。1941年回家乡石阡创办行健小学，并任石阡中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石阡县委副书记、铜仁专署建设科科长、铜仁地区政协副主席、贵州民族学院预科主任、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1989年逝世，寿终八十三岁。据《成氏族谱》记载，《年谱》作者成其济为成启宇十六世祖。

成氏家族为晚清石阡望族，世居石阡城南十八华里的下屯，紧靠石阡河西岸。成氏家族世代耕读，诗书传家，自乾隆时期起已有科举入仕为官者。民国《石阡县志》卷八《选举志》中多有记载成氏家族成员之情况：

成人，乾隆乙丑进士，签分江西即用知县。

成世瑄，人之曾孙，嘉庆丁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江宁布政使，署两江总督，别有传。¹

成世理，世瑄五弟，道光甲午举人，大挑一等，官山西赵城、武乡等县知县。²

成其济，世理子，咸丰辛酉拔贡。³

作者简介：胡海琴，1984年生，西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现供职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1 民国《石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四十七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78页。

2 民国《石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四十七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82页。

3 民国《石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四十七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85页。

成其济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字小樾，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候选通判。卒于光绪二十年前后，享年六十岁左右。其父成世理，字君佐，号樾生，道光五年（1825）拔贡，十四年（1834）举人，大挑一等，官山西越城、武乡等县知县。其伯父成世瑄，字师薛，号琨圃，亦号兰生，为“石阡三杰”之一。嘉庆十八年（1813）乡试中举，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出官杭州知府、江宁布政使等职。鸦片战争中署理两江总督，力主抗战，积极组织抗英斗争，后忧劳成疾，卒于任所。善文辞、工书、能画，行书清婉，于帖学尤有功力。民国《石阡县志·人物志》中对成世瑄、成世理之生平、事功均有详细记载。

成氏家族至成其济一代已走向衰落，成其济并未做官，只是一个拔贡。作为一个世有耕田的地方乡绅，他的一生主要是依靠着家族遗产过活。他生活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正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清末农民大起义时期。僻处西南的贵州，各族人民不堪忍受清政府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起义，反抗与镇压之烽火延烧二十余年，史称“咸同之乱”。成其济生当其间，作为地方望族之士绅，他曾组织带领团练与起义军为敌，维护封建士绅阶层之利益。

这本《年谱》写于成其济晚年，但其一生之行迹并未写完，只写到三十六岁。据石阡成氏后人言，《年谱》是成其济在晚年集其生平所记载的相关资料而成，因其中涉及到历史事件，成其济在写到三十六岁之行迹时，没有继续往下写，而是花了多年的时间收集、考证相关历史史料，以核查充实年谱记载的相关内容，直至其去世。故这本年谱记载的历史事件，既有其亲身经历，也有其收集考察之资料。《年谱》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编年记述作者之生平事迹、家族故实和地方大事，是研究石阡成氏家族及石阡一郡的第一手资料。石阡成氏为清代地方望族，自清乾隆时期起诗书传家，代有人出。特别如其家族中的成世瑄，官江陵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鸦片战争中卒于任中，鞠躬尽瘁，功绩卓著；生平为官清廉，爱民如子，百姓颂为青天。其在杭州任上时，丁父忧扶柩回籍守制，“扶柩出城，士民咸焚香奠酒，及舟次，泥首拜伏者犹不绝。一时目击者啧啧称羨，谓杭人爱戴，定国魏太守以后仅见也”¹。成世瑄病故后，家人将其灵柩运回石阡，百姓自发相送，沿长江而上数千里路，沿途“匪盗猖獗”，得到民船一站一站护送而安全回乡。“时长江盗贼肆扰，行旅寒心，幸方伯公遗爱在民，沿途反得民船互为伴送，至江西境始解严焉”²。成世瑄又善文辞、工书能画。时人为其作《西湖鉴影图》，一时名流争相题咏。这样一位贵州先贤应该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成其济之父成世理辞官归里后，作为一方乡绅，在石阡也颇有影响力。至今石阡尚有成氏墓群之遗存。关于成氏家族的研究，目前只有零散的文章提及，贵州世家研究尚未涉及。一方面也是因为资料难见，少有人知。此《年谱》中记载了成世瑄的相关事迹，如在鸦片战争中之功绩，以及逝后归葬之情景。但因当时成其济尚年幼，应是听闻长辈所言，纪事时间上或有出入。《年谱》中也详细记载了其父成世理中举为官之经历、功绩以及辞官归里的境况等，记载较为详细。也涉及到其家族与杨芳、罗绕典等黔中名人名宦交往的情况。是研究成氏家族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杂用“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记载了作者在咸同社会剧变中亲历之事件以及相关历史事件。这是《年谱》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成其济作为“咸同之乱”的亲历者，在这本年谱中，详细记载了咸同年间贵州石阡及附近的思南、余庆、铜仁等府县境内起义军及江西境内太平天国起义军等各方面的见闻。因他当时曾带领团练与起义军对抗，有些情况为亲眼目睹，记事真实；又其记录的时间与农民起义之时间相隔不远，可谓当时情形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年谱》中记载了农民起义之初，各府州县派驻军粮，名目繁兴，逼索勒捐，以至“乡户自此无宁日”的情景。其初始苗疆起义频繁，而官府昏聩无能，只知威逼扰民，以至“遂坚从逆之志，生苗、熟苗

1 民国《石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四十七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38～539页。

2 《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手抄本。

由此联为一气。……苗与汉自此成不共之仇矣。同时各府县群苗蠢动，驱逐汉人无遗，驿路断绝人踪”。虽然成其济作为官绅阶层，但从《年谱》中之记载来看，他对农民起义发生之原因以及苗疆民众不堪压迫的状况有较清楚的认识。

《年谱》依次记载了遵义杨龙喜，铜仁徐廷杰、梅济鼎红号及毛大仙、李太子，思南刘义顺等各股义军起事的情况，不仅记述起义之事，也对起义首领之生平、起事之原由、起事经过等作了详细记载。咸丰九年二十七岁时，成其济因“携内子护送岳母杨宜人自家启行赴江西”，又经历了江西境内起义之混乱局面，《年谱》中记载了太平天国李秀成部进攻建昌府时，攻守双方相持和太平军内部分裂相斗的情形。因是其亲身经历目睹，记载也较为具体。回到石阡后，又遭遇石阡几次围城。混战之中，经历了亲人逝去、四处奔逃、家族离散的境况，也亲眼目睹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虽然成其济是站在士绅阶层的立场上来记录相关事件，但对社会失序后民生之困苦以及官府的横征暴敛、昏庸无能也多有记载。特别是对咸同战乱中民生之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所记述当时战火之下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读来令人悲戚心惊。如《年谱》中记述逃亡中的平民：“出城遍访乡邻，尽属鹄面鸠形，状同鬼魅。而倒卧衢路者，则气息仅属，不复识认矣。又见群聚旅食，则有剥树皮捣饼者，有焙焦稻草为末者，其刈隔青草煮食者，则大半而是。”甚至也“曾亲见有同类相残者”。“腊尽风寒累日，饥寒交迫，而饿殍盈城下，沿河死者不下千人”“每硐男妇老幼多或一二千，少亦数百人，莫不骈肩叠股，焦烂溃裂而殁，婴儿偶以含乳得不绝，数日犹有婉转母怀左右者，令人不忍目睹”。由此也可窥见史称“咸同之乱”时期的悲惨的历史情形，在黔中腹地延烧二十余年的战火，无论苗汉，皆未能幸免，漫长的战乱给清末贵州各族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苦难。这本年谱对当时亲历历史事件的各方面的记载，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因此年谱较长，约有五万字左右，故分为上下两次刊载，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之史料。本篇系文献整理，原文中对少数民族、起义军的称呼与评述，或带有不公正性，甚至是侮辱性，但为保存文献原貌，尽量不予改动，敬请广大读者鉴之。

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

十九年己亥 年七岁

八月初十日，四弟丽江生。

是年春，仍从蔡师读书臬署。五月，外舅李和轩夫子至自京，师旋辞馆入都应顺天乡试，留外舅授读。外舅氏壬辰亚元，甲辰大挑一等，历任江西广昌、分宜、彭泽、永宁、丰城等县，以老致仕。初未第时，馆马溪朱氏近十年，教炳南孝廉圻及其群从质甫、伟堂辈八九人，相继掇科游庠，及门无白衣。解组后，朱氏复延馆其家，又教其子若孙皆成名焉。在臬署时从学者，余偕会东、幼兰两兄及御湖、古腴两侄而已。

二十年庚子 年八岁

春间仍从外舅读。五月，方伯公升授江宁布政使司，阖室随任金陵。外舅解馆回黔，至藩署，从中表王崧龛夫子福堃读。度岁后，即辞馆入都会试，旋成进士，分发广东，历任龙川、归善等县，荐升知府。是科方伯公监临江南乡试。

二十一年辛丑 年九岁

是年延在籍翰林院编修方伯雄夫子俊授读，上元县人，后官云南迤西道。塾设藩署瞻园之“云外天香”，先大夫书室在岸舟。一日饭后入塾，循池绕过岸舟外，度小桥，傍古柳下俯瞰游鱼，栏槛摧折，仆跌池中。姊丈王午亭遥立回廊下，闻池水震荡，恍见髻发红绳浮漾池心，狂呼无应，抢步墙外，遇役夫景

福，挽至池边，促其和衣溺水曳起，余已昏不知人矣，半晌呕水数升而苏。此初次溺水也。秋，先大夫挈眷回里，将送伯姊出阁。乘坐红船泝长江而上，冬初泊舟蕲水守风，遇¹严州府官眷回湘，坐船同缆江岸。是日，天寒风峭，前后舱门齐闭。余窃出船头，与邻船童子相戏。渠闻呼进舱，余独戏船边，左右分踏两船。风荡船开，身即栽跌下水。初时犹知极力上冲，因船复合拢，头触船底，仍又坠下，甫及半，又向上冲。时船头独老舟子倚篷斜卧，猛觉人声啁嘶，疾起张皇四望。船适漾开，瞥睹水面微露顶发，急伏船舷，以两足蹬开邻船，使其不复挤拢，狂呼舟子，一手挽定拴紧铁锚²大绳，纵身下水；一手挽余而起，约历数刻之久。此二次溺水也。两次皆于意外遇救获生。吁，亦险甚矣。十二月初抵里。

二十二年壬寅 年十岁

二月，长妹琼仙生。

三月，伯姊昭姑病歿。嫡母方太宜人出也。体本羸弱，夙患咳血症，抵家浹月，日渐增剧。一日晨起，忽晕绝，一时许复苏，顾谓太宜人曰惫甚。太宜人急抚之曰：“顷汝何往？”曰：“适到城隍庙，路甚平直，觉比往时喧闹。至门外，瞥见庭下人极众，多著穷袴，且有寸缕不著者。某姆某氏为所熟识，并立廊下，颜色惨沮。欲前问讯，有叟拦坐门槛，不容进内，谓过十八日来，促令迅归，送至藕田边，指我曰‘至矣’，豁然而醒。”及二十日，果卒。

四月，方伯公终于位。上年，啖咭喇犯顺，寇宁波，两江制府裕鲁珊官保谦奉命督师浙江堵御。逆陷定海，我师溃退，制府殉焉。江苏抚军梁芷林中丞章钜接署督篆，提兵上海。江宁布将军充参赞大臣，偕扬威大将军奕山驻苏州，金陵惟方伯公一人支撑。正月，梁中丞引疾得请，江苏藩司程晴峰方伯裔采接署抚篆，方伯公护理督篆。新简牛镜唐制军鉴巽懦畏蒞，到处逗遛。金陵省会，军务倥偬，兵差络绎，日督府县备船备夫，开局筹款，铸制炮械。又值江淮水灾，难民充斥省垣，倡捐巨款，筹给赈抚，簿书填委。扬威拥兵久驻，不以军事为急，日惟责索供亿，羽书旁午，催提军中一切应用，动以危词恫喝。夷船已窜长江，游奕象山、焦山一带，镇江府城旋被攻陷，屠戮甚惨。方伯公独持危局，事事棘手，忧愤时形，日咯血数升，四月初即已不支。因省垣戒严，人情汹惧，未肯稍萌退志，誓以身报殊恩。至十七日，竟以不起，垂危时犹兢兢以力顾溃局，委属首府樊太守。公歿未几，金陵被陷，蹂躏不已，当事遽以议和终焉。

五月中，先大夫接到家报，星夜驰往迎护方太夫人，及搬移公柩，自家廿五日而至金陵，捷速出人意表。至时，夷船炮弹已飞落城下，相距四十里外停泊。城门久闭，一家正皇皇无主，先大夫即谒将军商请令箭。开城半时，送太夫人及灵柩登舟，夜即解维上驶。时长江盗贼肆扰，行旅寒心，幸方伯公遗爱在民，沿途反得民船互为伴送，至江西境始解严焉。九月柩至，初卜葬覃家寨，次年改迁于蜂桶坡。

是年初自任所归，附观音阁塾，从同里曾小鲁夫子继孔。镇远府廪生，先大夫及门也。

二十三年癸卯 年十一岁

正月十四日，次妹元仙生。

是年仍附观音阁塾，从小鲁先生。十月，二伯父橘生公卒，遗命即葬覃家寨圻中。未几，姻戚果勇侯杨诚村官傅芳至，以方伯公次女仲仙姊原字其长孙恩柯，亲来迎去京邸故也。留其度岁，主持分析产业。腊初分爨后，余家移进新修大宅，迎方太夫人暨三伯母王孺人同居。先大夫旋启行北上。

二十四年甲辰 年十二岁

是年赁朝门曾姓厢房，专延小鲁先生教读。

先大夫春闱不遇，榜后更名。旋大挑一等，签掣山西知县，四月领凭到晋。时中丞梁沁芳先生尊涵，

¹ 遇，原作“与”，据文义改。

² 锚，原作“猫”，据文义改。

山东荣成人，为方伯公癸酉同年；方伯乔见斋先生用迁，湖北孝感人，昔官侍读，与方伯公为日南诗社旧侣；廉访罗苏溪先生绕典，湖南安化人；冀宁道劳辛阶先生，湖南善化人，皆先大夫乙酉同年；首府陆稼堂先生应穀，云南蒙自人，又都门夙好。先大夫初至，即为各上台垂情优待。五月，中丞调阅课卷，同事多新科即用。六月，观察复延阅卷。七月，中丞调阅决科卷，题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同事即用浙江某君，新科少年，校阅颇草率。先大夫偶过，获见一卷批语云：“未见文情斐亹。”匿笑不止。次日某君以病谒假，不及毕事而出。所阅五十余卷，先以特赏之卷面呈中丞，以前列相许。中丞颇不谓然，俟其退后，即取所校诸卷，命先大夫覆阅。内中郑汝侑、牛曰义两卷并为斥弃，涂抹太甚。先大夫悉心披阅，袖谓诸同事曰：“此二卷文情均静细无匹，理窟中有掉臂游行之趣，恐非老手莫办。”诸君传观，同声激赏。乃就所涂墨处盖以浓墨密圈，批语亦逐处更换，呈之中丞。明日，中丞语先大夫曰：“牛生卷几遭摈弃貽笑，非君莫识，允堪压卷。”竟置第一，而外间已盛传其事矣。本科同领乡荐，牛连捷成进士，官部曹。丁未科，郑亦相继捷南宫。两君皆于乡榜后执贄称弟子焉。

是科山西乡试，先大夫充弥封官，有首题“攻其恶，无攻人之恶”拟程。主试匡鹤泉源、杨昆峰天柱两太史及监试劳辛阶先生，咸击节称赏。辛阶先生尝于广坐中语先大夫曰：“闾艺殊少愜心贵当之作，多以人已对翻，纠缠不了，不知去题已远。必如尊作，其字勘得真，攻字诂得透，下五字不烦言而解矣。要如此力争上游，方见庐山真面。惜乎不与分校，披沙拣金，令人耳目一新也。”

八月，先大夫闱差销后，即奉宪檄委署赵城县。赵城，赵简子故里，或称简城，今隶霍州直隶州，民俗向称朴质。自道光十五年曹顺滋事以后，民情浮动，渐肆嚣陵，动辄聚众逞强，不知畏法矣。先大夫稟辞时，首府稼堂先生面囑曰：“风闻本任张君柯程声名平常，词讼纳贿，以致书役疲玩，士民狎视官长。履任后，须抖擞精神，洁己执法，严办一二案，可望风气转移也。”先大夫深感训词真至，谨佩不忘。

道光十五年，杨菊泉先生延亮，湖南长沙名进士，宰是邑，访有外来匪徒曹顺聚徒习教，缉拿到案，以事无证据，答责释归。曹顺出即对众摩其股曰：“此仇必报！”此七月间事也。归仍藏匿距城四十里外乡村，招集无赖。九月裹聚二三百人举事。变起仓猝，城中毫无知觉。黑夜入城，劫狱戕官，燔毁衙署，杨公眷属无一得脱。后曹顺虽经缉获，处以极刑，剜心致祭，而当事恐牵累无辜，不根究从逆党羽，一时莠民皆幸漏网。由此民情不靖，以好事逞强为能矣。

先大夫履任视事，即有渠长张佐敛费聚众一案。初，渠长张佐以引水转磨讹索范族不遂，即以决渠坑良具控范生桓一及其族中殷富于前任，闻已关说传案重罚分肥，不意票甫出而交卸。张佐乘新官入境，复拦递呈词，兼约多人集候界首，各持器械，藉口迎官。先大夫阅呈，语殊支离，情事瞭然。适官道经由渠畔，多人随拥车后。至转磨处所，下车沿渠亲勘，诘张佐曰：“水引转磨，不仍归渠耶？”曰：“然。”窥其面上微发汗，漫指圯圯处诬范族掘毁，言辞支饰。公谓：“吾已履勘明白，无庸晓晓也。”突问：“多人来此，胡为者？”对以：“齐来接官。”问：“奚为携带器械？”曰：“农器也。”公哂曰：“各处农器不一式，然皆大同小异，何此地独否？以之应敌，庶适用耳。”曰：“用以防身。”公曰：“世界清平，安用防卫？”曰：“畏范党有伏耳。”公微笑焉，顾有齿略长者，呼而与语，俟出不意询之曰：“劳尔辈远来，居址其邻渠长耶？”对曰：“家近洪洞界，相距约四十里。”问：“奚以知新官今日莅止，胥执械会兹候接，仆仆若是也？”曰：“渠长函约同集，连夜催促也。”公曰：“然则来者尽属资望此渠之人耳？”曰：“小人另有渠水资灌溉，此赵邑西渠也，内中仰给东渠者且半焉。”语次至分流处，衣冠簇簇十余人伏迎道左，则范桓一偕其族人也。公见其恂谨，扶使起，问曰：“汝即范桓一耶？”对曰：“然。祇迓父师。”公颌之。时张佐诸人咸在，晓之曰：“二比各归，听候履任受事后传审。”即升舆去。

是晚入城，凌晨接篆，旋为邻封灵石县移请相验，轻骑前去。晚间张佐使人微探意旨，为司閤白荣面斥其妄。张佐意含羞忿，次日偕其党五六辈拥至大堂，催促审案。书役等复之曰：“官已公出，谁为审

理？接印之日，即因公往邻封去，所有循例阅城、阅狱、放告、点卯诸事，一切未及举行，又何至独讯此案？”张佐谓：“案经前官批准，票差传质，昨拦舆补控，官曾面谕听审，非比他人新案。”恣肆放言，声彻内署，经捕厅善言谢去。公回署闻知，即于放告日传集两造对质。张佐六品顶戴，袍袴整齐，扬扬上堂。公温语曰：“尔何职也？”对以军功。问：“何处立功获奖？”对以协缉曹顺，蒙臬宪给奖耳。公乃微哂曰：“尔既为缉拿曹顺在事出力之人，应知曹顺下梢，当日纠众戕官，举事何等密速。一答之恨，方谓快心报复，岂知不旋踵即被缉获，活剥剜心，株连累累，逆谋果得逞否耶？杨公猝不及防，不幸遇害，然其身后叠沐隆施，建祠追赠，春秋享祀，封妻荫子，朝廷又何尝负良吏耶？尔乃欲步曹顺后尘，果得逞，不过如彼结局耳。一不得逞，并求如彼之快心一时而不得也。乃以引水细故，无端纠合多人，执持兵器，作赴敌之状，惊吓乡愚。诌名接官，实以胁官，其意果何居耶？究之转磨之水，滴滴归渠，不曾漏溢一线，前已亲勘确凿，范族并无不合。尔始则藉端讹索，不遂复构讼，妄思倾陷。后且肆闹公堂，胁迫官长，藐玩法律，恃符横强，无情无理。即此纠众胁官，持横咆哮，不必别科以讹诈良懦、遇事生风之罪，已死有馀辜矣。吾意曹顺滋事之后，历任皆宅心仁厚，不遽以重法绳尔凶顽，姑息优容，以致不知畏法，酿成风气，各有賒死之心。本县初膺民社，誓以抑强扶弱为心，如尔豪棍，既肯以身尝试，我又何惜不以辣手相加？剪除一害，即可安奠一方，又免他人妄思效尤。”拍案厉声，连呼上刑收禁。张佐汗下如雨，无词强辩¹，俯首服罪，叩求贷死，自愿具结息讼。公复痛斥再三，满堂莫不咋舌。范桓一等转为乞恩，谓生等村居比邻，平日无嫌，今彼既知悔罪，惟求格外施仁，以全乡邻之谊。公始首肯，令两造具结完案。又谓渠案了结，然纠众哄堂，情节较重，张佐仍交差管押，须俟公正绅耆保释。次日，有举人魏光坝五人联名具保，方予开释。阖邑咸颂严明。终公之任，无纠众之案。张佐亦不复苛敛渠费矣。

一日，中丞谓方伯曰：“赵城成令整饬甚好。张令解京饷，本可冬底回任。销差时，即留省局差委查看，俟成令署任及期，再饬交卸。”次年，公卸事回省，寅好相谑，谓赵城及瓜，渠长之赐也。相与一笑。公在赵城岁试文童四百余人，内张鸿超一卷，诗字冠场，拔之前列。后知为张佐犹子，游泮后即执贄门墙焉。

二十五年乙巳 年十三岁

仍从小鲁先生读书二房大厅。

是年，先大夫交卸赵城回省，旋奉臬宪委，偕同知穆克德起查验壶关县命案。销差后，奉抚宪檄委赴湖南咨追前任岢岚州牧曾君亏短库款。先大夫稟恳就便回籍省亲。冬月抵里。

壶关西乡靳庄，地滨小河，岸边高槐古柳下，屹立石碑，宽广六尺馀，厚三寸许，下半掩土中，苔藓斑驳，略无裂痕，一角微缺。距数武有临路店，忽闻路人传说丰碑羽化矣，远近好事者竞来探望，猜疑莫定。一日店中住客已满，傍晚复有投宿客，店主推之不肯去，顿思店后小屋两间，粪秽堆积，亟为扫除安止。及持帚进至内一间，微觉地下闪动，俯视则俨然石碑也，宽广恰与屋合。骇异而出，呼家人燃炬遍照，四围壁土毫未损动，不识其下衬垫何物。从隙中伏视，似有人仰卧状。倍惊疑不释，莫测所由，乃鸣乡保稟官勘验。时明府新丧，贰尹代县事，诣验四周上下，尘丝蛛网如故。飭令掀起石碑，其下死尸平直仰卧，年约五十外，身首悉压扁，着簇新布袄，衣褶平正，履底未沾泥土。贰尹检验无伤，通稟上台，请委员诣验。臬宪札委先大夫偕穆司马复验，署县事某君旋履任。此案下落后未得详。

二十六年丙午 年十四岁

八月十四日，三妹月仙生。

偕雨农、会东两兄从蔡朗轩师读书郡城明德书院。

¹ 辩，原作“辨”，据文义改。

是年，郡属盗伤事主命案叠出。太守福星垣先生奎购以重赏，先后缉获巨盗累累，每以大铁锤亲槌其踝骨至碎，郡人称为“福铁锤”，盗风尤未戢靖。五月，后城厢妇女每无故自缢，西门一隅尤多，竟有因嬉戏而毙命者。晡时即觉阴风瑟瑟，更定后巷衢即无敢独行矣。七月间，延僧建盂兰会，设坛校场，仍分扎四门，中设法座，金鼓喧阗，独西门一角，灯炬皆黯淡无光，顷刻灭熄。灯烛之下，恍见妇女成行，若隐若见，观者人人瑟缩，亦异事也。

冬月，先大夫为方太夫人庆祝七十有七寿，旋假装赴湖南，领咨回晋销差。

二十七年丁未 年十五岁

从郭芷沅先生读书大厅。三月会东兄病歿。兄为继母贺太宜人出，幼即嗣三伯父东甫公为后，读书刻苦，致染瘵疾而歿，伤哉。时值府试，余初应考，首场题“可也简次非然也，孟子曰鱼”，名列第八。因兄葬事，不与招覆，长榜列三百名外。

先大夫春初至太原，销差后即奉委署武乡县。武乡为石勒故里，微时夜辄闻鼓鼙声作于山腹，故名其地为鼙山，今隶沁州直隶州。先大夫莅县，有《听鼙山记》。履任三月，因接家信，知兄病歿，三伯母王太孺人悲伤过甚，方太夫人亦极伤情。次年春卸篆旋省，决计引退。辛阶先生力主改请回籍措资，进止得以自便。洎道经大梁，进谒鄂云浦中丞顺安，极荷优睐。昔与方伯公同官中州两司，交情最笃，现任巡抚，主持豫工捐输事，复劝捐尽先，允为集赆助其不及，冀早补缺。先大夫情切将母，不欲恋栈，婉辞别去。至邗上，小住梅花书院。时表伯徐侍御松泉先生培深主讲斯席，与安定书院山长少京兆吴笏庵年伯清鹏及都转但云湖年伯明伦、扬州太守吴荪生世兄葆晋晨夕过从极欢，谈次亦均力劝无萌退志，豫谋补缺地步，他日出山，不至赋闲需次。先大夫归志已决，盘桓两旬，即挂帆而归，从此承欢左右，息影蓬庐矣。

二十八年戊申 年十六岁

从刘揖三先生读书大厅，习诗赋。师为思南府廪生名怀让，受聘教读，仍按课与雨农兄、我湖侄会文，就正先大夫。次年己酉选拔，本科偕同怀兄怀宪中式第二、第三名举人。

三月科试府考，余偕古腴侄并列前茅，受知于太守福星垣师。六月院试，经古取列第二，赋题“喜雨名亭赋”以亭以雨名志喜也为韵，诗题“槐夏午阴清”得清字，正场首题“取瑟而歌”，次“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诗“眠琴绿阴”得琴字。学使宫詹丁虚园先生嘉葆，江苏武进县人，先方伯公壬午分校顺天乡试所得士，戊戌翰林，阡郡试竣，按临思南，以疾终于考棚。简放右中允翁祖庚先生同书，江苏常熟县人，庚子翰林¹接试。

二十九年己酉 年十七岁

二月二十日，五弟戟门生。

是年，先大夫亲课叔侄昆弟六七人读书梓潼阁之味绿轩，同里远近从学者十余人。下届岁科相继游庠食饩。五月十三夜，大雷雨达旦，侵晨²水暴至，淹平石马边桥上，坏山田无算，里中新修字藏，石址为水涨圯倒塌。

三十年庚戌 年十八岁

六月十八日，六弟同高生，以与高祖南宮公生同月日也。

是年，先大夫主讲明德书院，携余兄弟及我湖、古腴两侄入院读书。十月岁试，经古院中列正取者五人，余与雨农兄、我湖侄与焉。赋题“严君平下帘授老子赋”以卜筮之余学宗清静为韵，诗题“三十三天长雨

¹ “江苏常熟县人，庚子翰林”原为正文，据文义改为夹注文。

² 晨，原作“辰”，据文义改。

花”得天字，正场文题“樊迟问知”一章，诗题“文以意为车”得车字。院中取列优等七人。

咸丰元年辛亥 年十九岁

先大夫仍掌教书院。本年恩科，生童入院从学者愈众。六月科试，古场赋题“赐牛僧孺彝尊龙勺赋”以精金古器以比君子为韵，诗题“呼龙耕烟种瑶草”得烟字。余偕雨农兄、我湖侄及院中肄业列正取者六人。正场文题“非谓有乔木之谓也”二句，诗题“荷叶遮门水浸阶”得阶字。余兄弟及两侄均前列。复试之日，祖庚师当堂传阅正场卷，批语极荷奖谕，询家世甚详，而余“复古重与细论文”及“复试别后与谁同把酒”两试律尤荷激赏。又查阅试镇远府县取进案首，与阡试新进前列，填写业师，皆属先大夫。试毕，径至书院拜访，书赠“经师人师”额，悬之讲堂。岁科两试，院中新进诸生陈绍虞舜卿，杨繁春荫堂，杨鍾魁春门，雷应槐荫三，李培兰润亭，杜兴瑞辑五，徐彩林晴轩，黄日熙缉堂，族兄其涟漪甫、其湖华章，族侄学礼秉之皆及门授业者也。余偕雨农、幼兰两兄，我湖、古腴两侄皆以优等先后补廪。一时英才济济，称极盛焉。本年昆弟叔侄同赴乡试，我湖卷已拟元镂板，后以提比微疵被黜。雨农、幼兰两兄均荐焉而不售，祖庚师极为惋惜不置。首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次“厚牲而薄来”，三“拱把之桐梓”三句，诗“楼高面面看青山”得楼字。主考左瑛，湖北云梦人；华祝三，江西铅山人。

榜后归里，冬月二十七日完婚。

二年壬子 年二十岁

五月十五日，四妹闰芝生。

是年，先大夫辞掌教，课余昆弟叔侄读书后院新宅。七月赴省应试，是科首题“人而不为周南召南”二句，次“辟如登高必自卑”，三“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余偕两兄暨我湖侄卷均呈荐未遇。余卷出婺川县阮公文藻房，江西安福人，批语：“切实谛当，次三亦匀称，诗谐。”主考张衍重，山东海丰人；许彭寿，浙江钱塘人。

广西贼首李沅发滋事，扰及黔边，蒋中丞霁远奏办防堵，各府州县派助军粮，由藩司用印票借捐。太守植圃黄公培杰会商先大夫，派幼兰兄借助银四百两，议叙从八品职衔两名，给芷涛兄、雨帆弟承顶。其他富室借钱三四百千、一二百千者不等，捐输从此接续办理，连年不辍。有一年中劝捐两三次者，名目繁兴，直至卵破巢倾而犹未已，追比之严，较甚于负欠国课。其初派绅设局，分赴各乡题写，稍存观望，即派差练锁拿入局勒捐，一不如数，即送府用刑逼索。正捐之外，倍出使费，尽饱局绅囊橐，殷富莫不毁家。其后局外多生艳羡，三五为党，又复请领府札分办，分城内为总局，河街又设军需分局、盐粮局、厘金局等名，与总局若离若合，款目愈多，乡户自此无宁日矣。

七月赴省，遇云南临沅镇兵调赴广西。晤兵官，语以长发贼势甚披猖，官军屡挫，都统乌兰泰阵亡，经略赛尚阿自永安州溃退。贼全力注楚，湖南震动，黔边戒严，人情异常惶惧云。

近四五年，苗疆盗匪横行劫抢，巨案迭出，报经州县，犯无一获，上年竟至驿路行劫学差扛担及会试火牌。是年春间，革夷盗首保禾纠合大伙，劫抢麻音塘盐课。时胡文忠公林翼方权镇远府篆，闻报即挑派县中干差购线踪缉，复募练勇，亲督深入山丙、朗洞等处贼巢搜捕。先后缉获巨盗七十馀名，解省正法，破费二三千金。而首府江夏王廉普先生成璐积有违言，谓其喜事贪功，擅开兵衅，中丞颇为动容。赖吕方伯侄孙、孔廉访庆镛皆胡公丙申同年，极力维持，得不负过。及胡公移署黎平，后任朱用之太守右曾莅镇，事多迟疑，假手营弁，雇募乡勇搜捕逸匪。初时，良苗竭力供亿，缉获首要数犯，多资乡导之力。而营弁逗留苗寨，坐索匪犯，日事搜求，骚扰不已。匪党裹集渐多，乘机煽诱逼胁，而良苗犹怀疑畏，虽结寨自保，隐存观变之心，犹未敢显然抗拒。斯时官府果能绥戢安抚，设法解散，必不至四处响应。乃听从营弁稟请派拨营兵会拿，又复声言开剿，兵未入境，苗寨传播“见黑便杀”之谣，遂坚从逆之志，生苗、

熟苗由此联为一气，相率弃寨聚保雷公山千家寨，渐出焚掠村庄，屠戮汉人，浸至蔓延不可收拾。承平日久，官兵未经战阵，镇标兵千馀屯驻苗疆，畏其凶悍，谨守一隅。苗人长技，翻山越涧，捷比猿猱，而又出没无定。官军侦其所向，振旅迎敌，山路晓确，屡经挫损，匪党乘间袭陷岩门、邛水、胜秉等处，屠城戕官，逆焰日炽。官军节节溃退，以致台拱、清江各城亦相继失陷，苗疆千里沦为异域。官军无敢再履其境，苗与汉自此成不共之仇矣。同时各府县群苗蠢动，驱逐汉人无遗，驿路断绝人踪。清、黄、施秉只馀孤城，困守连年，至乙卯岁先后被陷，屠杀殆尽。当时分施、黄以上为高坡苗，台拱、清江为下河苗，逆首高禾、九松、李高脚等尤异常凶狡。自苗变后，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上游之侗匪、仲匪、杠匪及各种夷倮，下游之榔匪、教匪、号匪、叛勇、游练、粮户迭起迭灭，与苗匪相终始。镇远自官军溃败后，苗匪每窜至鼓楼坪、鸭溪田坝¹，窥伺官军动静。镇军统兵驻永坡防堵，府卫两城顾守不遑，苗匪乘机分窜后路各乡，焚掠一空。居民逃散，田地荒芜，满目荆榛，郡城竟成孤注，至丁巳九月亦为所袭陷矣。

三年癸丑 年二十一岁

正月三十日，方太夫人弃养，十二月十五日安葬牌头。先大夫居丧，余昆弟叔侄读书家中。十月岁试，以染症未痊未应古场。正场列一等，文题“何以报德”。学使黄伯垂先生统，广东顺德人，庚戌传臚。

四年甲寅 年二十二岁

六月科试古场赋题“万变图赋”以晴夏晚云八景之一为韵，诗题“松柏有心”得心字，余偕古腴侄列正取。正场文题“刍蕘者牲焉”三句，同列一等。是年奉旨兴办团练，由府颁到宪札并团练章程。先大夫充总团乡正，团练六百人，设局制造旗帜炮械，皆本团富户捐办也。

桐梓县逆首杨澧瀄倡乱，贼党蔓延，警报叠至，奉宪飞札各路齐团堵剿，勿使入境。十月，先大夫点阅丁壮，演试新铸枪炮，分派帮办诸务。余与雨农兄为左右管带。

杨澧瀄即杨瀄，桐梓县革役也，住居九坝。招聚外来游匪谋乱，猝然起事，攻陷县城，旋据雷台山为巢，直扑遵义府城，燔毁城外民居，裹挟日众，逆势寔炽。其侄杨六郎率当军锋，矫捷敢战；伪军师苏²老先生善占卜，颇多狡谋；贼党半属川黔积猾游棍，初战锐不可当，官军交绥辄靡，远近震动。制府文僖公罗苏溪先生绕典亲督云南昭通、鹤丽，贵州威宁、安义四镇兵剿办。初至多失利，伤亡颇多，贼势倍张，直逼制府营垒，猛力攻扑，日久不退。制府忧劳过甚，兼以微伤，八月歿于军中。赖援军大至，将贼击走。九月以后，滇黔兵分队痛剿，逼贼归聚山中，困以长围。贼计无所施，始溃遁向思、石一路，意图沿途藏匿解散。滇兵乃跟踪追袭，足无停趾，使其昼夜不得憩止，无暇掠食。贼果饥疲，为官军擒斩过半。次年二月追至葛彰司，贼方于马家土造饭，官军旋亦追至。杨逆势已不支，伏身山洞，为滇兵炮毙，当即割截首级，解至新任制军恒春贵定大营告捷。余贼星散，概为沿路团练所获，解官正法，漏网者寥寥。苏逆逃至硃石，为旅店盘获送思南。逆侄杨六郎至野猪宅问渡，为渡夫猜破，击落水中，鸣团擒缚，搜其身得珊瑚顶珠，称得之罗制军营，旋解石阡送贵定大营臬示。官军凯撤。

五年乙卯 年二十三岁

是年正科以全省糜烂，奏请停办。

二月十二日午后，探闻贼窜葛彰司。先大夫甫商各路调集团练，分堵龙塘、白沙两路要隘。十三日黎明，马家土败匪即由僻径窜出长冲，经过雷家屯至扶桥口，蹂浅向卡房坳而逸。署东道韩南溪先生超督带所募苗练，西道张春潭先生锁率兴义乡勇，均随后尾追。云南特、余两镇军各率所部凯旋，亦由此经过。

¹ 原文作“珀”，坝之俗书，下同。

² 原稿眉批：“‘苏’应为‘舒’。”

六七日中，兵夫络绎不断，间有散入乡村索取食物者，乡户畏兵差骚扰，闭门逃匿殆尽。幸抚宪讯发“兵练骚扰，格杀勿论”之示，四乡始得安靖。余家尽室移往牌头庄房避兵，事平始归。旋募护勇二十名交曹教师训练，防御土匪。

六月初，探闻余庆总团邓海山击贼黄平十里桥阵亡，防营瓦解，要隘尽失。大股苗匪由中桥河长驱而入，攻扑余庆县城，势将下窰。续据黄连沟团首飞报，苗匪分股踞长冈岭，显有窥伺阡境之意。太守植圃黄公培杰及杨用廷都戎启贤函请先大夫至府会商。迅集团练，出扎烂泥山防堵，相机截击，所需药弹油烛由府局供支，粮械自备，订期六月十二日出队。及驻马伏堰，苗匪据长冈岭未退，时游奕苦笋坪老屯一带。又据马溪总团朱炳南孝廉所函擒获苗探，据供侦知滥泥山一路有备，大股将由马溪出包溪，直从大地方下窰，请速移扎马溪，会合迎头截击。仍留府练协同马伏堰团丁防守滥泥山隘口。移驻马溪后，全股苗匪退走荆坑、牛打场一路，漫过老都桥、紫江关。先大夫督团进扎石桥，因老都桥团练请援，复会和马溪团直抵老都桥扼守。次日，苗匪焚掠柿花坪，余偕雨农兄分带团练驰击，匪已退走白塘矣。驻老都桥六日，探知大股归巢，分股数百往杉木河等处劫粮。先大夫督团由紫江关而进，拟由瓮哨大路退归。甫抵杉木河，喘息未定，匪亦踵至。团练立营河岸对击，复分左右包抄，炮毙大旗匪首。匪见两翼旗帜，即弃械狂奔，追过白塘始徐徐收队。因杉木河地势曲狭，前后受敌，即退屯高粱地，旋移扎代坪，扼守窰阡大路。维时施秉受困日久，孤城悬立贼中，其三面逼近苗地，已无汉人遗踪。惟代坪一路虽残破之余，居人未几离散，且可绕越通走石、镇两城，实为危城生路。邑侯刘公玉麟闻先大夫驻营此间，亟欲扳请久扎，保全出路，各乡寨咸愿筹粮供支，屡饬城绅诣营婉商。先大夫以非阡境扼要门户，相距穹远，深虞隔绝，万一贼从别径窰入，前后牵制，进退失据，为祸甚烈，坚不承诺。嗣又再三商请移驻柳塘堡，藉保近城收获，一月之后徐图撤归。先大夫以团练俱属农人，各有家计，非兵练可比，决难曲从。正筹商之际，苗匪突出扑城，抢割附城田谷。客楼、马溪等团应调赴援，先后趲至，城绅复赍邑侯手函请策应。次日，先大夫督团至瓮哨，派分两路，一由石牌坡，一由燕子岩，同时并进。时客楼、马溪团练正排队河岸与匪对击。匪于城后瞭望，遥见我军两路势如涌潮，即时四围鸣螺收队。及我团驰抵柳塘堡，甫施连环枪炮，匪皆远远伏地，渐次退走白堕、冈海，顷刻踪影全灭矣。刘明府偕城绅即日出城渡河谒谢，并馈米油盐薪及犒劳酒肉，商订确探贼踪，会团合击。次日，探知大股退归飞云洞，其屯扎冈海、白堕者约数百人，皆往时近城各寨苗也，欲俟客团撤后，复出抢掠田谷。是晚，会商客团与城练分三路进剿，派附城团练充当乡导。我团挑派六成，黎明饱食，驰抵白堕。匪散伏村中，不防团练掩至。我团首先冲进，团截袭杀，擒斩不少。余匪滚岩越涧而逃，复为城练与客楼团练分投追杀，匪已胆落，自此不复零落出掠矣。是日午后，收队分扎柳塘堡、石牌坡。旋接府局急信，探知苗匪大股窰葛彰司，焚掠三十三屯等处，苗探四出窥探虚实，请速撤归，防堵附近要隘。即日拔队启行，归经平贯，挑留百人驻守将军岩，余悉折归收获矣。

八月，府局会议分防苗匪下窰要隘，以专责成，免致兼顾疏虞。葛彰司一路札飭白沙走马坪团练防守。由总团徐立三从九全才择隘驻扎，滥泥山一路扎直桥总团，刘子惠孝廉庆元督团扼守，乾溪红岩团练分扼梓木凹，大坳、王家坪札包溪洪邓诸团联合马溪防守。先大夫督团专防大地方路濞一路，号孝义营。

九月，先大夫挑派壮丁二百人，命余偕雨农兄管带，合原扎将军岩之百人驻防大地方。苗匪复出瓮哨、谷定，路濞一带震恐，旋进扎路濞。匪扰荆蓬，镇远府吴鼎丞太守登甲以后路吃紧，派府练堵金石关即溜沙关，复据团首王金茂等吁稟函请先大夫移营羊场以壮声援。驻羊场旬日，苗匪归巢，仍折回大地方驻扎，专顾阡境要隘，直至冬初红号贼起，始全队撤归。

是年九十月间，铜仁粮户闹粮滋事，举人徐廷杰、梅济鼎乘机鼓众煽乱，破城戕官，松桃、思南相继被陷。冬月窰经阡境，绕出思州。是月，毛家寨逆首毛大仙传徒倡乱，旬月之间裹挟数千人，同时复有蚕溪王大仙及萧小仙遥为响应。江阳沟倏有李太子一股聚众数百，连夜袭踞阡郡。贼踪充斥，无干净土矣。

铜仁府五岗民以收粮浮冒，积怒粮书周祥，举人徐廷杰、梅济鼎等暗嗾各户担米拥积府堂，不遽交

仓，劫持府尊改革斗斛，旬日间府署堆积米萝无隙地。徐、梅假为调停关说，喊众鼓噪。太守葛蓬山先生景莱先入粮书之言，坚不垂允，及至詈骂沸腾，犹不思改计定变，以致粮户千百为群，蜂拥而入，寻殴周祥，不知其早已远遁矣。不逞之徒，乘机肆闹，直闯府署内堂，毁坏门窗，抢掠器物。太守因仓卒变起，环顾左右虚无一人，退匿内室自尽，文武各官同时出走。未变前，徐廷杰先以计遣梅济鼎归约江口太平场各乡粮户入城计事，而私回标杆河招聚亡命，相随入城。民变之日，两处同时抵城下。徐党之伏城内者，开门延纳，乃布散谣言，诈称城门闭塞，为先锋严占鳌、赵子瀚辈用二百斤铜槌击破。乡愚信其言，远近丧胆。后此赵逆所至，辄以铜箔饰大木槌，令数人舁之马前，欲惊人之听睹，轻重不伦，徒令见者捧腹。徐逆入城后，不容一人脱走，拥众自卫，安坐考棚，事事委决乱盘，谬称帝命，言词悖逆，笔不忍述。从此称徐为军师，梅为元戎，严占鳌、赵子瀚、刘美美辈为将军。其余附逆者，元帅先锋均有称谓，各率其党分扑旁近府厅矣。梅济鼎初意亦第欲附和徐逆革浮收，见德乡里，不知徐之阴蓄异志，图谋不轨，陷其叛逆为乱，至此势成骑虎，无计自拔，不得已隐忍将顺共事。徐暗布腹心，胁迫大举，攻陷思南，卒为官军袭杀，戮于小岩关。而伪先锋邬黑虎本扶桥口人，以健走充团练侦探，击贼白堕，手刃两贼，割取首级，夺获枪械，先大夫赏其勇。撤归后，因负欠博债，窃走铜城佣力，值粮户滋事，与刘美美素识，携叩乱坛，点充先锋，往攻松桃，即纠合数百人，沿路裹胁苗汉千馀直趋城下。维时厅城文武兵民已弃城远遁，仅馀空城，无人设守，逆众突至，未敢渡河。邬黑虎首先闯入探望，绝无备御，转而招众齐入，直踞副将衙署为帅府，掳获蟒衣穿著被体，公然出示安抚苗民，自称统天大元帅。示中张大其词，谓为神灵助顺，于是远近轰传邬元帅攻城之初，只一人一骑，以大刀劈门而入，追杀守城协兵，当者齑粉，半日之久，始返招大队进城。乡愚用是惴惴，日有投身饕餮羊酒者矣。次年败遁吊楼洋溪，为楚军搜获，碎割处死。逆之结队出略也，盈千累万，头裹白巾，多执白布小旛，一似丧家送葬，又如上山进香状。其执持刀械者甚少，又杂以木棒竹篙，晚间散住村寨停宿，安意肆志，略无防卫，动称神灵随身拥护，陈师鞠旅，直等儿戏。只以承平日久，无人知兵，官与民俱震慑浮言，不悉若曹伎俩，只图远避凶锋，弃地弃城，获罪在所不计，致逆党恣情窜越，如履无人之境。以故至松桃而松桃陷，至思南而思南破，石阡、思州亦皆循城而走，绝无阻拦，势益猖獗，而蠢蠢者方信其果有神助，将唾手而成大业矣。于是谋围凤皇厅，窥犯楚边。镇筴兵劲健甲东南各省，时邓忠武公绍良新逝，随征镇兵甫从江南大营遣撤归伍，皆百战之余，眼底岂有鼠贼。道标屯兵亦训练极精，附近乾州、茶洞各协，以黔边毗连，防堵布置严密，贼难飞越。苗屯弁兵豫受镇道诫谕，各守屯堡，无塞通道，听其阑入，过后断其归路，勿使旁扰。逆辈听信乱语指挥，犹袭故智，长驱大进，直抵凤皇城下。镇兵静伏，俟其涌至，排列大炮轰击。两边石岩壁立，蹊径掘断，逆众避藏无地，势已不支。将谋溃退，后路伏兵四起截杀，镇兵突从城上飞越而出，前后合剿，死伤山积。幸脱徐匪，败经屯堡，复被屯军节节痛剿，生还者无几。至此方知为徐逆愚弄，神并不灵，亦已晚矣。徐逆由此困踞铜城，不敢再觑楚疆。楚军旋于次年春攻拔铜、松两城，徐逆遁走不知下落。

毛大仙名瓜瓜同，毛家寨村农习业吹鼓者也，极愚朴，见人恒腴腆寡言。是年秋，染病弥月，病起言词恻怛，谓神授符箓，传教技勇，能疗治病症。村人试之信，实则互相愚弄，自欺欺人，无他术也。浹月之间，传徒二三十人，昼散宵聚，谓习神打。初时从学者备香楮牲，望空拜揖，饮以符水，即闭目跳吼，舞拳弄棒，犹不妄言语。嗣后饮符即称有神附体，名为临凡，神圣仙佛凭其假托，动发人隐私，指名诅詈，目为恶人，而势日以张。九月间，先大夫督防羊场，密遣人侦实，飞禀请示查禁。太守黄公不甚介意，第飭总役张成潜往龙洞场遥访消息，遽以癡邪置之。未几，侦知其徒叠相传习，浸及大河以外，风驰远方。以地属思南，黄公亟移商思南府福太守奎会拿。福公复以消弭息事相复，黄公恐酿事获咎，遂撤回差弁。虽经各寨绅耆危词稟究而亦不应。俾逆党恣其所为，无所忌惮，渐至燎原，而事起矣。毛逆之变，其事多成于其徒。毛逆初无倡乱之心，亦不知叛逆为何如事。当其病起时，并无意聚徒传习，日夕危坐，任人聚观，信口宣说五七字句不休。虽鄙俚凑杂，不堪入耳，却背诵如流若夙构。其有愿传习者亦不甚

拒，只以足不出户，一任其徒四方煽诱，谎惑乡愚，捕捉恶人，听其处治，只谓恶徒有可死之道，初不计杀人为何如事，彼为何如人，可以操杀人之权也。而犹断荤茹素，合掌低眉，日踞高座而受乡人宰杀羊豕之祭，自称长眉大仙，逆妻杨为观音圣母，逆子未元为释迦佛，方谓劝善免劫，保全乡境。而其徒则皆粗蠢乡愚，以杀人斗狠为能，肆出焚掠，犹以剿杀逆苗例视，不知叛逆之罪干族灭。又事不关白逆首，各不相下，其称托张飞、赵云二将军、三将军者比比而是；而唐老玉之称唐天子，雷三贵之称雷神，尤为不伦。至称白鹤仙之毛老同，乩仙之毛瘟六，为毛逆所最亲信，其狠毒亦甚于他贼，率其党封仓掠马无虚日。而余族之稗类从逆号鸿钧道人者，方且勾结渠党，日思肆毒余家，以快报复。赖毛逆知其隐情，计未得逞。至冬月十三日，伪太子李逆袭陷郡城之际，逆党大合二千余人，齐聚毛家寨亮队。是日骈杀累累。逆党杀人，每拥至对岸大沙坝，万刃攒刺，瞬息粉碎，惨不忍睹。缘同时逆族有名麻祥者，亦以传徒教打，角立成仇。逆势渐盛，麻祥尽室远避，食尽窃归，猝为逆党所缚。而先时首告邪教谋逆之毛寅寿父子亦被捆获，并扶桥口之不孝逆子杨石贵同日受刃。寅寿父子则为其截斫手足，号呼两日而后绝。至生员彭灿奎则先为毛逆谋主，素性奸狡，至是力怂编造党册，意在倾陷近村绅富。逆反疑其阴谋异己，突出不意戮之，悬首村外。其伪元帅朱文焕与毛逆隔河而居，素以膂力称，春间应募充余家护勇。撤归，受雇至江口担货，经塘头，适白号上窜思南，市人惊走，所担客货为土匪劫抢，渠亦窜身白号劫掠衣物而归。与逆党郝二将军有隙，被其缚至毛逆指为土匪，经逆子毛未元保释，毛逆以其膂力过人，用为总兵大元帅。值洛桥、白沙等团同驻大小岩防堵。先大夫飞函密嘱豫挑精壮，候合余庆练勇会击，复星夜函致余庆县彭紫瀛明府澜派拨劲练，联络团丁进剿。谓逆党散处远近，心未齐一，逆巢空虚无备，其近日金鼓喧阗，四方之供献者如织，半属阳为趋附，而阴窥探虚实者也。如振旅前来，敝团豫派乡导，直抵贼巢，乘夜掩袭，四路应援不及，必有拦截败路者，扫穴擒渠，在此一举。彭明府果派孙寿山率所部福勇进驻龙塘，乃逗遛观望，趑趄不前，又声张师期，使贼转得塞阻要隘，预为之备。时朱文焕甫脱斧钺，遽受专任，未厌众心，深虑郝逆辈挟众暗图，亟思建功树威，收众自固。毛逆亦责以驱除龙塘防勇，乃纠合数百人裹粮疾趋，夤夜奋力冲入。勇团仓皇惊起狂奔，不暇回顾。逆张两翼袭追截杀，刃为之折，尸横衢路，自此朱元帅勇闻远迹。未几孙部复由关口坪绕下，围击荆竹贼垒。朱文焕预伏鸡头沟，嘱垒贼佯败诱敌。孙队果追过河，涉甫及半，伏贼突出，上下截杀，又获大胜。福勇溃走，从此勇团谨避朱队旗帜矣。是时铜仁粮户裹头概用白布，谓之“白号”；毛逆党则以红布多结疙瘩围裹头上，谓之“红号”。冬月底，“白号”伪将军陈天秀、小江武生率众自吊楼洋溪而上，窜经沿河。毛逆畏其肆扰，出而弹压。相见之际，“白号”咸尊称为祖师，悉听约束，各村第给饭食，列置路头，皆席地围坐，食竟，俯首帖耳，鱼贯而去。伪太子李逆袭入阡郡，盘踞浹旬，捉杀蠹役张成一人，及误伤数人而已，城内外安堵如故。及毛逆党随后入城，强分卤获，抵牾成隙。李逆自忖众寡相悬，虑有变，乘夜满载遁归江阳沟。李逆本属另股，与毛党若离若合，亦以红巾为号。据城之日，士庶咸令系红布于身间，即可出入无阻。然远近播传，及各路禀报，咸称毛大仙“红号”袭陷阡郡云。郡城被陷，中丞蒋公霁远奏委升用府王承斋太守敬烈督办下游军务，派松桃协副将图塔布帮办，募勇二千，调仁怀及铜、松营兵并守备韩昌带抚标练勇各二百随征。丙辰正月十三日，驻军关口坪。太守黄公自失守出城，窃往南乡与绅团策商规复，又亲至余庆商彭明府添募练勇，正月十四日亦抵蜡岩驻营。初间毛党大股入踞郡城，掠近城村寨。十五日，铜线沟团丁知官军临境，假顽龙灯，暗藏刀械，思溷入城内应。为贼所觉，诱入禹王宫聚歼。逆党即日上窜，与直桥团练接仗亚云坝获胜。刘子惠孝廉、周渭川茂才诸君死焉。贼分由燕子岩、关口坳两路焚掠，直桥河东西寸椽无遗。是日大雾弥漫，黄府尊督所部由官庄龙底坝疾下，径扑城垣，夺门而入，搜杀城贼略尽。王军亦同日驰扎校场，逆党自直桥收队，始知官军入城据守，狂奔归巢，复扎营扶桥口堵御。当王军初驻关口坪时，逆党已离巢四出，毛家寨虚旷无人。官军果分一支驻亚鳌、高寨一带，牵制城贼；一支径出苦竹园、鸟茶关疾趋逆巢。逆首无从脱走，郡城恰为黄军所据。出掠大股无所归，必张皇失措，两军合力截剿，无难一鼓剪除。乃以乡导不

力，顿兵数日，致贼得归巢设守，要隘悉为所据。官军屡攻不下，反为所乘，赖团练四处策应，藉分贼势。二月初，先大夫命雨农兄详绘地图，诣城商之督办府，军分三路，派团练带同前进。西路由官道趋龙洞而出，包逆巢前面；东路由洋溪上越雷神壩口抄逆巢后路；大队沿河而下，直趋毛家寨逆巢，逆险尽失，腹背受敌。毛逆退据对市棚，拥众自守，余党散伏山谷，多张旗帜，施放枪铳以疑官军耳目。中路军恐中伏，驰至毛家寨纵火，旋收队；东西两路亦同时归营。逆由是震慑兵威，弃巢遁走，谋依王大仙扼蚕溪而守。王闻信，预约其党萧小仙至二十里延候，止其大股屯扎，诱毛逆偕其眷属及乱仙、白鹤仙诸逆深入抵其寨，即时擒缚解阡郡，献功自赎。王、萧原非毛逆夥党，毛逆之往投也，朱文焕力阻之而不听，故不与偕进，得脱网罗。余党知毛逆被陷，纷纷解散，先后赴郡投诚。逆子毛未元脱走铜仁，依白号赵子澹。毛逆解郡，并乱仙等皆极刑处死，毛家寨一炬毁平。官军驻郡，虑贼回窜，派韩昌一营出扎下屯大坡垸，仁怀营驻菁口防御。朱文焕率精悍百馀由蚕溪折回，探毛逆消息，突至箐口，冒团丁馈送饭食，溷入营垒，倏起袭杀，带兵官唐把总被戕，兵丁伤亡不少，弃垒逃出归郡。韩昌闻风亦拔营遁入城内。朱文焕复收合余烬，攻扑郡城，被官军击退，不时游奕近郭，郡城犹未解严。而督办府遽以踏毁逆巢，首逆就擒，具报肃清，剿办藏事，而以朱文焕一股归之徐匪，交地方官缉办。王旋奉委署铜仁府，彭署铜仁县，仍各带旧部剿白号徐孽。同往履任受事。先大夫念朱文焕之从逆非其本意，东驰西突，亦多成于迫制，其平日为人颇知重义，当贼势方张之日，凡绅富之夙与贼党有睚眦微嫌者，靡不寻思逞毒，快心泄忿，赖朱文焕极力调护，不惟不使受害破家，且不肯迫胁入党，而于鸿钧道人之百计倾陷时，其卵翼余宗为倍至，此际穷蹙无归，如招抚反正，必可资其出力以清根株。乃进商太守黄公给发札示招抚，许其戴罪自效。择素有胆略者，得及门覃锋，令携札示往会计议。朱意迟疑不决，必面见先大夫得一言以为信。覃复函至时，朱方据大坡垸废垒休息，尚存数百人。先大夫连夜单骑诣营相晤，剖析利害，力任保全，朱乃俯首归诚，誓不背负。次日即随入城谒见文武官府，给以六品翎顶，令汰撤随丁，酌挑百人改充府署亲兵，交渠管带，责以专任搜捕安插事宜。自此竭诚尽智，遇事勇往，颇收指臂之效。次年其旧党安毛、安长发辈归习清水教，啸聚百馀人于兴隆场，朱稟请查拿，即奉委带练围捕。黎明掩至，安毛横矛岩口，挺立抗敌，朱猛进，上下对击而死，红号徐党悉平。

王太守之督办石阡军务也，未建寸功，性习疏慵，癖嗜洋烟，军中高卧，日午未起。其在省垣募勇，多游手无赖，驻营郡城，任其散扰乡村，以抢掠为心，不畏军法；其出队也，搀前越后，全无纪律，二三千人不闻阵擒一贼，其校场之累累诛夷者，皆团练缚致之将军元帅也，嗣以各团生擒诸逆首，皆经解送府轅，索询供而不与，心滋不悦，即草草稟报藏事而去。其于郡城裁汰部勇，不思资遣，听其逗留，以致讹诈偷窃无所不至。而视朱文焕为奇货，于其就抚后，犹日寻衅袭杀，几复激变，盘踞城厢聚赌滋事，人人侧目，直至杨胜谋反败露，被获正法，究出同谋，尽属撤勇，闻风畏拿，始相率远遁，种祸地方，殊非细故。王在郡日，以余姻戚盛翼卿司马朝辅由思城避乱而来，行装被劫，反诬以倾资济贼，恶诈财贿，横加詈辱，尤令人切齿。而彭明府性习亦相类，其同赴铜仁新任，探知白号徐孽赵子澹、严占鳌辈虎踞太平场江口一带，意存恇怯，豫为牢笼之计，先发牌示招安，并约严、赵辈计事。逆党果挺往迎谒，貌为恭顺，窃觐军容，窥测意旨，深悉两人伎俩，百计要求，莫不应许，甚至与之联交，以弟兄相称谓，愿为前驱安抚，护送履任，沿途声扬“王大哥、彭大哥礼请吾辈协同守城”，褻视极矣。拥卫入城后，心腹布满左右，若辈进出无敢阻，事无巨细，悉为挟持，桀骜时形，而狎弄愈甚，府县直同傀儡，民谤沸腾，郡事益不可问矣。未几，杨星垣观察书魁卸遵义府事赴东道任，经太平场，为逆党劫之杨氏祠中，僭从惊散，只身羁困半年之久。而府县不能救，上宪以两人办理不善，糜饷纵寇，以致贼益骄横，撤省参办，两公由是竟脱樊笼矣。时骆文忠公秉章抚湘，奏派前任龙山县兆葆岩太守琛统楚边西防营入黔，剿办获胜。贼势不支，赵子澹、严占鳌、刘美美及毛未元等窜走阡境，兆军缀其后，并飞飭经过地方团练跟踪追击，贼窜余庆，遁走施秉苗地而灭，白号平。

李太子，家江阳沟中坝，其父盛儒贡生，极诚朴，授徒乡里致小康。及其母歿已有年，逆幼读书，应试未遇，习扶鸾请乩。先是其母临乩，称奉帝敕，封以正心帝君，无识者咸称贺，即尊呼逆为太子。至是母忽降乩，令其连夜进取郡城，即纠合近村人督促随行。乡愚不知利害轻重，不问事之可为不可为，力之能取不能取也，贸贸然逐队而行。黎明经过平地场各处，咸莫测所由，晌午直趋城下，蜂涌而前。官民皆张皇无主，猝难设备，于是城绅之崇信乩鸾者，相约备具香烛，衣冠奉迎，爆竹喧阗，雍容安步，观者阗塞，胥忘来者之为悖逆作乱也。文武官即日出走，惟太守黄公之配曹恭人至府署后山触石碎首殉焉。逆入踞考棚，安设乩坛，凡事一一请命正心帝君。以往时应试主北门夏家，至是用为郡守，某为都司经历，夏乃与之设誓毋妄杀人，乘夜窃遁。逆以夙恨捕杀府役张成，至龙氏妇则为怨家构杀，包氏子则疑其窥探而误杀者也。据城浹旬颇安戢，不妄杀人，城绅复设乩坛于禹王宫，李逆频往叩休咎。太守黄公匿河西书院中，乩绅以其仁柔，吁神贷死，于是同至书院拥往乩坛顶礼，接见李逆而归，即潜往廖田河商调团练去矣。先时太守搬移辎重出城，为营兵拦阻，堆存考棚，至是悉为逆党攫取，满载而归。李逆从此戢影不出，次年为团练捆解郡城凌迟。江阳沟逆巢亦经思南太守福公亲督练兵痛洗，逆党扫灭无遗。

王大仙士秀家蚕溪，萧小仙明仕家革攸寨，均应童试未遇。同时以扶乩煽惑乡愚，与毛逆略通声气。后诱执毛逆反正，获奖五品花翎，见督办府力辨其无邪谋，问以大仙小仙之称，则谓其原名大宣、孝先，传呼偶讹耳。王于次年击江外白号贼于印江，歿于阵，萧得终老闾里焉。

石阡营都司署内箭道，地极宽敞。是年杨用廷都戎种瓜五株，圆干修伟，爪距四张，飞扬生动，宛然游龙擎空状。绘图遍征题咏，犹记先大夫长律中有云：“奕矣恒农贤阃府，旗鼓休息闲艺圃。一时和气遍薰蒸，青门种布灵芽吐。大小游龙蟠五茎，天数地数得其盈。四龙蜿蜒如拱卫，一龙蹲伏势峥嵘。”一时竞推杰作。九月杨署镇远总镇，拔弃河中，随波荡漾，首尾尤为逼肖，当时呼以“瓜瓜龙”，目为瑞事，不谓竟兆毛逆瓜瓜同之乱也。草木为妖，出人意表，迟一年镇远被陷，杨弃城走，披缁远隐，不知所终。

六年丙辰 年二十四岁

正月红号贼猖獗，出入索扰不休。幼兰兄议设乩盘于梓潼阁讲说善书，日间男妇反关往听，藉此潜身引避凶锋。缘逆以教打为降像武坛，目扶乩为降笔文坛，往日假托附体，跳掷杀人，或需索财物，每借故加害于素所不快，惟匿身乩坛，即无虞逞毒。兄乃商延罗汉章、覃笔珊辈主其事，以其能得逆党要领也。十五日，官军入城。先一日，先大夫即接督办府王及太守黄公密函，至是命余偕雨农兄往见，请示机宜。晤谈之际，王以餉项未至，商借千金赏劳，太守则以行李全失，索借冠服，余弟兄应诺而归。幼兰兄筹借五百金。十九日，先大夫命余偕银及服物入城，夤夜带亲信七人绕越扶桥口平窑坝贼垒。四更抵城，吊入见王，商订师期，乘夜潜归，密派向导，自此沿河地方兵与贼上下驰骋，顿成战场。余家移避岩脚屯庄屋。而官军被挫，即恣掠无忌矣。坐待首逆成擒，王军拔队，而后四乡稍戢。三月，朱文焕就抚，余家移归。维时新抚之徒，犹怀反侧，每入城市，辄被轻薄诮辱不甘。王部散勇复藉端诈磕，虽稟官而不能禁，人情汹汹。于是先大夫集商沿河绅首稟吁镇远县，请移扶桥口场市改设彭家屯，名永安场，四乡称便。忌者诋为贼场，频趁集寻衅生事，复请示切禁，场期由绅首带团丁捍卫，遇有不逞，即驱逐离场，若辈渐次敛迹。先大夫稟以团务交雨农兄接办，拟即请咨赴补山西。十月，余随侍先大夫自家启行。由水程入川，抵成都度岁。

冬月，铜仁白号徐孽，被楚军追剿穷蹙，严、赵诸逆悉众上窜阡境。兆督队亲追，并饬经过地方团练尾击。雨农兄遵札挑派得力团丁百人追至走马坪，贼窜余庆。团丁分路撤回。彭若兰等二十八人由白季而走，至乾溪桥边，而李树阶文森带黄茅直桥团练适至，猝然相值，隔溪停驻。时李甫由奉天海澄县丁忧回籍，素鞞缟冠，团众簇簇拥护，立马桥头，意气自雄，举鞭招呼，令弃械至前。彭本李族姻戚，见其左右无非素识，偕诸人欣然向前，备陈奉札追贼撤回缘由，不知李隐怀乡里被贼之恨，遽大声詈骂，谓汝

辈概属红号漏网，死有余辜，岂容巧脱。其团众亦阴挟夙忿，咸思快心以张威勇，不俟语毕，遽合围纷纷捆缚，各以辫发反接其手，争挥白刃，顷刻惨杀二十人，得其侄李官音急前保留八人。李犹不遽释，解府亲献俘获，太守黄公骇异，谓此曹原属奉札追贼之人，清白可信，当时红号肆逆，赖沿河团练密禀请兵，探递信息，屡催进剿，官军莅境，在事出力，贼平蒙奖，今反诬以漏网馀党，无辜冤杀，匪惟若曹有所不甘，即我亦殊不服。而李盛气未平，哓哓折辩，其随从乡人亦复踞坐放言，大受斥辱，轰然而出，径往迎恩寺争住兆太守行馆，趾高气扬。兆闻知冤杀情由，积不能平，见其恣肆无状，即传令围拿，李越墙脱走，余众鼠窜。兆往商黄公会禀请办，接见雨衣兄委婉慰藉，嘱为死者伸雪，以乾溪隶印江，移请印江县亲验详报。李渐萌悔意，邻好亦每为调停和息。时先大夫正在蜀道，兄必欲俟得回示定夺。李驰往省垣探通禀消息，隐图斡旋，兄旋亲往上控，屡经发审局会审，供认确凿，续由臬宪请详革职，亲提研讯。李理屈¹词穷，自知罪无可逭，堂讯之日，泣诉家贫亲老，幸博一第，万里服官，惟求禄养，志愿迄未得展。此事实由惑于浮言，临事不慎，为庸众所误，至今身罹²重罪，亦不敢卸过于人，惟求格外矜全，言辞哀迫，泪流被面，满堂胥隶无不鄙笑。然上游已隐存保全驱命之心矣，待鞠会垣三年，迄未定案，延至己未年教匪窃据荆竹园，蹂躏乡里，祸近眉睫，人心惶惶，家报频至，兄不能再羁留候案，而血属之滞省城者，亦已精疲力尽，知昭雪无期，难望抵偿，只得曲从戚友调处，潦草和息，结案而归。后李文森开复原官，由知县荐升安徽皖南道，署臬司，志得意满，目空一切，为徽抚乔鹤斋中丞松年年终甄别，送部引见，寻以道员发云南委用，行次长沙，暴疾终于省寓。

七年丁己 年二十五岁

正月随侍先大夫住成都青龙街王瑞庵明府兆麟家。瑞庵昔年与盛翼卿同官福建至好，此行盛与结伴游川，故约主其家。

上年先大夫患咳喘，延石阡经历胡绩堂参军济饬医治痊愈，始定行期。舟中两月，饮啖犹健。至成都，同乡旧好之在省者，新年分日招饮，飞觥劝酬，即不胜酒力矣。至是每乐静居，多辞交游讌集，夜眠不能安枕。余私忧之，顿念三晋远在数千里外，老人衰茶渐形，此日轻装远驰，异时设有不讳，后事岂堪设想。即此中道蹉跎，宿疾如作，归途即多忧虞，于是婉谋归计。先大夫自省精力疲困，北行甚虑不支，定计返里。而同乡傅公友麟、犹公自东、吴公秉诤诸年伯犹力劝留省就医。徐新斋之铭以盐茶道升湖北臬司，适入觐北上，方且怱惠力疾赴官，敦促偕行，邛州刺史胡云樵兴倬为绩堂昆弟，又约襄校试卷，均婉辞谢之。二月中别成都而归，三月抵家，五月间喘嗽复作，至闰五月日益加剧，医药无效，渐至不能即枕，惟日夕危坐，犹与侍疾左右者讲论书史，絮谈往事，娓娓不倦。六月初即苦气逆痰壅，言语艰涩，至十四日亥刻弃养，七月安葬牌头先大父母墓侧，遵遗命也。

九月，苗匪大股袭陷镇远府卫两城。总镇杨出御永坡，兵败而逸，都、守各官弁均脱走，张邑侯不知下落，太守吴公登甲被害于五牌大街，男妇死难者无数。府学廩生黎君家四牌坡，素以拳勇著闻，至是闻变，携其子各持兵械出截巷口，左右环击，毙贼甚多。匪不能近，黠贼飞登墙上，以鸱吻下击碎其首，父子同时遇害。事闻，吴公追赠太仆寺卿、荫袭骑都尉，黎君父子及城厢死难者官绅咸蒙赠恤焉。

十二月初五日，思南府属冈家寨致和团匪攻扑府城。府练之堵御大小岩关者，方击贼获胜，贼分股突，从麂子角缘凉水沟冲入，府城失守。太守福公奎乘肩舆抢渡，甫登船，贼随追至，戳伤扑落河中溺死，男妇扑河死者无算。安化县邑侯及游击富珠隆阿均出走。贼盘踞数日，大肆焚掠，弃城仍遁冈家寨。

上年，余侍先大夫游蜀，小住涪城，闻州牧濮篴圃先生瑗语先大夫以秋间鹤游坪滋事，戕害州同琨君。官军往剿，传教匪首刘义顺脱走，闻其遁入黔境，经川省咨黔会缉，惟冀早日成擒，免致苞孽生事，

¹ 屈，原作“曲”，据文义改。

² 罹，原作“隸”，据文义改。

貽禍鄰封。后果以事属隔省，办不认真，致刘逆遁伏冈家寨覃崽崽二家传教煽乱。未及期年，而思南之祸作矣。当其造逆之始，官府亦微有所闻，不早设策翦除以净根株，郡中惟敛费设局，募勇巡防，多备军火，似欲摄以虚声以缓其祸，致逆党得于其间煽惑集事。冬月初，福公犹令其少君富绵率领府练周游查访，各乡安谧，未得确实逆迹，而不知其昼散夜聚，祸水已成。富君但勒令各团赴郡具结，认不谋逆而已。城陷之前，犹有赍结呈投者，不谓富君甫回城，贼股即尾随而至，举事之秘而且速，出人意外，致令富君今日追溯当时情事，犹索解不得也。陷城后，逆党饱掠而归，筑垒冈家寨芋头湾，后称老团，定为巢穴，复到处择据险要，坚修石磊，分置乡正、先锋等目。先锋任攻战，乡正以经理粮糈，尊刘逆为老祖祖，以乞丐小童唤肥坨坨者为伪幼主，覃逆为伪丞相，呼以二先生，逆中之尊称也，是为江外白号。自此惟防邻团攻劫，不知有官军进剿事，而七八年间，官军亦只署提督蒋军门玉龙带川兵驻偏刀水半年，署东道韩公超过河击贼至一碗水失利败归，皆戊午年事。自蒋军退，偏场亦沦为贼窟；韩军败后，而江内地方且被黄号贼蹂躏殆尽，江外贼壤反安堵无惊，俨然别有天地矣。逆势日盛，无他军敢履其境，直至戊辰年川楚官军会剿平贼，地始受兵，而迎降者多，仍不至于大创也。逆之初弃城归也，各路民团至，尽情搜刮，飏忽去来，未几贼复踵至，自此互相出没无虚日，而郡城灰烬矣。是时各团有“八大弟兄”“十大弟兄”之目，八家则关外之罗培之芳林、黎吉园占魁等，十家则许家坝之邓芷侯第武诸人也。又复互相劫杀，争夺攘攷，或反引贼自固，贼转得乘间袭取，逆焰益炽，蔓延日宽，河西顿成化外。次年，新任太守周硕夫献延绰号毛牛者莅任，远驻沿河司，惟知刻意搜求，动辄杀戮，致从逆者益坚其心；即未从逆者，亦挺然角立，与官为仇。如杨得友、田遂辈雄踞一方，虽经后来百计牢笼羁縻，而横暴不为稍敛。其间复有配军李宣忠亦以杀贼起家，保以官阶，得署思南营游击印。募带勇丁概属痞棍，殃民倍甚于贼，郡人苦其扰，而官府不敢过问。数年之后，兼署东道陈文轩太守昌运始授计邓芷侯诱执正其罪，而地方稍安。芷侯由是接署游击印，其平日骁勇善战，冠河西诸团，部勇无饷，惟以袭夺贼垒为生计，谓之打起发，贼垒多为踏毁，及后贼每出巢，相率引避，无敢犯其锋。往时仇视各团，且反颜附之，竟得平贼立功，官湖南总兵。

八年戊午 年二十六岁

守制在家，课诸弟读书新宅。春初，太守黄公督勇亲莅塘头设防，适思南新任周硕夫太守经过，接谈之际，各争属界安设厘局，齟齬生嫌，两部勇丁亦以夺船起衅寻斗，几酿祸端。周知不胜，率所部遁。秋，苗匪窜大地方，郡城戒严。雨农兄督团防堵将军岩，设仁和局筹备粮械。余偕幼兰兄总其事。冬月，大股苗匪复由走马坪下窜，洛桥、白沙各乡悉被焚掠。分股突至红岩，余姻蔡府阖门被害二十馀口，乾溪、凯景一带片瓦无存。至米沙坡为团练截击而退。

The Autobiographical Chronicle Written by Shiqian Chengqiji

Hu Haiqin

Abstract: The Autobiographical Chronicle Written by Shiqian Chengqiji in Guizhou Provincial Museum was written by the squire Chengqiji in Shiqian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which narrated his life stories and family events in different years, and recorded many wars in Guizhou during Xianfeng and Tongzhi years of Qing Dynasty, which provided rare data for studying Shiqian Chengji family and modern history of Guizhou Province.

Key words: Cheng Qiji; his own chronicle autobiography; Xiantong Uprising

责任编辑：王尧礼